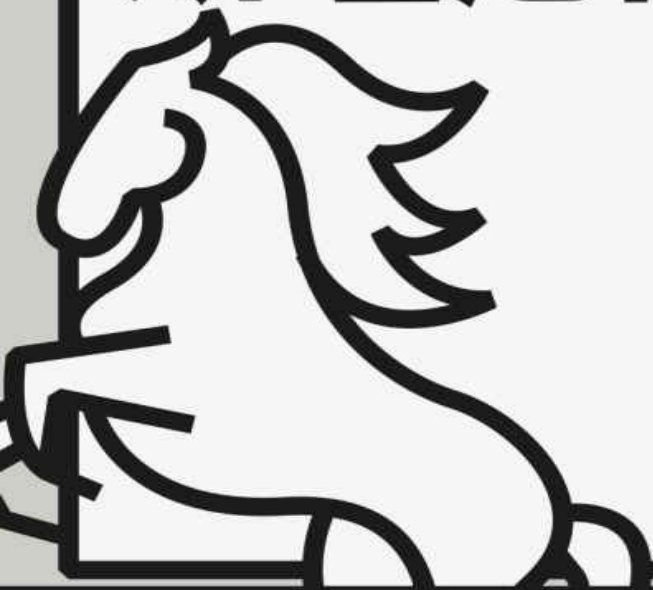


我从哪里来 HERKUNFT SAŠA STANIŠIĆ 德 萨沙· 斯坦尼西奇

著 韩瑞祥 译



德国图书奖获奖作品，火热售出 25 国版权
机智、疯狂、奇妙，轰动欧洲的文坛怪才

我出生在一个如今已经
不复存在的
国家里。

文
景

Horizon

贝尔格莱德红星队、
飞向太空的山羊、
龙守护神、初恋、
祖辈墓地中的井水

.....

往返于记忆与现实，找回正在渐渐消失的故乡

上海人民出版社

我从哪里来 HERKUNFT
SAŠA STANIŠIĆ 〔德〕 萨沙·
斯坦尼西奇 著 韩瑞祥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从哪里来 / （德）萨沙·斯坦尼西奇著；韩瑞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ISBN 978-7-208-16994-4

I．①我… II．①萨…②韩… III．①自传体小说-德国-现代 IV．①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044093号

书 名：我从哪里来

作 者：【德】萨沙·斯坦尼西奇

出 品 人：姚映然

责任编辑：杨沁

转 码：欣博友

ISBN：978-7-208-16994-4/I·1948

本书版权，为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所有，非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进行编辑、翻印、仿制或节录。

文
景

Horizon

豆瓣小站：世纪文景

新浪微博：@世纪文景

微信号：shijiwenjing2002

发邮件至wenjingduzhe@126.com订阅文景每月书情



阅 读 未 来

豆瓣douban



bilibili



远而近的阅读
一起做个有趣的书呆子！

关注“世纪文景”



Original title: HERKUNFT by Saša Stanišić

© 2019 by Luchterhand Literaturverlag

a division of Penguin Random House Verlagsgruppe GmbH, München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1 by Horizon Media Co., Ltd.,

A division of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Die Übersetzung dieses Werkes wurde vom Goethe-Institut e.V gefördert

本书获得歌德学院全额翻译资助

译者前言

萨沙·斯坦尼西奇（Saša Stanišić, 1978—）是德国当今文坛的佼佼者。他一部又一部引起震撼的作品为当今德国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引起读者和学界广泛的关注和青睐，因此也接二连三地获得了令人仰慕的殊荣。他2019年3月发表的新作《我从哪里来》又一举成为德语文坛上好评如潮的热门话题。这部“令人赏心悦目的神奇之作”赢得了2019年德国图书奖，堪称实至名归。

斯坦尼西奇出生在波斯尼亚小城维舍格勒。1992年，在波斯尼亚战乱中，他与父母逃亡到德国海德堡。他与众不同的成长经历造就了德国当代文坛上的一个奇迹：在短短十几年时间里，他从一个连德语字母都不认识的14岁难民一跃成为德国当今新生代作家中当之无愧的杰出代表。从走上文坛开始，斯坦尼西奇就始终把充满伤痛的移民经历视为其文学创作的背景。对他来说，写作就是把人生最深切的经历与独特的叙事方式融合成具有张力的艺术图像，使之饱含历史的底蕴和时代的活力。他也因此成为德国当今移民文学的领军人物。2006年，斯坦尼西奇发表了她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士兵如何修理留声机》（*Wie der soldat das Grammofon repariert*），开始在德国文坛上绽放异彩，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在这部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中，作者刻画了一个来自波斯尼亚的年轻人形象。小说叙事富有诗意，又诙谐幽默，很快就被翻译成30多种文字并成为经久不衰的畅销书。斯坦尼西奇因此先后获得了德国图书奖最终提名奖（2006年）、不来梅城文学奖（2007年）和沙米索文学奖（2008年）。他的第二部小说《我们与祖先交谈的夜晚》（*Vor dem Fest*, 2014年）被批评家誉为当今德语文坛上“令人耳目一新的事件”，当年就获得了莱比锡书展大奖。这部小说讲述的是柏林墙倒塌后发生在一个曾属于东德的小村庄的故事。作者在时空交错的叙述主线上，断片式地勾勒出发生在这个地方的一个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事件以及活动在其中的形形色色的小人物。读者在这里所感受到的是，一个小村庄那平淡无奇的现实深深地承载着启人深思的大千世界，一个个穿插其中的真实或虚构的历史事件无不蕴含着对现实的深刻启示。

自传体小说《我从哪里来》是一本讲述躲避战乱经历的书，一本讲述家乡兴衰的书，一本回忆与虚构的书，一本描写“幸福与死亡”的书，一本“告别奶奶”的书。小说41岁的叙述者以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和独具一格的叙事技巧，绝妙地融贯了传记式的断片和超凡的虚构，展现出一幅感人至深、令人回味无穷的“我是谁”和“我从哪里来”的出身图像：他讲述了他的祖先的人生片段，讲述了他在如今已经不复存在的祖国南斯拉夫的童年经历，讲述了他与父母一起逃离波斯尼亚战乱、流落到德国海德堡的苦痛，讲述了德国当下的移民问题，讲述了家乡和出身的意义。在这本书里，作者彻底打破了自传体小说编年史式的现实主义叙事模式，一如既往地采用了独具风格的断片表现形式。如同此前的《我们与祖先交谈的夜晚》一样，《我从哪里来》的叙事时空变换自如，当下与历史交错，真实与虚构融贯，多视角和断片式地表现出一个层次丰富、错综交织的“出身”万花筒。叙事主线飘忽不定，时而柳暗花明，时而高屋建瓴，时而启人深思，时而会令人心痛和伤感。这种开放式的“出身”图像奠定了小说叙事的独特基调，构成了小说叙事的内在动因。

在这部小说里，斯坦尼西奇要讲述的是出身以及出身对他和所有人，特别是生活在德国的难民意味着什么。小说交替变换的叙事视角游弋在过去与当下的瞬间。伴随着断片式和充满幽默的叙事流，一次次相遇、一个个瞬间、一段段回忆交织成一个“我从哪里来”的

多层镜像，给读者带来了深深的震撼。斯坦尼西奇谈及小说时说：“《我从哪里来》的叙事是悲伤的，因为对我来说，出身与那不再可以拥有的东西息息相关”，因为在这个时代里，“出身和出生地又成为区分人的根本标志”。

出身是什么？这是贯穿小说叙事始终的问题。对叙事者来说，出身“永远是一种身份建构！一种服饰，一旦它罩在你的身上，那你就不得不一辈子穿着它。这样的服饰是一种魔咒”。出身是一种包罗万象的东西，决定着人的命运，甚至连叙述者姓名上的小钩也会成为妨碍生存的出身象征。小说中一个个人物的命运似乎都是出身的造物，而出身的魔咒潜藏在字句的叙述中。这一切从不同的视角构成了叙述者的出身，也铸就了叙述者的命运。

父母是叙述者的出身。叙述者的父亲是塞尔维亚人，母亲是波斯尼亚穆斯林。当他出生的那个国度还存在时，他认为自己是“南斯拉夫人”，“我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孩子，是两个彼此相爱的人的结晶和自白，而南斯拉夫大熔炉将他们从不同的出身和宗教信仰的桎梏中解救了出来”。然而，当穆斯林成为迫害的对象时，他们不得不逃出家园，流亡到德国，成为难民。作为政治学家的母亲无可奈何地进入酷热的洗衣房里辛勤劳作；身为企业经济学家的父亲则忍辱负重沦落到建筑工地上。因为出身，他们在德国遭受着所有难民所遭受的种种屈辱，还时刻面临着被遣返的危险。他们迫不得已移民去了美国。当他们最终回到故乡时，却感到那里比陌生的地方还要陌生。因为出身，他们似乎成为无家可归的“流亡者”。

外公外婆是叙述者的出身。外公穆罕默德曾经是南斯拉夫时代的火车司闸工。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博爱主义者。他不相信有全能的神。他为人友善，乐于助人，关心家庭，喜欢钓鱼，“他是我迄今可能认识的最无私的人”。外婆梅耶玛会拿红芸豆来算命。她能通过抛撒芸豆看出叙述者的未来，看出预示他的未来的图像。她劝叙述者一辈子都要说话算数。这样，“就算并非事事称心如意，至少会少遭受一些痛苦”。然而，穆斯林出身的命运使她们也不得不背井离乡逃亡到德国。外公“是我们当中在德国最少感到幸福的人”，但他一如既往为人友善，知恩图报，永远不愿意说出心里不快。又因为出身，外公外婆后来被遣送回去了，但他们不能回到自己的家乡维舍格勒，只能客居他乡，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不言而喻，出身最终成了他们无法摆脱的“魔咒”。

南斯拉夫、维舍格勒和海德堡是叙述者的出身。它们共同承载着他人生变幻莫测的命运，亦是他出身的见证者。叙述者视自己为南斯拉夫人，因为他的幸福童年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留在了曾经的祖国南斯拉夫。可这个多民族国家瞬间土崩瓦解了，不复存在，成为他永远抹不去的记忆。德里纳河畔的小城维舍格勒是他的出生地和家乡，在爷爷奶奶身边度过的童年时光是他人生最美好的回忆。在他的心里，奶奶永远是守在他身边的保护神。然而，分崩离析的南斯拉夫战乱又使他失去了这个魂牵梦绕的家乡。一家人被迫流落到世界各地。当叙述者多年后再回到家乡时，昔日熟悉的一切变得面目全非、丑陋和陌生，甚至连记忆在这里也失灵了：“维舍格勒几乎再也不是一个让人感到无忧无虑的地方。几乎没有一段回忆是纯粹个人的。几乎没有一段回忆不需要补遗，不需要对案犯和蒙难者以及发生在那里的暴力行径做出注释。”家乡已经不再是叙述者记忆中的家乡了。海德堡是叙述者1992年逃亡的归宿，也是新的开端。在他看来，“每个家都充满了偶然性……那些能把握这种偶然性的人是幸运的”。作为难民，他流落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与其他难民遭受到同样的屈辱。在这个对巴尔干人充满偏见的国度里，他生存得如履薄冰，时刻面临着被遣送的威胁。尽管如此，在这个“偶然的家乡”里，叙述者从不放弃去寻求归属感和家的感觉；他宁可什么都是，但绝不愿意成为一个陌生世界的牺牲品。在这个过程中，“家乡”大夫成为他“融入社会的引路人”。小说中，这个宽厚仁慈的形象是原本意义上家乡的

象征，亦是叙述者梦寐以求的“家乡”的理性投影。

奶奶是叙述者的出身。奶奶是小说叙述的中心。出现在小说第一章的奶奶已经是一个身患阿尔茨海默病的耄耋老人，失去了对现实的感知，沉陷于逝去的岁月里。这就是叙述者“正好要书写的东西……当奶奶克里斯蒂娜开始失去记忆时，我便开始收集记忆”。2009年回维舍格勒看望奶奶的一幕是反复出现在叙述者记忆里的刻骨铭心的画面，成为他不断反思和认知出身的契机。奶奶让他看到了爷爷的家乡——奥斯科鲁沙，一个给他的出身打上烙印的波斯尼亚小山村：这里留下了奶奶人生诸多的回忆，也让身临其境的叙事者感慨万千。在这个祖祖辈辈生存的地方，“我从哪里来”不可阻挡地萦绕在叙述者的脑海里。这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叙述者在这里所经历的一切，自然而然地成为“一种原始画面，我似乎在其中看到了我与祖先们息息相关的自画像”。奶奶是小说中一个承上启下的人物，是叙述者心中过去与当下交织在一起的出身，是叙述者收集记忆和追问出身的源泉。当日益失去现实感知的奶奶觉得她当下的家不再是她的家时，她“痴呆地”陷入了一个逝去的世界里。叙述者在这里收集的一个个回忆让他认识了原本记忆中模糊的爷爷，寻觅到了他们人生的足迹，开始不断地追问起“我是谁”和“我从哪里来”。叙述者甚至追随着奶奶，乘龙进入神话般的龙的王国里，见到复活的爷爷，和他一起回到维舍格勒那温馨可爱的家。对叙述者来说，没有奶奶，就没有家乡；没有奶奶，曾经熟悉的一切都变得陌生。在与奶奶亡灵的对话中，过往的一个个情景和一个个细节无比清晰地展现在叙述者的眼前，成为读者感知其描写的出身的镜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奶奶对当下的“痴呆”和对过去的眷恋或许就是叙述者追寻“出身”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隐喻。

小说结尾部分，叙述者让断片叙事模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也赋予这部分一个独立的标题《龙——守护神》。在这里，叙述者不断地变换叙事视角，现实与神话世界此起彼伏，交相辉映，奶奶几乎变成了一个与叙述者相依为命的神话人物。在这里，一个个真实与虚构的断片既是叙述者内心反思的自我对话，更是他与奶奶在现实与虚构层面上的直接交流，同样也是他对读者的呼唤。在这样的叙述过程中，叙述者甚至让读者进入了一场游戏式的叙事模式：读者可以自己决定，这里所表现的断片故事如何发展下去，去感知和回答“我从哪里来”这个问题。在叙述者夹带着伤感的幽默笔调下，一个个似真似幻的断片相映成趣地交织在一起，展现出一种多姿多彩、层次丰富的“出身”图像。这种开放式的断片叙事无疑给读者留下了无限广阔的想象和思考空间。

《我从哪里来》是一部充满智慧的小说，一部诙谐幽默的小说，一部令人感伤动情的小说。叙述者以简洁明快和深邃犀利的笔触，让读者自然而然地进入了一个马赛克式的“出身”世界里，时而让你感到幽深莫测，时而让你感同身受；虚虚实实，活灵活现。在整个叙述中，一个个铸就出身的亲人，一个个象征出身的事件，一个个决定出身的地方流动在过去与当下错综交织的断片叙事中，游刃有余，错落有致，形成了一个互相依存、相得益彰、层次丰富和启人深思的叙事图像。叙述者在这里完全摒弃了编年史式的情节表现和环环相扣的发展过程，而以情深意切的语言、生动可感的图像、轶闻趣事式的断片和神话般的想象让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故事说话，画龙点睛一般勾勒出一个逃亡到德国的年轻难民那充满伤痛但又锲而不舍地与出身命运抗争到底的内在世界。小说的描写形似散而神不散，幽默中夹带着伤感，而伤感中又潜藏着克服出身障碍的生存意志。可以说，这样的断片叙述是叙述者大胆的艺术尝试，是对自传体小说艺术一个值得赞赏的贡献。这样的叙述如同一部交响曲，多层交织的回音久久地萦绕在读者的耳旁，韵味无穷。小说所表现的“出身”图像既是叙述者的出身图像，又是当今世界难民问题的反映。在这个世界里，叙述者着意“建立的是一个自己的世界，而不是再现我们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生活在其中的人会说话，江河会说话，祖先会说话，记忆会说话，家乡会说话，一个个决定生存命

运的地方会说话，这一切都是出身的标志和象征，因为它“是一个由创造、感知和回忆组成的开放性体系”。这也许就是叙述者如此叙事的意图所在。

这是一本会激励读者想象和思考的好小说，值得一读。

小说《我从哪里来》的翻译属于德国歌德学院2019年协作翻译项目（Social Translating Project）之一，受到该院资助。译者也应德国施特拉伦欧洲翻译学院（Europäisches Übersetzer-Kollegium Straelen）之邀，于2019年9月至11月在那里驻站三个月，有机会与作者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同人进行交流，解决了翻译中的诸多问题。译者在此一并表示深切的谢意。与此同时，译者 also 期待同人和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韩瑞祥
2019年11月于北京

目 录

[译者前言](#)
[奶奶和小姑娘](#)
[写给移民局](#)
[滑雪橇](#)
[游戏、我和战争，1991年](#)
[奥斯克鲁沙，2009年](#)
[迷失在陌生的异乡，行走在光线昏暗的时间洞穴里](#)
[一个节日！](#)
[乡村客厅里的地板嘎嘎响](#)
[奶奶和士兵](#)
[米罗斯拉夫·斯坦尼西奇教他的羊群怎样过日子](#)
[名字上的小钩](#)
[断片](#)
[艄公必须会游泳吗？](#)
[奶奶与轮舞](#)
[诚实、正直、坚持不懈](#)
[混血儿](#)
[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
[奶奶和铁托](#)
[在鞋盒里，在抽屉里，在科涅克白兰地里](#)
[爷爷漫不经心和全副武装](#)
[奶奶和婚戒](#)
[北极附近](#)
[格蕾琴问](#)
[母亲喜欢喝咖啡时抽支烟](#)
[海德堡](#)
[布鲁斯·威利斯说德语](#)
[被束缚的双手](#)
[吊死他们！](#)
[施瓦茨海德，1993年](#)
[照相写实主义绘画](#)
[我，斯洛文尼亚人](#)
[魔兽向城堡蜂拥而来](#)
[你今后打算干什么？](#)
[枪口上的出身](#)

[奶奶和电视遥控器](#)

[“家乡”大夫](#)

[瞎折腾](#)

[彼此让人把话说完](#)

[客人们](#)

[只是说说罢了（客人们，1987年）](#)

[奶奶要离开这里](#)

[烤全羊](#)

[阿拉尔加油站文学](#)

[听到了吗，沃伊泰克是怎样匍匐来到埃默茨格伦德的？](#)

[外交手段，1994年](#)

[皮耶罗来自阿普利亚大区的卢切拉城](#)

[危急的比赛局势](#)

[文学黏合剂](#)

[父亲和蛇](#)

[奶奶吃桃子，不给那个掘墓人任何东西](#)

[看样子，仿佛你听到头顶上翩翩起舞的响动](#)

[奶奶和生日](#)

[青年接力棒](#)

[我们从来没回过家](#)

[穆罕默德和梅耶玛](#)

[奶奶和牙刷](#)

[也许有一列火车开过来](#)

[不管怎样，日子毕竟还要继续下去](#)

[总是没人帮忙](#)

[奥斯克鲁沙，2018年](#)

[向阳一面很甜蜜，背阴一面很苦涩](#)

[天天如此](#)

[必须谨防要你去回忆的人](#)

[后记](#)

[龙——守护神](#)

[致谢](#)

奶奶和小姑娘

奶奶看到大街上站着一个小姑娘。她从阳台上向小姑娘大声呼喊，让她别害怕，她就去接她。你站着别动！

奶奶只穿着袜子奔下楼去，要下三层楼，她走啊走啊，踉踉跄跄，膝盖不听使唤，上气不接下气，腰也酸，背也痛。当她来到小姑娘刚才站着的地方，小姑娘却不见了踪影。她呼喊着小姑娘的名字，问小姑娘在哪儿。

一辆辆汽车刹车减速，绕开只穿着薄薄的黑袜子站在大街上的奶奶。这条街曾叫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大街。而今天，那个消失的小姑娘的名字回荡在这大街上。克里斯蒂娜！奶奶呼喊着她，她呼喊着自己的名字：克里斯蒂娜。

这事发生在2018年3月7日，地点是波黑的维舍格勒。奶奶87岁了，同时也是11岁。

写给移民局

1978年3月7日，我出生在德里纳河畔的维舍格勒。在我出生前的几天里，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在维舍格勒，3月是最令人厌恶的日子，淫雨霏霏，危机四伏。山里的冰雪开始融化，洪水肆意地漫过一条条河流的堤岸。我们的德里纳河也同样躁动不安，波涛汹涌。半座城池都淹没在洪水里。

1978年的3月也一如既往。当母亲开始感到分娩前的阵痛时，猛烈的暴风雨怒吼着席卷过整个城市。狂风似乎势不可当地要吹走产房的一扇扇窗户，把人们的感受稀里哗啦地搅成一团。就在母亲出现又一次阵痛的时刻，天空电闪雷鸣，于是大家都心想着，噢，天哪，莫非魔鬼现在要降临人世了。这事对我来说算不上什么不吉利，我反倒觉得很好，因为在你压根儿还未来到这世上时，人们就有点惧怕你了。

分娩过程的一切迹象都不免让母亲感到忐忑不安。接生婆同样觉得当时的情况似乎不妙，一言以蔽之，接连不断地出现难产征兆，于是她便把我母亲打发到医院值班的女大夫那里。就像此时此刻的我一样，女大夫不想让这个故事毫无必要地延伸下去。或许这样说就足够了，借助一个接生吸盘，那一个个难产征兆便轻而易举地被化解了。

30年后，也就是2008年3月，为了取得德国国籍，我必须向移民局呈递一份亲笔书写的履历。这是怎样的煎熬啊！第一次尝试时，除了填上我生于1978年3月7日的信息外，别的我什么都写不出来。仿佛从那之后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仿佛我的履历被德里纳河彻底冲走了。

德国人喜欢各种各样的表格。我列了一张表，也填上了一些数据和信息——在维舍格勒上小学，在海德堡学习斯拉夫语言文学——然而我觉得，这些东西与我毫不相干。我心知肚明，这些信息准确无误，但却无法让它们留在纸上。我难以相信自己有过这样一些经历。

我又从头写起。又写上我的出生年月，描写了那场大雨，填写上我的名字是奶奶起的。在我人生最初几年里，奶奶一直照看我，因为我母亲正在读大学，父亲忙于工作。奶奶是黑社会的人，我给移民局这样写道，干黑社会这一行，有的是时间照看孩子。我生活在奶奶和爷爷家里，周末才会回到父母身边。

我给移民局写道：我爷爷佩罗拥有党员证，是个全心全意的共产党人，常常带着我和他的同志们一起散步。当他们谈论起政治时，我就美美地进入梦乡。说实在的，他们谈论的话题向来离不开政治。到了4岁，我便可以参与他们的谈论了。

我擦掉奶奶与黑社会相关的一切。这事反正永远都不会有人知晓。

取而代之的是：我奶奶有一根擀面杖。她常常吓唬要拿它来揍我。可我从来都没挨过揍。但时至今日，我对擀面杖始终有点敬而远之，间接地也对面食抱有同感。

我写道：奶奶有一颗金牙。

我写道：我也想要一颗金牙，于是我用彩笔把我的一颗门牙涂成了金色。

我给移民局写道：宗教信仰——无。我是在异教徒中长大的，地地道道无信仰。我爷爷把宗教称为人类最大的罪孽，因为罪孽就是由宗教发明的。

爷爷出身于一个崇拜圣格奥尔格，也就是屠龙山的山村，或者说人们偏爱的是龙本

身，至少我当时觉得是这样。我很早就接触到了龙的形象。亲人们的脖子上挂着形形色色的龙饰，带有龙图饰的钩织品是人们喜闻乐见的小礼物。爷爷有一个叔叔，他用蜡雕刻出各式各样的小龙，拿到市场上当蜡烛卖。只要一点上烛芯，便会出现美妙的情景；瞧那小家伙，仿佛它会喷吐火焰似的。

当我长到半大年岁，爷爷拿出一本画册让我看。我觉得远东的龙无比美妙。它们看上去挺残忍，但却显得五彩缤纷，兴致盎然。而斯拉夫的龙看上去只有残忍，连那些所谓可爱的、对制造灾难或引诱少女不感兴趣的家伙也不例外：三头六臂，龇牙咧嘴，让人望而生畏。

我给移民局写道：我出生的那家医院已经不存在了。天哪，我的屁股在那里挨了多少针青霉素啊，我写道。可又把它划掉了。没错，谁都不愿意用这样的词语让一个有可能扭扭捏捏的女办事员心烦意乱。于是我把屁股改成了臀部。但我觉得这样做不合适，我又划掉了填好的全部信息。

我过10岁生日时，在我们这个名叫马哈拉的城区里，鲁扎夫河给我送来了一个礼物，它摧毁了那座桥。我站在河岸上观望，随着山里春天来临，德里纳河那条支流如此长久地冲击着这座桥，直到桥开口说，好吧，你干脆连我一起冲走算了。

我写道：没有对童年那自由自在的岁月的描写，就没有传记叙事可言。于是我用大写字母在纸的中间写道：

滑雪橇

这条经典的滑雪道始于格拉德山峰顶下方，转过一个狭窄的弯道后止于深渊前。中世纪时，格拉德山峰下有一座城堡守卫着山谷。这时，我不禁回想起胡索来。他肩上扛着一个破旧的雪橇，缓慢艰难地登上格拉德山，一边笑着，一边气喘吁吁。我们这帮孩子们也跟着笑，嘲笑他，因为他长得像麻秆，靴子上满是窟窿，牙齿稀稀拉拉。一个疯子，我当时心里这样想，而现在却寻思着，他压根儿只是我行我素，独来独往。你在哪儿睡觉，你穿什么样的衣裳，你怎样不折不扣地说出一句话，你的牙齿成了什么样子，要说这些，他与绝大多数人迥然不同。确切地说，胡索不过是一个无业酗酒者。他没有在深渊前停住雪橇。也许因为我们没有提醒他终端有弯道。也许他的理智在酗酒中毁掉了。胡索大声地呼叫着。我们走上前去，情不自禁地爆发出一阵幸灾乐祸的叫喊：胡索坐在他的雪橇里，而雪橇则挂在半坡的小树丛上。

“继续前进吧，胡索！”我们齐声大喊着，“一鼓作气冲下去！”我们的喊声激励了他，首先因为事实就明摆在面前，陷入这样的窘境，向下比向上更容易。于是胡索挣脱小树丛，顺着陡峭的山坡，嗖地滑下去了。简直难以置信，我们兴奋极了。1992年，胡索在他位于德里纳河畔的棚屋里被人开枪打伤了。他的家是用纸板和木条搭建起来的，离城堡不远。在那里，塞尔维亚英雄王子马尔科⁽¹⁾当年为了躲避奥斯曼人的追杀找到了避难的地方；在那里，波斯尼亚的阿利亚·德泽莱兹⁽²⁾骑着他长着翅膀的阿拉伯牝马跃过德里纳河；在那里，不管你问谁，人们都会给你讲述这样的故事。那些古老的史诗歌颂着这样的英雄。胡索躲过这一劫，之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再也没有回来过。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如此经受这条经典滑雪道的考验。

我写下了一个故事，它是这样开头的：如果有人问我，家乡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那我就给他讲一讲“家乡”大夫的故事。他是最初帮助我融入社会的引路人。

我给移民局写道：我是南斯拉夫人，尽管如此，我在德国从来没有偷过什么东西，除了在法兰克福书展上顺手拿走几本书之外。在海德堡，有一次，我在一个露天游泳池里划过皮筏子。我擦掉这两件事，因为这或许是犯罪行为，而且还未过追诉期。

我写道：这就是我所经历的一系列事情。

(1) Marko (1335—1395)，马其顿西部地区统治者，1371年至1395年是今塞尔维亚地区法律上的国王。——中译注，本书注释如无特殊说明均为译者注

(2) Alija Đerzelez，波斯尼亚史诗英雄，是该地区的穆斯林以历史人物为原型创作出的文学形象。

游戏、我和战争，1991年

这就是我所经历的一系列事情：

母亲和父亲。

奶奶克里斯蒂娜向来都知道我需要什么。只要她给我送来她亲手织好的小外套，那就是我真的感到寒冷的时候。我只是不愿意承认而已。哪一个孩子愿意承认他的奶奶无论什么时候都做得对呢？

我的外婆内娜·梅耶玛会从红芸豆里看出我的未来。她撒出一把红芸豆，它们会在地毯上显现出预示未来的图像。她有一次预言说，会有一个年龄较大的女子爱上我，或者我的牙齿恐怕会掉个精光，因为红芸豆呈现出一种模糊的图像。

惧怕红芸豆。

我有一个胡子永远刮得干干净净的外公。他喜欢钓鱼，对谁都非常友善。

南斯拉夫。可是这个国家不会再长久了。社会主义疲倦了，民族主义觉醒了。各种旗帜随风飘扬，人人心中都有一面自己的旗帜，而在大家的脑海里则盘绕着一个问题：你是什么？

面对我的英语老师，我情不自禁地产生了一些莫名其妙的感觉。

有一次，她邀请我去她家里。直到今天，我都不明白为什么。我去了，激动得犹如万物苏醒的初春。我们一边吃着英语老师亲手烤的蛋糕，一边喝着红茶。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喝红茶，我觉得自己一下子完全长大成人了，但是我却装作自己多年来一直都喝红茶的样子，脱口说出了那句行话：“如果它不是这么黑乎乎的话，我倒还挺喜欢喝的。”

我有一台C-64电脑。我嗜好运动游戏，比如《夏日游戏》《国际空手道》《国际足球》等。

我有许多书。1991年，我发现了一种新的文学种类：请选择你自己的冒险之旅。作为读者，你可以自己决定故事的进程：

你喊道：“让开，地狱里的魔鬼，不然我就割断你的喉咙！”——接着阅读[此处](#)。

我有我喜欢的球队：Crvena Zvezda，即贝尔格莱德红星队^[1]。80年代末，我们在五年内三次获得冠军称号。1991年，我们挺进了欧洲冠军联赛四分之一决赛，对阵德累斯顿火车头队。只要有重要比赛，便会有十多万球迷聚集在贝尔格莱德马拉卡纳体育场，其中至少有一半是疯狂的球迷。体育场里总是一片火热，大家齐声高唱，齐声欢呼。

上小学时，我常常围着那条红白条相间的围巾，夏天也喜欢围着它，同时为未来制订一个个能让我接近红星队的计划。我要成为足球运动员，并且被红星队以一百亿第纳尔（考虑通货膨胀因素）买走。我看这条路走不通，希望似乎十分渺茫。于是我就想成为理疗师或足球管理员。要我看，变成足球也行，关键是，我能成为红星队的一员。

我不放过任何一次广播里的比赛实况，也不放过任何一次电视里播放的比赛集锦。过13岁生日时，我渴望得到一张足球比赛年票。

内娜询问红芸豆后说：“你可以得到一辆自行车。”

芸豆怎么能知道这事呢？我问道。

她重新撒了一把芸豆，并且一本正经地说：“今天你过生日，可千万别出家门。”她说完话站起来，将手里的芸豆扔出窗外，洗洗手便去休息了。

我的愿望并没有可能实现，因为贝尔格莱德距离我们家差不多250公里之遥。尽管如此，作为独生子，我心存侥幸，期待着父母有朝一日会因为我而下定决心把家搬到首都去。

3月6日，红星队在首场比赛中3：0横扫德累斯顿火车头队。父亲和我一起观看比赛直播，进了第一个球后，我们的声音就已经变得嘶哑了。等到终场哨声一响，父亲把我拉到一旁说，要是红星队能晋级，他就会想方设法为我们弄来半决赛门票。他所说的我们，当然也包括母亲。然而母亲只是一个劲儿地用食指敲着太阳穴。

第二场比赛在德累斯顿进行，当比分变成1：2时，球场出现了骚乱。比赛随之中断了，裁判最终判我们3：0取胜。半决赛抽签对阵巴伐利亚。当时从理论上讲，对手是不可战胜的。父亲和我又一起在电视里观看了半决赛首场比赛直播。中场休息时，电视里报道了发生在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数起骚乱。枪声四起，人心惶惶。红星队射中了两球，巴伐利亚队只进了一球。

事情就是这样：我出生的那个国度如今已经不复存在了。当她还存在时，我一直认为自己是南斯拉夫人，就像我父母一样。我的父亲出身于一个塞尔维亚人家庭，母亲则出身于一个波斯尼亚-穆斯林家庭。我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孩子，是两个彼此相爱的人的结晶和自白，而南斯拉夫大熔炉将他们从不同的出身和宗教信仰的桎梏中解救了出来。

你必须要知道：如果某人的父亲是波兰人，而母亲是马其顿人，那他当然就可以表明自己是南斯拉夫人，只要他觉得，自我决定与血缘比他者决定与血统更重要。

1991年4月24日，父亲和我驱车前往贝尔格莱德观看半决赛第二场比赛。我让那条红白相间的围巾在车窗外飘扬，因为作为真正的球迷，你在电视里看到大家都是这样做的。到了体育场时，围巾已经脏得不成样子。看到这样的情形，谁也不会提醒你。

1991年6月27日，首先在斯洛文尼亚发生了一些战争行动。这个阿尔卑斯山共和国宣布脱离南斯拉夫，实行独立自主。随之而来的是在克罗地亚爆发的一个个局部冲突，白色恐怖笼罩，接着就是克罗地亚宣布独立。

1991年4月24日，塞族后卫西尼沙·米哈伊洛维奇依靠任意球进球，使得红星队领先。对方球员之前对德扬·萨维切维奇犯规，导致了这个任意球。萨维切维奇来自黑山，是一个技术娴熟的中场球员。八万多观众齐声欢呼，响声震耳欲聋，令人毛骨悚然。今天我恐怕可以断言，那响彻云天的欢呼声似乎就是愤怒的大爆发，是被压抑的本能反抗的大爆发，是生存恐惧的大爆发。然而这样说也不对。这一切似乎是后来才从枪炮里爆发出来的。当时那里所发生的，无非只是欢呼庆祝一个举足轻重的进球。

看台上燃起一片火把，红彤彤的烟雾弥漫在球场上方。我高高地拉起围巾遮住脸。我们周围人声鼎沸，喊声震天，几乎清一色的男人，清一色的小伙子，各种奇形怪状的发型，烟头飞来飞去，拳头在空中挥舞。

普罗西内茨基在中场灵活地盘来带去，如同穿越无人之境，没人可以阻挡，一再让巴伐利亚人大乱阵脚。他那一头淡黄色的浓发宛若一个小太阳，时而升起在草地上，时而又沉落在上面，对手没有什么办法来对付他。一个像我一样的南斯拉夫人：母亲是塞尔维亚

人，父亲是克罗地亚人。他的运动短裤提得高高的。两条腿白晃晃的。

雷菲克·萨巴纳佐维奇紧紧地压住后场，一个令对手难以防范的波斯尼亚人，矮小壮实，速度惊人。那个我所喜爱的球员好像在对手的罚球区前懒洋洋地荡来荡去——达尔科·潘切夫，人们通常叫他科布拉。那个马其顿前锋在球场上奔跑时始终微微向前弯着身子，耸着肩膀，仿佛他正好今天身体不太舒服。第一回合比赛时，他打进了一球。瞧瞧那两条天底下最弯曲的腿，我多么想也能长两条这样的腿啊。

一个多么神奇的球队！这样一支球队永远不可能在巴尔干半岛再出现了。南斯拉夫解体以后，每个新的国家都成立了新的足球协会和实力弱小的球队，那些最优秀的球员如今早已被交换去了国外。

下半场中间，巴伐利亚人和红星队踢成了平局。奥根塔勒进了一个任意球，球滑过斯托扬诺维奇的十指入网。红星队队长沮丧地躺在草地上，罗马尼亚族（塞尔维亚少数民族）前卫贝洛代迪奇上前去安慰他。

向来很少大声说话的父亲吼叫着，抱怨着，咒骂着。我也学着父亲的愤怒，可我压根儿就不知道自己的愤怒是怎么回事，也许它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我周围所有人都如此怒不可遏。也许是因为我心里明白，一切都会变好的。而恰好就在我要告诉父亲一切都会变好的那一刻，巴伐利亚人又破门领先了。

父亲一下子像泄了气的皮球。

几乎正好就在一年以后，父亲从容地问我，哪些物品对我来说很重要，如果不随身带上它们，我就不能踏上一段或许十分漫长的旅程。他所说的这段漫长的旅程指的是逃离我们被占领的故乡之城。在这里，一群喝得醉醺醺的士兵高唱着他们的歌曲，仿佛正在为一支球队加油。这时，我立刻就想到了那红白条相间的围巾。我知道，还有更重要的东西要带。尽管如此，我还是把它带上了。

父亲说：“别害怕。一切都会变好的。”

要是比赛结果定在1：2的话，那就少不了加时赛。^②也许巴伐利亚人后来脚法更好，战术思想更胜一筹，便会顺理成章进入决赛。也许后来压根儿就不会发生所有别的事情，战火也不会烧到波斯尼亚，我也不会提笔书写这样的东西。

我当时没有看到2：2是如何发生的。在那个时刻，终场哨声吹响，所有人都站起来了，整个体育场都站起来了，甚或整个国家最后一次站起来了，成为一件事情的后盾。这次关乎成败的进攻，我只能看到奥根塔勒做着假动作晃来晃去，球随之迎着大门飞去。接着，我们前面的人，我们左右两旁的人都涌动起来，整个看台都涌动起来，向左，向上，我被挤来挤去，暂时失去了平衡，眼前也不见了球的踪影——

我曾多少次反复观看这个进球呢？肯定有百余次之多。直到每个细节都铭刻在我的记忆里，犹如某些人拿来与伟大的爱情或者莫大的不幸相提并论的东西。奥根塔勒打算从外围传中，却不幸将球踢进自家球门，球在空中划出一道闪亮的弧线应声入网。

这就是我所经历的一系列事情：

在德里纳河畔一座小城里度过了童年时光。

收藏了一些从汽车上拧下来的尾灯。仅有一次因此挨过父母一顿揍。

有一位依照红芸豆排序算命的外婆。她劝我一辈子都要说话算数。这样一来，就算并非事事称心如意，至少会少遭受一些痛苦。或者好好打拼，过上称心如意的日子。在这一

点上，红芸豆似乎没有给出确切的说法。

我养过两只虎皮鹦鹉，乖乖（浅蓝色）和巧巧（再也想不起来是什么颜色）。

养过一只名叫印第安纳·琼斯⁽³⁾的仓鼠。在它短暂生命的最后几天里，我给它喂了一小勺研磨成粉状的安多尔药片（我自己头痛时服用），并且给它朗诵了伊沃·安德里奇⁽⁴⁾的小说。

常常患头痛。

经历过一次几乎不可能的旅程，与父亲一起前往观看一支令人难以置信的球队的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比赛。这支球队晋级以后会在贝尔格莱德最终赢得比赛冠军，但从此以后这一切变得令人难以想象。

一场不堪设想的战争。

一位英语老师，我从来没向她说过一声再见，也不再有可能说一声再见了。

一条红白相间的围巾，从贝尔格莱德举行的那场比赛以后，我就再也不打算洗它了，可它后来还是进了洗衣机。贝尔格莱德红星队如今成了一支拥有许多好斗的极右球迷的球队。我当年把那条围巾带到了德国，可我不知道它如今在哪儿。

⁽¹⁾ 塞尔维亚获得最多联赛冠军的球队，1991年赢得欧洲冠军联赛冠军，其标志由红、白两色组成。

⁽²⁾ 由于半决赛首场比赛中，红星队2：1胜出，故第二场比赛如红星队1：2负则需要加时赛。最终红星队凭借终场时戏剧化的进球2：2平巴伐利亚并顺利晋级。

⁽³⁾ Indiana Jones，美国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1981年执导的《夺宝奇兵》中的主人公。

⁽⁴⁾ Ivo Andrić（1892—1975），南斯拉夫小说家，196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奥斯克鲁沙，2009年

在东部山区离维舍格勒不远的地方坐落着一个村庄，一年四季基本上都难以进入，要是遇到恶劣天气，那就彻底与世隔绝了。在这个村子里，如今仅仅生活着13个人。我相信，这13个人在那里从来都没有过陌生的感觉。他们不是从别的地方来到这儿的。他们在这里度过了人生最长的时光。

也毋庸置疑：这13个人不会再去任何别的地方。他们将会是生活在这里的最后一代人。他们不是在这儿的山上，就是在山谷的一家医院里结束生命。随着他们生命的终结，他们的庄园会彻底破败——孩子们不会去继承——同时逝去的还有他们的幸福和咔嚓作响的髋关节。他们的烧酒会使有视力的人变成瞎子，又会让瞎子重见光明。他们的酒将会被彻底喝光，或者也并非如此，过不了多久，这里就再也不会有人酿造烧酒了。你再也看不到带木制十字架的酒瓶。那一道道篱笆不会再隔离什么有意义的东西。那一片片田地将会变得荒芜。那一头头猪要么被卖掉，要么被宰杀。我不知道那一匹匹马儿将会何去何从。这里的阔叶植物、玉米和黑莓将会日益凋零。可话说回来，或许黑莓会自行繁衍生息下去。

2009年，我第一次来到这里。回想起来，当时一看到那些电线杆，我就默默无声、毫无意义地寻思着电的事，当最后一个人在这里离世后，电力会不会被切断呢？这些电线杆之间的嗡嗡声往后还会响多久呢？

加夫里洛往生机勃勃的草丛里狠狠地吐了一口痰后大声说：“你怎么回事啊？刚来这里就口口声声不离死亡。我要好好跟你说说。我们世代代在这里活下来了，死亡可没什么大不了。只要你们看护好我们的坟墓，或者时不时献点花，和我们说说话，这里的一切就会继续下去。有电没电无所谓。而且，谁也不用给我献花。我死了以后要花干什么用呢？事情就是这样。现在走吧，睁大眼睛，我要让你看几样东西。你显然对这里的一切一无所知。”加夫里洛是村子里最年长的人之一。

这村子叫奥斯克鲁沙。这老人是我们在村外的路边上偶然遇上的，他的两手仿佛是用泥巴烧成的。之所以说我们，是因为我不是独自一人。这次出行是奶奶克里斯蒂娜一手安排的。

同行的还有斯特沃，他开车送我们来，一个十分稳重的人，长着一双蓝汪汪的眼睛，有两个女儿，日子过得比较拮据。

这一天，奶奶也不在乎阳光的炙热，穿着一身黑衣裳。她话很多，回想起来许许多多的往事。事后看起来，仿佛她那时预感到那些往事不久便会离她而去了。她要再次亲眼看看奥斯克鲁沙，也让我第一次来亲身感受奥斯克鲁沙。

对奶奶而言，2009年是她人生最后一段美好的岁月。她还没开始健忘，她想干什么时，身体还听使唤。在奥斯克鲁沙，她漫步在那一条条半个世纪之前走过的路上，那时她是年轻的妻子，陪着丈夫一起。我爷爷佩罗出生在这里，在一条条山沟里度过了他的童年。他于1986年死于维舍格勒，看着电视就倒下了。当时，我正在旁边卧室里玩着塑料印第安小人射杀骑马牧童的游戏。

奶奶以前断言说，当时我不是10岁就是5岁或者7岁。对此我绝对没有弄虚作假或说谎，而始终只是夸张和虚构而已。我当时肯定并不明白这之间的区别是什么，现在任何时候也不想把它弄明白。但我心里乐滋滋的，因为奶奶好像很信任我。

在我们前往奥斯克鲁沙的清晨，她又一次强调说自己始终心如明镜：“你就是喜欢虚构和夸张，你如今甚至依靠这玩意儿来赚钱。”

我刚刚回到维舍格勒，打算休整一下，因为随着我的第一部小说问世，没完没了的阅读分享之行已经弄得我苦不堪言。我随身带了一本作为礼物。但荒唐的是，那是德语版的。

这本书写的是我们的事吗？奶奶问。

我立刻应答道——在我看来，我说，虚构是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而不是再现我们的世界。瞧这虚构的东西，我敲了敲书的封面，它就是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江河会说话，祖先会永垂不朽。我心里所想象的虚构，我说，是一个由创造、感知和回忆组成的开放性体系，它可能会与真正发生的事实产生摩擦——

“产生摩擦？”其间奶奶咳嗽了一声，接着使劲地把一个装着酿柿子椒的大锅端到灶台上。“你坐下，你饿了。”她说把那本书摆放到一个花瓶上，犹如把一件博物馆展品摆在基座上。

接下来说到了赚钱的事。

酿柿子椒的味道让人像是回到了1984年冬天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奥林匹克运动会正在萨拉热窝如火如荼地举行。我踩着雪橇，装扮成一个冬季项目运动员的样子，犹如我们的斯洛文尼亚英雄，他们身着五彩缤纷、十分显眼的紧身运动衣，风驰电掣般地从山上滑下去。我赢得了每一场比赛，因为只有当我身后再也没有人可能超过我时，我才开始滑起来。

此时此刻，我一边等待着美味的柿子椒，一边望着山坡上库普家的房子，自从战争爆发，那里满目疮痍，空空如也。那时候，当我踩着雪橇来到奶奶家里时，她已经把柿子椒摆在餐桌上。我的手指冻得直发痒，奶奶紧紧握住我的手，要让它们暖和起来。就在这时，电视里播放出尤雷·弗兰科在大回转滑雪比赛中赢得了银牌的新闻。没有柿子椒，对这座城市回忆的插曲也就不复存在。

奶奶给我倒上水。喝水很重要，她1984年就说过，2009年又这样说，而且她始终坚信，人每天必须喝很多水。水杯还是同一个水杯，我打眼就看到了杯沿上那一道细小的裂纹。

“奶奶，这玩意儿也该换个新的吧。”

“你不是长着眼睛吗？你从另一边喝不就行了。”

我这样做了。她袖手旁观。观看我怎样坐着。观看我怎样问来问去。奶奶，你身体好吗？你一天到晚干什么呢？有人来看望你吗？这是些我打电话时也一再寒暄的话题。

片刻间，她满脸不高兴，不愿意说自己的事。只有当我询问起其他人，询问起邻居们，她才会娓娓道来：“打你上次来这里以后，没人过世或者发疯。拉达还活着，佐丽察还活着。纳达住在五楼上。他们只是变得有点不正常了。到了这把年纪，也就这样了。不过也好。好在他们还活着。他们疯疯癫癫的。可在我看来，这也不是什么坏事。”

就在这时，门铃响了。

“噢，我的安德烈！”奶奶一边大声喊，一边急忙走到门前。我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和奶奶像个小姑娘似的咯咯笑声，听到包装袋的沙沙声和奶奶说谢谢的声音。她回到屋里，直接收走了我的盘子。我还没吃完，但已经有几分饱了。

“这人是谁？”

“我的警察。”奶奶大声说，仿佛这样一说，一切便不言而喻。

我打算去洗碗，奶奶把我从厨房里赶出来，这事可不是男人干的。她以前就这样说过，指的是打扫卫生、收拾床铺、洗洗涮涮等事情。奶奶出身于一个男人剪羊毛、女人织马甲的家庭和时代。行为举止要时时自然得体，幻想必须永远埋在心里，语言要准确和粗犷。后来有了社会主义，开始讨论起妇女的作用。可女人讨论完回到家里，依然要去晾晒洗好的衣裳。

奶奶的姐姐，也就是我的姨奶奶扎戈尔卡不想再漫无尽头地等待新时代到来。她要去上学，要上天，要进入宇宙。她想成为宇航员。在患有软骨病的双胞胎兄弟托多尔和图多尔的帮助下，她先学会了抗拒，然后学会了阅读和算术。15岁时，也就是那次大战结束不久，她抛弃了童年时代生活的山区，仅仅牵着那只在山崖上陪伴着她、让她开心的山羊，踏上了前往苏联的旅程。在巴纳特⁽¹⁾，她跟随一位匈牙利飞行员学习飞行。在潘诺尼亚平原一条机场滑行道上，他们度过了一个温和的夜晚。她没爱上他。她去了维也纳，长达三年之久的时间里在军营里给人家打扫厕所，并且在多瑙河畔让一个在那里当兽医、面色苍白的苏联上士教她俄语。这人名叫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亚历山大会唱歌，也会弹吉他，虽然水平不怎么样，但他兴致盎然。在多瑙河畔，这个来自伏尔加河畔高尔基城的苏联人为了我那来自鲁扎夫河畔的斯塔尼舍瓦茨山村的姨奶奶扎戈尔卡歌唱了一条条美丽的河流、一座座美丽的城市和一双双美丽的眼睛——一双双褐色的，或许也是蓝色的眼睛。反正如今要确切地说眼睛是什么颜色也无关紧要了。而姨奶奶想要从歌唱的苏联人那里得到的，与他想要从她那里得到的并不相同。她离开了维也纳，牵着那只山羊，带了一些盘缠以及一个苏联上士的证件，留着短发上路了。19岁生日时，她到达了莫斯科。她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战斗机飞行员训练。1959年，她被选拔进入苏联首个航天员预备组。但对她飞向太空的梦想来说，已经为时太晚了，美国人不久之后登上了月球，并在上面蹦来蹦去，而苏联人在任何地方都不会甘居第二。1962年2月一个温暖的星期一，她走进了瓦西里·帕夫洛维奇·米申⁽²⁾的办公室，并且说，她有一个想法和一只健康的老山羊。仅仅半年之后，姨奶奶扎戈尔卡的那只山羊，一只来自波斯尼亚东部山村斯塔尼舍瓦茨的山羊被发射送入月球轨道。它没有名字，也许在重返大气层时被烧光了。

扎戈尔卡死于2006年。到了生命尽头，她既不曾特别疲倦，也不曾特别悲伤。她耳朵不好使了，牙齿也掉光了。我奶奶护理着这个被她称为扎戈尔卡的可爱的姐姐，直到生命最后一息。当我正要再次坐到桌旁时，奶奶说：“你在这儿干什么呢？快过去，去洗碗！你到底在犯什么傻啊？”

洗碗池下方挂着一条洗碗布，几乎跟我年龄一般大。红白格子，在洗衣机里经历了无数次的旋转，已经变得软绵绵的，像麻花似的。我擦干一个盘子、一把叉子、一把刀子，还有那个有裂纹的玻璃杯。

奶奶换好衣服站在我身后。黑色的上衣，黑色的裤子，只有橡胶靴子是黄色的，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转眼间穿上礼服的女超人，只是奶奶的头发不长，也不是金色，而是卷发，雪青色。她穿着一身丧服。

“你要去哪儿？”

“我们乘车去奥斯科鲁沙。”

“我不是刚刚才到家吗？”

“回到家里，你有的是时间。但奥斯克鲁沙等不及了。”汽车喇叭响了一声。“司机也已经到了。”她把头巾系在下颌边上，在镜子里看了看，然后又摘下来。

“你听着，”她说，“你还从来没有去过山上那个地方，你应该感到愧疚。”我依然一动不动。“犹豫不决可从来不是什么好事。”

我不知道，这话是她从哪儿弄来的，但是听上去十分美妙。

“我们去待多久？”

“一旦你到了山上那个地方，你就永远不想离开了。”

过道里放着装满食品的袋子。这些准保是“她的警察”顺道送来的。现在我要背着它们。奶奶含笑注视着我。“欢迎回家，”她说，“我的小毛驴。”

如果说维舍格勒有过黑社会的话，那我奶奶就是头子了。小时候，我就知道有三个名声在外的小混混惧怕她，服服帖帖地为她办各种事。每当她去理发店让人家把她的头发染成雪青色时，绝大多数情况下，会有一个人突然站在理发店门前，嘴里磕着南瓜子。奶奶一理完发就走到街上，悄悄向他说些什么，这人立刻就带上某些使命急急忙忙地消失在巷子里。

奶奶从来没上过学。男孩子必须上学，却宁可在外游来荡去，她说。女孩多么喜欢上学，都不得不待在家里。母亲教会了她缝衣服、织毛衣、干家务，姐姐扎戈尔卡教会了她读书和写字。

看样子，奶奶无所不是，无所不能。我也深信，她似乎能轻轻松松地经受生活的考验，无忧无虑地度过生命的衰老。然而，随着病情的发展，这一切都化为泡影了。她的病是从2016年春天开始的。奶奶挪动了一些东西，可想不起来它们去了哪儿。她寻思着选择一个恰当的词语，却忘记了要说什么。她不再记得怎样用遥控器，便把它拆个乱七八糟。只有人家领她去理发店，她才会去理发。她被一个销售代理忽悠，花200欧元买了一个破枕头。她从前曾胁迫他买了自己一个旧枕头。不然的话，他就会遭到一顿暴打。

2009年，她的身体状况还不错。2009年春天，奶奶还能毫不费力地下三层楼去院子里。蓝色的宇戈车⁽³⁾发动了，穿着牛仔裤和T恤衫的司机急忙上前把她扶进车里。他向我介绍说自己名叫斯特沃，并且一边向奶奶点头，一边补充说：“司机。”

通往奥斯克鲁沙的小道坚硬而不平坦，让宇戈车吃尽了苦头。小车费了好大劲儿才有惊无险地从一个个坑洼里爬出来。然而斯特沃很快就受不了了，我们也不忍心让他继续这样开下去。

我们打算步行继续前进。这时，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了呼叫奶奶名字的声音，群山将回声友好而严肃地镌刻进春意盎然的天空里。

奶奶微笑着。

一开始看不到那个呼叫的人的身影，接着马路上方的树林里闪现出一个年轻人来。他纵身跃过斜坡，令人十分惊心，却如同山羊一样精准地落在地上。一个年轻人，他走得离我们越近，就变得越苍老。他的胡须里挂着冷杉针叶。

当他走到离我们几步远时，他又一次呼叫奶奶的名字。他摘下帽子——一顶塞尔维亚民间礼帽。他们面面相觑，久久都不说话，你甚至可以用情意绵绵来描绘此时此刻的情形。

他先是与斯特沃握握手，然后转向我，一边夸张地打着手势，一边大声呼喊着我的名字，一切都显得有点过分夸张：转身的声音太大，眼睛太显褐色，指甲缝里满是泥土。

“你就是克里斯蒂娜的孙子。我叫加夫里洛。我们是亲戚。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所有的事，可怎么说呢，我宁愿让你先亲眼看一看。”

让我亲眼看看是从公墓开始的。奶奶要去给公公婆婆上坟。加夫里洛迈着不紧不慢的步子，领着我们来到一片斜坡草地上，周围都是歪歪斜斜的树木。向西望去，视野一片开阔，连绵起伏的山丘上，零零星星地散落着一些房子和庄园。一座山高高地耸立云天，郁郁葱葱的树林几乎覆盖到山顶，峰顶呈现出赤裸的岩石，在阳光下闪耀着殷红的光芒。在奥斯克鲁沙，亡灵们可以眺望美丽的远景。

我们行走在一座座坟墓之间，头顶着正午的烈日，穿过高高的草丛。我一边尽力跟着加夫里洛的步子，一边斜望着山顶。这时，老人突然用手掌顶在我的胸膛上：“当心，你在胡思乱想什么呢！”

只见一条蛇横穿过面前小路。

“Poskok（蝰蛇）⁽⁴⁾。”加夫里洛噓声说。

我向后退了一步，仿佛又回到了当年那惊心动魄的时刻，回到了多年前在维舍格勒同样炎热的一天。

Poskok意味着：一个孩子——我？——和鸡舍里的一条蛇。

Poskok意味着：阳光，它透过木板缝隙切开尘雾弥漫的空气。

Poskok：一块石头，父亲将它举过头顶，要打死一条蛇。

Poskok这个词语里包含着skok，也就是跃然而起的意思，而这个孩子想象着蛇的样子：它猛地跳到你的脖子上，给你的眼睛里注射毒液。

父亲说出了这个词语，而比起鸡舍里那条蛇来，我更害怕这个词语。

在奥斯克鲁沙的公墓里，我凝固在这个闻所未闻的词语里瞬间闪现出来的一幕幕图景前。对这个孩子来说，Poskok包含着一切会让人心有余悸的东西。毒液和要开杀戒的父亲。看样子，仿佛父亲与这个词语在这个孩子，也就是我的心里所引起的东西已合为一体。我害怕这个词语，担心这个动物，和父亲一样害怕。我站在他的斜后方，眼睁睁地看着二者，父亲和蛇。一种预感告诉我：父亲打不中。父亲打不中，这个词语会开始变成skok，张开大嘴。我，既毛骨悚然，又十分好奇：如果不是父亲战胜了蛇，而是蛇战胜了父亲，那会是怎样的情形呢？我感受到一排牙齿狠狠地咬住了父亲的脖子，Poskok。

父亲使劲儿地扔出那块石头。

而对这个翻译过来的词语——Hornotter⁽⁵⁾，我不感兴趣。

奥斯克鲁沙公墓里那条长鼻蛇盘绕在一棵果树的树冠里，要寻找一个更好的视角，以便窥视这群入侵者。一副绿莹莹的样子，一副镇定自若的神情。它安然地缠绕在树枝上，沐浴着阳光，自然而然地变成了一个位于我祖宗坟墓上方的掩体。

在那里，美食和饮料在等待着我们，还有一个身材高大的女人。她站在那里，手里拿着一把大刀，正在把熏肉切成薄片，即使那条蛇就在距离她几米远的地方爬上了那棵歪树干，她也无动于衷。

加夫里洛从我的胸口上收起手，继续向前走去。奶奶和斯特沃越过我，要去和那女人打招呼。她们把带来的美食摆上去，饮料装在塑料袋里。墓穴盖板成了餐桌。肉和面包已经摆在上面。没人再去关注那条蛇。看样子，仿佛它不过是个幻觉而已，只是说说罢了。奶奶点上蜡烛。

我转过身。从一座墓碑到另一座，边走边念着名字。我念着斯坦尼西奇。念着一个又一个斯坦尼西奇。几乎每座墓碑上，每块木牌上都写着我的姓。他们从一张张相片里注视着我，自豪或尴尬。我觉得，只有这样的神态：自豪和尴尬。

苔藓遮盖住了几个名字，时间让几个名字风化了。“没有一个人被遗忘。”加夫里洛后来在我太爷爷太奶奶墓前信誓旦旦地对我说。他指着那些看不清的名字说：“这个也是斯坦尼西奇，那个也是斯坦尼西奇。”他停了一会儿又说，“这个我记不清了。”

大个子女人过来和我打招呼，先是握握手，然后递给我一杯烧酒。“玛丽亚，”她说，“加夫里洛是我丈夫。你带水果了吗？”

这是玛丽亚：在树底下像树干一样高。一件绷得紧紧的灰色连衣裙宛若一个铁匠的围裙。她出身于一个山村，离这儿隔着几座山谷，我忘了那村子叫什么。在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去世那天，那个村子里有一位姑娘降生了，红头发，不同寻常，很美丽。据说，小姑娘两岁时就开始说拉丁语，也不同寻常，但首先不实用，也无益。人们教她学习草药知识。过了不久，姑娘每个星期二都会相当精确地预言未来。一些应验了，另一些失灵了。1994年，她在寻找欧蓍草——几天来，村子里有一个人一再抱怨流鼻血——的途中撞上了一颗地雷。

我把装着橙子和菠萝的袋子递给玛丽亚。她把水果摆在墓地上。

“他们应该喜欢吃吧？”我问道。

“不知道，”玛丽亚说着用手里的大刀削去菠萝皮，“我喜欢吃菠萝。你也想吃吗？”

玛丽亚如此高大，当我站在她身旁时，可以看到她下巴上的毛细血管。她手指灵巧，行动敏捷。瞧她怎样切开菠萝。瞧她怎样从坟墓上跳下来取东西，接着又跳上去。这时，我不由自主地想起女击剑手来。

在我们上方，在那棵山梨树的树冠里，poskok窥视着，那条头上长角的蛇。今天是2017年9月25日。我坐在汉堡城铁里，在我身旁，有两个45岁左右的人谈论着《宠物小精灵》。她们的话语在暗暗地窥视着我，让我不知所措，也让我高兴，我必须在这些话语之中为这个故事寻找到真正的话语。

这个故事以回忆的消失和一个很快就会消亡的村庄开始。它在亡灵们的当下开始：在我太爷爷太奶奶墓地旁，我喝着烧酒，吃着菠萝。空气中弥漫着蚯蚓气味，弥漫着蒲公英乳汁气味，弥漫着牛粪气味，说什么就是什么吧。这里的房子是用石灰石和山毛榉建造的，它们散落在山峰和周围的树林之间，仿佛是从中雕刻出来的。或许很美丽。我问过加夫里洛美不美的问题，他是不是曾经认为奥斯克鲁沙十分美丽，养猪人加夫里洛，猎人加夫里洛。

除了说他妻子美丽之外，他向来都觉得美不美无所谓，他边说边吻了吻玛丽亚的肩膀。我相信他会补充一些更为实实在在的东西，说句有关长年累月辛勤劳作的话，说句有关土地的话，或者说句有关收成的话。然而，加夫里洛只是从一个可口可乐瓶子里给自己斟上酒，然后坐到墓地上。

奥斯克鲁沙是一个美妙的名字。说得不对。奥斯克鲁沙听起来很生硬，缺少亲切感。

没有一个你可以把握得住的音节，无节奏，一种古怪的音素组合。没错，瞧瞧开头：奥斯克——这是什么意思呢？谁会这样说呢？——然后一下子跌落到莫名其妙的词尾：鲁沙。生硬，斯拉夫语特有的生硬，同巴尔干地区的词尾没什么两样。

我似乎可以保留这个词的原汁原味，也许人们会认为我就是来自巴尔干的人，生硬的斯拉夫语词尾？不言而喻，这些南斯拉夫人，彼此混战不断，行为举止恶劣。

然而，这种想象的图景压根儿就不会有任何意义。你应该怎样看待生硬的斯拉夫语词尾呢？斯拉夫文化不是什么绅士礼帽，不是什么你可以不容置疑地描述的东西，只要你明白什么是绅士，什么是礼帽就不言自明了。

可话说回来，或许有人看到这样的说法时，虽然对嘲讽地复制偏见和陈词滥调不感兴趣，但却明白奥斯克鲁沙意味着什么，奥斯克鲁沙是什么。奥斯克鲁沙是一种果树。一种非常受人欢迎的果树。确切地说，一种令人敬重、让农民十分信赖的山梨树。农民们如此申明，关键在于他们对其抱有敬畏感。奥斯克鲁沙是Sorbus Domestica^⑥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名称。

山梨树是一种抵抗力强大的果树。果实完全成熟时，向阳一面红彤彤的，其余部分则呈黄色。果实向阳一面甜蜜可口，而背阴一面味道苦涩。寄生虫远离果实，因此不需要特别护理，也不必喷洒药物。相反，树干和树叶会遭受严重的虫害。

在波斯尼亚山区，在这个日益陷入悲哀的国度最东部有一个村庄，它不久将会不复存在。奥斯克鲁沙。80年代，这里生活着上百人。有一个弹奏塞尔维亚独弦琴。有一个组织多米诺骨牌比赛。还有一个雕刻蜡龙。人们穿着毛皮衣，玩着多米诺骨牌，在温暖的争执中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冬天。夏天里，人们像模像样地涂上防晒油。有一次，一个来自冰岛的背包旅行者迷路闯荡到这里，他很喜欢笑，并且在一次多米诺骨牌比赛中赢得了可敬的第四名。

在那一次次战争期间，这种与世隔绝的状况可能挽救了无数生命。除了自愿参加这场或那场战争而失去生命的男人外，奥斯克鲁沙始终安然无恙，毫发无损。凡是留在这里的人，全都死于别的原因。

在奥斯克鲁沙的公墓里，我与亡灵们分享着我的名字和面包。我们在祖先的世界里享用着熏肉。这时，加夫里洛开口说话了。

“这里，”他边说边给地上洒些酒，“是你太爷爷长眠的地方。你太奶奶一生只能偷偷地喝酒。”他在太奶奶那边也放上一只酒杯，然后目光移开，为的是让她继续偷偷地喝。我们相互碰杯祝酒。

奶奶在公公婆婆墓前不辞劳苦地忙碌着。她从黑色的墓穴板上刮掉鸟粪，拔除杂草，剪去灌木丛。她搬来两块石头，我不明白她有什么用意，只是搭把手，她要把石块放在这里那里。

如今，墓地周围的一切成了确确实实萦绕在奶奶心头的回忆。她自己让人修建了这墓地。“谁都不愿意关心这事，”她反复说道，“连一代又一代后人也要置若罔闻；如果没有这些长眠在这里的人，这个世上哪会有他们呢？”

公墓里的酷热弥漫着咸咸的气味，四周回荡着蝉鸣的响声。加夫里洛寻求着我的目光。我朝他点点头，立刻又觉得在一个公墓里点头是不合时宜的。

“你看到那个地方了吗？”他边说边指向那里，“他们的房子就坐落在那里。”

“我太爷爷太奶奶的？”

“是的。”

“那儿吗？”

“不，在那边。”

“可以看到围着篱笆的地方吗？”

“不是的，是那边。那里什么也看不到。”

我笑出声来。加夫里洛并不觉得可笑。正是在这个时刻，加夫里洛问我，我从哪里来。

既然话说到这里，那就不妨说说来历吧，一如既往，我心想着。于是我开始说起来：一个错综复杂的问题！首先必须弄明白，这个我从哪里来指的是什么。指的是那个产房坐落其上的丘陵的地理位置吗？指的是最后分娩阵痛时刻那个国家的边界吗？父母的来历？基因、祖先、方言？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出身毕竟永远是一种身份建构！一种服饰，一旦它罩在你的身上，那你就得一辈子穿着它。这样的服饰是一种魔咒！或者，如果有点幸运的话，一种财富。出身并不归功于任何天赋，却能带来利益和特权。

我就这样说来说去，没完没了，加夫里洛也不打断我的话。他掰开面包，把边角递给我。然后他说：“从这里来的。你就是从这里来的。”

我嘴里咬着面包。等待着他说个究竟。从这里来？是什么从这里来？因为太爷爷太奶奶的缘故？

加夫里洛在袖子上擦了擦一根黄瓜。当他吃黄瓜的时候，他谈论的是黄瓜，谈论的是广为传播的转基因蔬菜。当我几乎失去了说话的头绪时，他抓住我的胳膊，仿佛要试一试我的肌肉力量，并大声说：“你是从这里来的。你就是从这里来的。你会看到的。你跟着我一起去看看好吗？”

“我有选择吗？”我至少打算逗逗乐吧。

“没有。”加夫里洛说。而奶奶则悄悄地说：“你可别不识好歹啊。”

我抬头望着那条蛇，几乎确信无疑：它立刻也会说些什么。它毕竟在这里土生土长，理解这里群山的语言，也许比我更明白这里发生了什么，甚或知道我应该对什么心存感激。

我们收拾好东西。斯特沃和玛丽亚把那些袋子拎走了。我尾随着奶奶和加夫里洛。两人把我领到一口井前，一口司空见惯的水井：四周围着石头，上面搭着木头斜顶，有曲柄、水桶和井绳。加夫里洛说：“这眼泉水是你太爷爷发现的，这口井是你太爷爷挖成的。你太爷爷去世前最后的愿望就是让他妻子，也就是你太奶奶从这井里弄一口水给他喝。她听了却说，你自个儿去弄吧。”

我应该喝这井水，可我一点儿都不渴，也害怕有细菌。但我不想让任何人失望，不想让太爷爷失望，也不想让加夫里洛和奶奶失望，于是我喝起来。果不其然，这是我喝过的最香甜的水。当我立刻要给我的水瓶灌满井水的时候，奶奶说：“你爷爷就出生在奥斯克鲁沙。他是喝着这口井里的水长大的。他在这里的树林里寻找过蘑菇，并且杀死了第一头熊。他当时还不满8岁。”

“你从哪里来，小伙子？”加夫里洛又问道。可我心想着：庸俗的归属感！我可不会因

为这点点滴滴水而变得软弱。

然而接下来，不管你心里怎样想，奶奶又继续说起来：“你太爷爷就出生在奥斯克鲁沙，”她说，“这一切都是他的地盘。在那边山上，你放眼望去，他在那里建了自己的房子。”

“去看看吧。”加夫里洛说。两人又开始行动了。“在我们这里，向下俯瞰山谷，向上仰望维亚拉茨山，哪儿还有比这更好的美景呢？”

可一到那里，眼前只有几块雕凿粗糙的石头，一座房子的残垣断壁或者什么。上面密密麻麻地布满蜘蛛网，看上去十分可怕。我竭力要从中想象出一幅建筑图像来。我穿过荨麻，攀爬到已经变成废墟的房子里，眼前尽是残破的家具。一个破裂的柜子，苟延残喘，延续着那什么都没有承载的生存。在一张只剩下骨架的铁床上，一只蜥蜴无所畏惧地守候着。而透过一个曾经是窗户的洞口，一些树枝追随着我爷爷童年时的一个个梦想。可话说回来，天哪，这一切对我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我喝过了太爷爷井里的水，并且用德语来书写它。这水承载着那一座座高山的重负，承载着我永远都不必承载的重负。某些东西属于你，这话说起来很轻松，但却让你困惑不安。不。这水冰冰的，喝起来是纯粹的水的味道。我做出抉择：我。

“你从哪里来，小伙子？”

那么现在也可以说，就是从这里来的？奥斯克鲁沙。

-
- (1) Banat，东欧历史上的民族杂居地区。东自南喀尔巴阡山脉，西至蒂萨河，北邻穆列什河，南滨多瑙河。该地区现今分属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匈牙利。
 - (2) 苏联工程师，他领导了苏联载人登月计划但最终失败。
 - (3) Yugo，南斯拉夫时代扎斯塔瓦汽车公司生产的一款微型小汽车。
 - (4) Poskok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蝰蛇是一种有剧毒的蛇类，主要分布在欧洲南部和高加索地区的岩石沙地中。
 - (5) Poskok的德语译文。
 - (6) 山梨树的拉丁学名。

迷失在陌生的异乡，行走在光线昏暗的时间洞穴里

我生活在汉堡。我拥有一本德国护照。我的出生地坐落在遥远的异国群山的背后。在熟悉的易北河边，我每星期跑步两次，用计步器记下跑过的里程。我几乎难以想象，迷路会是怎么回事。

我是汉堡体育协会的追随者。我有一辆赛车，但我几乎从来都不骑它，因为我担心它会被偷走。我最近去植物园散过步，被包围在一片鲜花盛开的美景中。我问过一个工作人员，山梨树是不是这里土生土长的。他回答说，他擅长与仙人掌打交道。

人们时而又想从我嘴里知道，我在德国有没有家的感觉。我的回答变幻不定，时而说有，时而说没有。人们这样说很少有排外的意思。他们把自己保护起来。他们说：“您可别误解我，我的堂妹就嫁给了一个捷克人。”

亲爱的移民局，我3月7日出生在南斯拉夫。那是一个淫雨霏霏的夜晚。我从1992年8月24日开始生活在德国，那也是一个雨天。我是一个有礼貌的人。我不愿意让任何人感到不舒服，仅仅因为我不是捷克人。我说：我来自.....诸如此类。后来我说：“后面那是枪炮玫瑰乐队的歌手埃克索尔·罗斯吗？”当面对你的谈话人四下环顾，我就变成一只德国蝴蝶飞走了。

我3岁的儿子在我们租房附近的一个花园里玩。邻居说，主人不愿意看到有孩子在他家的花园里玩。那里长着一棵樱桃树。樱桃成熟了。我们一起摘樱桃。我儿子出生在汉堡。他知道，樱桃有核，核也叫Košpica，樱桃也叫Trešnja⁽¹⁾。

人们在奥斯克鲁沙让我看樱桃树。有一个人给我展示了他的熊皮，有一个人让我参观了熏烤房。还有一个女人和她在维也纳的孙子通了电话，然后想把一部手机卖给我。加夫里洛让我看了他的伤疤，那看上去就像是被一个大嘴撕咬的。有些东西我喜欢观看和倾听，有些东西就那样随之而去了。

当我问起加夫里洛的大伤疤是怎么回事时，他给我递来一些黑莓，还打算送给我一头小猪。而远在上面，在山里，有一个故事在呼唤，在呼啸，它是这样开始的：

远在上空，在山里.....

这个故事是从一个名叫加夫里洛的农民开始的。不，是从维舍格勒一个雨夜开始的。不，是从患上阿尔茨海默病的奶奶开始的，不。这个故事是这样开始的：一个又一个故事叠加起来，让这个世界充满温暖。

只要再写一个！只要再写一个！

我会数次从头写起，也会找到数种结局，我毕竟了解自己。如果没有穿插之笔，我的故事根本就不是我的。穿插故事是我的写作方式。我自己的冒险行为。

你身处在时代那奇怪而阴暗的洞穴里。一条通道拐向下面，另一条通向上方。你似乎觉得，好像那条向下的通道会引领你回到过去，而那条向上的则会指引你走向未来。你选择哪条呢？

我难以集中心思。我在埃本多夫大学医学院的图书馆里查阅有关阿尔茨海默病和蛇毒

的资料。我对面坐着一位学医的女大学生，她翻阅着描绘各种器官的索引卡片。许多时间她的目光停留在那张肝脏卡片上。

加夫里洛又递给我一杯烧酒。

我请这位女大学生尝一尝巧克力威化饼。她不愿意吃那玩意儿。一个小小的冲动，一个想入非非的念头，就足以让你偏离正在发生的最重要的事。这儿有一段回忆，那里是一个传说，对面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被回忆起来的词语。

Poskok。

一些看似次要的东西获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似乎很快就变得不可或缺，挥之不去。那条蛇从树上俯瞰着我，并且从我的童年深入到我的心灵深处：这个被回忆起来的词语，这种语义上的恐惧，我选择通向下方的通道，我一下子就年轻了30岁，一个生活在维舍格勒的小男孩。那是战前的一个夏天，那是浮想联翩的80年代，父亲和母亲在翩翩起舞。

(1) Košpica与Trešnja均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

一个节日！

一个父亲和母亲的节日，发生在花园的樱桃树下。阳台上播放着音乐，母亲在父亲的胳膊下旋转着。收音机在为他们演奏。我在那里，但那不是我的节日，对我而言什么都不是。我聆听着音乐，并不明白父母从这一幕中理解到的意味。我在打扫阳台。

我拿着小孩用的笤帚打扫阳台。笤帚不好用。笤帚缺少关键的东西，缺少能使笤帚正常使用的东西。上面的塑料刷毛彼此远远地分离开来。一切比樱桃小的东西都会漏过去。伴随着那不属于我的音乐节奏，我在阳台上刷来刷去。

有条狗朝着父母汪汪叫，围着他们的腿蹦来蹦去。那不是我家的狗。我家的宠物只有一些匆匆死去的仓鼠和郁郁寡欢的鸟儿。那条狗昨天就来过这里。父母没在意它，或者没把它当回事。它觉得没趣，悻悻而去，跑到草丛里，和在那里跳来跳去的什么东西玩起来。

瞧我父母扭来扭去的样子，我就不愿意待在他们近旁。我扔掉笤帚，故意弄出响动。父母继续跳着舞。

我跟着那条狗。它游荡着蹿到一片草地前，吉卜赛人在那里搭起了他们的小木屋、自动炊具和旋转木马。那条狗在灌木丛里嗅来嗅去。它让我感到乏味无聊。

父母彼此很少表现出情意绵绵的样子，可对我的宠爱之情溢于言表。每当我们三个在一起时，他们就变换自己的声音，把一个个辅音都说得软绵绵的。他们常常说着亲昵的语言，让听者感受到深深的爱慕，除此以外再无其他。

父母跳舞前，父亲本来打算给我讲解下水道是怎样发挥作用的。他把一个红木球扔进废水渠里，于是我们飞快地奔向河边。按照他的说法，木球必然又会从那里，也就是从池塘的一个洞口冒出来。我们跑得很快，父亲和我。为了不误事，同父亲一起飞快地奔向某个地方，这实在让人太开心了。

河堤上有一个人在钓鱼。他的帽子上挂着鱼钩和鱼漂。父亲放慢速度，停住脚步，还没喘过气来，便开始和钓鱼人搭话。我记忆犹新，心想着：这是万万不可能的事啊！怎么会这样呢，他居然毫无征兆地忽略了我们来这里的原因。他自己还上气不接下气的，应该不会忘记啊。

我说了些什么。我指向我们要去的地方。我说：“爸爸……木球！”父亲挥起手臂。

我蹲下来。这两人很快就嚷嚷起来。那人名叫科斯塔。科斯塔和父亲争吵着，大笑着。也许父亲有意要教给我这样的东西：星期六的河边上，人们既可以友好地开玩笑，又可以肆无忌惮地谩骂。可这事我早就知道了。要是父亲越来越争强好胜，能把另一个人推到河里去，那才叫新鲜呢。

父亲，快推吧！我心想着。我自己似乎也不乏这样的兴致。这时，鱼竿上讨厌的小铃响起来。这人猛一收竿，有什么东西上钩了。

那个红木球我们恐怕找不到了。我多么希望再沉下去一个。父亲抚摸着我的脑袋。

回到家里后，父亲又在花园里做了33个俯卧撑，睡着了，醒过来，脱去汗衫，剪草，叫我取报纸，翻阅报纸。父亲边看边出汗，脖子上的汗毛都贴在了上面。

他大声叫我，要给我朗读些什么。他又火冒三丈。他也许要与我分享愤怒，就像跟那个钓鱼人一样。不知塞尔维亚哪个研究院的什么人写了什么可怕的东西。我不明白所写的一切。比如，我就不明白备忘录是什么意思。我听懂了大危机，却不知道这危机是什么。我在学校里就认识了种族灭绝这个词，但这里说的不是亚塞诺瓦茨⁽¹⁾，而是科索沃。抗议和集会我似懂非懂。要说禁止集会，我也能想象一些东西，只是不明白为什么要禁止公开发表言论和集会。我不知道父亲认为这一切是好是坏，可我知道骚乱是什么。

我有许多疑问。可父亲是一个安静的人。他把报纸揉成一团，大喊着：“难以置信！”我没提出任何问题。

他爬上那棵樱桃树，又爬下来。他在地上刨了一个洞，又把洞填上。他打开收音机，找到音乐台。

门上的防蚊蝇帘子沙沙地响了，母亲从房子里钻出来，就像是被音乐吸引出来的。父母彼此拥抱在一起。仿佛他们如约而至，母亲如此自然地牵住父亲的手臂。父亲跳起舞来，也不再愤怒了。是的，因为愤怒与跳舞风马牛不相及。其他一切都伴随着愤怒，但跳舞不是这样，拥抱也非如此。

到了市场上，我呼唤着那条狗。我抚摸着它。我问狗：你是谁家的？它的舌头特别敏捷，呈橘黄色。狗在灌木丛里发现了一块布，蓝白红相间，像一面旗帜。难以置信，我低声说。狗身上散发出一种刚刚剪过的青草的味道。狗对我毫无兴趣。

一个男孩透过牙齿吹起口哨。狗离开我，一溜烟似的朝着呼叫声跑去。小男孩同我一般大小。我立刻就想到，他有许多本领，而我什么都没有。他招手让我过去。他向我自我介绍。他头手倒立奔走。我转过身去。我已经看够了。他还要展示的一切，我都可以想象得出，我借此来安慰自己的胆怯。

我晃晃悠悠地回到家里。花园里父亲和母亲已不见踪影。收音机里，有两个男人正在严肃地对谈，然后又大笑起来，就像父亲和河边那人一样。仿佛所有的人突然不约而同地变得无所不能，严肃和古怪，愤怒和跳舞。

那群鸡在干什么呢？它们在夏日里四处溜达。我透过木板缝隙窥探着鸡舍。阳光穿透空气。我走进去，想看看有没有鸡蛋。有一条蛇卧在平台上。

你能对一条蛇说什么呢？

“禁止集会。”我低声说。蛇抬起头。鸡舍里弥漫着一如既往的气味。收音机里在预报天气。一次高温，35度。蛇从平台上攀索而下。

“抗议。”我大声喊道。或者：“Poskok！”

父亲要把我拽出去。我执意不动，仿佛他对我不怀好意似的。父亲穿着已经褪色的蓝色牛仔衣。母亲转身把我拉到她跟前，两手搭在我肩上，直直地看着我的眼睛。就这样，她现在和我跳起舞。然而，我真的想看的是：父亲怎样对付那条蛇。

你不用害怕，母亲说。

我就不怕蛇！

父亲从菜地里捡来一块石头。父亲走到鸡舍门前，把石头举过头顶。他走进去，要更靠近蛇，而蛇也想干什么，可能要出去吧。我们进来之前，它挺自在的。

蛇迅速地爬行到门前，冲向父亲。它会不会立刻跳起来？父亲后退一步。收音机里又

响起了舞曲。

父亲让我看看死蛇。

我问，我可不可以把它拿在手里。

我把蛇拿在手里，可我心想着：这不再是蛇了。父亲还是父亲，满身灰尘。我多么想要找到那个红木球啊。

这条蛇比我想象的更沉重，更温暖。这样把它拿在手里，让人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你怕吗？”父亲问。

为什么大家话里总是不离怕不怕呢？

“你呢？”我反问道。

“也就那样吧。”父亲说。他用手背拭拭额头，又拭拭嘴边。灰尘和汗水。我不由自主地心想着：令人恶心。

父亲说：“Poskok。它会蹦到你的脖子上，给你的眼睛里注射毒液。”他捏着我的脸蛋，抓住母亲的手。

这是战前父母最后一次跳舞。或者是我在场的最后一次。在德国，我从没看过他们跳舞。

父亲用给花园浇水的软管冲了冲身子。我为死蛇挖了一个墓穴。它始终还在那里：Poskok。让人难以置信。

(1) Jasenovac，纳粹德国1941年在南斯拉夫建立的集中营，被称为“巴尔干和南斯拉夫的奥斯威辛”。

乡村客厅里的地板嘎嘎响

吃了熏肉，又去看太爷爷太奶奶的房子废墟，这让加夫里洛和奶奶又口渴，又有说不完的话。在回来的路上，他们喝了老井里的水，接着以“你还记得吗？”开始了他们的谈话。山梨树树冠上那条蛇沐浴着阳光。

“你还记得你第一次来我们这里是什么样儿吗？衣服、头发，一切都是褐色的，可是脸蛋却像个红苹果似的！”

奶奶点点头，她当然记得。她点头并非回忆，而是认可：她并非独自沉浸在对往昔的回忆里。想必那是50年代的事了，加夫里洛当时还是个小伙子。

“我跟佩罗来到这里。公公那天很晚才干完活从地里回来。”

“博戈萨夫那时压根儿还不是你公公呢。”

“可是我心里明白我想要什么！我知道，佩罗会和我走到一起。”奶奶大笑着，“佩罗待在卧室里看书。我帮婆婆准备晚饭。公公呼唤着婆婆，可我代她走了出来。我向他做了自我介绍。这时他说，他已经知道我是谁。知道就好。我要给他脱下靴子，入乡随俗嘛。不用了。‘只要我还能自理，’他说，‘那就用不着去麻烦任何人。’我执意要给他脱。于是他便顺其自然。他穿着厚实的羊毛袜子。”

“过后我打算回厨房去，可就在这时，他说：‘你别走。你说说，你是谁家的姑娘？’

“‘难道佩罗没跟你说过？’这时，佩罗正好来了，他见到父亲又是拥抱又是亲吻，抓住我的手。然而，公公执意要继续单独和我谈话。”

“‘我就是要从你嘴里知道是怎么回事。’他说。佩罗只给他讲述了他自己喜欢听的话。‘你从你父母那里学到了什么？’

“我心里明白，他这样问话，主要是因为佩罗。那时，佩罗已经生活在维舍格勒，上过高级中学，爱读书。他丝毫不愿意和庄园与田地打交道了。作为长子！

“于是我告诉公公，我父母是干什么的。像他一样当农民。种植小麦和玉米。养了许多羊、四头奶牛、两匹马。我告诉他，凡是我母亲双手能干的，几乎没有我干不了的。我学过读书写字。‘而且我母亲也教会了我做好吃的玉米粥^①！’然后我走进厨房去做玉米粥。我相信，我有点儿丢下他不管去干别的事了。可他倒觉得挺好的。”

“我和他从来没发生过任何不愉快。”

“他肯定不知道，做玉米粥时，你必须装作笨手笨脚的样子，故意把它做得不成样子。”

加夫里洛脸上早就挂起了微笑。不用说，他知道，玉米粥在故事结束时总会再提一次。他熟知这个故事。她说来说去，老生常谈，能有什么变化呢？时至今日，无论奶奶的记忆如何变化，捉摸不定，玉米粥一直在那里。

如果说加夫里洛已经对这一切了如指掌的话，那么她还会讲给谁听呢？我？她公公本人？如果要赞颂亡灵，那她就不会说谎吧？

现在轮到活着的人了。奶奶问起加夫里洛正在上大学的女儿，问起他爱骂人的母亲，问起他弟弟。说到弟弟，加夫里洛的神情顿时变得严肃，并且指向山里：“斯雷托那去那

里喂龙了……”

奶奶点点头，“你有拉登科的消息吗？”

“想必他还待在山谷里。”不管这样说意味着什么，这句回答让两个人不约而同地盯着地面。

在加夫里洛房前的院子里，玛丽亚、斯特沃和咖啡在等待着。洗衣机在凉台上旋转着。上面有一只猫在打盹。一辆黄色的旧拉达汽车停放在棚子里，上面盖着硬纸板。

“拉达车还能开吗？”

“不能再开了。”加夫里洛捏住我的脖颈，“你闲站着干什么，你累了？来吧，喝杯咖啡。”

咖啡弥漫出一股神奇的焦糊味。家长里短的话题继续进行。这个人只有夏天还来奥斯克鲁沙。那个人再也见不到踪影了。一个名叫拉多耶的人把他的牲畜全卖了，因为他盘算好了，手头的钱够他用到死的那天。可是他活得比他估计的久多了，如今日子过得十分拮据。除此之外，没了牲畜，他很难过。

一个名叫拉特科的人在维亚拉茨山上的火崖旁弄断了腿，伤口一直难以愈合。直到一个女草药师为他治疗，病情才日益好转。拉特科不愿意说出她向他索要了什么回报。不管怎么样，他现在的状况是，只要他一开口说话，他的脸都必然会疼得变形。他变成了一个有想象力的人，说起话来就像一个文质彬彬的绅士，因为他不再说马，而说骏，不再说吃饭，而说用餐。他也不再说去蹲茅坑，而是说上洗手间。

说来说去离不开身体好坏。谁的身体怎样垮掉了？谁又病得不轻？骨头病、肿瘤、皮肤病和血液病。同样还有土地。土壤怎样？收成怎样？雨水怎样？“黑莓，”加夫里洛大声说，“大家都栽种黑莓！就是因为几年前山谷里有一家人靠种黑莓发了大财！”

德拉古洛维奇一家好像也跃跃欲试。他们是村里最年轻的。他们的小女儿是村里唯一的小孩。他们在城里找不到工作，现在试图在奥斯克鲁沙靠种植黑莓谋生。

奶奶和加夫里洛絮叨完了过去和现在以后，就到了享用饭后甜点的时候。玛丽亚给我们献上了一个黑莓蛋糕。我们自己动手，一边品尝，一边赞不绝口。

加夫里洛身子往后一靠，沐浴着阳光。奶奶打量着他。你还活着，她的目光说。你还在这儿，你的身子还硬朗。老妇和老头惺惺相惜，因为他们昔日在这群山环抱的土地上一次次相遇，其中一个没有注视对方时，另一个便一次次送去深情的目光：略带尴尬的心心相印。

如今，奶奶时而回想起加夫里洛，时而这名字对她来说什么都不是。一道昔日的帷幕笼罩了她现在的生活。一个个虚构故事被编织到其中。我借此可以开始讲述某些事情了。奶奶是一个身材娇小的女人，她永远都不会死去。

“你们在这里从来都没拿我当外人看。”奶奶对加夫里洛说。

“你始终也真心实意待我们。这一切都是举手之劳，没什么可说的。”

“我并非始终真心实意。我想看看我的佩罗。时而也会装模作样让你们看看。”

此时此刻，加夫里洛对奶奶说的话感到十分惊讶，这让我觉得他比奶奶年轻许多。两人之前的对话就像是演练过的。奶奶现在突然开始即兴说话，打破了他们共同回忆同一段往事的仪式。

“你装作什么样子给我们看呢，克里斯蒂娜？”他说着躬了躬身。

“你不能这样问一个女士。”奶奶装作生气的样子。奶奶不是什么女士。

加夫里洛点点头，好像对这个并非回答的回答十分满意。

“你们没为难过我。这个村子没为难过我。公公婆婆也没为难过我。”奶奶说。这让我很开心：不为难任何人，这的确是做人的准则，一丝不苟，永远如此。“要是我年轻10岁的话，这家伙”——我——“就必须在这儿为我建造一座小房子。”

“现在也为时不晚啊。”加夫里洛说。

“对他来说为时不晚，一点儿没错。”

“对我来说似乎太遥远了。”我说。

“离哪儿太遥远了？”加夫里洛问。

“离德国。”

“德国是很遥远，不是吗？”

我不想说出来，我无法想象会生活在这个地方。或许加夫里洛宁愿听到我说真话。或者我不过是条件反射而已，向自己提出了一个从来没人向我提过的问题。

烧酒让我解脱了。我喝着酒，不用再没完没了地解释。当玛丽亚开始收拾桌子时，我乐滋滋地跟着她把餐具送进屋子里。其他人依然坐在外面。

乡村人家的客厅里，地板嘎嘎作响。

一面面墙壁上都装着护板。

独一无二的装饰：一位骑士拿着一根长矛瞄准一条龙。两个头顶上闪耀着金色光环的木刻形象，蛇青色和血红色。骑士满头卷发，披着披风，骏马眼冒金星，以致我刚才以为那眼眶里燃烧着蜡烛。

那条龙欲躲开长矛，曲折迂回，身体蜷缩成严阵以待的样子。鲜血染红了马尾。

那一个个图像闪闪烁烁。光线如此缤纷炫目，我不得不眯起眼睛。手持长矛的骑士和龙闪动着，仿佛他们真的在搏斗。我喝醉了。我转过身去。

一张巨大的桌子，上面铺着一层油布。玛丽亚从厨房里端出放着肉、奶酪和面包的托盘。我们不是刚吃过甜点吗！为六个人准备的餐具。我问，是不是还有人来呀？

“你从来都想不到会有多少人来。”她说。

一台小电视摆放在架子上。一只苍蝇落在屏幕上。电视上盖着一条钩织罩，钩织罩上摆着两张带框的照片，分别是战争罪犯拉多万·卡拉季奇⁽²⁾和一身戎装的拉特科·姆拉迪奇⁽³⁾。

我不得不坐下来。

“再来点儿吗？”玛丽亚问。她这样问，肯定不是仅仅在说更多的食物。灰蒙蒙的肉就堆在我眼前，我简直连一口都咽不下去了。也许她指的是更多濒临死亡边缘的乡村生命的图像？或者二者兼有，同时也指更多堆得满满的餐盘？我将会复述更多有关来历的陈词滥调？

也许她指的是架子上那些就摆在战争罪犯旁、用瓷瓶装的达尔马提葡萄酒：更多令人欣悦的喜悦？

也许她指的是她的丈夫加夫里洛。我愿不愿意多写一点儿他的故事？

或者她指的就是自己？更多的人生经历：一个女人，她曾在一个名叫南斯拉夫的国家上学，上过八年，行过少先队礼，乘火车去过萨拉热窝参观民俗博物馆。那是她一生中最远的旅程。

她指的是那位骑士和那条龙？而我——如果我乐意的话——能在这一切之中看到表面之下更深沉的东西。这也正中我的下怀！连同那一幅幅五彩缤纷的图像。在这惨淡的光线里，在这令人窒息的寒舍里，面对着维亚拉茨山那粗犷的峰顶。

那条龙被击中了，鲜血从它的脖子上涌出来。我发誓从未有过如此多的鲜血。那位神圣的骑士的眼睛呈现出这里所有人都拥有的褐色。呈现出我的褐色。

他是一个恶魔，我心想，他。

玛丽亚贴近我的耳旁说：“屠龙神。”她的呼吸散发出羊排味。她三次把痰吐在自家屋里的地板上，拉着我的手说：“我的手比我老公的大。”

她的双手，这座房子，奥斯克鲁沙。这苦涩又甜蜜的一天，有活着的人，有死去的人，有一条有血有肉的蛇，或者一个象征性的动物。有在太爷爷太奶奶墓前的野餐。这一切在我心里形成了一种原始画面，我似乎在其中看到了我与祖先们息息相关的自画像。可要描绘出这幅自画像，对我无疑是一种苛求。

其他人也走进屋里，洗洗手坐下来。人人都显得很疲倦，疲倦的方式又各不相同。加夫里洛问我喜不喜欢旅行。终于说到我可以炫耀的话题了，我心想。我罗列一个又一个国家，讲述一个又一个歌德学院、大学和出版社，讲述着这个在国外享受奖学金、日子过得无忧无虑的人。我去过美国，去过墨西哥、哥伦比亚、印度和澳大利亚。伴随着每个远离奥斯克鲁沙的地方，我觉得这样的罗列越来越荒唐。我听到自己说，我在墨西哥的瓜达拉哈拉喝了龙舌兰酒，那是我这辈子喝过的最棒的酒。我猜，加夫里洛认为能喝上美酒就是人生的快乐与辉煌。我要让他高兴。加夫里洛却无动于衷。玻璃柜里的战争罪犯也一样。

加夫里洛开始讲起他的旅行。有一天，几个语言学家出现在村子里。他们把一个麦克风捧到他鼻子跟前说：请您冲着麦克风说话，我们想听听您说的话听起来是什么味儿。

他本打算把他们轰走，因为你能只看一个人的嘴，而要听他用嘴所说的内容。然而他克制住自己的行动，问这些语言学家，他们自己有什么要说的。

然后，这些人讲述了当地的方言。这里的方言很特别，包含着一些除了这地方之外，只有几百公里以外的黑山才会有的表达方式。

这让加夫里洛很高兴。有人在另外的地方说着跟他在这里说的一样的话。他记下了那地方的名字，然后把那些语言学家轰走了。就在当天，他把行李放在自己的马背上出发了。连续数日，只有他与马为伍，也就是一匹马和一头老驴，加夫里洛说。他最终找到了他希望找到的东西。他从玻璃柜里拿出一个皮面笔记本，打开后说：“这个故事是这样开始的。”

这是一个做旧的笔记本，用的是粗糙的纸张。上面贴着一张照片，看上去是一张写着文字的羊皮纸，不太清晰。我学过两个学期斯拉夫语文学，能认出上面是古保加利亚语，但无法弄懂所写的内容。

“一切是这样开始的！”加夫里洛又大声说，接着又讲下去，“有三个黑山兄弟要反抗奥斯曼总督，他们不是抢走他的马，就是他的珠宝，或者他的妻子——”到底是什么，加夫里洛说，谁都说不清楚。这也无所谓。“他们逃出了城。为了捉拿他们，总督发布了通缉悬赏令，一笔数额不菲的悬赏。有两个兄弟徒步踏上逃亡之路，但第三个——”话说到这里，整个事件变得很可疑，可我有什么资格质疑古怪的事呢？“——第三个变成龙飞上了天，要从空中侦察这地区哪儿有危险，哪儿适合重新开始安家立业。”

“变成龙了？”我问。

“马儿飞不起来啊。”奶奶说。

“一个斯坦尼西奇，又是一个斯坦尼西奇，还有一个斯坦尼西奇。”加夫里洛兴高采烈地说。他的呼吸变得短促。为了呼吸更顺畅，他挺直身子。在预感和祖宗面前，空气变得凝重了。“他们找到了合适的地方，”他大声说，“那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奥斯克鲁沙！他们在这里扎下了根！繁衍了一代又一代斯坦尼西奇。而现在——现在就轮到你了！”

为了书写这一切？书写祖先和后代。书写坟墓、桌布和幽灵。书写活下来的人。而现在无疑也要书写龙。

我问加夫里洛，那条龙后来怎么样了。然后他敲了敲我的脑门说，我大可不必把这一切都当真。那家伙也许只不过是他们三个之中跑得最快的。

当天晚上，斯特沃开车把我们送回维舍格勒。回到家里，奶奶坚持要为我铺好床。我感谢她把我一起带去奥斯克鲁沙。

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我打开灯，在网上搜了搜。哪儿也找不到这三个斯坦尼西奇龙兄弟。我如释重负。

奶奶敲敲门走进来。她看到我屋里还亮着灯，要过来跟我说声晚安。她给我盖上被子，站在我床前不肯离去，仿佛我还是那个从雪地里回来后双手暖在她手里的小男孩。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期待着我做些什么。而她或许也不知道，我是不是期待着她说些什么。就这样，我们两个一句话都没说。

在接下来几天里，我常常独自在城里走来走去。有一次，我散步回来，发现奶奶和一个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年轻男子在聊天。一个仪表堂堂的家伙。身着牛仔裤和T恤衫。他和奶奶并肩坐在沙发上。

奶奶自豪地介绍说，这是“我的安德烈”。奶奶的安德烈握握我的手。他多握了两秒钟不肯松开。我感到很不自在。这期间，他说：“这么说你就是那个作家了。”

我望着那个花瓶。我的书不见了踪影。

“你就是那个警察吧。”我说。

花瓶里插着一支向日葵。

(1) 原文为Polenta，是一种意式玉米粥。

(2) Radovan Karadžić (1945—)，曾任塞族共和国首任总统。2016年，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裁定其在波斯尼亚战争中犯下反人类罪，后被判处终身监禁。

(3) Rotko Mladić (1943—)，在波斯尼亚战争中担任塞族共和国将军。

奶奶和士兵

奶奶去找卖肉师傅。她在那个地方一个劲儿地摇人家的门。可是卖肉师傅10年前就关店了。奶奶做了一锅煮豆子，因为她丈夫马上下班回来。一锅煮豆子是他最喜欢吃的美味。

自从她两腿不灵便以来，邻居便帮她买东西。她总是喜欢打发安德烈去，也就是那个住在对面、头发一直梳得整整齐齐的警察。奶奶说他不腐化堕落，完全不像别的警察。有一次，他拦住了埃米尔·库斯图里卡⁽¹⁾的车。人家问他：“你知道我是谁吗？”他的回答是：“请出示驾驶证和行驶证，你的尊姓大名不就写在上面吗？”

她从来都没麻烦过那个住在五楼的退休军官，尽管这人一再向她献殷勤。奶奶不喜欢退役的大胡子军人。再说那个警察常常给她带一些小东西，让她喝咖啡时感到很惬意。

奶奶有时候感到惊讶，那些士兵突然间全都不见踪影了。她在家乡经历了一次次战争。她在童年的村子斯塔尼舍瓦茨度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又在维舍格勒经历了波斯尼亚战争。

2000年初，奶奶踏上了生命中唯一一次长途旅程，去美国看望儿子和儿媳——我的父母。德国不允许他们滞留以后，他们移民去了美国。

奶奶乘坐的飞机本来应该在晚上8点落地，可它突然在下午5点提前降落了。当奶奶出人意料地早早站在他们门前时，我父母惊愕得目瞪口呆。奶奶解释说：“我干吗要在机场等那么久呢？”一个脸色苍白的斯洛伐克人提着她的行李箱。他们通过两种语言的斯拉夫语词根沟通。奶奶打算让这个斯洛伐克人进屋喝杯咖啡，可这人却说没时间，匆匆忙忙地告辞了。

1944年，德国国防军士兵来到斯塔尼舍瓦茨村。1944年，奶奶12岁。

“奶奶，你能回忆起他们是怎样进来的吗？”

“确切地说，是偷偷摸摸进来的。那帮家伙鬼鬼祟祟地从四面八方溜了进来。”

“你害怕吗？”

“大家都害怕。德国人害怕，所以他们才如此偷偷摸摸地潜行。我们害怕，因为那帮家伙如此偷偷摸摸地潜行。人们对当时发生的一个个故事记忆犹新。大家彼此都心照不宣，这也让我感到害怕。

“我们从屋子里出来，双手抱在头上，德国人冲进屋子里，双手握着枪。然而，因为屋子里没有人准备射击，或者压根儿就没有什么东西有能力射击，他们又把枪收起来。他们感到热，穿着制服像猪一样出汗，我们就给他们端上水。然而，他们宁可喝自己军用壶里装的水。”

除了说到水的时候，人们直到夜幕降临才又相互说话。士兵们肯定也要在哪儿睡觉，这很好理解。而在某些东西很好理解的时刻，大家身上的恐惧变小了。我们的牲畜无疑会从一个圈里被转移到另一个圈里，可臭气依然四处弥漫。

第一个夜晚，没人能睡个安稳觉。第二个夜晚也一样。伴随着每天早上习以为常的洗漱，入睡变得越来越容易了，钢盔也卸下来了，因为身旁没人吊在树上，也没人在梦里被

捅死了。

扎戈尔卡知道，士兵们在哪个房子里光着上身蹲在炉火前互相捉虱子。奶奶陪着姐姐去看。扎戈尔卡打听他们之中有没有人是飞行员。要是德国兵继续开拔的话，她打算跟着一个飞行员私奔。他们之中没人是飞行员。扎戈尔卡感到很失望，也有点儿生气。可士兵们不知怎么回事也很失望，也许他们个个都特别想当飞行员吧。

奶奶说，有一个军官住在她家里。他长着一双纤细的手，皮肤细嫩，像个小孩，还戴着一副小眼镜。他早晚都洗漱，睡觉前彬彬有礼地询问有没有牛奶。他拿一些东西来交换，可都是些无用的玩意儿。不管是谁，拿他给的玩意儿能干什么呢。虽然奶奶特别希望能换些粉笔，可她父亲坚决不肯。

这军官得到一碗牛奶后，便把自己关在小卧室里。等他出来时，碗就空空的。他表示感谢，祝大家晚安，说了几天德语，后来有人教会他说lakunoć（晚安），还有mlijeko, molim——牛奶，请问。不知什么时候，12岁的奶奶一时心血来潮，很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当一个德国士兵喝牛奶时，他看上去究竟是什么样儿。

于是她藏在衣柜里，透过柜门缝观望着。这军官走进来，他名叫格奥尔格，他将奶碗放在地上，把小眼镜放到碗跟前。然后他跪下去，合拢双手，开始低声说话。声音十分细小，也没说多长时间。

接着，他在胸前画了个十字，两手把奶碗捧到嘴边喝牛奶。

他如今时而来看望奶奶。就像那个站在街上的小姑娘。奶奶心中的这个德国军官跪在那条废弃的铁路路堤上，奶奶从窗前可以看到他。那副眼镜，还有一切的一切。

他不需要帮助，不像那个小姑娘。奶奶压根儿也不会出门去找他。奶奶相信，他不喜欢被人打扰。

[\(1\)](#) Emir Kusturica（1954— ），塞尔维亚著名电影导演。

米罗斯拉夫·斯坦尼西奇教他的羊群怎样过日子

照理来说，本不该在亡灵面前说他们的坏话。但更可怕的是压根儿就不提他们。大地不是默默无声的陪伴者，当然不是这样。大地期盼听到人们温暖的声音，渴望分享我们谈天说地的爱好。大地很矜持，大地很朴实。亡灵们则喜欢夸夸其谈。

2009年春天，奥斯克鲁沙一个叫米罗斯拉夫·斯坦尼西奇的人刚刚死去。加夫里洛让我们看了他的坟墓。

“但愿他在地下感到轻松自在。”奶奶叹息着说。

“米基预言过自己的死期，”加夫里洛说，“他这辈子干什么都对，但愿三犄角飞龙能够宽恕他。”

“怎么预言的呢？”我问，其实我似乎对三犄角飞龙更感兴趣。

“‘你们将会看到’，他总是这样说。‘有朝一日就会看到’，他说。他所说的果不其然应验了。正好就发生在那一天。”

“他凭什么能预言呢？”我问。

“因为他是个一丝不苟、说一不二的人，所以如此。”

“创造多米诺骨牌比赛纪录的大师。”玛丽亚说。

“你和他是亲戚，”加夫里洛说，仿佛他要让接下来说的话更有分量，“在他死前几个月里，米基训练了他的羊群。我们起初心想，由于患病，他变得古里古怪了。我们说：

‘天哪，米基，你到底在出什么洋相呢？’

‘我要让羊群学会怎样过日子。’米基回答说。

‘过什么日子，怎么个过法，米基？你这样做会遭雷劈的。’

‘没我以后怎样过日子。’他跪在他的羊群跟前孜孜不倦地教诲它们。给它们做示范。各种各样的练习。在草地上咩咩叫。”

“他是不是发疯了？”我出言不逊地说，然后大家——甚至连斯特沃——都不约而同地盯着我，仿佛我就是那个在草地上一边爬行一边咩咩叫的人。

“我的萨沙，我的小毛驴。”奶奶充满同情地说。

“要是那些羊什么都学不会的话，那他恐怕是会发疯的，”加夫里洛补充说，“可话说回来，他要求羊群做什么，它们就做什么；凡是他牵挂的事情，一件都少不了。”

“一只羊学会了开门。”玛丽亚说。

“一只羊学会了警告有危险来临。”加夫里洛说。

“三只羊学会了从井里打水。”

“有一次，一只羊遇上了奇戈，那是我弟弟的狗，一条生性敏感的家伙。这只羊上前舔舔狗狂叫的大嘴，让它别愤怒。从来没人看见过这样的事。”

“没人看见过。”玛丽亚点点头说。

“羊群如今还在这里。这就是说，一些不在了，因为衰老。但是羊群！羊群还在。我们的米基教会了这群羊活下去的本领！那天早上，他把羊群放出去，因为按照他的推算，他的心脏会在这天晚上停止跳动。那些羊排成一队，像士兵或蚂蚁或别的什么，爬上维亚拉茨山，进入树林里。”加夫里洛说着摘下帽子，“于是米基躺下去，永远离开了我们。”

“但愿他的棺材永远完好无损。”奶奶说。

“但愿墓地别遭到侵蚀。”玛丽亚说。

“那些羊，”加夫里洛大声说，“它们逍遥自在地穿过原野。它们不断繁衍壮大！羊群日益兴旺，萨沙！它们兴旺发达！米基的羊群将会在我们死去之后还活着。它们组织得如此井然有序。有这些羊，整个国家的日子都会过得更好，胜过那个罪犯集团的统治！这不是开玩笑。而一切都因为有一个人会说它们的语言。米基。”

“但愿他在地下感到轻松自在。”我叹息着说。

“这里四个月都没下过一滴雨了。”玛丽亚一边叹息，一边对着维亚拉茨山在胸前画了个十字。

我望着山顶。太阳火辣辣地烤着山崖，闪耀着刺眼的白光，宛若群山海洋里的一座灯塔。

“我和米基是亲戚。”我说，仿佛我要让接下来说的话更加有分量。

名字上的小钩

我们的名字上有小钩。有个喜欢我的人称我的小钩是“装饰”。可我在德国常常觉得它们很碍事。它们会让一些官员和房东变得满脸疑虑。在边防检查护照时，我的检查要比前面的彼得拉和后面的英戈持续更长时间。

此外，我的护照上注明了12个学期期限。我在德国居留期间只能上大学。于是，边防检查官中一些孜孜不倦的人会询问我的专业。它们都写在上面，可检查官偏偏非要问你不可。这是一种考验：要是你不熟悉自己的专业而回答错了，那你的签证就有可能是伪造的。

在法兰克福机场，当我要前往美国当德语老师时，一个检查官拿着我的护照津津有味地翻来看去，简直没完没了，弄得我身后的长队几乎排到了紧急出口。不知什么时候，这检查官大声喊道：“你——上大学！——学什么！你真的在上大学吗？”仿佛他刚刚才注意到我的签证似的。不知怎么回事，他大喊着每个词，好像它们都至关重要。

“斯拉夫语文学。”我以同样的大声回敬道。

我的回答博得他赞许地点点头。“肯定要学很多数学吧。”他大声说，继续翻了又翻，接着询问道，“你去过！——突尼斯！——干什么去了！”

“什么都干过！——无所不有！——可我！那么首先！——自助餐！——激动人心！”

我本不该对名字中包含的异国意味太过在意，毕竟我自己有时候也难以毫无偏见地把一些德国人的名字分门别类。在一次谈论一对我不认识的人时，我问，豪克和西格利德，这两个名字哪个是女士的？后来知道两位都是女士！我就有了负疚感。

但我看了20次房子，还是没能成为备选，后来，我只好把我的名字Saša写成Sascha。这样一来，虽然也没能一下子就成功，但现在人们至少看重我的职业了。（“在我们这栋楼里，其实只住着医生、律师和建筑师。还有一个古文献学家，我们弄不清他是干什么的。”）后来我获得了一个文学奖，在半年时间里好像真的挣了很多钱。于是无论是名字还是职业突然都不成问题了。

我去拜祭奥斯克鲁沙公墓前，从家庭出身意义上来说，我对我从哪里来不曾有过任何想法。很简单，爷爷奶奶就是那里的人。外公还在世，爷爷早就过世了。这个是和善的垂钓者，那个一辈子都是充满幻想的共产党人。

我对奶奶和外婆的过去知之甚少。她们是我的生活自然而然的组成部分。对我很好，充满我的生活。要说到芸豆，有时候我会感到不寒而栗。我希望我们有时间真正认识彼此。

甚至地点也没有承载太多归属感。维舍格勒是母亲对雨夜里一家医院的讲述，是强盗和绅士穿过大街小巷的匆忙与喧嚣，是指头间松针的柔软，是奶奶家里充满无数气味的楼梯，是滑雪橇，是学校，是战争，是曾经发生过的一切。

海德堡是逃亡和新开端，是困难和青春期，是第一次边防检查和初恋，是人家丢弃的旧家具和上大学。不知什么时候也成了叛逆的自我意识，它呼唤着：因为我有这样的能力！

然而，后来我在奥斯克鲁沙公墓每隔一座墓碑上都看到我的姓。于是，我立刻就从那

些与我从哪里来息息相关的经历中，从那些不熟悉的亲缘关系和那些熟悉的地方感受到了更多的东西。在我自以为熟悉的维舍格勒曾经发生的一切，前所未有地触动了我的心灵，从最初陌生的海德堡所赢得的一切也让我思绪万千，心潮起伏。

我曾经去过奥斯克鲁沙，可只是一个穿着短裤的旅行者。一个在祖先那棵果树下喝烧酒的人。他认为那里的风景难以置信地美妙，而那些废墟则不可思议地荒芜。他扪心自问：我的族人，他们是些什么人呢？包括那些还健在的人，还有站在我身旁、披着一头雪青色卷发的奶奶。她说：“我在奥斯克鲁沙只见过春天。”

她为什么这样说呢？好久以后我才会明白过来：奶奶只在春天和爷爷来这山里。我们的旅程也是在春意盎然的四月。

祭拜了墓地以后，我确实浮想联翩。我成了斯坦尼西奇家族最后一个男性，这让我心烦意乱，同时觉得无关紧要。要是我没孩子的话，那我也就算家族的尽头了。我开始思考我从哪里来，但对此久久不愿承认。在当下的时代里，出身和出生地被当作区分标志，边界被重新加固，不同国家各自沉陷于干涸的泥沼中，所谓的民族利益从中冒出头来。在这样的时代谈论我或者我们从哪儿来似乎过于迂腐，简直是毁灭性的。也就是说，在一个时代里，排外已经公然成为一种政治纲领，而且可以赢得选民。

奥斯克鲁沙旅程之后，在我创作的绝大多数作品里，不管以什么形式，我都明确地探索着人和地方，以及出生在一个确切的地方对这些人意味着什么，还有不再能够或者愿意生活在那里意味着什么。出身或者来历赋予了一个人什么？确切地说：依据出身，一个人到底保留着什么？我书写这一切，书写勃兰登堡，书写波斯尼亚。地理位置其实并不那么重要，认同的努力并不在于纬度。我书写种族主义，书写暴力和逃亡。我的人物几乎没有一个留在原处。有一些人去了他们本来要去的地方。他们定居在那里却很少感到幸福。他们或多或少因为生存问题而逃亡。四处奔波时而是负担，时而又是惠赠。

他们很少谈论家乡。如果要谈的话，他们指的也并非具体的地方。家乡，周游世界的莫先生说，就是你最用不着再去的地方。

家乡，我说，就是我正好要书写的东西。奶奶和外婆。当奶奶克里斯蒂娜开始失去记忆时，我开始收集记忆。

外婆梅耶玛，我称她为内娜。她会留下什么呢？母亲告诉我，外婆是一个热情洋溢的电影迷。在70和80年代里，她看过“文化之家”上演的每部电影，一部都不错过。甚至包括像《第一滴血2》⁽¹⁾这样的电影。她领着我去了我人生中的第一部恐怖片，是由小说《德古拉》⁽²⁾改编的。这对我来说为时过早了，结果变成了一个相当大的灾难，我们不得不中途离开放映厅。让人庆幸的是，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已经忘记了那一个个恐怖图像。我从那里带回来的是一种对蝙蝠莫名奇妙的既恐惧又同情的心理。

内娜是个大烟鬼，这是我亲身经历过的。给我把烟缸递过来，小乖乖。她喜欢盘腿而坐。为了打发时间少抽些烟，她也经常缝缝补补。要是她知道有人来看望她，或者有人从什么地方回来，她就站在窗前等着。芸豆已经告诉她访客大概到达的时间。只要她一激动，便会来回晃动着上身。她安静和疲倦时也同样如此。

她父亲，也就是我太外公苏尔霍留下了什么呢？

他是德里纳河上的一个艄公。我最早听到有关他的事是：最棒的艄公之一。

他不会游泳，这是我后来才听说的。

(1) Rambo, 美国影星史泰龙主演的动作片, 该系列共有五部电影。

(2) *Dracula*, 爱尔兰作家布拉姆·斯托克 (Bram Stoker) 1879年出版的一部吸血鬼小说。

断片

我堂姐去年有了第二个孩子，是个女孩，名叫阿达。她们生活在法国的蒙彼利埃。堂姐的丈夫是个留着大胡子的医生。他父母是突尼斯移民。他是法国人。他把我的书送给他母亲。“因为它们讲述的是流落异国他乡的故事。”在法国生活了那么多年以后，这依然是他们挥之不去的话题。在阿达过第一个生日这天，我又在波斯尼亚山区的墓地之间游来荡去。

我的家人分散在世界各地。我们与南斯拉夫分道扬镳了，再也不可能走到一起。我试图讲述出身的故事也与这种天南海北的分离状态息息相关，因为多年来这种状态决定了我在哪里：几乎从来没有在有家的地方。

出身就是奶奶。那个只有奶奶看得见的、站在街上的小姑娘也是出身。

出身就是加夫里洛。告别时，他执意让我把他的一头小猪带到德国来。

出身就是那个生活在汉堡、和我同姓的小男孩。他玩着一架小飞机。我问：“你要飞到哪儿去？”“飞到斯普利特去，要看娜娜。”他骑着小车子。我问：“你要骑到哪儿去？”“骑到非洲去，要看恐龙。”

出身就是娜娜。我的母亲，他的奶奶。几年来，经历了德国和美国的生活以后，她现在住在克罗地亚的一座高楼里，从平台上可以眺望亚得里亚海。

出身就是那一个个甜蜜又苦涩、让我们四处流浪的偶然事件。出身就是归属，你对它毫无作为。那个位于奥斯克鲁沙那片沉重土地上的陌生的家。那个降生在蒙彼利埃、尚未谋面的孩子。

出身就是战争。对我们来说战争就是母亲和我穿越塞尔维亚、匈牙利和克罗地亚来到德国。1992年8月24日，我们到达海德堡。父亲送我们穿过塞尔维亚边境，然后又返回维舍格勒，为了照顾奶奶。半年后他也过来了，随身带了一只棕色旅行箱、失眠和大腿上的伤疤。直到今天，我也没问过他伤疤是怎么来的。

你从巴尔干来，逃亡到这里，不说这个国家的语言，这些就是你本来的属性和证明。身为政治学家的母亲落脚到一家洗衣厂里。她和滚烫的毛巾打了五年半交道。身为经济学家的父亲流落到建筑工地上。

他们俩在德国幸福吗？幸福，有时候；幸福，太少见。

1998年，他们又不得不离开这个国家。为了抢在被遣送回遭到种族清洗的维舍格勒之前，他们移民去了佛罗里达。他们在那里找到了工作，这恐怕是他们在德国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他们和美国朋友一起打牌，和波斯尼亚朋友一起烤肉。他们攒了一些钱。有一次，他们在自家花园的水池里碰到了一条短吻鳄。

如今，他们以美国退休人员的身份生活在克罗地亚。然而，他们在那里始终只能待一年，然后他们必须前往一个非申根国家居住三个月。2017年，大约有4.7万人从克罗地亚流亡出去。克罗地亚又是一个在移民问题上盲目无知的欧洲国家。

我们在德国的第一个家坐落在维斯洛赫和瓦尔多夫两城之间的工业区，紧挨着州际公路。火车站就在附近，出行简单方便，这是唯一的好处。我们家是周围唯一的住宅。我们被包围在烟囱、厂房和汽车经销店之中。海德堡印刷机械厂。便士中心仓库。带自助清洁

包及吸尘器的洗车中心。我记不清当时是不是已经有了这一切。这是我今天从谷歌地图上看到的。

这座房子里还住着另外六家难民。大家一直都感到失望。对当局失望，对物价失望，对仅有两个能用的灶台失望，对自己失望。人人都等待着好消息，等待着生存条件得以改善，当然肯定不会抱有什么奢望。好在还活着。

我们这些小孩可以看电视，想看多久就看多久。我们看摔跤娱乐片和赤裸裸的色情片，在院子的旧床垫上打斗。床垫很难闻。它们承载着前主人的梦想和皮屑。抱拳重摔。头部坐击。颈部重击。

废弃的旧家具对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具有莫大的吸引力。人们如此轻而易举地把这些不用的玩意儿扔出来！我感到非常恶心。可是我们没家具，也没钱，毫无选择。出于抗议，我有好一阵子睡在地板上。我太傲慢了。我最喜欢的摔跤手是“送葬者”⁽¹⁾。如今依然不改初衷。

母亲和我在火车站的电话亭里一待就是几个钟头。如果别人要打电话，我们就出来，母亲抽根烟。我们试图去打通不管是谁的电话——丈夫、父亲、兄弟，奶奶——但绝大多数情况下谁的都打不通。

母亲如今还记得那本被翻得不成样子的电话本，记得那充斥在电话亭里的汗臭味，记得贴在电话亭窗子上的那幅彩色装饰画，上面画着一颗心。我们没看懂心上的两个字母是什么意思。

搬到海德堡以后，日子变得稍微轻松了些。我们和姨妈卢拉一家同住在一座平层小别墅里。战争爆发时，姨妈和姨父在德国当外籍工人。当母亲和我在慕尼黑机场被扣留，并且要被遣返回去时，他们出具了担保书，表明必要时他们会承担我们的生活费用。然后我们才被允许入境。别的一些人就没有这样幸运的担保了。

我们在一个屋檐下度过了四年时光。

战争结束后，姨妈一家可以返回扎维多维契。这座城市位于新创立的联邦共和国的波斯尼亚部分，⁽²⁾而他们的住宅依然属于他们，几乎安然无恙。他们粉刷了墙壁，重新修整了花园。姨妈养鸡，姨父养信鸽。那个时候，不知是些什么人住在我们家位于维舍格勒的房子里。为了付房租的事，奶奶坚持不懈地与他们争来斗去。

我不知道姨妈如今干什么工作，我相信什么都没干。不知怎么回事，我也不想问这事。我知道她对什么感兴趣。姨妈跳了60年民间舞，夏天会去亚得里亚海滨度几天假。此外，她对养鸡也很有兴趣。她讲述鸡的故事，给鸡拍照片，加上解说，一并发在Ins社交网站上。此外，在她的报道中还可以看到，社会民主党地方支部喜欢去大自然郊游（同志们坐在树林里一块奇异的石头上，十分严肃地看着镜头）。她差点儿代表这个支部被选进了市议会。姨妈会烤一种十分美味的皮塔饼⁽³⁾，喜欢咕咕地笑，像鸽子的声音，这让我很开心。姨妈一直对我视若己出。

姨妈有两个儿子，也就是我的表弟，三十出头。大儿子在德国当球员经纪人，宽肩膀，有一个行动敏捷的小儿子。早在汉堡体育协会降级之前，他就知道它会降级。他还知道汉堡体育协会什么时候又会晋级。在维斯洛赫，他喜欢的摔跤手是“猛男”兰迪·萨维奇⁽⁴⁾。

小儿子为了在波斯尼亚一家德国呼叫中心工作，读了日耳曼语文学。这期间，他自己开了一家呼叫公司。他正在研发一款健身应用程序，有竞技运动员在上面给大家展示他们

的训练方法。一旦这款程序发布，我会把它推荐给每一个喜欢像马里奥·格策^⑤那样做俯卧撑的人。我理所当然可以推荐我表弟。在维斯洛赫，他同我一样，最喜欢摔跤手“送葬者”。

1992年8月，我舅舅被一伙塞尔维亚非正规军拽进一个厕所里。他们强行要让他脱掉衣服，看他是不是行过割礼。他讲这讲那，比比画画，故意拖延时间。我舅舅很善于表演，他能博得一分钟的喝彩。可就在这一分钟里，有人路过这里，认出了他，并且对那帮家伙说，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呢？他不过是个演员而已。他们放走了他。从此以后，他必须每天去警察局报到。凡是每天去警察局报到的人，过不了四五次，便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在维舍格勒，人们对此这样说：“黑夜吞没了他们。”舅舅和家人逃离了黑夜。他们长途跋涉了数月之久，最后在萨尔茨堡安了新家。

舅舅寻思着，一个34岁的演员，来到异国他乡，又不懂人家的语言，他还能演什么呢。剧院对他不感兴趣，代理也不会对他抱什么希望。于是他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扮演了挨门挨户送报纸的角色，直到他突然想起了一个不需要语言的角色。南斯拉夫人不看丑角表演，但是奥地利幼儿园和一些不动产行业喜欢丑角。他找到了一个合作伙伴，从那时起挺着一个红鼻子，踉踉跄跄地活跃在生日庆祝会和公司庆典上。他甚至还去美国搞了一次不大的巡回表演，一个小时的节目，他试图翻过一道矮小的城墙。

与合作伙伴发生争执以后，他就彻底洗手不干了，接着制作了一张扑克牌游戏桌，和两个女儿一起在儿童房里开办了扑克牌游戏室。他们先是和邻居玩，后来从城里各个地方来玩的人络绎不绝。

到了周末，舅舅就去萨尔扎赫河钓鱼。他不久前又开始在德里纳河钓鱼了。他在维舍格勒附近建了一座小房子，过着退休生活。半年去法国，看女儿和外孙，享受天伦之乐；半年守在德里纳河畔，等待着鲑鱼上钩。他想象的生活就是这样。

也就是说，他的孩子们，即我的表妹，生活在法国。从前在维舍格勒，我们常常一起玩。我们玩商店模型玩具。我保管着钱。我们玩布娃娃。只要我一揍布娃娃，她们俩便哭哭啼啼，然后我们就去玩别的东西。

我有一张和表妹的合照，那是在战争开始两年前拍的。我们坐在一个楼梯上。我的手臂搂着小表妹，大表妹把脑袋搭在我肩上。我们穿着运动服。斜眼望着太阳，冲着镜头微笑。我从来没有过比这种与兄弟姐妹在一起更亲密的感觉。

如今我们相互拜访时，会做一些需要注意力的事。我们谈论我们正在经历的事情。而要谈论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则需要冷静和眷恋，更重要的是要有刨根问底的勇气。离开维舍格勒以来，我们就再也不谈维舍格勒了。

当我们是孩子时，眼前的事物让我们心满意足。有阳光。还有下一次游戏前的宁静。现在我们各自有了孩子，于是我们就谈论孩子。他们怎样玩。他们怎样生气。谈论我们怎样享用调味汁，直接浇在面上，随便试一试，或者放在专用小碗里。我们说，要是我们的孩子能经常见面，那该多好啊。我们三个都保存着那张照片：我们三人沐浴着阳光，美滋滋地坐在楼梯上。

① Mark William Calaway（1965— ），美国职业摔跤手，绰号“送葬者”。

② 波斯尼亚战争后，波黑在行政及管理上分为两个实体：波黑联邦和塞族共和国。

③ 皮塔饼又称口袋饼，是一种圆形口袋状面食，中间可放馅料，广泛流行于中东、巴尔干半岛等地区。

(4) Randy Savage (1952—2011), 美国职业摔跤手。

(5) Mario Götze (1992—), 德国足球运动员。

外公必须会游泳吗？

我小表妹的丈夫名叫穆罕默德，与我外公同名。外公一年四季的标配是一身蓝色铁路工人制服，冬天还要披上一件大衣。大衣非常厚实和沉重，外公穿着它就不会在火车上挨冻。外公穆罕默德是司闸工，夏天在司闸工小屋里汗水淋淋，冬天在里面瑟瑟发抖。他从小就喜欢火车。他多么想成为一名火车司机，可干司闸工也不错。

1978年，萨拉热窝与维舍格勒之间的铁路停运了，外公也不得不提前退休。在他退休的第一天，他叠起沉重的大衣，用一根绳子捆起来，把其他制服和鸭舌帽放在上面，然后动身前往铁路管理局。

铁路局有个女士边抽烟边看文件。她示意他等一等。过道里没有窗户，办公室前也没有坐的地方。外公反正没什么急事。他头顶上是漆黑的天花板。他另找了一个地方站着。楼里非常安静，唯一可以听到的响声就是从那小办公室里传来的翻阅纸张的声音。

后来，他可以进去了。一个狭小的空间，乱七八糟，被烟熏得黑乎乎的。到处堆着文件。来访者的椅子上也堆得满满的。外公站在那里。再次打招呼，报出他的姓名。说了他的工作年限和工作号码。那女士又点上一根烟。

外公不认识她。女士既不显年轻，也不显苍老。她脸色苍白。她询问他有什么事。他说，他打算交回制服，并表示感谢。他微笑着。她咳嗽着。他不知道他该怎样来处理这制服。他环顾四周。他把一切都放在地上。他依然面带微笑，可能因为他不再确切地知道自己为什么事要表示感谢。可能因为他突然想起来，这件大衣1975年冬天救了他一命。可能有一瞬间他甚至短暂地想到，应该向大衣表示感谢。

女士抽着烟。在她翻阅过的那本册子里有许多照片。外公微笑着。然后他说，好吧。他又拿起大衣离开了办公室。

阳光明媚。回到家里，外公挂起大衣，脱去衬衫和好鞋，然后穿上工装裤和胶皮靴子。他收拾好自己的钓具，扛起小凳。外公57岁。他前往德里纳河，我猜想。当他下钓竿时，他微笑着。

外公穆罕默德是个十分和善的人。大家都认为是这样，人人有目共睹。一个友善的人，他的妻子，我的内娜·梅耶玛时而又这样说，仿佛她说的是一个乐于助人的陌生人。她如此直言不讳地脱口而出，让人觉得她会没完没了地感叹丈夫那温柔善良的秉性。

外公几乎每天都过来问我们需不需要帮助。他给我们送来新钓的鱼，帮我们购物，削好我的铅笔。只要有什么东西坏了，他都尽力去修好，很少会把什么东西弄坏。

有一阵子，我很怕蚯蚓，或者说一看见蚯蚓就恶心。外公穆罕默德从地里挖出三条蚯蚓放在手心上让我看。蚯蚓爬过一条条掌纹。如果我愿意的话，他说，我可以把我的手放在他手旁，这样蚯蚓就会爬过来。我这样做了。可蚯蚓停留在外公手上不过来。可能连它们也感觉到了外公的善良（后来他却把蚯蚓钉到了叉子上）。我克服了对蚯蚓的恐惧。

母亲说，外公身上散发出的煤烟味伴随着她的整个童年。无论拿什么香皂都洗不掉。在我们拿着蚯蚓去钓鱼的那天，他的身上散发出剃须水和泥土的味道。

对他性格最好的描述或许来自那场战争中的事件。外公随着一个救助车队离开了维舍格勒。出城以后，车队被拦住了。一群全副武装的士兵冲向一辆辆车，命令所有人都下

车。士兵中有两个人来自维舍格勒，他们认识外公。外公微笑着走上前去，同他们握握手，向他们嘘寒问暖。

大家都躲过了这次被拦截的灾难。

1995年，我们如愿以偿地将内娜和外公接到海德堡。两人绝大多数时候都守在家里。外公时而敢去葡萄山上散步，或者去离我们几条街的超市购物。每隔几天，他就会去林中的小泉里背上一桶水回来。他不学德语，帮着干点儿家务，喜欢观看电视里播放的F1赛车。

有一次，他走进客厅里，电视里正播放着科幻连续剧《X档案》。他看了一会儿两个正在行动的间谍，接着在某个时刻问道，他可不可以提个问题打扰一下：“刚才那家伙是干什么的，就是电视里那玩意儿？”

我说：“一个外星人。”

外公边笑边说：“和我一样吧！”他用一双粗糙的手温柔地抚摸着我的脑袋。理论上，他在德国同样十分友善。但他没有表现自己友善的机会。

认识外公之前，我的内娜已经结过一次婚。家里几乎没人知道这事。在50年代和60年代，人们在南斯拉夫不愿意谈论失败的婚姻。这样的话题有伤风化。人们彼此忍受着，谁都有可能在和某个不喜欢的人共同生活。分手都是秘密进行的，谁都会为之感到羞愧。

大家并不知道内娜第一任丈夫的确切情况。他肯定是个马其顿人，因为她被“交给了”马其顿共和国首都斯科普里。半年以后，她返回维舍格勒。她比之前消瘦了，开始抽烟，并且一天到晚几乎笑个不停。谁也说不出来，这一切到底是什么征兆。也许她什么时候讲述过这段短暂的婚姻，只是那些听过的人对此始终守口如瓶。

外公穆罕默德当时住在城外一个棚屋里，正在找工作。他有的是时间。而因为他没入党，他也需要接受时间的考验。那时只要有可能，他就跑到离梅耶玛父母家不远的河边垂柳下面去。在那里可以开心地看火车，可以自在地钓鱼。年轻的穆罕默德喜欢干这两件事，当然也希望偶尔看到梅耶玛。从垂柳下望去，可以看到她家的房子。梅耶玛坐在花园一棵山梨树下一边缝衣服——如果父母不在家的话——一边抽烟。如果你站在垂柳下，自然会被人家看到。

不知什么时候，梅耶玛下到河边，朝他走过来。他立刻兴奋地跳起来，期待着她慢慢悠悠地来到他身边。他把帽子捏在手里，随时准备着打招呼。

可她没打招呼。她问他到底一直在这儿寻找什么。

这一问，一下子弄得外公六神无主，不知所措。所以他也没打招呼，也许这是他成年生活中的第一次。他转而问她喜不喜欢钓鱼。

她说不，然后又提出一个问题，她看上去是不是好像很喜欢钓鱼的样子？

听到这样的话，你能说什么呢？每个人，包括像梅耶玛这样的美人可能都喜欢钓鱼吧！鱼儿才不管你长什么样。最好还是说些别的吧。然而，穆罕默德除了想到钓鱼，脑海里一片空白，于是他问她愿不愿意向他学习打结。

她会打的结肯定比他要多，她回敬道，钩织时她甚至会打一些看不见的结。

然后他说，他想成为火车司机。

为什么想当火车司机呢？

光靠钓鱼和打结肯定没法生活，他说。这时，她问他愿不愿意和她一起去看电影。

他比她大六岁，一辈子都会和和气气地对待她，我想应该是这样。

内娜·梅耶玛的父亲叫苏尔霍，就是那个艄公。他有手艺，能在德里纳河上呼风唤雨。我太外公满手老茧，伤痕累累。他头上戴着便帽，嘴上叼着烟头，手抓着划桨。

这张照片：我母亲就是筏子上的小姑娘，两腿叉开骑在一根随意放置的树干上，活像一个德里纳河上的女船长。她外公管她叫小猫咪。当河水使筏子颤动起来时，她那高亢的声音回荡在峡谷里：“外——公——！”

外公再三叮嘱她要保持安静，本来是不许她跟着一起来的。可是，当出现这样美妙的摇晃时，她哪会一声不吭呢？

苏尔霍娴熟地让筏子远远绕开突出水面的岩石。他十分得意没让别的艄公看见他的小外孙女，也没让他们听到她的声音。

到了泽帕河汇入的下游，德里纳河奔腾咆哮，沿着两段陡坡浪花飞溅，如痴如醉地飞流直下。小猫咪必须在湍流的前方下船，那里太危险了。她在岸边跟随着外公，奔跑着，不想错过外公飞过湍流的时刻。到了更加狭窄、更加汹涌的第二段湍流前，许多艄公会跳下水，游到岸边，让筏子暂时听天由命。

外公不会或者不需要游泳。他与他的合伙经营者留在筏子上，抓着后面的划桨。筏子开始倾斜，河水漫上大梁，有人呼喊着什么，也许是河流，接着他们就从上面飞跃过去。我母亲在一旁拍手叫好。

当苏尔霍离开这个世界时，我还没出生呢。他没死在河里。他死于肾衰竭。从1963年起，德里纳河上三道堤坝相继建成，再也不需要艄公了。这些水库驯服了德里纳河。

他到底会不会游泳？关于这个问题流传着一个故事。我无法说出这个故事里哪些是真的，哪些不是真的。

我的太外婆卢姆萨去德里纳河边洗衣服。一个会唱古老歌曲的文盲。这个故事是这样的：苏尔霍第一次在筏子上听到她的歌声，认为这是一个水妖的声音。众所周知，自从维舍格勒修建了德里纳河桥，就一直有水妖在河里兴风作浪。苏尔霍跳进河水里，不是为了逃到岸边，也不是为了溺水身亡，关键是不想让人骂他一辈子在为水妖效劳。

在沉下去的时刻，他听到歌声是从哪儿传来的，他想去那里。于是，他游到了岸边那个地方，看到垂柳下的卢姆萨蹲在双把洗衣木桶前，唱着歌。

“哎，我在这里钓到了一条多么丑陋的鱼啊。”据说这就是太外婆冲着她未来的丈夫说的第一句话。

回想起来，他当时并不是特别有把握，苏尔霍经常这样说，要是他没讲述这件轶事的话，那恐怕会更糟糕——一个水妖的诅咒，或者他未来的妻子那张尖刻伶俐的嘴。

当卢姆萨讲述时，她描述的是一个戴着帽子和穿着白衬衫的艄公，或者有时候，更好的情况是，光着上身，每周多次顺着德里纳河漂流而下。唯有她可以从远处认出他，认出他的帽子和挥动的手臂。因为她不想一直仅仅从远方眼巴巴地望着他，所以她唱起了歌。

“我把我的苏尔霍唱到了我的怀抱里，尽管他那时还不知道，他已经是我的心上人了！”但是她心如明镜，“我当年给你唱那首歌，只为换几个铜板。或者别的什么东西。”

太外婆卢姆萨出身于一个人口众多的家庭。在那次大战中，这个家遭遇了巨大的伤

亡。也许正是蒙难者使得她这个活下来的人变得机智、快乐，喜欢歌唱。

只要说起卢姆萨，人们都赞扬她有一把情真意切、清澈的好嗓子，但是她不愿意为所有人吐露这样的真情。当德国人1944年在一个牛圈里搭建起一个舞台，她不得不去为他们唱歌。人家命令她去唱歌，但没强迫她非得唱好不可……

苏尔霍和卢姆萨在德里纳河畔建了一座房子。正面是白色的，百叶窗是用杨木做的。苔藓很快就长满了屋顶。他们养育了五个孩子。人们坐在阳台上，可以一边临河喝着咖啡，一边聆听卢姆萨唱歌。孩子们在两棵郁郁葱葱的桑树下戏耍。那里有一张桌子，南瓜长得很茁壮。

我母亲童年时也在桑树下度过了美好的日子。卢姆萨帮她把头发梳成小辫，教她怎样自己编小辫，许许多多的花样。为她唱歌，为河流唱歌。母亲的外公划着他的筏子，带着小猫咪穿行在德里纳河上。太外公一辈子与水结下了不解之缘。

水也找上了他们的家门。1975年3月，接连14天之久，大雨滂沱，下个不停，山里的雪融化了。随之而来的洪水冲毁了他们的房子，那里再也无法居住了。

全家人聚集在被洪水淹得不成样子的房子里，站在深深的淤泥里。孩子们清理着，孙女们在哭泣——我妈妈和姨妈卢拉。她们前天还一起打扫过房子。那时候，卢姆萨已经弯不下腰了，也就再也不能端正地直起身子了。据说过了没多久，她走起路来，身子不得不弯成一个直角的样子。

在汪汪泪水和一片狼藉中，她开口说：“你们打扫屋子的水平可不太行。”她说，“好吧，我告诉德里纳河，让它来帮我们一下。”

在一部拍摄于1951年、关于德里纳河艄公的纪录片里，可以看到一个戴着帽子、穿着衬衫的艄公。

卢姆萨去世时，我才两个月大。人们在夜里听到她突然一声大笑和一声咒骂。清晨时她就走了。在我们唯一一张合影上，我躺在她的怀抱里。她注视着我，微微张口。今天是2018年8月24日。我把耳朵贴到那张已经失去色泽的照片上，深深地倾听着。

奶奶与轮舞

奶奶克里斯蒂娜是一个很实际的女人。在奥斯克鲁沙那不平凡的一天，她对加夫里洛说：“要是你先我走了的话，我想要你的电视。”

那天下午，加夫里洛家的电视始终开着。电视里放着一部墨西哥连续剧时，大家都美美地睡了个午觉。飞来飞去的苍蝇饮着我们头发上的汗水。一个钟头后，我们又醒来了。奶奶挽着加夫里洛的手臂，他们离开了房子。不，他们什么话都不用说。我跟随着他们。

他们俩走在前面，低声聊着天。我想象着，他们聊来聊去，无非回忆和洗钱之类的事。有一次，奶奶难以置信地大笑起来，像个小姑娘，笑声向四面八方弥漫开去。

一群羊从树林里走出来，逍遥自在地朝我们走过来。它们脖子上的小铃如同小调似的丁零当啷响着。奶奶和加夫里洛停在一道篱笆前。看上去当然是一副饱经风雨的样子。三块木板，一根木柱，又是三块木板，又是一根木柱。两人环顾四周，说了些什么。然后奶奶问，她可不可以给我照张相。我感到诧异，提议我们三个一起照。

就给你一个人照。“你坐到那边篱笆上。”

我把智能手机递给她。她知道怎么用吗？我是个蠢驴，她当然不知道怎么用。我告诉她怎么用。我爬上篱笆。这儿吗？

不，再向左。再向左一点。好。别说话！

我一声不吭。

我面前是草地，背后是羊群和维亚拉茨山顶峰。然后就发生了下面的事：什么都没发生。

“奶奶，现在怎么样？”

“别动。”

“快摁吧！”

“别那样坐立不安，动来动去。”

“奶奶，直接摁红圈就是了。”

“别说话。”

整个过程特别荒谬。过了三分钟或者多久，我烦透了。我从篱笆上跳下来，可奶奶和加夫里洛齐声喊道：“别下来！快回去！”他们一脸严肃的样子。

我又爬上篱笆，几乎恳求他们饶了我。

“向左一点。”奶奶说。

羊群像踩着高跷似的从我们身旁走过去。有一只打开通往相邻牧场的门。其他的跟着穿过去。我对什么都不会感到惊讶了。最后一只羊卧在我身后的草丛里。加夫里洛也坐下来。一只鸟儿在鸣叫。奶奶大声说：“瞧那儿！快瞧那儿！”我环顾四周。那里除了高山、羊群和晴朗的天空，什么都看不到。我的目光又移向前方，奶奶趁机摁了一下，给我在奥斯克鲁沙留下了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没什么引人注目的。山地里一个年轻男子。头发上满是汗水，贴在额头上。一只羊卧在跟前。有一座山耸立在他的肩膀上。一些大鸟围着山顶盘旋。天空一片蔚蓝。

今天是2018年2月7日。这张照片拍摄之后，差不多已经过去九个年头了。山上那里还有人住吗？为什么没人住呢？据说，有一个来自莱比锡的画家路过奥斯克鲁沙，在那里画了12幅蛇的油画，一条条蛇懒洋洋地盘绕在果树上。德国商业银行有一位文化经纪人，他对盘绕在果树上的蛇很感兴趣，花了30万欧元买走这一系列的画。他的妻子是一位瑜伽老师，爱上了油画上的这个地区，便前往那里观光。一到那里，真实的景象更显美丽。她买了一座空置的院子，让人进行修缮，夏天为来自莱比锡大区的瑜伽爱好者举办瑜伽工作坊。一位心力交瘁的企业顾问在那里安了家。他的女朋友，一位大提琴演奏家，在夜晚的宁静中营造着氛围。那个画家又回来，为加夫里洛、玛丽亚和米罗斯拉夫的羊群画了像。有两名女实习医生在一座谷仓里酿造苹果酒。那里现在成了一个公社。人们各自的背景和情况大相径庭，但能相互争论，又彼此热爱。一些对公社感兴趣的旅行者来了。善于动手的嬉皮士为加夫里洛修理洗衣机，让他观看怎样修身养性。人们修缮房屋，注销社交媒体，熬煮果酱。手工艺人开办了作坊。一个来自哈雷的女皮肤科医生创建了波斯尼亚山区可持续度假模式，以此填补可持续度假领域的市场空白。那位心力交瘁的企业顾问在维亚拉茨山上发现了一条巨蛇蜕下的皮，他把蛇皮放在枕头下，又可以睡好觉了。人人都从玛丽亚那里买牛奶，有庆祝活动时，又从加夫里洛那里买五头小猪。一年后，第一批公社婴儿的哭叫声回响在这片山区里。一个俄罗斯女人结束瑜伽学习后决定买下所有无主的東西。这个公社随之出现了一些紧张的气氛，直到人们对这个俄罗斯女人有了更多了解，觉得她其实十分出类拔萃。她丈夫同时买下了维舍格勒。斯特沃有了一项新工作，因为俄罗斯人促进了维舍格勒的工业发展。放在玻璃柜里的战争罪犯照片向加夫里洛招手警告。当年的南斯拉夫共和国正在紧锣密鼓地为战争做准备。

我给奶奶打电话。问她身体怎样。

“我身体不太好。”从来都不说自己身体不好的奶奶说。她哼着一首曲子，好像正在听音乐。我想象着，她闭着眼睛。一阵咳嗽打断了她的话。

我问她是不是哪儿不舒服。这是一个愚蠢的问题，于是我马上接着问道：“你感到痛吗？”

“是的，”奶奶边说边哼着曲子，“我告诉过你我怎样认识你爷爷的吗？”

是的，她说过。仅仅这个星期就说过两三次。“你没说过，奶奶。”

“在一次轮舞时。在奥斯克鲁沙。他挽起我的胳膊，还没等到音乐开始，他就踩到了我脚上。音乐一开始，他立刻又踩了一次。接下来再跳时，我就站到别的地方去了。佩罗也跟过来，又踩了我一下。我还是想跟一个不踩我脚的人跳舞，于是第三轮就没去。他当然也就没去。”

我想象着，奶奶在微笑。奶奶在咳嗽。到了下一次轮舞时，爷爷跳着跳着又踩到她脚上。这一次，奶奶干脆停下不跳了。轮舞圈绷得紧紧的，急促地移动，犹如一个链条，马上就要跳跃起来，散开来，又合拢，继续旋转着，没有爷爷奶奶。

奶奶提议坐下不跳了。爷爷把提议理解为奶奶同情他的信号，而在奶奶看来，这是他的靴子踩踏的后果。奶奶哼着舞曲。我熟悉这舞曲，这是一首塞尔维亚轮舞曲，节奏明快简洁。

“接下来呢？”我问。哼着舞曲就是回答，然后是她的呼吸，缓慢而沉重。“奶奶？”

她说：“你长着像佩罗一样的长腿。”

童年时，这样的比较让我觉得美滋滋的，因为我确实认为爷爷很帅。电话那头，奶奶的话听起来仿佛不仅在说外貌，而且在说我必须回答这个故事该怎样发展的问题。

我们打完电话这天，奶奶因肺炎住进了医院。我没把奶奶的病当成我去看望她的契机，而是待在汉堡书写关于她的故事。父母代我去了维舍格勒。今天是2018年3月7日，他们在那里待了一个多月了。我从他们那里获知，奶奶的身体状况好转了，但是阿尔茨海默病比之前更加残酷地折磨着她。她和只有她看得见的人说话，寻找着已经离开人世的人。

我今天给她打电话，想让她祝贺我的生日。我想让她回忆起我的生日。就这样，我们的对话唠唠叨叨地朝着这个话题而去。奶奶说话的声音如此微小，所以我也不用问她身体怎样。我说：“我打算很快再去奥斯克鲁沙。”她一声不吭。我问：“你想一起去吗？”她一声不吭。我哼着那首轮舞曲。我已经什么都不打算做了。可就在这时，她的心里有些东西复活了，又跳起舞来。这一次，她“和一个男人”跳轮舞。她没说是“佩罗”或者“爷爷”。一个男人踩了她的脚。

我想知道，这事发生在什么时候。

“格奥尔格节那一天。离现在没多久。我们在这里的苜蓿地里跳舞。”她说，仿佛她就在现场，仿佛桌子和凳子就摆在那些树下，仿佛她听到了蝉鸣和音乐人的演奏。很奇怪。我不想让奶奶和别的男人跳舞。我想让爷爷踩到她的脚上。我想让奶奶在她的回忆里和她未来的丈夫第一次跳舞，和她未来的丈夫第一次交谈。

“是和爷爷一起吗？”

“什么？”

“你不是和爷爷在跳轮舞吗？在奥斯克鲁沙，和你的佩罗一起？”我又哼起那首舞曲。突然间，我觉得我好像在训练一只动物似的。于是我们的谈话中断了。

“和佩罗一起？”奶奶犹豫不决地说。

我不忍心再这样下去了。

“对面那边，在那棵山梨树下，”她说，“我们谈天说地。你可以和佩罗聊得很投缘，毫无疑问，不像跳舞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地方的姑娘个个人高马大，行为粗鲁，如同橡树。我身材娇小，我的佩罗就喜欢我这样的。”

奶奶清了清嗓子。

“爷爷舍得为你花时间。”她说，她的声音变了。我更加坚信她说的话。“我喜欢看到你们在一起。你们在城里游来荡去，海阔天空，说个没完没了。”别的7岁男孩个个都能揍我一顿，但我能用智谋胜过他们每个人。爷爷给了我一些我想从他身上得到的东西。“你们两个是两头喜欢争辩、互不相让的骡驴，”奶奶说，“这一点你也像佩罗。”

据说，爷爷很少直接回答我提出的问题，而是把回答包装到一个个小故事里。多年来，我也是这样讲故事的。这是对我钟爱虚构的一个很好的解释。我问奶奶，爷爷讲的一个个故事是不是真的。我多么希望是真的。我是个投机分子。

奶奶说：“尽管天气炎热，但他依然穿着一件上装。这样一个自命不凡的人。一个仪表堂堂又自命不凡的人。”

她挂了电话。

爷爷死后许多年，奶奶住宅的门铃上依然写着他的名字。爷爷佩塔尔·斯坦尼西奇死于1986年。30年之久，尽管人早就不在世了，可人们一直还按着他名下的门铃。奶奶不允许把丈夫的名字从门铃上去掉。她心里无疑明白，如果不再用他的名字命名门铃，那它就只能写在一块人们有时会在前面点上蜡烛的墓碑上。

我渴望跳舞，这很奇怪，因为我心知肚明，整个故事不可能是这样的。爷爷奶奶并不是在跳舞时认识的，也不是在奥斯克鲁沙。爷爷是税务局官员。有一次，他在一个名叫斯塔尼舍瓦茨的村子里挨门挨户办理业务。他在村子最大的房子里待的时间比较长。他和房主人一起喝酒吃饭，一个年轻女子把饭菜端上桌来。她没和这陌生人说一句话，也没看他一眼。

一年后，奶奶从马上摔下来，摔断了胳膊。她被送到维舍格勒的医院。这时候，爷爷已经被聘为医院的会计。他们在走廊的霓虹灯下不期而遇。他还能想起这个从厨房里端出玉米粥的年轻女子，她也能想起这个当时上装就搭在椅背上的年轻男子。这样的不期而遇有时候足以促成一个美妙的开端：共同回忆起一个起初好像毫无意义的时刻。

我的名字写在汉堡一个门铃上。

童年时，我跳过几次轮舞。

而今再也记不起那些舞步了。

我儿子继承了我的长腿。

诚实、正直、坚持不懈

我出生在一个如今已经不复存在的国家里。11月29日是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国庆节。在这天，一些如今已经不复存在的南斯拉夫人聚集在一个个充满南斯拉夫象征意义的地方。当他们在11月29日，也就是如今已经不复存在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国庆节这天聚集在一起，共和国就依然存在着。民族自决是有意义的，对吧？11月29日，我看到一些老人——男女都有——眼里饱含着泪水在歌唱：

我的路将我引向广阔的世界，
我追随着我的命运，
心灵庄重地承载着你，
你永远让我可敬可爱，
我亲爱的家乡，
南斯拉夫，南斯拉夫！⁽¹⁾

他们一次聚集在内雷特瓦河畔，另一次在伊格曼山上烧烤羊排。卢布尔雅那、贝尔格莱德和亚伊切同样是他们轮流聚会的地方。在亚伊切，铁托险些被德国人杀害了。参加聚会的人在铁托和他的指挥部藏匿的洞窟里自拍。光线不好，照片当然也就不尽人意。你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他们为晚会预定了一支合唱团。合唱团唱着民歌和英雄之歌，并且不能花费太多。当有人发表演说，合唱团就不声不响地站在后面。总有一个人讲反法西斯话题，包括与当前欧洲局势相关的内容。一旦你成为反法西斯主义者，那你就一辈子是反法西斯主义者，直到进入坟墓。

除了合唱团——绝大多数是年轻人——以外，所有在场的人都是在南斯拉夫出生和成长的。他们爱上了南斯拉夫，不管结婚没结婚，不过其中绝大多数都已成家立业。他们在南斯拉夫做盲肠手术，购买南斯拉夫汽车，欠债和还债，经历危机和享受幸福。有些人还保留着他们的盲肠。他们唯一再也不能在南斯拉夫做的事是：死亡。土地还是一样的。可在他们眼里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他们难以接受这个出人意料的历史结局。你不接受又能怎样呢？你必须面对现实。南斯拉夫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他们还活着。他们要让南斯拉夫复活一天一夜。他们有膳宿，有节日演说者，有来自50年代和60年代的幻灯片，有时还有PPT。一些胆大的人会展示80年代的幻灯片。灾难就发生在台上的讨论中，难道还用得着展示有关灾难的照片吗？！在红星闪闪的旗帜下，他们全体起立，合唱团开始唱国歌：

啊，斯拉夫人，
我们祖先精神不灭，
因为子孙的心
仍为人民跳动。

大家齐声歌唱。手捂在心窝上，社会主义的孩子们，多民族的兄弟姐妹们。他们是旧物商人、博学的退休者、农民和奶奶们。他们是铁托中心会员，是人民解放战斗真理学会

会员。他们围坐成一圈展开讨论。只有轮到谁，谁才可以发言。铁托领导下的年代是他们人生最美好的岁月。他们相信，这对其他人来说也是天经地义的。现在是天堂过后的地狱。当然不包括那些从地狱中渔利的人——那些政治激进分子、那些丧尽天良的企业家、那些剥削人的外国投资者。

有一次，在莫斯塔尔的酒店里，除了他们的集会外，一场妇科医生大会也在同时举办，那边的食物要好得多。临近深夜时，一个南斯拉夫人戴上他那显得有点太小的少先队队帽，将拳头贴到太阳穴上和人打招呼，大家随之都摘下帽子行礼。第一个人宣读少先队誓词，其他人齐声复述。这时，地面张开，铁托乘坐着金色的自动扶梯来到这个世界，要给每一个在场的人颁发一枚勋章。然而，来者不是铁托，而是一个稀里糊涂闯进来的妇科大夫。他盯着一群少先队员的眼睛，立刻又退回去了。他真的为贸然闯入感到特别不好意思。

我有点像他们。我也相信昔日的理想。少先队誓词我依然可以倒背如流：

今天我成为少先队员，我在这里宣誓：

我将努力学习，勤奋工作，尊敬父母和老人，成为一个善良和诚实的同志。

我热爱我们自治的家乡，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

我将捍卫四海皆兄弟和团结统一的思想，捍卫铁托为之战斗的思想。

我将尊重世界上所有人，为自由与和平而奋斗。

这话说得多么美好啊？尊重世界上所有人！这听起来多么容易。

早饭后，人们无所事事地在内雷特瓦河边散步。有一个人打算往河里撒尿时掉进了水里。许多同志接着跳进河里，团结和愚蠢同时爆发。这时，从河水里传来了《国际歌》，下游有一个钓鱼人大声喊道：“闭上嘴，你们这帮地地道道的白痴！”

接着：“所有想工作的人都有工作。”

接着：“是的，也存在一些审查和几个政治犯。可比起那些结盟国家要少得多。”

接着：“社会保险，教育平等，旅行自由。”

接着：“是的，但个人崇拜也理所当然，无可厚非。”

接着：“要是铁托还活着的话，恐怕就不会有战争了。”

接着：“要是铁托还在世的话，今天的南斯拉夫恐怕就会像瑞士一样，只是有点顽固不化而已。”

接着：“要是铁托还在世的话，南斯拉夫恐怕会成为世界冠军。只要想一想，一支从各个联盟共和国中选拔队员的足球队会是什么样。”

接着：“同志们，请安静。下一个演讲者是米莱·拉迪沃耶维奇。米莱用不着特别介绍。他演讲的题目是《伟大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40周年之际的约瑟普·布罗兹·铁托与他的‘腰痛病’的真相》。欢迎米莱做报告。”

接着：“我们是南斯拉夫人。这是我们的出身，也是我们的未来。”

到了深夜，合唱团解散了，领带结打开了，参加聚会的人们几乎还悉数在场。他们把

桌子推到墙边，又是跳舞，又是不顾禁令地抽烟。莫斯塔尔的天空一片晴朗。一些星星早已熄灭。尽管如此，人们依然会看到它们。一位酒店职员问，还需不需要什么，他马上就要下班了。

什么都不需要了。

南斯拉夫人一直跳舞，直到黎明时分。一个来自斯普利特的人坐在椅子上进入了梦乡。一个来自卢布尔雅那的人回到房间里。一个来自图兹拉的人告别后同一个来自铁托格勒的女士上了楼。一个来自诺维萨德的人蹲在厕所打起盹。一个来自斯科普里的人把闹钟定在下午1点。

晚安，同志们，晚安。

[\(1\)](#) 歌词来自南斯拉夫80年代流行歌曲《Jugoslavijo》，原文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

混血儿

1986年，一个24小时内做俯卧撑29449次的人打破了世界纪录，他名叫米奥德拉格·斯托扬诺维奇·吉德拉，是南斯拉夫人。

南斯拉夫的勇士们于1989年和1991年先后两次荣获欧洲篮球锦标赛冠军。

1991年，红星队也参加了争夺洲际杯的比赛。我获准深夜不睡觉观看比赛。对手来自智利，国徽上有一个印第安人图案。我们有半场只有10个人参加比赛，但仍以3：0大获全胜。

南斯拉夫制造的产品也许不是那么地好，但也足够好。也许不是足够好，但足够便宜。

南斯拉夫是意大利西部语言的自然背景，假若你喜欢卡尔·迈⁽¹⁾和枪战，就像童年的我和内娜·梅耶玛喜欢脏兮兮的克林特·伊斯特伍德⁽²⁾那双严肃的眼睛一样，南斯拉夫就会是无比灿烂辉煌的风俗画。

南斯拉夫，它是优秀者的天堂。在体育领域优秀，在战争中优秀，在和平时优秀，在战争与和平之间优秀，远离各种结盟。在南斯拉夫的描述中，大家都拧成一股绳，同心协力追求同一目标，不管年龄、性别、职业或者种族差异，人人平等。

所有的问题都伴随着许诺；只要大家齐心协力，问题就可以解决。这话说得也许不诚实，但很乐观。有些问题解决了，有些则没有。

数十年之久，天文数字的贷款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导致了通货膨胀。

至于那些批评国家政权的人，人们通过把他们关在一座孤岛上来解决问题。这种做法自然让人觉得不是真正的上策。童年时，我对此一无所知。在这一方面，南斯拉夫也做得十全十美：对不太好的事情始终守口如瓶。

南斯拉夫支持年轻人，因为未来掌握在他们手里。这样说也包括我在内。说实在的，要义不容辞地为一些压根儿还没有发生的事肩负起责任会有相当大的压力。如果一个人把一棵无花果树连同花盆和泥土一起扔进洗衣机里，要看看无花果树会成什么样儿，那还怎么能贸然相信这个人呢？可话说回来，事已如此。

我和我的少先队队友一起清扫德里纳河岸，一边用口哨吹着我那个时候最喜欢的歌《变化之风》⁽³⁾。我熟背一首首诗，自己也写一些。诗中的“我”是些押韵的游击队员。

战前不久，我为献血做宣传。

元月或2月的一个星期六，我们蜂拥而出，挨门挨户去问：“同志，你最后一次献血是什么时候？”我受命负责的区域与奶奶克里斯蒂娜的家相邻。我认识那里的人，他们也认识我。“你们都好吗？你们愿不愿意再次献血？”

肯定没有一个国家会像南斯拉夫这样献这么多血，我当时这样认为。这些可观的血来自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波斯尼亚人、马其顿人、斯洛文尼亚人，以及那些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数不胜数，没有必要在此一一罗列。但他们的血一定也很棒。

我是混血儿。我读《温内托》。

1990年，萨格勒布发电机队和贝尔格莱德红星队比赛时发生了骚乱。观众相互袭击，克罗地亚人袭击塞尔维亚人，塞尔维亚人袭击克罗地亚人，球员们夹在中间。有100多人受伤了。

1992年，南斯拉夫国家队解散了。

1992年8月，塞族共和国的军队血洗了离维舍格勒不远的一个村庄。巴里莫。这村庄名叫巴里莫。26人失去了生命。

2001年，俯卧撑世界纪录保持者米奥德拉格·斯托扬诺维奇·吉德拉在他的车里遭到枪杀。一颗子弹打中他的脖子，五颗打中胸膛。

-
- (1) Karl May (1842—1912)，德国作家，作品多为带有异域情调的游记和冒险故事，常描写沙漠中的阿拉伯人和美国西部的印第安人。代表作《温内托》是以印第安人温内托为主角的三部曲。
 - (2) Clint Eastwood (1930—)，美国演员、电影人和音乐家。
 - (3) 德国摇滚乐队“蝎子乐队” (Scorpions) 1991年发行的歌曲。歌词是乐队成员访问苏联期间创作的。

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

最晚在铁托死后的80年代里，南斯拉夫的多视角叙事中就出现了缺陷，联邦根基也出现了裂痕。统一和友爱的口号之下，经济领域的种种鸿沟无法弥合。那些比较富裕的共和国不再愿意长久地贡献商品和分配资本，种族仇恨日益滋长，加剧了分裂趋势，后者又进一步加剧了种族仇恨。政治非但不能减少民众的恐惧，反而激化了各种敌对。

多民族思想的黏合剂难以长久地承受民族主义情绪潜在性的破坏。作为南斯拉夫统一神话至关重要的叙事者，铁托是无法替代的。其后的一个个新的声音只会以粗暴的谎言煽动人心。他们的宣言看起来就像是挑起民族仇恨的行动指南。那些宣言得到知识分子的支持，又通过媒体广泛传播，反反复复，直到80年代中期，这一切已无处不在。在他与母亲和那条蛇跳舞之前，父亲已经从中看到了端倪。

那些新的叙事者名叫米洛舍维奇、伊泽特贝戈维奇、图季曼。他们踏上漫长的宣讲旅程，走进他们的人民之中。

叙事类型：博得喝彩和慷慨激昂的演讲。

叙事框架：80年代迷失方向的政治、经济危机和通货膨胀。

叙事主题：各自的民族是牺牲品。丧失尊严，遭受不公正，战争屡屡失败。另外一个则是敌人。

主要人物：薪水微薄的人、当今的失业者，以及数百年前阵亡的战士。

被叙事时间：800年之久。

叙事风格：命令式。关于象征的象征。残忍的图像。咄咄逼人的预期。

叙事视角：全知视角。第一人称复数是其所选择的叙事人称。他们运用我们的方式，全然排除了那些不属于我们的人。“我们不再听任那些人摆布——诸如此类。”

叙事意图：行动起来，创造新的英雄行为！历史是可以改变的！我们的血统无比强大！尼古拉·特斯拉⁽¹⁾是塞尔维亚人。德拉泽·彼得罗维奇⁽²⁾是克罗地亚人。

叙事主线：声称一个民族的文化认同受到威胁，因此必须奋力捍卫。主张有选择性的种族、宗教或者道德优越性，其目的是让贪婪的领土野心合法化。民俗起源乃是个性证明。一切来自另一方的东西都是骗人的鬼话。

接受者：腰袋里装着折刀和除臭香水的男人。

恰恰就在这儿！在巴尔干半岛上，天哪！在东方与西方的交汇处！大家不知什么时候都排队来过这里，大家！他们不可一世，被打败（或者没有），撤退。而他们在这里都留下了某些东西。罗马人、威尼斯人、奥斯曼军队、奥匈帝国。全都是斯拉夫人。犹太人来自伊比利亚半岛，并且留了下来。罗马人的飞地存在于整个区域里。德国人睡在我祖先的床上。大家都来过这里，你听见人们以不同的音调唱着同一首歌，各吹各的号，各定各的调。在这里，你喝着土耳其咖啡，自然而然地运用德语和阿拉伯语外来词，与原始斯拉夫的水妖在森林里共舞，在结婚典礼上唱起同样蹩脚的克罗地亚或者塞尔维亚的流行歌曲。我们不是共同为红星队的进球而欢呼喝彩吗？显然没有。

今天是2018年8月29日。最近几天，德国有成百上千的人在开姆尼茨游行抗议开放的社会。移民受到攻击，现场有人行纳粹礼。

在南斯拉夫国徽上，六个火炬在为六个民族燃烧，周围镶着麦穗，上面烤着五角星。孩童时代的我觉得这国徽很棒。与此同时，他也在问自己，为什么小麦或者五角星没有燃烧起来呢？

1991年，各种归属感变成了导火索。大家都喝着同样的汽油。每个出身都可能是错误的。大火燃烧起来了。

1991年，当火焰在克罗地亚熊熊燃烧起来的时候，我正在维舍格勒宣传和平。我加入了一个由8岁到14岁的孩子组成的小组。我们以和平的名义策划了一个宣传节目。奶奶克里斯蒂娜帮我们找到了一个合适的舞台。她认识一个坐落在城中心的饭店的老板，估计他欠她什么情。我们可以免费进入啤酒花园，甚至还可以得到赠送的饮料。

我们用红星装饰一张张桌子，把彩旗和花环挂到墙上。花环应该像和平花环，但实际上看上去就像冰雪老人⁽³⁾快来了似的。

我们朗诵赞美诗：赞美南斯拉夫。赞美人民解放战争。赞美集体、童年、雨水、红星队（我）等。

我们唱起游击队歌和美国流行歌。我们举办了各种主题访谈。我想起有恐龙和反法西斯主义系列。奶奶在三个下午组织了义卖抽奖，自己中了两次。我的英语老师做了一个报告，我记不清是什么内容了，整个过程我都盯着她的嘴唇。我们的母亲每天都为自助餐准备夹心面包。两个星期的活动快结束时，由于通货膨胀，面包太贵，我们只好不再赠送。

这些活动结束后，便开始放音乐。我当时也成功鼓动起一个姑娘。她和我一起跳舞，一切都让人觉得难以置信地美妙和正确。后来，那姑娘去和另一个萨沙跳舞，又让我觉得不可思议地难受和错误。他们甚至在放着蝎子乐队的《变化之风》时（苦涩和嘲讽）跳舞。

大概就在我们这次宣传活动一年后，一个塞尔维亚士兵来到我奶奶克里斯蒂娜的住宅里找我母亲。他会打开屋里所有的门，甚至还要看一看我母亲会不会挂在阳台上。他会给自己倒上一杯牛奶，问我奶奶为什么会允许她儿子娶一个“土耳其女人”。他离去时还告诫奶奶：

“把铁托画像从墙上摘下来！”

“种族主义者基本上都是一些蛮不讲理的人。”听说爷爷有一次这样说过。在南斯拉夫，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长久以来就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所以，在90年代里，种族主义者在贝尔格莱德、萨格勒布、武科瓦尔，同样也在维舍格勒兴风作浪，倒行逆施，更加让人觉得闻所未闻。

世界要完蛋了，人们没有及早并坚决地阻止那些想让世界完蛋的人。今天是2018年9月21日，如果下一个星期日联邦议会举行选举，那么德国选择党⁽⁴⁾恐怕会获得18%的选票。

铁托画像如今依然挂在奶奶的住宅里。维舍格勒的孩子们每隔两个星期就会为了和平而占领一个地方。他们曾有一次肯定唱着：

我的路将我引向广阔的世界，

我追随着我的命运，
心灵庄重地承载着你，
你永远让我可敬可爱，
我亲爱的家乡，
南斯拉夫，南斯拉夫！

-
- (1) Nikola Tesla（1856—1943），美籍塞尔维亚物理学家、工程师和化学家，在电磁场领域有多项革命性发明。
 - (2) Dražen Petrović（1964—1993），克罗地亚职业篮球运动员，最早进入NBA的欧洲球员之一。
 - (3) 俄罗斯传说中的童话形象，类似圣诞老人。这个形象来源于斯拉夫神话，象征寒冷的冬天。
 - (4) 德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反对欧洲一体化。

奶奶和铁托

“铁托死了！”奶奶低声说。她把正喝的咖啡倒进洗碗池里，用洗碗布抹了抹嘴，打开门去楼梯间，大声喊道：“铁托死了！”我抓住她的胳膊。她继续大喊着，声音越来越大。高兴或震惊？“铁托死了！”

奶奶从来都是一个不问政治的人。政治是爷爷的神圣领域，正是他把铁托的画像挂在了墙上。只是因为铁托是她丈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奶奶就不会把铁托画像摘下来。她自己把人分成好的与坏的，好就好，坏就坏，泾渭分明，看他们的吃相是好是坏，看他们照顾家庭是好是坏。要说照顾家庭，那也包括照顾亲人死后的生活，照看他们的墓地，铭刻对他们的记忆。谁把自己的家庭放在第一位，谁就首先受到关照。

从照片上看，铁托养得胖胖的。他关心的是南斯拉夫这个大家庭。奶奶可能对这一点很满意。可是，我觉得她突如其来的大喊大叫好像有些过分。她甩开我的手说：“铁托死了！”她要下楼去。她要上街去。

“今天，既然我已经成为少先队员了，我便以少先队员的荣誉宣布。”我说话的声音不大，可奶奶依然站在那里。我低声说：“铁托去地下了。去了他在亚伊采的藏身洞里。”我用拇指和食指封住了我嘴唇之间的拉链。

奶奶点点头。她眼睛里闪闪发光。她犹豫不决地转过身，打开铁托传记，注视着那一一张张照片。她让我给她朗读那段描写铁托在亚伊采藏身洞里的文字。让我关掉门窗，并且低声说：“老实说，他需要我们帮助吗？”

“革命需要每一个愿意忠诚地为无产阶级斗争服务的人。”我边说边把拳头贴到太阳穴上。

“我只想要一把手枪，你这个小坏蛋。”她低声说。

我说，我会看看怎么办。“也许我可以问问安德烈。”

“哪个安德烈？”

“你的邻居。你的警察？”

“这里没有警察。”奶奶挥手拒绝。

我明白：“这里”不是今天。奶奶回到了铁托去世那一年，1980年。

我继续翻着那本传记。她看上去心不在焉的样子。提起安德烈让她心神不安。她直盯着眼前。不知什么时候脑袋耷拉在大开本传记上睡着了。铁托的肖像压在她的脸颊下。

在鞋盒里，在抽屉里，在科涅克白兰地里

奶奶从房子里清走了许多属于丈夫的遗物。她保留下来的有：能够证明丈夫一生经历的文献和照片；爷爷的小图书馆，一些她没有读过并且也不会去读的书；他的纪念章和三件上装，一件就像是专门为我定做的，另外两件很难看。当她趴在铁托传记上睡觉的时候，我在屋里走来走去，寻找爷爷的踪迹。对我来说，她睡觉时是最合适的时候，也不知为什么，我不想让她知道我在干什么。

在我的记忆里，爷爷是一片空白，它是通过别人讲述的逸闻趣事和我自己的虚构填补起来的。我打算寻找一些写着他名字的证件和电费单，把这些遗物当作我与他事实上的一次相遇。那我就从他的一个用来喝科涅克白兰地的小酒杯说起吧。这瓶酒比我年龄大。我缺少勇气去喝，哪怕是小小一口。科涅克白兰地喝起来太甜，没什么酒力。

佩塔·“佩罗”·斯坦尼西奇留在鞋盒里，留在抽屉里，被封存在薄膜里。自从她患病以来，她宛若一位女诗人，在苦思冥想中穿越逝去的岁月，又开始常常说起他。绝大多数情况下，你弄不明白她是真的在回忆，还是在讲述一些荒诞不经的事。但毋庸置疑，她渴望他来到她身边——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我记不起来他们两人什么时候曾经出现在同一个地方。

然而，在一次庆祝活动的照片上，他们并排站在那里。一张餐桌，就摆在这里，摆在这屋子里。奶奶和爷爷坐在客人们中间。屋子里很热，大家吃吃喝喝，谈笑风生。餐桌上摆着科涅克白兰地。爷爷的上装搭在椅背上——这件我穿上很合身。

我穿上那件上装。

爷爷面朝着奶奶。她站在他旁边，一只手搭在他肩上，另一只打着手势。奶奶讲述着。永远不会有人知道她说了些什么。估计她自己也想不起来了。站在桌前的其他人全都不在世了。

奶奶肯定不是想让她丈夫流芳百世。她仅仅是保留了几样她认为重要的东西，没扔掉罢了。我又找到了一张购物票（面包、奶、苹果、面粉、香肠等），并且翻了翻一本油乎乎的、里面记着儿歌的册子。这是她的私密档案，别的任何人都不必弄明白是怎么回事。

爷爷漫不经心和全副武装

今天是2018年7月18日。我找不到别的办法来展现我所知道的爷爷的人生经历，只好一一列举出被发掘出来的东西，犹如食谱里的配料，以此来叙述一个人的生平。爷爷故事的伟大叙述者是一份尘封已久的清单。

卢多国立小说毕业证书

佩塔·斯坦尼西奇，博戈萨夫的儿子，1923年10月14日出生于奥斯克鲁沙。宗教信仰：塞尔维亚-东正教。1934—1935年间完成小学四年学业，并获此证书。

各科成绩均为4分（第二好成绩）。就连唱歌、书法和民间图案手工制作也不例外。唯一的5分（最好成绩）是宗教与道德。

操行：5分

缺课三天，有正当理由：3次

无正当理由：0次

照片：大约16岁的爷爷，黑白

腰袋上插着一把刀。歪戴着帽子，目光叛逆，手插在一边。爷爷漫不经心，全副武装。我心想着：这可能就是真正的你。

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服兵役证

佩塔·斯坦尼西奇

加入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时的住址：奥斯克鲁沙

职业：农民

身高：1米72

体重：72公斤

在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服役期限：1945年2月12日至1946年1月18日

兵种：步兵

在服役期间所学到的对平民生活会有用的本领：战斗技能

奖状

奖给佩塔·斯坦尼西奇同志。你参加了重建家乡的工作，特发此状，以兹证明。

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

维舍格勒
1948年12月5日

党员证BH 01 456416

佩塔·斯坦尼西奇从1949年9月8日起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成员。

小盒子（里面有一只健康之家颁发的钟）：

1967年10月1日——忠诚服务20周年纪念。

照片：家庭聚会，黑白

一张摆着丰盛菜肴的餐桌。母亲微笑着。爷爷用手臂搂着她。奶奶和外婆留着卷发，没有犬齿。外公穆罕默德尴尬地微笑着。满口牙。此时此刻肯定宁愿去钓鱼，也不愿意看着镜头。那瓶科涅克白兰地看上去信心满满。大家高举酒杯！内娜手臂抱在怀里。她不喝酒。他们在为我过生日？

班亚弗鲁契察心血管和风湿性疾病医院诊断证明

患者：佩塔·斯坦尼西奇，病历号：3605

诊断结果：

Calculosis renis 1. Sin.

Varices cruris bill.

Hypertensio arterialis osc.

Maocardiopathia hypertensive comp.

我立刻在谷歌上搜索了这些：肾结石，静脉曲张。由于高血压心肌出现病灶。动脉血管阻力增加，心脏不得不更有力地供血，左心室增大，久而久之会失去功能。

我感觉我的心在怦怦直跳。搜索了预防措施：增加运动，控制饮食。几个月前，医生给我父亲开了降压药。

患者通过自行车测力计进行了负荷试验，11分钟/150W（相当于繁重的体力劳动）后，因为患者疲劳和呼吸困难，试验中断了。

我给我的医生打电话，约好时间去做负荷心电图。

照片：奶奶、爷爷和我坐在餐桌旁，彩色

一个生日蛋糕，上面插着8根蜡烛。奶奶穿着一件红上衣，端详着我。穿着上装的爷爷看着镜头。穿着马甲的孩子盯着蛋糕。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合影。几个月后，我让儿子看

这张照片。“这是谁？”我指着穿着马甲的小男孩问。

“这是我。”儿子说。

1986年7月24日刊登在地方报纸上的讣告

佩塔·佩罗·斯坦尼西奇，健康之家会计，人民解放军战士，共产党员，优秀的社会政治工作者不幸去世……这个悲伤的消息痛苦万分地回荡在他的家里，回荡在维舍格勒，回荡在他的出生地奥斯克鲁沙——

讣告上附有一幅长龙似的送葬队伍的照片。队伍前头的棺材早就到了桥对岸，而队尾还在桥这边。我不在送葬队伍里。父母不允许我去送葬，他们担心整个送葬过程会让我承受不了。我留在邻居家里，我们玩多米诺骨牌。我今天特别羡慕那些把爷爷抬到墓地的人。也就是这件事，我在送葬队列里的缺失，让我来到这里，要看看这些鞋盒。

这里是我对这个农家孩子、这个游击队战士、这个党的干部唯一真正的回忆：一个老人和一个小男孩，俯身玩着纵横填字游戏。老人用简单易懂的问题给了一些提示，直到小男孩看起来自己想到了要填的词语。小男孩用一支粗壮的四色圆珠笔把字母填进一个个小方框里。

那好吧，再来一口。最后一个被发现的东西放在科涅克白兰地酒瓶后面的吧台酒柜里。它藏在那里，等待被人发现：一张爷爷的照片，他坐在一块木篱笆上（三块木板，一个木桩，又是三块木板，又是一个木桩），背靠大山。那是奥斯克鲁沙的树林和草地，那是维亚拉茨山的顶峰。

爷爷显得轻松自在。脸庞棱角分明，人们是这样说的吗？高颧骨。装作严肃的样子，你会预感到：他立刻就会微笑起来，只要快门一按，立刻就会这样。

这张照片是谁照的呢——是奶奶吗？

说着她就进来了：“佩罗，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奶奶，是我呀。”

奶奶需要一阵子来辨别空间和时间，我想。她拿起其中一张照片，端详着，抚摸着，宛若摸着皮肤似的。“你没问过你可不可以看这些——你看这些干什么呢？”她走过来。

“我不知道我想要干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在寻找什么——”

“那你就先好好想想再说吧！”

“对不起。”

她站在我面前。“你该理理发了。”

“干吗要理发呢？”

“佩罗不喜欢你这样子。”

我问她喜欢不喜欢。

“嗯，”奶奶把身子重重地靠在我肩上，“让我再多看一会儿吧。”她说。她想看更多的照片。我让她看爷爷穿着制服的照片。他真的曾经是这样的吗？戴着帽子，也留着胡子，难说啊。我问道：“这是爷爷，对吗？”又补充道，他负伤了。负伤的事写在服役证上。在

哪儿负的伤害？我问，发生了什么事？

奶奶久久地端详着这张照片，把它放到一旁说：“他没打过仗。我的佩罗蔑视战争。”

我的回忆是各种各样的渴望。奶奶的回忆是各种各样的疾病。

她轻轻指着那张照片，从爷爷到篱笆。她的指头落在维亚拉茨山的峰顶上。“那里，”她说，“他要登上那里去。去火焰山上。可是，他待在哪儿呢？这么久了？”她又移开指头。那峰顶上显现出一个模模糊糊的影子。像虫子一样。镜头上的一丝绒毛？张开了翅膀。翅膀？镜头上的一丝绒毛。

爷爷正好就坐在奶奶带我去奥斯科鲁沙时我坐过的篱笆上。

翅膀？一丝绒毛。一个模模糊糊的影子。一座山顶。

“奶奶，你现在在哪儿？”我问。

“你在哪儿？”问——我？——克里斯蒂娜。

奶奶和婚戒

奶奶找不到她的婚戒了。她四处找来找去，婚戒不见了踪影。她看到一个男子站在山丘上。她觉得他很面熟。一个身穿上装的男子，一个侧影，这的确就是他——她几乎可以断定。奶奶急急忙忙地走下去，穿过院子，来到山丘上。她呼喊着他的名字：“佩罗！”奶奶呼喊道，“佩罗！”

这人再也看不到了。

一个过路的女人问，她是不是有什么解不开的烦心事呢？

事事都不顺意，奶奶回应道。可这肯定不是她的问题啊。

今天是2018年4月17日。奶奶穿着薄薄的黑长筒袜在车库旁等候。她在维亚拉茨山山脚等待着。那是奥斯克鲁沙的一个夏日，大约是1960年。她随身带着一把伞，天空晴朗，可马上就会下雨了。

她丈夫正在山里面。她也说不清楚他在那里干什么。他有时去采蘑菇，有时为了思考问题而漫游到山顶上。他总会在一种酝酿着暴风骤雨的天气里出门。

奶奶转动着她的婚戒，寻思着该怎么办。她一辈子都把戒指戴在指头上吗？无所谓。关键是他又回来了。

奶奶转过身。她没跟着下去找他，而是进入那黑洞洞的树林里。

北极附近

佐基走进教室里，把一张纸往讲台上一放，大声说：“大家都要填写。”

上面有三个栏目选项：穆斯林，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

大家聚在一起，个个犹豫不决。

“哎呀，你们干吗这样呢，真见鬼。”佐基把他的名字填在塞尔维亚人一栏。

凯南从他手里夺过笔，填到穆斯林一栏。

两个戈兰分别填到塞尔维亚人一栏。

埃丁填到穆斯林一栏。

阿伦填到穆斯林一栏。

马里察填到塞尔维亚人一栏。

戈卡填到塞尔维亚人一栏。

库莱询问填这玩意儿干什么用。

佐基说：“方便我们了解情况。”

库莱：“操他妈。”

佐基说：“你不就是穆斯林吗？”

“我是操他妈。”库来说。

埃尔维拉增添上不知道一栏，并且填在那里。阿伦又拿来笔，涂抹了他的名字，把它填到不知道一栏。戈卡也随着阿伦。

马尔科填到塞尔维亚人一栏。

阿纳填到不知道一栏，短暂地想了想，又抹掉名字，写上南斯拉夫人，作为第五栏，随之把名字填到里面。

佐基把库莱填到穆斯林一栏。

库莱说：“佐基，我操你妈，你这个蠢驴。”

两个戈兰站在库莱面前。长着长门牙的戈兰说：“库莱，怎么回事，你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库莱从佐基手里夺去笔，他要在戈兰的额头上涂写什么。于是两人推推搡搡，你来我去。我们插手其间。

大家你喊我叫，嚷来嚷去，乱成一团。库莱挥起手臂，好啊，你长本事了，居然又跟我较起劲来，他的手势说。他走到桌前，写下第六个选项：操你们这帮混蛋。库莱在那里填上库莱，随之踩断笔，然后离开教室。

没人跟着库莱。表格也不见了踪影。

几个月后，在一些城市里，有人命令穆斯林在袖子上戴一个白布条。

在维舍格勒，有一家爱斯基摩人住在铁托大街的超市上方，他们与因纽特人没有什么共同的地方。这是1991年人口普查时的一个笑话，一个事实上写进统计表里、很快就全城皆知的笑话。在塞尔维亚占领期间，那家人的父亲重新提起这笑话，然而谁都笑不起来了。于是，这个爱斯基摩人携妻子和年幼的女儿离开了维舍格勒。他们如今生活在北极附近，说一口标准的瑞典语。

格蕾琴问

我从来都不上宗教课。和我关系好的人中，没有一个公开表明奉行什么信仰，甚至没人说过：“我不相信教会所信奉的上帝，但相信有可能存在这样一个客观实体，这完全有可能。”我对此特别高兴。我长久以来心想着，这可不是开玩笑，因为你不吃猪肉，所以你才是穆斯林，就这么简单，一些饮食口味很特别的人。

内娜·梅耶玛相信红芸豆，相信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表演天才。我从来没看过她祈祷。如果说她真的对伊斯兰教感兴趣的话，那也没有什么连续性。真主出现在几句俗语里。同样也出现在我们大家的言谈里。

外公穆罕默德是个不折不扣的博爱主义者，他才不会相信有一位全能的神。如果你连礼拜都不做，那你怎么会有宗教信仰呢？友善、钓鱼和家庭。这些在穆罕默德看来才是正事。他是我迄今可能认识的最无私的人。

除了这一切，他还有一把好剃须刀。外公穆罕默德一辈子只有一把剃须刀，一个镀铬的小刀头，顶端带有一个齿形梳子。罗巴特公司生产的德国型号。手柄上饰有“超级月亮”字样。剃须刀是他从父亲那里得到的，而他父亲是从一个德国士兵那里不知用什么东西换来的。外公把剃须刀保存在一个金属片做的红盒子里，剃须刀涂层日渐脱落，不少地方都没了光泽。外公当作宝贝一样珍爱它。他每隔两三天刮一次胡须，每次都刮得干干净净。

爷爷佩罗可能是家里唯一有信仰的人。他相信社会主义会取得胜利，由于他没有亲身经历过社会主义的失败，他在所谓的宗教信仰方面绝对不会感到失望。

1992年4月，一个不修边幅的男子穿着迷彩服登上了他位于萨拉热窝的房顶，朝着太阳乱发了一匣子弹，因为他这一天感到酷热难忍。他在胸前画了个十字，或者他双膝跪地望着麦加说：“但愿你们与和平同行。”然后他从房顶上爬下来，打起背包进入山里。这就是战争。

1992年4月，有人在维舍格勒铁托大街上大声呼叫着我母亲的名字。母亲吓了一跳。一个男子坐在议会大厦前的矮墙上，示意她过去。警察衬衫，佩枪腰带，运动裤。母亲觉得他很面熟，如今却记不起来他叫什么名字了。

当她站在他面前时，他压低声音重复了她的名字，而且装作忧心忡忡的样子。他问母亲知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母亲听明白了，他指的并非钟表时间。母亲依然告诉他现在几点了。

母亲喜欢喝咖啡时抽支烟

母亲很早就学会了看钟点。这是铁路工人女儿的命运。她知道所有火车出发和到达的时间。她也知道父亲哪个点上就会回来。无论天气怎样，她都站在铁道旁等着他。他走下火车，又脏又累，像烟雾那样沉重。他举起她，抱着她回家，那里有热腾腾的饭菜等着他。

直到今天，旅行对我母亲来说仍意味着：喜悦，有一个她深爱的人到了什么地方。她对我的希望、对我们大家的希望是，我们外出旅行时告诉她一声。我从来没听过她热情洋溢地谈论自己的旅行，无论远近。她在铁路线上的童年仅仅就是：一段在铁路线上的童年。火车不会传达对远方的渴望。这个家没有能力负担全家旅行。

母亲怀着一个年轻女子的朴素抱负，昂首阔步地跨过了南斯拉夫自信的60年代，成功实现了她认为重要的人生目标。她取得了良好的学习成绩，交上了好朋友。在中学里，她读马克思和康德的书，会烹饪她母亲会烹饪的一切。母亲年轻时很漂亮，披着飘逸的长发。我们从来都不谈论恋爱的事。既不谈她的，也不谈我的。

母亲在萨拉热窝读政治学，研究重点是马克思主义。她并非野心勃勃，只是对此感兴趣。于是，她经常坐火车穿梭在维舍格勒与萨拉热窝之间。她第一次乘车时，有两个年轻的女人唱起一首游击队员歌。母亲没跟着一起唱。她觉得这样太愚蠢了。有一次，她乘坐了一列火车，她的父亲正好在上面当司闸工，火车抵达时误点了。

铁路线穿过德里纳河谷。母亲看书。学习。没浪费时间。车窗外面，南斯拉夫摇摇晃晃地从眼前闪过。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¹⁾

她们的学生宿舍冬天经常停暖气。母亲穿着衣服睡觉，仿佛她攀登着冰雪覆盖的梦境。萨拉热窝繁荣兴旺，臭气熏天，载歌载舞，争执不断。母亲怀孕了。我和母亲一起为考试学习，只是大部分知识我还不能马上理解。

当你成为女人，要在学习上取得非常优秀的成绩就显得更加困难了，母亲说。于是她比男同学加倍用功。人们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着自己的历史。⁽²⁾

母亲得到了小额学生贷款，每个月只能有一次在学生食堂之外买一顿热餐。每当外公值班的火车到达萨拉热窝站时，他就给她送去从维舍格勒带来的饭菜。母亲在铁路旁等待着。外公走下火车，微笑着，被熏得黑乎乎的，散发出一股在火车头里为他的皮塔饼保温的煤味。

1980年，母亲以几乎是同届学生中最优秀的毕业成绩回到维舍格勒，成为中学马克思主义教师。她排队购买价格过高、质量令人生疑的商品。她为那个无能的领导集团和社会的不公平而愤怒。她担心变得强大的民族主义，但并没有真的把这事看得很严重。对母亲——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这场危机是可以忍受的，因为它还未威胁到生存。尚未有人穿着警察服和运动裤，咄咄逼人地向她表示一种友好的警告。

母亲毫无意外地遭受着过去的折磨。她克服了社会出身的种种障碍——她父母不是富人，不得不举债为生。她是个女人，出生在一个非知识分子环境里，是家里三个孩子中唯一上过大学的。1990年，她开始独立创业，这在当时还是很少见的。

然而，由于她的阿拉伯名字，种族出身一直缠绕着她，如同一个挥之不去的流言。这

是新权贵眼中的污点，一个无论靠抱负、教育还是能力都无法剔除的污点。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③

到了35岁时，母亲不得不放弃她在维舍格勒的生活，也就离开和失去了一个充满美好回忆、成功和个人幸福的地方。母亲和我现在不一样，她不是用虚构来弥补她所缺乏的东西。凡是失去的，就是失去了。她还记得，她父亲散发出怎样的气味，他出发前是怎样的气味（古龙香水），而他回来时又是怎样的气味（煤味）。母亲喝咖啡时喜欢抽一支烟，还要加上特维克斯巧克力棒。出身意味着，当有人在她出生的城市呼喊她的名字时，她会猛然一惊。

我很喜欢母亲的两张照片。第一张是肖像，照片上的她18或者19岁。面容无与伦比地温柔，我难以用别的语言来描述。头发又黑又长，闪闪发亮。目光则陶醉在沉思默想中。完全一副自我陶醉的样子。童年时，你不想看到自己的母亲陶醉在沉思默想之中，而想看到一个面对世界的人。如今我却觉得她那副沉醉的样子美极了。特别是我没有过她那样的经历。母亲生活在世上，首先是为了我，然后是为别人，最后才是为自己。

第二张照片上，她被簇拥在朋友之中。牛仔裤、煎肋条肉排和一个个心愿。父亲在场，但那时他还不是我父亲。母亲微笑着，其他人神情严肃地谈论着。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一个个僵硬的神态。母亲微笑着，仿佛她置身于画面之外。她微笑着，仿佛她对局势比其他人有更多的了解。或者她知道得越少，就会越幸福。

那个警察1992年4月告诫她要离开维舍格勒，因为局势很快就会威胁穆斯林的性命。在我想为她书写的人生里，她会这样回答：“谁决定了我是个穆斯林呢？”

母亲没说过这样的话。这样做是明智的。她为他的忠告表示感谢。她从爷爷那里接走了我，让父亲中断工作立刻回到家里。当我们收拾行李的时候——什么东西会是我们最需要的呢？——山区里已经有穆斯林的房子开始燃烧起来。

母亲打电话，继续转达那警察的告诫。父亲和我把行李装到我家的宇戈车上。他们俩后来还去了花园。他们在那里彼此拥抱，因为那是他们最后一次跳舞的地方。这事仿佛就发生在昨天，同时也发生在几年前的一个夏天。父亲背对着我，母亲面朝我。她的眼睛瞪得大大的，神色就像在那张照片上一样凝重。她的身体依偎在丈夫身上，但她的心却沉浸在自身和恐惧中，沉浸在对我、对我们的担忧中，还不快点走，还不快点儿告别，现在还不走，快走吧，要不就来不及了。

我们接上奶奶克里斯蒂娜。奶奶只是想和我们一起走到边境上，然后和父亲一道返回。奶奶要亲眼看着我们活着离开这座城。我们后来就这样离开了。我们躲过了人生的劫难，各自逃离我们的生活。

①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24章《所谓原始积累》。《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全集》，第23卷，柏林迪兹出版社，1962年，第779页。——作者原注

② 卡尔·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全集》，第11卷，柏林迪兹出版社，1985年，第96页。——作者原注

③ 卡尔·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全集》，第2卷，柏林迪兹出版社，1982年，第171页。——作者原注

海德堡

1992年8月24日，波斯尼亚到处枪林弹雨，而在海德堡，天下着雨。奥斯陆可能也在下着雨。每个家都充满了偶然性：你出生在那里，被驱赶到这里，你在那里把你的肾脏捐赠给科学研究机构。那些能把握这种偶然性的人是幸运的。谁离开自己家的时候不是迫不得已，而是心甘情愿的呢？那些能实现自己地理上的愿望的人是幸运的。正因为如此，后来才有了美妙的语言旅行，有了令人向往的佛罗里达老年公寓，有了到多米尼加共和国寻找仪表堂堂的男人的女性移民。

对我来说，海德堡从开始就是一个偶然的城市。我14岁，从来没听说过它，更不会预料到后来在内卡河畔和一个哲学系的女生一起散步有多么美妙。

我们起初以为只是暂时滞留，暂时逃离那现实的战争所带来的非现实。如果我们是在今天逃离，如果1992年的边境像今天欧盟的外围边境这样有着严格限制，那我们恐怕永远都到不了海德堡。这段旅程恐怕只能止步于匈牙利的一道铁丝网前，后来的一切便不会存在了。

1992年8月24日，海德堡雨过天晴，太阳出来了。母亲打算给这个被旅程折腾得不知所措的男孩，也就是我，弄点什么好吃的。她自己同样也被折腾得不知所措，可她竭尽全力掩饰着，不让这种情绪暴露出来。我回想起和她一起乘车的情形，雨水淅淅沥沥淋得车窗如同一个面具，车窗后的城市是一个秘密。

她在一家冰激凌店买来巧克力冰激凌。我们手里拿着华夫冰激凌，走在一条漫长的大街上，后来又沿着一条河走去。我们漫无目的地穿过一个一切都没有名称的世界：一条条大街，一条河流，还有我们自己。

谁都听不懂我们的话，我们也听不懂别人的话。我只会用德语说洛塔尔·马托伊斯⁽¹⁾。现在加入其中的还有：“我的名字叫”“难民”“海德堡”和“巧克力”。后两个说起来相当容易。

还有那座城堡：宏伟而饱经沧桑的城堡 / 沉重地悬挂在河谷上方， / 直落入那深幽的谷底， / 历尽风雨的磨难， / 却沐浴着永恒的阳光， / 让你青春永驻的光芒洒在这日益衰老的 / 巨幅画像上， / 生机勃勃的常青藤 / 郁郁葱葱地围抱着你。⁽²⁾

即使他们知道荷尔德林，可对这位身心疲惫的母亲和她的儿子来说，这些诗句几乎不会带来任何感染力。在海德堡的第一天，没有什么东西会引发历史、固有的知识或文学的触动。一座座屋顶、一个个门面、一堆堆建筑材料。各种各样的物质。人们徜徉在雨后清澈明亮的空气里。一段段对枪声的回忆。这就是一切的一切。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视野变得开阔了。斜着向上方望去，那永恒的太阳真的将它那让青春永驻的光芒洒在一个静卧在山峦和树林之中的城堡废墟之上。我看到一座座破败的房子，比我希望看到的还要多——这是第一座映入眼帘的城堡废墟。尽管破败不堪，但它看上去无比美妙，显示着自豪——在某种程度上又完美无瑕。那淡红的废墟看起来已经镶嵌在山里。仿佛只有这样，只有在这里，在那条温柔的河流令人惬意的近旁，在这座古老的城市此刻毫无遮掩的真容近旁，它才能荡涤一切怀疑而存在。

突然间，我们自己也觉得无拘无束了。一位母亲和她的儿子站在德国一个很快就会拥有名字的小广场上：卡尔广场。就像站在别的广场上的那些别的母亲和孩子一样。就像巧

克力冰激凌就是巧克力味道一样。就像突然停留在一座宏伟的、你第一次看到的建筑物下方一样。

对我来说，观看这座城堡，永远都会带来巧克力的味道。我在德国的第一次兴奋来自观光的魅力。事后我才明白过来，之所以兴奋，是因为我们自逃亡以来第一次有了安全的感觉。在这里，我们感到陌生，但这个陌生世界里没有威胁，下雨只是天气变化，出太阳也是。在这个令人惊奇的地方，你可以如此无拘无束地四处驻足观看，感受一座宏伟的废墟。你看到有日本人在你的上方攀来攀去，你有点傲慢，又有点滑稽，在某个瞬间你也有点儿“我的”之感——在这里，我们会安然无恙。像这座城堡废墟一样，我们也会经受住时间的考验。

雨后的海德堡，一切都变得清澈明亮，如此美丽，只有一些生长橄榄树的城市才可以与之媲美。这个场景也是1992年晚夏留下的回忆。

母亲相信，战争很快就会过去，然后我们就可以回家。在我们的第一个德国的家里，我们和其他难民共用浴室、电视和每个门把手。我们在异国他乡和一些陌生人过着一种陌生的生活。属于我们自己的只有三只棕色旅行箱。这就足够了，不够又能怎样呢。我们学习一种有硬核的语言，犹如李子核一样坚硬。

我们的第二个家位于海德堡南部一个名叫埃默茨格伦德的城区，一个毫不吝惜水泥的城市发展项目。但却有一片坡地，从那里可以俯瞰莱茵河平原，还可以眺望位于内卡河谷-奥登林山自然公园尽头的葡萄山。

来德国第二年，在一个温和的夏日夜晚，我失魂落魄地迷上了一个红头发姑娘。她试图给我讲解，动词在德语从句里始终位于句尾，其实我早就知道了，可是她的讲解听起来那样美妙动听。

埃默茨格伦德住着特别多的移民。这在德国司空见惯：移民们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住在某个地方的一个特殊区域里。游客们倾向于先去看勃兰登堡门，然后去新克尔恩区喝咖啡，观看阿拉伯人。这种情况不会很快改变。要说起来，我们可以为剧院书写跨文化对话，就是写上几天几夜也写不完。

很少有游客来埃默茨格伦德。巴洛克文化只在别的地方绽放光彩。他们错失了一些东西。海德堡有一个细长的脖子——优美的内卡河谷，还有一条条轻盈纤细的手臂——古城里的条条小巷。它的砂岩门面始终呈现出柔美的红色——对自己的美貌永远显得羞羞答答。埃默茨格伦德是这妩媚动人的躯体上的右手。又大又粗，有时候会握成拳头。

在埃默茨格伦德，人们彼此握手问候：波斯尼亚人和土耳其人、希腊人和意大利人、俄罗斯裔德国人、波兰裔德国人、德国的德国人。有时会突然出现一大群骨瘦如柴、寡言少语的红眼睛黑人。看到这样的情形，你立刻就会明白：非洲什么地方又开战了。我们是邻居、同学、同事。超市的长队里人们说着七种不同的语言。

阿拉尔加油站是一个社会机构，它全力以赴地帮助我们融入当地。这里摇滚乐声喧天。它是年轻人的中心、饮料供应地、舞场和卫生间。各种文化在霓虹灯光下与汽油味融为一体。在停车场里，我们互相学习错误的德语，学习怎样重新安装汽车收音机。唯一的规矩：加油柱附近——禁止吸烟。

到了星期日，这里的情景会变得特别美妙。中午，波兰人做完礼拜后便成群结队去喝酒，慢慢悠悠，一直喝到下午。慷慨大方的金发男子一副被基督的血弄得有点昏昏沉沉的样子。他们留着狭长的髭须，总是穿着大一号的上装。谈论的是培训、单杠双杠运动、甲

级联赛、联邦国防军、肝功能，而且不知什么时候会一如既往地谈论起生儿育女的事。婊子，婊子，婊子，口口声声不离婊子，让人印象深刻。

阿拉尔加油站是海德堡城里的瑞士：中立之地。在这里，出身鲜有冲突价值。无论怎么说，跨文化拳头对话几乎没有发生过。但有时出身也免不了受到攻击。遇到这样的情况，人们肯定以和为贵，免得一个德国人和一个俄罗斯裔德国人当天晚上拿着气枪前来兴师问罪。

在我们埃默茨格伦德人中，没人愿意在这里打工。不知什么嬉皮士从基希海姆过来接手了这里的工作。他们学习艺术史，已经进入第40个学期。值得同情的可怜虫，大家原则上都不愿意伤害他们。他们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但他们可以从阿拉尔加油站极目远望，享受美景——这还是很激动人心的。遇到好天气，你可以遥望到法国；天气不好时，你看到的则是一把对准你的手枪枪口。

莱门坐落在阿拉尔加油站下方。它是鲍里斯·贝克尔⁽³⁾的出生地。有时候，鲍里斯·贝克尔会来这里看看。我们坐在阿拉尔加油站下方的葡萄园里，一边喝着莱门山泉啤酒，一边谈论着施特菲·格拉夫⁽⁴⁾。我们之中没一个人成为网球运动员。莱门啤酒不知什么时候也不得不像鲍里斯一样结束它的生涯。

我们是一座令人崇敬的城市边缘当下的一张统计表。这座城市在今天庆祝它的过去。我们是犯罪率、失业率、外国人的一分子。这座古城拥有喜爱它的美式铺路石的仰慕者，拥有大学生的亲吻，狗的学校，全天营业的星期天和地方影院。影院是一个童话王国。只有学校迫使我们前往时，我们才会踏进它一次：阿拉尔的孩子郊游只去人类文化博物馆。

后来上大学时，我才真的搬“下去”了，搬到西边的城区。我合住宿舍的天花板要比我们埃默茨格伦德平层别墅的高很多。对面是公墓，旁边邻居种着罕见的甘蓝，订阅《亮点》周刊⁽⁵⁾。

自从父母不得不离开埃默茨格伦德和德国以后，我几乎再也不去那里了。与那些生活在山坡上的朋友的联系也越来越少。有能力的人都相继搬走。阿拉尔更新换代了。

在埃默茨格伦德这个粗俗放荡的地方度过那段岁月之后，我可以把老城区，这个宝箱称为“我的”。在这里，住在山坡最佳位置上的不是移民而是学生社团成员。这座古城以自身为傲。它变得越来越古老，但是看上去青春依旧。衰落被阻挡或遮蔽了。人们为海德堡大学的排名而自豪，为免遭美国炸弹摧毁而自豪。大家也为埃默茨格伦德的外国人而自豪。只要我们不干伤天害理的事情。

我是波斯尼亚人和逃亡难民，这在埃默茨格伦德是不会引人注意的。但在大学圈子里，这可常常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我心里有准备，随时可以讲述两三件战争轶事，但总是无法避免引起过度的痛苦。

哲学系图书馆一直开到很晚。在第三学期里，我常常坐在那里，装作好像在读阿多诺。我穿着一件高领毛衣，6月也如此。回报就是能有几次和她在内卡河边散步。我主动给她讲述我从哪儿来，我经历了什么。我心想着，难民命运？也许能给我加分。

她时而引用一些哲学家，我已经记不起来是谁，也记不起来内容是什么了。可我还记得第一次亲吻是什么滋味（我们吃了肉饼）。

我在弗里德里希·埃伯特⁽⁶⁾纪念馆的布克哈德咖啡馆打工。阿拉尔加油站对埃默茨格伦德的年轻人意味着什么，布克哈德咖啡馆对这座古城就意味着什么：一个墙上装有护板

的微观世界。大家都来这里：德国社会民主党地方社团的人，由于又一次在格劳布尔贡德选举失败而借酒消愁；患糖尿病的奶奶们吃了第二颗黑森林樱桃后相互扇着风；东方学学生一边说阿拉伯语，一边享用狮子头。

很少有人从“上边”，也就是埃默茨格伦德过来。这期间，他们都有了固定的工作，建立了家庭，但只要一见面，大家首先讲述的是过去的事，讲述的是阿拉尔加油站，讲述的是年轻时的美好，也讲述我们之中唯一的荷兰人米歇尔。有一次，警察检查时问他“出生年月”，他回答说“是”。

2018年8月，当我带着三岁的儿子来到海德堡时，我们乘车去了埃默茨格伦德；只要我来海德堡，都少不了去那里看看。阿拉尔停车场空空如也，加油站正在维修。像从前一样，我买了一张彩票，又像从前一样，一无所获。

在前往曾经住过四年的平层别墅的路上，我碰到了马特克的母亲。马特克是我阿拉尔时期的一个朋友。天气很热，还不到中午，气温已经上升到30度。柯尼希夫人坐在阳台上喝汽水。她跟我打招呼，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嗨，萨沙，你怎么样？”看样子，仿佛我们上一次见面说话是在昨天，而不是20年前。“这是你的孩子？”

“是的，”我说，“他是我儿子。”

“马特克已经有三个孩子了，”柯尼希夫人说，“我刚去纽约看过他。我在那里待了三个月。我现在需要休息三个月。”她说笑着起来。

蟋蟀在唧唧地叫。20年前我问，马特克在不在家。

“在家，”柯尼希夫人说，“你就直接上来吧。”话音里回响着那美妙的波兰语式的卷舌音。我回忆起这句话。你就直接上来吧。

马特克正在看连环漫画。

“准备好了吗？”

“可以出发了。”

“去阿拉尔？”

马特克挠挠头。“要不还能去哪儿呢？”

我告别了柯尼希夫人，我们踩着台阶登上我们昔日住过的平层别墅。门铃牌上写着一个土耳其名字。在那小花园里，我学会了德语字母，后来又学会了弹吉他。在浴室镜子前，我练习过接吻，“用舌头”。如果你之前吃了肉饼，也不会带来太多的意外。

我们下去到葡萄园里看看。这座城市经受着正午酷热的考验，发出轻轻的嗡嗡声。可以听到一些声音，模模糊糊的，后来慢慢清楚了：一个姑娘正在教一个男孩德语，她说一句，他跟着重复一句，肯定不熟练，因为她在笑，而他在骂，同样也一边笑着，他说的是波斯尼亚语。

“每座城市，”英国作家约翰·伯格写道，“都有与其人口统计学毫不相干的性别和年龄。罗马是女性。巴黎是一个20岁左右的小伙子，爱上了一个年长的女人。”

海德堡是一个来自波斯尼亚的男孩，他在埃默茨格伦德的葡萄园里让一个姑娘教他德语。他很久以后才会意识到，成为一个海德堡男孩是一个偶然。他称偶然为幸运，称这座城市：我的海德堡。

- (1) Lothar Matthäus（1961— ），德国前足球运动员，1990年以队长身份带领德国国家队赢得世界杯。
- (2) 引自荷尔德林《海德堡》。
- (3) Boris Becker（1967— ），德国男子网球运动员，单打曾排名世界第一。
- (4) Steffi Graf（1969— ），德国女子网球运动员，德国体育史上的传奇。
- (5) *Stern*，德国最大的时事社会生活杂志。
- (6) Friedrich Ebert（1871—1926），生于海德堡，魏玛共和国首任总统。

布鲁斯·威利斯说德语

你站在门前，看到Ziehen^①这个词。这是一扇门。这是一些字母。这是字母Z。这是字母I。这是字母E。这是字母H。这是字母E。这是字母N。Ziehen。欢迎来到写着德语的门前。于是你摁了摁门铃。

这是1992年9月20日。你来德国一个月了。这扇门属于你的学校，今天是你上学第一天。你穿着新牛仔裤。它是母亲专为你买的，因为她的不忍心看到你穿着一条破破烂烂的裤子去德国学校上学。她觉得牛仔裤太贵。母亲不被允许去工作，而你们又没什么钱。有也好，没也罢，你曾这样说过。说这样的话就是不合群。你心里明白，这样说就意味着离群索居。母亲也心明如镜，于是不顾一切地给你买来了牛仔裤。

你左边坐着一个芬兰人。他名叫佩卡。佩卡在他的本子里画了手翻书。看上去特别棒。说实在的，佩卡可以现在就回家去，永远不再来上学，一门心思画手翻书就行了，画上一辈子。

右边坐的是德多。他是南斯拉夫人，像你一样。老师进来前，德多早有准备地喊了一声。德多有好一阵子不是叫喊就是沉默。到后来，叫喊就越来越少了。

班里没有一个人是当地的。没人讲德语。其实这样很好，大家只能相互听懂一点儿，谁也不必解释什么，反正你什么都不会解释。

地理老师挂上地图，给大家指一条条河流、一座座山脉、一片片森林和一座座城市。你写上了“莱茵河”，还有“费尔德贝格”和“奥登林山”。老师说：“我出生在曼海姆。佩卡，你出生在哪儿？”佩卡说：“奥登林山。”

这就是说，为了上新的德国学校，我有了一条新牛仔裤。语言规则也是新的，德语就是按照这些规则被玩来玩去，还有绝大多数游戏同样是新的。父亲不在身边也是新的。父亲依然在维舍格勒。母亲和你在电话亭里伴着占线信号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钟头。父亲的声音断断续续，时而清清嗓子，时而停顿一会儿。“你什么时候能来到我们身边？”对这个母亲最为关切的问题，父亲无法回答。

把你的名字和日期刻在黄色的电话亭上。1992年10月1日。

半年以后，父亲才来到这里。

你问：“你身体好吗？”

父亲紧紧地搂住我，久久不松开手。他看上去一如既往，只是头发比以前长些。说话不多。维舍格勒一切平静。最后。奶奶身体挺好。得看具体情况。具体情况到底是什么，对此他闭口不谈。于是他所说的具体情况更加让人忐忑不安。关于他大腿上的伤疤，他也一字不提。你所知道的远远不够，所以也不能就说它看上去像是一块愈合的枪伤。你没有追问下去。父亲带来了他的棕色旅行箱。你们三个带着你们的棕色旅行箱，最后一次旅行是1990年夏天去亚得里亚海滨。

学习这门新的语言并不怎么费劲，但要实际运用实在不太容易。你懂得的多，会说的少。在机场行李传送带旁，你忘记了一个个词尾。德语词实在太拗口，各种各样的变化错综复杂，无论怎样把一个句子组合在一起，语音始终会让你露出破绽。

一周又一周，一月又一月，你终于融会贯通、如愿以偿。当然，过了一些日子，你也

交上了朋友。有了共同分享的语言，就容易找到朋友。你弄明白了他们喜欢哪支足球队。来自埃佩尔海姆的奥利喜欢一支汉堡球队。他父亲领着你们去卡尔斯鲁厄看比赛。在德国，第一次有人邀请你去干什么。奥利的父亲高声地怒骂裁判。你学会了骂人的话“你这个王八蛋”。半场休息时，他给你们买来烤香肠。你跟着齐声高唱：“汉堡小伙子，汉堡小伙子，我们大家都是汉堡小伙子。”90分钟时间里，你是一个汉堡小伙子。而你的球队叫海德堡足球队。海德堡足球队输了，你将会慢慢习惯的。

地理老师挂上地图，一一列举了联邦州和首都。他问佩卡，他的故乡之国的首都是哪儿？佩卡说：“斯图加特。”

地理老师说：“太有趣了。”

大家都笑起来，甚至连那些迷迷糊糊像听天书一样的家伙也不例外。

地理老师问我，我的故乡之国的首都是哪儿，我说：“贝尔格莱德和萨拉热窝和柏林。”

踢足球比赛时，你不需要太多语言。更为重要的是，你千万不可最后一个被挑选到一个团队里。然而，新牛仔褲的膝盖上撕破了。母亲先是六神无主，心疼不已，接着便哭了。然后，她又给你补好牛仔褲。在这期间，你坐在沙发上，手里抓住了一只苍蝇。沙发是人家扔掉的旧货。恐慌的苍蝇弄得你拳头里痒痒的。你放开了它，这是第一次。

突然间，出现了这样的情形：你开始有点春心萌动。苏珊披着一头金发，又长又整齐，上面有一只蝴蝶，一个发夹，红色，十分轻盈。苏珊不说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也不说英语。要真的诚心诚意去谈恋爱，你的德语还太差。那能说什么呢？如果人家提出一个问题来，你只是耸耸肩，牵住人家的手。

“你喜欢听什么音乐？”

“是的，音乐好棒！”

过了一天一夜，苏珊说：“完了。”

“什么完了？”你问。

“完了就是完了，这就是说，我们完了。我再也不想跟你一起走了。”

“不想去哪儿？”你问，“外出散步？”

“不是，你就是听不明白。我是说我走我的，你走你的。”

“咱们一起走不更好吗？”

你学会了“牵手”和“告别吻”。

动词前缀：你分发报纸。你结识邻居，知道了“小费”这个词。六个月以后，你还不断地在可分动词上出现差错。但是，你有了足够的钱买一条台湾生产的德国围巾送给母亲。母亲哭了。

间接用语：母亲常常以泪洗面。你大多情况下都不明白这是因为高兴、悲伤，还是恐惧。她在一家大洗衣店干活。她说，那里太过酷热，连她的心都快要沸腾起来了。

你可以用德语讲述你的第一个笑话了。除了佩卡，再也没人听了发笑。原因显然不在语言，而在于你不太善于讲笑话。

关系代词：一旦你懂得一个国家的语言，你便不再是强制性地成为她的国民，但这也

并非必然。

你们有一台小电视。到了晚上，电视上会短暂地报道发生在你家乡的战争。你换一个频道：布鲁斯·威利斯主演的《虎胆龙威》。布鲁斯·威利斯说德语。你能听懂布鲁斯·威利斯说的德语，完全不成问题。布鲁斯·威利斯快不行了。“哟嚯哟呀，混蛋。”⁽²⁾他一面说着，一面为他的家奋斗。

过去完成时：格布哈德先生的历史课，主题是国家社会主义。你站起来，尽管你在德国要发言时不用站起来。你大声说，尽管你不用那样大声：“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

将来时：政治课。你说：“资本主义将会自掘坟墓，彻底灭亡。”

你又站在学校门前。你再也感知不到这里写着Ziehen这个词。懂得一些语言太美妙了。语言旅行箱，里面装的东西越多，它就变得越轻盈。于是，日益积累的词汇、语言规则及技能打发你踏上一段新的旅程：你开始写小说了。

在树林里的猎台上。在埃默茨格伦德的葡萄园里。在旧沙发上。稿纸摊在膝盖上。一篇小说描写的是你父亲怎样杀死一条蛇。在另一篇小说里，你滑雪回到家里，奶奶把你的手握在她的手里给你取暖。在第三篇小说里，你父亲被枪打伤了。奶奶克里斯蒂娜独自一人留在维舍格勒。许多年以后，你的小说才会去描写这些。

31路公交车把你从埃默茨格伦德送到罗尔巴赫南站。从罗尔巴赫南站转乘3路电车到奥尔滕瑙大街。你从那里步行去学校。这条路不太引人瞩目，既不特别美丽，也不十分危险。这是一条捷径。这是你走了四年的路。奥尔滕瑙大街两旁坐落着一些相似的房子。有几家花园在房前，有几家在屋后。有几家花园里有棵树，有几家则没有。矮树篱隔开一个个院子，窗户上都挂着白窗帘。家家屋顶都是褐色的。信箱不是褐色就是白色。

在奥尔滕瑙大街上，你从来没有遭到过辱骂。在奥尔滕瑙大街上，你从来没有感到过饥肠辘辘。你在一些考试前会激动不安。你做过白日梦。你不是感到酷热就是寒冷，但从来没有感到太难过。在奥尔滕瑙大街上，你从来没有向矮树篱里撒过尿，或者打碎一块玻璃。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有一次——波斯尼亚战争已经结束了——你放学后爬进一家花园里，事情就是这样，你那时正上十一年级。花园里立着一个小滑梯，四处都是玩具，苹果树下的一张桌子上放着一盘苹果。门前的脚垫告诉你：家，甜蜜的家。门铃上写着一个女人、一个男人和一个姑娘的名字。姑娘的名字是孩子手迹补上去的。

你盯着你的运动鞋。这是母亲从戴希曼鞋店买来的。它们看上去挺好，黑色的，很朴素。花园里的草很短，花圃里开满黄花。院子角落里有一座小工具房。你打开工具房的门，在昏暗的光线里吸了一口气。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润滑油和水泥混合的味道。然后，你从桌上的盘子里拿了一个苹果，随之又回到奥尔滕瑙大街上。

⁽¹⁾ 德语动词，这里是拉门的意思。

⁽²⁾ 这句话是布鲁斯·威利斯扮演的男主角的经典台词。

被束缚的双手

我现在能用语言工作，能写文学作品，这是上天对我的恩赐。我深有感触，想要表达一些东西而没有合适的语言，会让人从心底里感到难以忍受的苦涩。在谈话时，如果我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说出我心里想说的话，导致对话者难以掩饰他们的不耐烦，我便恨不得立刻中断谈话。父母在德国待了三四年，语言最多也就达到了中等水平，我为之感到惭愧。可话说回来，中等水平其实也非常了不起；有不少人都想以各种方式学会这门语言，但他们缺少途径、意志或机会。

父亲起初申请了所有可能的工作——一些他适合干的工作，一些他说很快就能学会干的工作。只要不做饭，他什么样的工作都不嫌。园林工、教书、卖鞋，还有建筑工地，干什么都行。他很少被叫去面试。只要人家叫他去面试，他就让我一起去；如果他有什么听不懂，我可以给他翻译。

事实上，一个求职者带着一个这样帮助他的人，有可能对他有利，会被看作他诚心诚意求职的信号。或者也对他不利。我想起一家运输公司的一位女主管的目光。当时，我向她的解释我为什么一起来。那是我在德国人那里早就领教过的同情的目光，让人刻骨铭心。他们虽然很友好，心里却不情愿。

她一直慢慢悠悠地说来说去，她和我心里都明白，这事不会有什么结果。估计父亲也一样。她打发走我们时说：“说实在的，我同情你们，但我的双手受到束缚，爱莫能助啊。”

这话十分新颖，十分有趣：被束缚的双手。这位女主管的双手握成拳头放在办公桌上。旁边立着一个带有这家运输公司标志的茶杯，上面写着“这世界很小”的字样。

父亲表示感谢。表示感谢的话他来德国后很快就学会了。“多谢！”父亲大声说，这个38岁的企业经济学家，研究重点是物流，带着明显的口音，面对着这小小的世界。

吊死他们！

1992年8月24日，新纳粹分子在罗斯托克将燃烧瓶扔进越南合同工人的住房里。那里出现了形形色色的观众。罗斯托克市民。前来助威的仇视外国人的游客。警察。

“我们要熏死他们！”

“要吊死他们！”

“胜利万岁！”

一些燃烧物在房子下面几层爆炸燃烧起来。这群人齐声高唱《这样一天，像今天一样如此美妙》^[1]。那里有售货亭。他们买来啤酒和香肠，观望着熊熊燃烧的火焰。消防车来了，他们堵住了救火通道。一场德国的大屠杀嘉年华。

我没听到有关这事的任何消息。这样更好。我们刚刚来到德国，正在为自己的生计奔忙。你在哪儿可以买到床单？你应该怎样付款？我可以乘哪路车去哪儿？司机那里可以买票吗？你应该怎样付车票钱？

仅仅三个月以后，在11月的一个星期一，有位老师把有关利希滕哈根事件的报纸剪贴带到课堂上。词汇练习。听起来有点苛刻，但这是一件他深为关切的事情：与我们这些外国人谈论仇视外国人的问题。

我们默默地阅读，读完之后保持沉默。平时，总是立刻有人因为没弄明白某些东西而举手发言。这一次，大家无疑都弄懂了其中的要旨。这涉及我们的命运。

在一本词汇练习册里，1992年11月19日我记下了20个词汇：

Sonnenblume (f) ——向日葵

aufgebracht ——愤怒的

Bürgerwehr (f) ——市民抵抗

Trittbretfahrer (m) ——滑踏板的人

Vorgang (m) /vorgehen (-ging) ——过程 / 进行

Krawal (n) ——暴动

freisetzen (freigesetzt) ——释放

basteln (-te) ——制作

Sprengsatz (m) ——炸药

ersticken (-te) ——窒息

Löscharbeit (f, löschen, löschte) ——消防工作（扑灭）

sich zurückziehen (-zog) ——撤退

jmdn das Feld überlassen ——让位

jmdn decken ——保护某人

verkorkst——损坏的

Einsatz (m) ——投入

Zustrom (m) ——涌入

mißbrauchen (-te) ——滥用

Einschränkung (f) ——限制

Grundrecht (n) ——基本权利

我们注视着地图，看看罗斯托克在哪儿。我们注视着地图，看看霍耶斯韦达在哪儿。我们盯着地图，瞧瞧越南在哪儿。佩卡说：“我不是来自罗斯托克的。”

这天，穿过奥尔滕瑙大街的回家之路让人觉得更漫长。一家阳台上挂着一面德国国旗。我之前看到过它，可此时此刻我问自己，是谁为什么把它挂在那里呢？

后来回到家里：我们南斯拉夫人与越南人到底有什么共同点呢？于是，我开始在我仅有一点关于越南的知识里寻找，这个国家及其国民有什么让人仇恨的东西。我读过有关越南战争的书，品尝过两次越南美食，在学校里认识一个越南人。而真正的恐怖是：我想来想去，我作为南斯拉夫人在哪方面与之不同，在哪方面要好些，为的是在某种程度上确信，我们这些好人不会发生类似的不幸。

学校图书馆里陈列着一些报纸。午间休息时翻翻报纸已经成为我的习惯。我首先只看标题，然后再阅读整篇报道。除了词汇手册之外，我还有一个用来记录各种信息的本子。鲍里斯·贝克赢了吉姆·库里耶。对塞尔维亚的海上封锁开始生效了。在明恩，一场火灾夺取了一个10岁和一个14岁姑娘以及她们奶奶的生命。维也纳霍夫堡皇宫发生了火灾，人们抢救出了利比扎马和数千本珍藏书籍。

1993年5月29日，在索林根一次极右分子实施的纵火案中，有五个人失去了生命。犯罪行为？犯罪过程？犯罪原因？大家都还在这里，唯独死者不在了。慢慢去消化吧。

2017年，攻击难民住地的事件在264起到1387起之间（数据由于来源不同而有差异）。今天是2018年8月28日。塞巴斯蒂安·查亚（德国自由民主党人）在推特上说：“反法西斯主义者亦是法西斯主义者。”

[\(1\)](#) 这首歌原是为狂欢节创作的，后在两德统一期间被各地人群演唱。

施瓦茨海德，1993年

1993年夏天，父亲得到了一份工作。在工作日，他必须前往施瓦茨海德。这地方听起来既神秘又危险，直到父亲解释说，那里曾经属于东德，如今是巴斯夫化工公司的地盘，神秘劲儿一下子就化为泡影了。

巴斯夫化工公司在施瓦茨海德建了一些新的生产设施。父亲为一个南斯拉夫人打工，他名叫豪里什，但大家都管他叫哈里，也许因为他宁愿当个美国人，也不愿是南斯拉夫人，或者只是因为他认为自己的名字太恶心。

这是父亲来德国后找到的第一份工作。他攀上管道，在一条条管道里干人家安排给他的工作。管道如此粗大，他在里面可以直着身子站立。一天下来，他有时要和同事在管道里走几公里路。如果他们不想再返回来，就随地躺在那里睡觉。第二天一早，上早班的同事给他们带来面包和切成片的肉食。南斯拉夫人在劳西茨的巴斯夫化工公司管道里吃早餐。

父亲如今说：胡说八道。施瓦茨海德的管道完全不是这样的。它们绝没有那么粗大，而且他们也从来没在里面过夜。说真的：“只要你问一问，你就绝对不会认为事情是那样的。”

我确实对父亲在劳西茨度过的日子知之甚少。父亲自己也几乎闭口不谈这事。当时，我正值青春叛逆期，总是回避与父母交流。而现在，当他纠正了我错误的理解以后，我才想更多地知道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父亲说，他会给我写邮件。他后来也写了。事由是：在施瓦茨海德的生活。

这封邮件的语气非常奇怪。“我住在一个当年的临时军营里，与另外两个人合住一间屋子。”父亲写道，用的是现在时。看样子，仿佛我收到了一封他1993年发给我的信。或者仿佛他依然还在那里。“军营附近有一个电话亭，我每天晚上打电话，想听听你们的情况怎样，你在哪儿，你在干什么。”

我记得那一次次电话。吃完晚饭后，电话铃就响起来了。母亲已经在等待。即便真的要跟他说话，我也只是简短地寒暄几句。我们说到上学，一直说着我的事。

“这里有一家小酒馆，一家土耳其卷饼店和一家超市，这就是我们下班后会去的地方。”父亲写道。施瓦茨海德的土耳其卷饼是他所吃过的最好的。

我想象着他的样子。父亲在德国瘦了，尖尖的脸颊，太宽大的牛仔裤，他正在施瓦茨海德吃土耳其卷饼。在霓虹灯下，他的两鬓闪现出斑白的光亮。

“这里的工作挺有趣，下班后也如此。总会有新鲜事发生，每天都不一样。贝克和另一个波斯尼亚人落入了监牢，不然的话，他们恐怕也会长久地待在这地方。”

父亲站在土耳其卷饼店前的立式桌旁与同事们举杯。他们都是当地人。父亲给他们讲述南斯拉夫的事，他们给父亲讲述东德的事。他们在施瓦茨海德的霓虹灯光下一致认为，随着他们各自的国家走向灭亡，后来所发生的一切都糟糕透顶。

“那些管道必须按照等距图纸严丝合缝地对接。一个差错都不能出。当你开始铺第一条管道，必须让它十分精确地到达预定的位置。我们总比德国人干得快。他们看来看去，但你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

父亲没有写，贝克和另一个人为什么沦落到牢狱里。

奥利亚是一个来自克拉伊那的塞尔维亚人，以前是护林员。他与父亲在同一个管道队干活。逃离战争后，他落脚到路德维希港，每个星期有五天在施瓦茨海德上班。在施瓦茨海德，奥利亚从第一天开始就讲同一个笑话，他喜欢一连讲许多遍。但有时候他也沉默不语，也可以完全正常地跟你说话。

这个笑话是这样的：游击队员和德国人在一个树林里战斗，这时有个护林员过来把他们双方赶出林子了。

起初还挺好笑的，但很快就多此一举，并且令人厌烦。现在也该说够了吧，奥利亚，干吗老这样没完没了地唠唠叨叨、老生常谈呢？但是奥利亚依然说个不停。奥利亚夜里从噩梦中惊醒，便把这笑话讲给兵营里的黑暗听，吵醒大家。谁也不会对奥利亚发火。发火能有什么用呢？

然而有一次，一个家伙忍无可忍了。一个阿尔巴尼亚人，他同奥利亚一样住在路德维希港，奥利亚来回都搭他便车。他走过去，手里拿着管钳，十分中肯地提醒他：奥利亚，饶了我们吧，我实在受不了啦。你就别讲这笑话了。就这样。我们帮不了你。请你答应好吗。

一个手里拿着管钳的阿尔巴尼亚人。或许也很悲伤，谁知道。他站在那里等待着奥利亚理解他的用意。奥利亚点点头，因为他理解了。可他又一次讲起这笑话。

有几个星期，奥利亚继续来回往返于施瓦茨海德与路德维希港之间，当然是乘坐火车，因为阿尔巴尼亚人再也不想让他搭车了。

一个星期一，他没来上班。第二天，另一个人接替了奥利亚的工作。

父亲不知道，奥利亚后来出了什么事。

游击队员和德国人在一个树林里战斗，这时有个护林员过来把他们双方赶出林子了。

游击队员和德国人在一个树林里战斗，这时有个护林员过来把他们双方赶出林子了。

游击队员和德国人在一个树林里战斗，这时有个护林员过来把他们双方赶出林子了。

游击队员和德国人在一个树林里战斗，这时有个护林员过来把他们双方赶出林子了。

游击队员和德国人在一个树林里战斗，这时有个护林员过来把他们双方赶出林子了。

游击队员和德国人在一个树林里战斗，这时有个护林员过来把他们双方赶出林子了。

游击队员和德国人在一个树林里战斗，这时有个护林员过来把他们双方赶出林子了。

游击队员和德国人在一个树林里战斗，这时有个护林员过来把他们双方赶出林子了。

游击队员和德国人在一个树林里战斗，这时有个护林员过来把他们双方赶出林子了。

游击队员和德国人在一个树林里战斗，这时有个护林员过来把他们双方赶出林子了。

游击队员和德国人在一个树林里战斗，这时有个护林员过来把他们双方赶出林子了。

照相写实主义绘画

学校实践周。我登记参加艺术实践，参加照相写实主义绘画——为了避免误会：我之所以选择参加照相写实主义绘画，并非因为我对照相写实主义感兴趣，或者因为我画得好，或者真的喜欢画画；我之所以这样选择，是因为里克会参与其中。九年级B2班的里克，红头发里克，绿眼睛里克，我多么喜欢注视着里克，可我常常不得不掉转目光。也就是说，我之所以选择照相现实主义，是因为我想方设法希望给里克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至于用什么样的方式，我现在还不知道。或者说，即使不会立刻留下深刻的印象，但至少能在同一间教室里与她朝夕相处五天，让她感觉到我的存在。之前我所有跟她搭话的努力都失败了，因为它们除了发生在我的脑海里，压根儿就没有一次被真正实施过。在想象中，我已经与里克默默地聊过上百次，聊得很开心。我们聊动物行为，聊佛教涅槃，聊印度，全都是里克感兴趣的话题，也许吧。

实践周第一天，我紧张而坚定地走进艺术教室。我们要各自挑选一张照片，老师说，我们要描绘各自选择的图像，使它看上去和照片一样逼真，甚至比照片更真实，超级写实。这个目标完全不现实，或许教室里并非人人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毫无疑问，我对此立刻就了然于心了。

我给自己挑了一张靠在墙上的自行车的照片。这好像是个再简单不过的主题，显得有点平庸，色彩也过于贫乏。自行车是黑色，墙壁是橘黄色。

此时此刻我才意识到，里克并没有来。也许她晚些时候会来，我心想着。但是她始终没出现，第二天也不见她的影子。

这就是说，我必须得在没有她的情况下应付下去，现在我不得不和安德烈亚斯聊聊联邦国防军的事，因为他对别的什么都不感兴趣。安德烈亚斯本来打算参加社团活动。他想成为将军，或者至少在什么时候亲身经历一次战争。我真没想到，他居然比我画得还差。他也抱怨，觉得画画很愚蠢。画画，他说，这是“婊子干的事”。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自找苦吃，安德烈亚斯说，因为在社团里恐怕他也不得不忍受他所憎恨的各种情况。一些难以预料的苛求他、折磨他的情况。

他画了一棵果树，但是画面上的东西看上去不像果树，而像一辆大众高尔夫GTI。我画了一辆靠在墙边的自行车，上面唯一超写实的地方是车铃。可车铃是老师画的，他要让我看看，“应该怎样画”。

这事让我很受打击。我是艺术教室里唯一的外国人。也许外国人普遍不喜欢画画，也许这只是偶然，天知道。第一天，车扶手画得过分弯曲。第二天，我败在车辐条上。然而我继续在安德烈亚斯旁边画我的。而他拖着深沉的声音沉醉于歼击机。到了第三天，我感觉挺好。我不知怎的变得轻松了。我三天以来都在画画。如果你眯起眼睛，它看上去也不是那么差，我画的自行车。

我为安德烈亚斯高兴，因为他有这样一个确切的梦想。我为他高兴，因为他在最后关头依然锲而不舍。他的画看上去一如既往地糟糕，可是他蹲在画布前，忘我地从嘴唇间吐出小舌头。是的，专心致志做事的人看上去多么迷人啊！

星期五下午，实践周结束了。我们把画好的画挂在学生食堂里。它们将在那里展出一个月。我的画自然也挂在那里，一辆旧自行车，上面有一个照相写实主义的小铃，靠在一面墙上，我猜是在葡萄牙。

几个星期后，我和里克在葡萄园里举办的一个庆祝活动中邂逅。我在脑海里重温了与她的八次对话。这时她突然站在我面前，开启了对话。即使可能没人相信我，我也依然要描述这个场景：

“嗨。你画了一辆自行车，是吗？”

“是的！”我非常大声地说，因为我如此受宠若惊。

“这幅画很酷，”里克边说边微笑地看着，“车铃棒极了。”

“是的！”我又大声说。

“你并没有把整个画面都构思成照相写实主义，我觉得这样挺好。只有车铃——画面的核心。”

“是的！”

“可惜我病了，没能去。我是里克。”里克然后说。

“我知道，”我说，“我是萨沙。”

而里克说：“我知道，你名字里的S上有个装饰。”

里克真的对群居动物行为很感兴趣。她并不怎么喜欢谈论佛教涅槃，认为印度旅游业不过是“以隐蔽的方式剥削次大陆”。

我本应讲述一些有关我的事情，然而我又想起了那令人不快的战争。我不想讲这事。这时，安德烈亚斯的影子浮现在我脑海里，于是我对里克说，我喜欢歼击机，觉得伞兵很酷，惊叹德国武器质量无与伦比。里克冲着这一切说：“啊哈，好有趣，果真是这样吗？”

我画了一张画。没有一点天赋，也对造型艺术没有哪怕一丝一毫的热情。花费了一点时间，还有为我提供的各种材料。和安德烈亚斯一起。没有里克。我们第二次相逢时，我坦诚地告诉她，说那些打打斗斗的东西都是骗人的。而里克说：“很好。只要你喜欢画画，一切就都挺好。”

我，斯洛文尼亚人

在德国初期，我不愿当两种人：南斯拉夫人和难民。我要留长发，一方面为了掩饰我的青春痘，另一方面为了看上去像科特·柯本⁽¹⁾。我要学弹吉他，要像科特·柯本那样唱歌。我要把自己装扮成男性的贾妮斯·乔普林⁽²⁾。我觉得蜡染的T恤酷极了。我要把德语学得更好，免得德国人不得不在我面前竭力掩饰他们认为我朽木不可雕的神情。

就这样，我有时对新认识的人说，我来自斯洛文尼亚。这个阿尔卑斯山共和国很少出现在新闻报刊的头版头条上。我宁可让人把我看作滑雪者，而不是牺牲品。我抱着这样的希望。

人家问我为什么来德国时，我会暗示这样的意思：“我父亲得到了巴斯夫化工公司一份收入不菲的工作，盛情难却，我们难以拒绝。”

我叹息着说：“我多么怀念阿尔卑斯山啊。”

怀念阿尔卑斯山，我学会了，在德国，人们特别爱听这样的话。

在学校里，我的斯洛文尼亚文化则有点不合时宜。海德堡国际小学（IGH）非常国际化，很好地适应了学生的多元化。外国学生不是班级合影时要站在中间、以便让人更好地认出来的特殊面孔，也不是人们容易轻视的少数群体。

我是一个南斯拉夫人，许多南斯拉夫人中的一个。对于不是南斯拉夫人的同学来说，我是哪种类型的南斯拉夫人几乎无所谓。绝大多数人都被自己的出身搞得晕头转向。要是有人觉得出身并非无所谓的事情，那他恐怕有问题。种族歧视在这里是零容忍。

在海德堡国际小学，几乎每个学生都知道，彼此融洽相处是一种需要和行动。有些人会比另一些做得好些，这是主要区别。初来乍到的人都抱着大同小异的渴望，或者会让人设身处地地感受到他们的渴望。来学语言，来交朋友，来度过平常的每一天。回家去，只要还在什么地方存在着一个家。

德国学生有时是少数。如果你通常都是多数，那么偶尔成为少数会是一种特别有价值的经历。他们自然而然地融入学校的一切活动中。他们让我们抄作业，同时也抄我们的。我们为同一个——我们的——校队共同进退，以民主的方式决定为学校的花园购买食虫植物。海德堡其他学校认为，我们是一伙放荡不羁、不听管教的暴徒。当你处在14岁到18岁之间时，这也不是什么糟糕透顶的事。

作为非母语学生，我首先上的是预科班，重点是学习语言和融入社会。此外还会教授一些教学计划中的内容，以便我们之后能更容易地过渡到正常教学。有人辅导作业，有休息时间。对绝大多数学生来说，这在家里也经常是不可企及的。

老师们都额外拥有“德语作为外语教学”资格证书，他们大体上知道应该怎样做，即使并非真的知道该怎样做，也会积极地去，这好像没有什么两样。绝大多数老师都小心翼翼地对待新来的学生。他们提出一些举足轻重的问题，但不是太多。你绝对不知道，你面对的学生正好有什么样的心灵创伤，或者有什么事情暗中守候在我们家里。

但也有一些老师，他们替我们完成造句。有些老师把他们的课从头讲到底，就像他们面对的是一家私人学校的巴伐利亚青年天主教徒。这样也挺好，我们也就不用经常为沉闷的课堂气氛感到愧疚。

当然也有老师偷偷酗酒。还有一位性格暴戾的女老师，同样令人难忘。有一两位老师会让人感到难以言状的厌烦，这样一来，不管你是来自上普法尔茨还是中东都无所谓了；乏味无聊的课堂不管在哪里都是乏味无聊。

海德堡国际小学是遮风挡雨之地，是学习语言之地，是日常生活之地，是学生食堂的塑料盘子，上面总是放着太软的炸薯条。我站在角落的吸烟区，没有吸烟，与人谈论着颓废摇滚。我打篮球，在场上四处瞎跑。此地此刻，你时而会有这样的感觉：作为一个青年移民，在一座完全正常的城市里，在一段完全正常的时间里，你就是一个完全正常的年轻人。于是，我变得更加自信。写出了好乐谱。学校为我支付了一年之久的吉他课费用。我本来打算学习演奏小步舞曲，后来却变成了巴赫的组曲。到了十一年级，我甚至想要承担责任，毛遂自荐参加班长选举。但我们班还未成熟到实现社会主义的地步。

在学校之外，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仍然以为自己会被认作移民，也会因此受到攻击。仿佛我从自己身上可以看到那困扰我的东西，那语言上不无摩擦的东西，那困难重重的东西。事实上，真的可以看出来：从我的缺乏安全感上，从我的语调上，从我的衣着打扮上。有一次，在篮球比赛期间，我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骂人。接下来进攻时，有一个家伙粗暴地朝我嚷嚷，粗暴地说了令人生气的话。我罚中了两个球。

我和外公去超市购物，在收银台旁排队时，有一次说到萨拉米香肠包装在保鲜膜里。他认为这样做无比可笑。“萨拉米香肠一定要敞开放！”外公一边大声说，一边把萨拉米香肠举过头顶，就像德扬·萨维切维奇^③举着联赛冠军奖杯似的。我们又说又笑，在付款队列向前移动时耽误了一阵子。

“哎，外国打工仔，你们到底有完没完呢？”

我没给外公翻译。我转过身去，说了声对不起。

与我在学校的情况不同，工作把父母置于社会生存边缘和身体可以承受的极限。父亲在路德维希港和勃兰登堡省的建筑工地上艰难度日。他弄坏了腰背，只有在周末才会回到家里。

母亲在洗衣房里热得不知“死”过多少次。作为非德国籍的女人，而且是来自巴尔干的女人，她处在工作阶梯的最底层，人家也会让她感受到这一点。

我们也常常被人提醒，你在德国一定要遵守“规则”。仿佛规则在别的国家完全不为人知似的。在有轨电车上，有人冲着我和堂弟说“你们要多说德语”。这当然不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规则，但说这话的人却是认真的。在公共场合，父母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交谈时，声音会变得很小，怕惹来麻烦。谁遵守规则，包括那些根本不是规则的规则，那他的移民身份就更容易得到宽恕，这就是我们的印象。而每个别人提醒我们去遵守的规则也在提醒我们：你们在这里是外国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对一个个偏见了如指掌，学会了你说你的，我做我的。好斗、愚昧、非法。只知道吃洋葱，只会带来疾病。移民到这里，就是为了胡作非为，破坏捣乱。其实，我们干的是启蒙的工作，因为我们无论到什么地方，都只会表现出我们真实的态度：我们只是恰好没能生活在我们愿意生活的地方。我们用不着伪装。

今天是2018年12月1日。堂弟给我寄来一张照片。照片上可以看到那个车库顶。我们在埃默茨格伦德时曾经在上面踢过球。一个开阔的场地，水泥板之间冒出杂草，书包充作球门柱。照片上能看到一个牌子上面画着一个带红杠的球，并且写着：“禁止踢球”。他给这张照片加了评论：“照片上的童年。”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照样踢球。也很少有人说什么。难道你们不识字吗？然后我们短暂地离开，随后又再次回来。

(1) Kurt Cobain (1967—1994)，美国摇滚乐队“涅槃”的主唱。

(2) Janis Joplin (1943—1970)，美国女歌手。

(3) Dejan Savićević (1966—)，南斯拉夫足球运动员。

魔兽向城堡蜂拥而来

17岁时，我与咒语、可乐、箭和弓一起度过了无数个周末。我们玩耍的场地是笔和纸，还有许多人们所说的想象力。一个20面的骰子决定我们的命运。

在粗俗的埃默茨格伦德，阿拉尔加油站对我的社会化意味着什么，那么角色扮演游戏对我——是的，到底是什么呢？当然是在对抗邪恶的斗争中成年——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其他17岁的孩子不是专注于自己的身体，就是沉醉于彼此的关系，依靠拓宽感知的真实物体去体验人生，把包围着自己的世界变成自己拥有的世界。而我的角色游戏伙伴和我开始痴迷于让魔兽军队在斯维尔特兰步步挺进。

奥利来自埃珀尔海姆，他的女巫出生于一个女巫蛋。他是我在德国第一个正常班级里的同学，一个安静的家伙：只有当我有把握知道是什么时，我才举手发言。不知什么时候，奥利告诉我，他星期六和朋友们一起玩《黑色眼睛》。一个角色扮演游戏。

在电脑上？

不是，在脑袋里。

我立刻兴奋起来。在脑袋里，这可是我的拿手好戏。就这样，我受邀和他们一起玩。在一个星期六，我去找奥利。约、彼得和塞布已经坐在他房间的地毯上，三个人的胳膊肘都伸进辣味薯片袋子里。

每个人面前都放着一张纸，上面写着数字，画着一个全副武装的人，画得很差。那上面是玩游戏的人代表的人物的本领和肖像。我扮演的是一个来自河滩湿地的小妖怪。我的父母在一次魔兽军队的突袭中丧命了，我不得不作为孤儿艰难度日。由于我会施魔法，掷骰子时又很走运，所以我最后如愿以偿地成功了。

“富尔米尼图斯⁽¹⁾霹雳，像箭一样击杀。”我大声说，手攥成了拳头。

“班巴拉丁⁽²⁾，我是你的朋友。”我一边大声说，一边盯着对手的眼睛。

约扮演的是一个神授超凡能力的女巫。几个月后，我们在一片森林空地上结婚了，森林坐落在一座满是仙女的高山上。

我在电话里向奶奶克里斯蒂娜描述玩角色扮演游戏时发生了什么。这就像是演戏，我解释说，在一个神鬼生活的魔幻世界里，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想象的角色，一个个神鬼身上覆盖着攀缘植物。有可爱的巨人，有可怕的巨龙。这一切都没有舞台、剧本或导演。

“也没有观众。”奶奶猜对了。

“是的，在脑袋里玩角色扮演游戏时，有观众恐怕只会扰乱心思。”我说，“当我们走进一个空间时，我们并非真的走进了这空间——或者说是真的，但是在一种游戏管理员为我们描述的真实里。这空间看上去是什么样子的，诸如此类。”

奶奶不吱声了。

“扣人心弦。”我说。

“一点儿都不扣人心弦。”奶奶边说边问，“你靠这玩意儿能不能赚钱呢？”这时，我试图把谈话转向别的话题，转向她本人，转向维舍格勒。

我们已经三年没见面，电话也打得少了。战争虽然没有摧毁这座城市，但造成了不少破坏。慢慢地，针对穆斯林的暴力行径越来越泛滥。我没和她谈这话题。我问她会不会孤独。她说，如果我能去看望她，她会很高兴。她说：“但是，你可别让我看到一个小妖怪回家来，听见了吗？”接着说，“你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呀？”

(1) Fulminictus，游戏中的咒语，听到咒语的人会受到伤害。

(2) Bannbaladin，游戏中的咒语，听到咒语的人会将念咒语者视为朋友。

你今后打算干什么？

1995年和1996年夏天，我和奥利在他家的大电视上观看了环法自行车赛，包括平路赛段。自从骑车轧死了一只鸽子，奥利就再也不骑自行车了。这令人十分惋惜，因为他本来非常喜欢骑自行车。他只是再也忘不了车轮下鸽子骨头碎裂时的嘎嘎声。我自己没自行车，乘坐公交车和有轨电车去埃珀尔海姆。说实在的，我也说不清自己为什么突然喜欢上了骑车运动，或许因为我喜欢奥利。夏天，我不愿意在湖边脱掉T恤，怕人看见我背上的青春痘。

奥利的母亲大多时候都待在家里，可是我很少看见她。她老在睡觉，我们不能大声喧哗。当我们周末聚集在奥利家里玩角色扮演游戏时，他父亲为我们准备好夹心面包片。

简单说说埃珀尔海姆吧，因为我刚才提到了它：埃珀尔海姆人对已经停止使用的信箱情有独钟。我不知道当时在埃珀尔海姆发生了什么。我也不知道，如今是不是依然如此。我好久没去过那里了。但是，当时你在任意一条街上都可以看到，埃珀尔海姆人特意把许多时间花在他们的信箱上，一直把许多心思都用在信箱上。我不想说这是浪费。

他们用形形色色的材料，关键是材料要能防风挡雨（但不是非得如此），特别引人注目。齿轮、链条、管道、火柴、硬币、苔藓，形状各异，无奇不有。在这些年里，我绝对没有在任何别的地方看到像埃珀尔海姆那么多的怪异信箱。那时候，扬·乌尔里希还是职业自行车运动的顶级选手。

我不是专门研究信箱的，但情况也许是这样：如果你住的街上房子看上去大同小异，而你是第一个让你的信箱展现出个性的人，比如说用芦苇造一只巨鸟，鸟喙是投信口，那么这只巨鸟，比如说一只鹈鹕，就代表你与众不同的风格。这只鹈鹕直接或间接就是你向其他所有埃珀尔海姆人发出的信号，你随大流只能到此为止，不会继续下去了。信箱就是区别所在。

然而，当鹈鹕激发起邻居展示个性的灵感时，你也不必感到惊讶——先驱者的命运就是被人模仿。有了这样的灵感后，邻居就会思考他们的命运和社会上的地位，相应地要在埃珀尔海姆建立起一些富有想象力的、异常吸引人的信箱。这样的东西会体现出认同感，同样又有平等的意义，一种特殊的平等；我们就是我们，那个有趣的、形同信封的信箱对那个把足球顶在脑袋上的信箱说。而这个头顶足球的信箱也不言自明地说出了主人是哪支球队的球迷。

1997年，奥利和我没有一起观看环法自行车赛。由于面临被遣返的危险，我这里接二连三地出状况，哪里还有心思去观赏阿尔卑斯山山路赛段的冲刺呢？而奥利的母亲身体不好。确切得了什么病，我是后来才知道的。

奥利和我中学毕业了。班级合影上，我们并肩微笑着。奥利如今生活在一个位于希尔德斯海姆附近的乡镇里。他有两个孩子。今天是2018年9月26日，晚报上出现了一个醒目的标题：《扬·乌尔里希掐死了汉堡机场一个工作人员？》。

天哪，扬。

马特克在平行班里，喜欢看连环漫画。1993年冬天，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没有和大家一同乘车参加学校的冬令营。而我因为没有足够的钱去旅行，同样也留在了海德堡，必

须和马特克以及其他三四个同龄的波斯尼亚和阿尔巴尼亚同学去上课。我们成了朋友，因为我们共同错过了一些令人向往的东西，这种情况把我们联结在了一起。

马特克同我们一样住在埃默茨格伦德，是我迄今为止能想到的最平常不过的15岁少年。对此我可没有夸张。他说话不多也不少。他穿着T恤衫、牛仔裤和运动鞋。他喜欢喝苹果汁加自来水。他不读书，或者说只看连环漫画，但也不算太多。他不收藏什么。他喜欢的乐队是汉诺威摇滚乐队“屠宰场的愤怒”，但他们的音乐听上去温文尔雅。马特克每隔几个月就试用一种新发胶。他在协会里打篮球，并邀请我一起玩。每次比赛，他得分绝对都在10分上下，不太多，也不会太少。

马特克的父母是西里西亚人。在认识马特克之前，我还不知道西里西亚这个地方。马特克出生在德国，打算到了18岁时去波兰的卡托维兹旅行，看看他父母的出生地。可是他后来飞到希腊的科孚岛上去了。

预科班的德多乘坐一辆拖拉机挂车，从他的家乡之城逃亡到了波斯尼亚中部。拖拉机穿过田野。挂车猛烈地摇来晃去。在他们离开田野的地方，有一块绷在两根杆子上的布条，警告田野里有地雷。从这天起，德多只有快速地来回晃动脑袋，直到他晕眩而失去知觉时才能入睡。

依靠缝在牛仔上衣里的小兜，德多从波斯尼亚带来了他钟爱的音乐：英国铁娘子乐队、巴西神碑合唱团、美国麦加蒂斯乐队等。在德国，上衣里不用再缝小兜了。德多也没别的上衣。我从来没听过他谈论音乐。

我的预科班成绩册上写着：“斯坦尼西奇学习语言毫不费劲。他理解快，又能很好地把所学的语言知识运用到新的情境中。他特别喜欢描述奇异的东西和想象。”

在德多的成绩册上写着，他是一个“安静的学生”。

拉希姆披着一头卷发，名字也曲里拐弯，时而人家会问：“你是不是阿拉伯人？”其实他父亲是个闪米特语言专家，给四个孩子中的三个起了阿拉伯名字，只有梅拉妮例外。

海尔道先生走进来，打开一本书，把袖子挽得高高的，挥舞着手臂，宛若拿着一把斧子。海尔道先生开始朗读！文学对这个大光头、小个子的人来说是个体力活儿。他特别喜欢工作。海尔道先生朗读着，顺着开头的句子打着手势，这里描写的是一个人醒过来后变成了怪物。

我不知道怪物叫什么。

我问奥利，奥利说：“甲壳虫。”也就是说，一个人醒来后变成了甲壳虫，有许多小腿和不伦不类的东西。我忍不住笑起来。我忍不住大声笑起来，这样笑有点奇怪，因为其他人都那样严肃认真地倾听着，而海尔道先生一门心思继续朗读，仿佛没人醒来后变成了甲壳虫似的。这时，他中断了朗读，注视着我，就像他向来注视着在课堂上捣乱的学生那样：他的额头（半个光头连在一起）和脖子陷入一道道皱纹。值得庆幸的是，我不是唯一发笑的人。拉希姆也笑了，还有一个，阿尔卡迪乌什，他也注意到了，或者是跟着另外两个发笑的人笑了起来。

海尔道先生问，什么东西如此好笑呢，他多么乐意跟着一起笑。

我打算实话实说：“海尔道先生，一个人醒来后变成了甲壳虫，这很可笑。”

拉希姆反应比较快，因为他的德语说得比较快，他说：“海尔道先生，我们笑的是那

个怪物。它很可笑。也就是说，那人变成了这样一个虫子。”

第二天，拉希姆自愿坐到了我旁边，问我有没有继续读下去。我读下去了。《变形记》是一个特别耸人听闻的故事。但在当时，“耸人听闻”这个词还不我的词汇之列。也就是说，我用了别的什么词语。

拉希姆接着又问，我在课堂上总写什么呢。“你可不是在记笔记，对吧？”

事实上，我在记笔记，这可以帮我课后捕获一些只当是胡言一听而过的东西。可是我怕这样说他会觉得不舒服，于是我说：“写所谓的诗歌。”

拉希姆说，他自己写“所谓的小说”，并说他在31路车上见过我一次，问我是不是住在埃默茨格伦德。我们很快就弄清了谁住在哪儿：他住在联排别墅里，我没住在人们以为南斯拉夫人必然会住的高楼里，而是住在位于城区边缘的平层别墅里。

拉希姆提议说，我们可以聚一次。“我们也许能一起写点什么。”

“或许和甲壳虫人一起？”我提议说。

“甲壳虫人住在埃默茨格伦德。时而也会看见他出门。”

“在艾德卡超市里买辣椒。”

所谓的诗歌和所谓的小说成为联结我们的纽带。到了十二年级，我们俩都把德语课选为提高课程，并且参加了海尔道先生的文学兴趣小组。拉希姆是个善于讽刺和渴望远方的人。我是个中规中矩和思念家乡的人。我们一起学习，一起吃饭，打算进行一次长途旅行。但是我们首先打算划着一只双人划艇，沿着亚格斯特河顺流而下。我们后来长途旅行去了波斯尼亚。拉希姆成了我奶奶的客人。他如今生活在慕尼黑，有一个小女儿。

埃米尔和爷爷一起生活在希尔施霍恩。我没问过他父母去哪儿了。埃米尔也不想知道我父母是怎么回事。埃米尔喜欢看书，也借书给我看。我很少去希尔施霍恩找他，因为希尔施霍恩坐落在一个偏僻荒凉的地方，而我作为外国人不太情愿走出海德堡——压根儿就不愿意去那儿，因为那里更多是16世纪留下来的木质房屋，没有什么高楼大厦。

我第一次登门拜访时，埃米尔的爷爷立刻就让我看看他的猎枪。他退休了，是个猎人，他说情愿一辈子靠打猎为生。他把我们第一次聊天的话题引到了在哪儿杀死动物上，不知怎的，这让人感到惬意。几乎就在同一瞬间，他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他出生在但泽，在那里结识了一位来自苏联的女孩，名字也叫萨沙。她很美丽，不知道她如今在干什么。

我问，她当时在干什么呢？埃米尔的爷爷说：在一个集中营里当看守。这就是我们刚刚认识两分钟半的情形。我问埃米尔，他是不是也跟着爷爷去打猎。埃米尔说，他憎恨打猎。

埃米尔喜欢看书。他16岁，是两个读书会的会员。他邀请我一起去，可是我担心自己读一本书要比他多花十倍的时间。我不愿意让人家等着我。

埃米尔借给我的第一本书是汉斯·法拉达的小说《小人物，怎么办？》。我用了三个月时间读完这本书，觉得写得棒极了。

有一次，埃米尔的爷爷来希尔施霍恩汽车站接我。他领着我穿过那地方，给我讲述那一座座房子的事。他说到“木梁构成的骨架”和“砂岩柔和的红色”。有一座大楼让他特别迷恋，那就是富丽堂皇的猎人之家。埃米尔的爷爷讲述了它的建筑年代和规模。“当你静静地站在里面时，你会听到一个个幽灵的声音。它们永远都待在这里，可它们的家完全在另

外的地方。”他这样说道，或者是我今天想象他有可能这样说过。

我在图书馆里查找但泽在哪儿。我请教历史老师格布哈特先生，我们应该知道但泽是怎么回事。

他扬起眉毛说，要说但泽，就必须从头说起啊。波兰人、德国人，少数、多数，被迫迁走的人。许多东西我都听不懂，但有些东西觉得格外熟悉。

接下来去拜访时，我就直接问埃米尔的爷爷有关但泽的情况。他冷静地回答了我的询问，说话很快。在但泽，他和父母以及三个姐妹住在一座木质房子里，几个孩子一个比一个调皮。他父亲是教师，母亲是家庭妇女。

家里有人曾经是猎人吗？

没人当过猎人。

我等待着他继续讲下去，可是爷爷去擦猎枪了。

埃米尔、拉希姆、奥利、马特克。他们有时问我今后打算干什么。我也想知道他们打算干什么。到了这个年龄，不管是外国人还是别的什么人，最基本的想法就是：有人愿意与你共度时光。

德多不提这样的问题。德多没什么问题可提。德多几乎不学德语。一天到晚沉思默想，上课也心不在焉。但在其他事情上，他可不是这样。凡是德多动手做的事，都会做得让人拍手称赞。一旦他把什么东西做得非常好，他就弃而不做，并开始做一些新东西。后来他父母离婚了，他便开始吸毒。这样一来，他就不再关心是否能把事情做好了，而是沉溺于冒险。

登高成为他风雨无阻的嗜好。他每天锻炼，从四面八方登上这个地方比房子高的一切事物。所有跟他打交道的人心里都明白，德多背负着过去一些挥之不去的精神创伤，比当下更沉重，更严酷。我们知道拖拉机的事和地雷区。也许事情仅仅是：如此幸运地活下来。

当我们获悉他面临被遣返的危险时，大家都恳求德多去看医生。每个精神科医生恐怕都会看出他的精神创伤。如此一来，德多可能就不会被遣返了。德多说，他不需要治疗。他手里总是拿着什么东西玩。还有那件永不离身的、上面缝着小兜的牛仔上衣。

1999年，他被遣返回波斯尼亚。他不上脸书，我不知道德多如今在哪儿。

1995年夏天，他在一个距离学校不远的年轻人聚会点玩桌面足球，一天又一天地泡在里面，通宵达旦，玩个没完没了。他很快就玩得非常娴熟，人家和他玩或跟他比赛已经找不到任何乐趣。

枪口上的出身

我的历史老师格布哈特先生是一个温和的大个子男人，来自博登湖畔，对各种革命情有独钟。法国大革命、勇敢的1848革命、1911年的中国革命。他能细致入微、栩栩如生地讲解一次次历史变革，而且还抱有一种渴望。因此我觉得，他在讲述一个个故事时，很愿意（或者绝对不愿意）自己就是其中的主人公——与丹东和罗伯斯庇尔一起玩骰子游戏。我想要回报他的热情，便在我的历史考试中写了一个个故事，直到他委婉地叫我别写那么多页，而要多写一些史实。

2016年，他已经退休了。他打电话告诉我，他有了一个有趣的发现，想和我见面聊聊。我们约好在海德堡的布克哈德咖啡馆吃汤饺，喝罗萨斯啤酒。

格布哈特先生讲述了他父亲的故事。我当年的历史老师的父亲1916年出生在上施瓦本。他成长于一个贫寒的家庭，9岁时就失去了母亲。继母是一个冷漠但很能干的人。她在泰特南为他弄到了一个给商人当助手的学徒职位。她很少拥抱他。

1938年，他加入了国家劳役团^[1]，随后又应征入伍。他从战争打响第一枪，就在国防军里。他先被派遣到波兰，然后到了法国。他在俄罗斯负了伤，并非因为他上了最前线，而是最前线挺进到他跟前，挺进到中队参谋部跟前。他回到德国，住进战地医院。而他的同伴，也就是第六集团军的部分力量长驱直入抵达了斯大林格勒。

1943年，他在泰特南娶了路易丝·施梅尔策为妻。就在婚庆的钟声还余音缭绕之际，他又不得不上前线去，进入第45先锋营参谋部。1943年秋天，先锋营被派往南斯拉夫。他“继续挺进到深山里”，给他的新婚之妻写柔情绵绵的战地信件。“你想想这森林小道，我们一整天沿着狭窄的道路向上前进，并不算很高，穿过一座座被炸得满目疮痍的村庄。后来，这条道突然就不见了，因为河上的桥被炸毁了。而就在从贝尔格莱德到萨拉热窝的塞尔维亚深山里，我找到了昔日的同伴。”

他在维舍格勒找到了同伴，真巧。“这座城是一片废墟，”他写信给他亲爱的路易丝说，“这里就像走马灯似的更替主人，现在又是德国士兵维持秩序。”他在那里驻扎了几个月。修缮房子，在德里纳河和鲁扎夫河河谷里穿来穿去，“在一座还未遭到毁坏房子里，在一个整整齐齐的房间里，在一张用简单的木板搭建起来的，甚至还有床垫的床上”做着他的美梦。1944年1月，奶奶克里斯蒂娜还是一个12岁的姑娘。爷爷佩罗20岁，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在离维舍格勒不远的山里四处活动。要是我的太奶奶卢姆沙晚上从一座还未遭到毁坏房子里一个整整齐齐的房间前走过的话，她就会听到里面的收音机声音，因为“收音机一直会响到灯熄灭的时候”。要是我的历史老师的父亲从卢姆沙的房子的废墟前走过的话，他会迷上她的歌声，而且会情不自禁地冒出一个念头，一个要在维舍格勒举办歌舞晚会的念头。

他们很快就“找到了一个看上去适合举办活动的空间，尽管在这小城里只有为数不多的房子还未遭到毁坏：一个昔日被土匪团伙占用的马厩。当他们清理走一层厚厚的马粪后，露出了质地不错的木地板。只要先锋营成员把什么弄到手，总会使之变成一些合适和有用的东西。这样一来，人们很快就看见了一个收拾得干干净净、装饰着冷杉树枝和独特壁画的大厅”。

我的历史老师和我又各要了一杯苹果汁汽水。我们一边用吸管喝着，一边为我们的祖

先当年有可能在那里见过面举杯。或许就在新大厅启用当天的歌舞晚会上，“当贵客们落座在那些做工粗糙的凳子上以后，乐队便以轻快的流行音乐开始了演奏”。

难道就没有一位当地的女歌手唱一首小曲为之助兴吗？比如在主要节目开始之前，“小丑和驯兽师‘埃里克’出场，他特别能让观众赏心悦目”。

此外，他的信里还描述了前往这个地区郊游的情景。长途跋涉使“一些人汗流浹背”，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奶奶如何讲起村子里那些汗水淋淋的士兵。想起了那个喜欢喝牛奶的军官。

“我亲爱的小宝贝！一个阳光四射的星期天清晨透过窗户朝着我微笑。晨曦中，那高高的山峰闪现出白晃晃的光芒。德里纳河河水奔腾不息地流向深谷。直到现在，我仍在这里过着一种悠闲自在的日子。”

这条河见证了我们大家，是的。

当这对夫妻意识到不是每个人都会看到他们书写的所有内容时，他们匆匆写下：

“千千万万个亲爱衷心的问候伴随着我今天的几行字，还要送给亲爱的小宝贝一个甜蜜的吻。”

“现在能得到你一个吻该有多美啊。”

在那些照片上，这个年轻的士兵在维舍格勒滞留的地方，我似乎什么时候也去过。德里纳河依然长流，当然不可撼动。一个临时搭建的木板走道连接起那座部分被毁坏的旧桥的白色拱顶。

[\(1\)](#) 纳粹德国的社会组织，“二战”中要求德国青年在服兵役前履行六个月的劳动义务。

奶奶和电视遥控器

奶奶要关掉电视，却按到音量按钮上。桑德拉·阿弗里卡⁽¹⁾正在放声歌唱：

我的生命是我的游戏，它和你根本没什么相干，
直到有一个人让我发疯，我完全孤独地留在这里。

父亲从奶奶手里拿走遥控器，把声音调小了。我觉得这种不闻不问的态度是一种冒犯。可话说回来，要是我在近旁的話，似乎也会做出同样的反应。奶奶看见父亲后好像很高兴，说了句感谢。“这些按钮那么小。”她说。

父亲又把遥控器递给她。

“你们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她看看父亲，又看看我。父亲消失在浴室里，他不想再次受到迎接。奶奶把身子转向我微笑着。我坐到她身边。她的睡衣是白色而软绵绵的。她打着哈欠。沙发前摆放着那张永恒的咖啡桌，上面还盖着一条永恒的小台布。那是奶奶好久以前钩织的。咖啡桌上放着一个玻璃盘，盘子上放着一杯水。

我把水杯递给奶奶。她不想喝水。她的头发呈淡红色，稀稀拉拉的。上面有一个饰有小鸟的梳状发卡。

“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家呢？”

“奶奶，你就在家啊。”

奶奶用指头摸摸咖啡桌上的玻璃杯的边缘。站起来。那一面面墙上挂着她的刺绣画和我们的照片。站在前面的奶奶犹如在参观画廊。她端详着在巴黎的我，我用手抓着我的头发，一张地地道道的旧照片，是我挑选出来的。我之所以挑选这张，是因为我知道奶奶不喜欢大胡子。我要让她高兴。这张照片旁边是父亲和叔叔的照片，两个沉思的小学生。奶奶站在餐柜前，里面尽是账单、首饰、药以及更多的药方。奶奶旋转着炉灶上的温度调节器。靠在窗前，奶奶说：“这不是我的家。我要回家去。”

“奶奶，你的家在哪儿呢？”

“在维舍格勒，我的小毛驴。”

“我们就在维舍格勒呀，奶奶。”

“这不是维舍格勒。”

我宁愿告诉她她说得对。对我来说，维舍格勒也不是我的维舍格勒了。但她指的并非深层意义上的维舍格勒。她说：“你能送我回去吗？我要舒舒服服地待在那属于我的一切之中。”

“这一切都是你的，奶奶。”我张开手臂。

奶奶根本连看都不看一眼。“我一无所有。”

我站到她跟前。这一次她接住了我递过去的水，但是她没喝。她拿着玻璃杯指着窗外。“在我的房子对面，也有一座像那边一样的房子。”

“这就是那座房子，奶奶。”

“这不是那座房子。”

“那是什么山？就是上面有房子的那座。”

“梅格丹山，你这个笨蛋。”

“你在你房子里能看到的那座房子坐落在哪儿呢？”

“梅格丹山上。”奶奶说着突然啦啦啦地哼起小调，一首儿歌。

“这是梅格丹山，奶奶。你瞧瞧这儿，这就是你的家。”我说。虚构故事就存在于我的家里，我心想。

奶奶摇摇头。在接下来的瞬间，她把杯子里的水倒出窗外。溅落的水花从院子里跳起来。奶奶迎面把杯子递给我。

“我的好儿子，你给我倒杯水去。”

我是萨沙，我想说，可我一声未吭，随后为奶奶倒了一杯水。

我相信，没有什么比明知道你属于那儿，但却不能在那里生活更糟糕的了。

父亲从浴室里走出来。我建议买一个新遥控器，按钮要大些。父亲同意，要立刻行动，要马上离开这儿。奶奶站在窗前，背对着我们。在维舍格勒，不是在维舍格勒。

奶奶喝水太少。

[\(1\)](#) Sandra Afrika（1984— ），塞尔维亚著名女歌手。

“家乡”大夫⁽¹⁾

如果有人问我，家乡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那我就给他讲一讲“家乡”大夫的故事。他是最初帮助我融入社会的引路人。

1992年秋炎热的一天，我在“家乡”大夫位于埃默茨格伦德的花园里认识了他。当时，我走到这条街另一侧齐花园高的地方，突然听到有人大声说话，听到一声招呼。那是一位老人，留着髭须，身穿速比涛泳裤。他一边拿着一条软管给草坪浇水，一边向我挥手示意。

当身穿速比涛泳裤的老人和你打招呼，你会不由自主地心怀疑虑吗？我也应声回答。他试图隔着篱笆跟我说话，可说来说去我也听不明白。我的德语太差了。可他越过那条街，友好地和你打招呼，这首先已经让你心里感到热乎乎的了。

“家乡”大夫留着髭须，一脸地地道道的髭须，一派克拉克·盖博⁽²⁾的神气。可惜这种胡须如今几乎绝迹了。15岁时，我觉得胡须十分可怕，同时也会让人产生信任感。这与我心里的德国形象简直如出一辙。

在这条街上，他的草坪看上去非常柔美。他的房子很大。他的萨博车有好些年头了。这条街是埃默茨格伦德最漂亮的街，报警装置也最多。“家乡”大夫没成家，我觉得很遗憾，因为他的行为举止如此文雅，留着髭须，又有一口健康的牙齿。

第二年春天，他说到了我的牙齿。直到这时，我们彼此的交谈绝对没有超过几句话，他不知怎样通过面颊看出了我口腔里有问题。他劝我方便时来他的门诊看看。什么时候来都行，但他建议越早越好。

我没有医疗保险。“家乡”大夫说有没有无所谓。他治疗过我们大家的龋齿：波斯尼亚龋齿、索马里龋齿、德国龋齿等。在一个理想的家乡，重要的是龋齿，而不是你的嘴说什么语言，说得多么好。

我必须去看许多次。第四次或第五次时，我躺在治疗椅上讲了一些我的故事，也讲了我家的故事。并非因为“家乡”大夫对此好奇。只是他对人太和蔼可亲了。我吃力地用德语讲了在洗衣房辛辛苦苦当牛做马的母亲，结结巴巴。我说，她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本来算是一位研究剥削的专家，现在却受人剥削。

“家乡”大夫微笑着，随之把一个看上去令人讨厌的器械放入我的口腔里，一边脱口而出：“卡尔·马克思或许满口烂牙，但却满脑子好思想。”他开始在我的牙齿上刮来刮去，接着出神地说：“工人们就没有祖国可言。”

不知什么时候，我又给他讲述了外公穆罕默德的故事。因为我相信，他是我们当中在德国最少感到幸福的人，但他为人友善，知恩图报，不愿意说出心里的不快。“家乡”大夫询问我外公有没有什么喜欢干的事。

如果有人问我，家乡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那我会讲述一个邻居越过那条大街友好地打声招呼的事。我会讲述，“家乡”大夫怎样邀请外公和我去内卡河边钓鱼。他怎样为我们弄到了钓鱼证。他怎样准备好面包，还带上果汁和啤酒，因为你对此绝对料想不到。我们怎样站在内卡河边，一个来自西里西亚的牙科大夫，一个来自南斯拉夫的老司闸工，还有一个没有龋齿的15岁中学生。几个钟头之久，我们三个人对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全然没了恐惧。

(1) 这位大夫的姓（Heimat）在德语中意为“家乡”，故在此意译为“家乡”大夫。

(2) Clark Gable（1901—1960），美国著名演员，被称为“好莱坞之王”。

瞎折腾

我们喜欢瞎折腾。我们乘车去集装箱堆场，皮耶罗、马特克、杜莱和我。我们爬上货车厢，里面装着满满的铜材，然后翻过篱笆，来到废纸堆放场。大多数情况下，跨过篱笆后，瞎折腾就开始了。我们躺在一个个巨大的废纸集装箱里，里面堆满杂志和报纸，全是剩下没卖掉的。要是这些东西没人看过，那多可惜呀，皮耶罗用意大利语大声说。也许他是这样大声说的，只是我们听不懂皮耶罗说的而已。可他说对了。什么样的杂志都有，尤其重要的是音乐杂志，因为到了16岁上下，音乐会告诉你一切美妙的东西。一些体育杂志，还有大包大包未开封的《南德意志报》和《明镜周刊》。我专心致志地看着一本摄影专刊。我准备攒钱购买人生中的第一台照相机。我看到有人说，数码照相机时代即将到来，但这不过是一个时髦现象。

海德堡散发出印刷黑墨和马特克的发胶（苹果）的气味。我们的指尖翻着一本又一本杂志，变得越来越黑。这时，皮耶罗大声说：“喂！森林仙女！”我们躺在这些文字和图像以及被禁止的东西上，仰望着晴朗的天空。或者像皮耶罗那样，眼睛死死地盯着画刊封面上一个女水兵那闪亮耀眼的乳房。这才叫真正的度假，让人感到惬意的度假，而且没有父母在身边，和一帮朋友在一起。杜莱点上一支烟，尽管毋庸置疑，在一个废纸集装箱里抽烟很愚蠢，你在里面干吗也不能抽烟啊。烟雾很快就变成了现实，我们像电影里一样慌不择路，急忙逃跑，用慢动作翻过篱笆。大多数情况下，只要能翻过篱笆逃出来，瞎折腾就结束了。这一次我们以哈哈大笑了之，因为起火没造成什么严重后果。尽管大家落荒而逃，但有一个人想到要带上一本杂志。这就是皮耶罗，我们为此相当高兴。

彼此让人把话说完

拉希姆的父母是法兰克地区的无神论者和人文科学家。他们家有四个孩子。屋里有一座螺旋楼梯。

我一直没弄明白拉希姆母亲的专业领域具体是什么。或许她压根儿就不是人文科学家。我们从来没谈过这事。她说完她的话，好像她事先就知道她说的话该怎样结束。

与她不同，拉希姆的父亲经常谈论他的职业。他是闪米特语言文学教授，经常奔波在一些地区，那里有一些重要的方言几乎无声无息地趋于消亡。他要把这些方言带回来作为研讨会的材料。

我在拉希姆家里度过了许多时光，常常会见到他父母。有时候我会留下来吃饭。不说别的，他家饭菜摆放的样子都非同一般！盘子里的调味汁简直就是一道精美的装饰。一切都美味可口，仿佛那是一位外星厨师用魔法变来的。要是真的有人从厨房里走出来，彬彬有礼地鞠躬致意，用阿拉姆语^[1]祝我们好胃口，随之消失在一片藏红花云雾里，我也不会感到奇怪。

我享受阿拉尔团伙的放荡无忌、时而为之的冒险行为和友谊。我也享受拉希姆家按照主题分门别类的书架、宽敞而令人舒适的客厅和彼此让对方说完话的氛围。

有一次吃晚饭时，除了我之外，还有两位热情的同性恋女士在场，坐在我旁边那位名叫安德烈娅。两人在普法尔茨从事兽医工作，一个搞实践，另一个搞研究。人家问我是哪儿的口音时，我回答得含糊不清，不管怎么说，那个从事研究的安德烈娅把“波斯尼亚”听成了“波士顿”，笑得乐开了怀，仿佛我正好送给她一个礼物。她开始讲起她在麻省理工学院委托任教的经历和在波士顿度过的一段美好的时光。她说英语，非常纯正的英国腔，这是我从电影《英国斗牛士》里那个摔跤手的言语中听来的。尽管她听到我说德语，但她依然说英语。或许她觉得，在交谈中说母语会让我觉得舒服些。

我任凭她一个劲儿地说下去，不时地点点头。当我听懂一些问话时，便如实回答她的一个个问题——我在德国干什么，school（上学）；我住在哪儿，close to the river（离那条河不远）；我什么时候又会返回家园，soon, I hope（不久吧，我希望如此）。我说英语时拖着我的布鲁斯·威利斯腔。她非常自然地接受了我的一个个回答。这太神奇了。

闪米特语言文学专家会心地微微一笑。拉希姆给自己盛上肉丸子。这个令人喜爱的畜牧专家每说一句话，我都觉得不知为何……越来越有身临其境之感。一个误会让我从出身的重负中解脱出来了。当一个来自波士顿的交换生，可比当一个只有临时居留许可的波斯尼亚人简单多了——Have you ever been to a Celtics game?（你看过凯尔特人队的现场比赛吗？）

这时，我甚至敢于提出反问来：No, you?（没看过，你呢？）

Yes, indeed! It was fantastic!（看过，当然看过！简直太棒了！）后来，拉希姆的母亲端着沙拉过来，我们的谈话遗憾地暂停了。这时，我们的东道主把手搭在安德烈娅的胳膊上低声说“不是波士顿，而是波斯尼亚”。

“噢！”研究者说。

“噢！”行医的兽医也说。她关注的重点是家畜的群体行为。

令人垂涎的美味佳肴在纵横交错的误解中被分到一个个盘子里。扮演另一个自我的游戏结束了。大家自然而然地笑声不断。安德烈娅当然说了对不起。我也表达了歉意。我们碰杯（拉希姆和我喝冰茶）。拉希姆的父亲大声说——转向两位兽医专家，仿佛他不是提问题，而是在讲一个笑话：“凯撒斯劳滕⁽²⁾的生活怎么样？”

大约15年后，也就是2010年，我自己去了麻省理工学院，在那里教授德国文学和创意写作课，住在离查理斯河不远的地方。如果有人问我来自哪里，我时而说“维舍格勒”，时而说“欧洲”，时而又说“库尔普法尔茨”。库尔普法尔茨最受欢迎。要是你在国外说“库尔普法尔茨”，你的对话伙伴肯定不会知道这是一座城市，还是一个语言错误。

我说，我父母是人文科学家。我说，我爷爷是猎人，是从但泽移民过来的。我说，我母亲和岳母是同性恋。我总是说，出身是偶然，也不管人家问不问，总会说这句话。

在NBA半决赛中，凯尔特人队对阵奥兰多魔术队。我在现场观看了第三场比赛。我的凯尔特人队大获全胜。

⁽¹⁾ 中东古语，起源于古叙利亚，属于闪米特语族。

⁽²⁾ 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城市。

客人们

在德国第一年，我很少有客人拜访。我总会找到拒绝来访的借口。我们落脚的地方在维斯洛赫，一家六口人挤在一间屋子里。房子里住的全是陌生人。他们出现又消失，彼此介绍一下压根儿就没什么意义，更何况邀请一个同学来这工业区的地狱呢。

到了埃默茨格伦德，空间是大了，但安静依然是难以企及的。每天下午，大家都待在家里。我的表妹们还小，爱闹腾。昔日的南斯拉夫人突然不请自来。他们在南斯拉夫也会这样做，友好邻里文化的象征，但也特别让人闹心，因为你第二天还要参加数学考试。我时而在客厅桌上做功课，时而在地上。不知什么时候，父亲给我睡觉的屋里买来了一张桌子。至少我愿意相信：桌子是买来的。

至今我依然在说服自己，不让客人来家里，只是出于一些善意的理由。缺少空间和安静，这是一方面，朋友们也理解这一点。但他们也知道我的羞愧吗？我为旧家具羞愧；我为没有游戏、没有电脑和几乎没有音乐（只有几盒翻来覆去听的录音带，比如金属乐队、涅槃乐队、碎南瓜乐队的）羞愧；我为我们家吃饭用款式不一、五花八门的盘子和聚少离多羞愧。瞧瞧吃饭用的刀子，刀刃不是破损就是卷曲。

我憎恨这样的感觉，但也没有办法。在外面，我几乎可以毫无困难地应对那些施加给我和我主动选择的角色。但在家里，这一切全都失灵了。你也能看出来，我们的日子实际上过得怎么样。

父亲和母亲一天到晚辛勤劳作，让人心痛。1994年，父亲在一家康复医院里干了整整一个月，腰背都累坏了。被解雇后的第二天，为了能不间断地继续干下去，他又去了建筑工地，可腰背再也不听使唤了。时至今日，他依然会感觉到当年留下的后遗症。

父母不爱惜自己，但很照顾我。他们让最棘手的问题和忧愁都远离我，很少谈论他们感到力不从心的困难。我不久前才知道，他们当时多么贫困潦倒，他们遭受了怎样的挫折，又多么失落。我明白了他们在30多岁之前一直过着安稳的生活，如今却要与房东讨价还价能不能在花园里栽种西红柿，明白这对他们到底意味着什么。

他们俩不得不放弃熟悉和喜欢的职业。在德国，为了生存下去，他们会不加选择地接受任何工作。在我们的南斯拉夫朋友圈里，这样的情形比比皆是。雇主们懂得从别人的困境中获取利益。工资很低，绝大多数情况下会被迫加班加点，而且分文不会多给。这是歧视吗？父母只能忍气吞声，敢怒不敢言。这不可怜吗？无论如何都是。

生活捉襟见肘，入不敷出，谁还能再顾得上接受培训或继续深造呢？语言学习是基础，但却没时间和精力。尽管如此，还有不少人下班后不顾脚上满是血泡，赶去听上两个钟头的德语动词变化。然而，摆脱依赖的出路常常是走不通的，或者为时已晚——而遣返却来得太快。

我从自己这个幸运的例子看得出，这种对难民的结构性的歧视在当时有多么广泛，而如今一如既往。随着我正式获得难民身份，那一个个实际障碍消失了。我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和上大学期间打工的机会。我可以利用的机会越多，就越难以袖手旁观，或者甘愿成为受害者。我没有承受过父母所承受的生存压力。

我无法确定，当时到底是什么东西让他们备受折磨，这到底是好是坏。或者换个说法，假如他们的实际状况要好些，又是好是坏呢？关于他们的恐惧，关于我们家的经济状

况，最根本的，关于他们在德国的生活是否幸福，我当然知道一些，但我不愿意承认。我只要有机会就尽量不待在家里。我很少为了他们而守在家里。

我需要自由空间，父母允许我有自由空间。他们通过鼓励、关爱和一点零花钱为我创造了一个个机会，让我在一定程度上克服移民身份的种种障碍，成了一个正常的青年。

随着里克的出现，一些情况发生了变化。里克是我交往的第一个女朋友，也是我的第一个德国客人。她在我家进进出出，自然坦率，很有教养，绝对不会对任何事情表现出反感，而我却抱着自身固有的偏见猜测，认为我们家的一切必然会让德国人反感。她问道，我们之所以不在墙上挂一幅画，是否因为我们觉得艺术很无聊，而我肯定瞪过她，仿佛觉得她发疯了。她边笑边说，这问题只是个玩笑。我总是会小看所有的人。

里克和母亲很合得来。她在花园里帮内娜干活。外公上百次抓住里克的手，微笑着把它握在自己手里，仿佛这只手是最有价值的礼物。里克自然地用那些五花八门的盘子吃饭，为我录制磁带。

不知什么时候，父亲在万得城电器店⁽¹⁾给我买了一台带有CD播放器的小型音响设备，也可能是人家扔掉的旧东西。于是，我买了人生中的第一张CD，是鲍勃·马利⁽²⁾的独唱，因为里克喜欢雷鬼音乐（可惜我根本不喜欢）。里克不喜欢吃肉（可惜我不一样），所以我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变成素食者。为此，母亲或许恨不得用青葱来扼死我。

里克和母亲一起坐在客厅地板上观看连续剧《X档案》。我在阳台上学习。内娜走进客厅，拳头里攥着一把头发。她可不可以扔掉这头发呢？萨沙的梳子上总有这么多头发，她不太清楚他是不是在积攒头发。

母亲清了清嗓子。里克想知道是怎么回事。母亲翻译给她听。两个人用德语商量着，内娜一句话都听不懂。母亲然后说：“是的，你别管，萨沙需要这些头发，用于玩魔法⁽³⁾。”

从此以后，内娜睡觉时都会锁上门。她望着我，打着一些莫名其妙的手势。她为自己撒芸豆。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几个星期后吃早餐时，内娜突然开口问：“你为什么要玩魔法呢？你出什么问题了吗？”

母亲一边大笑，一边澄清了一切。内娜轻声地骂骂咧咧。里克拥抱住她。

缺少的东西并不太多。缺点儿语言。缺点儿勇气。我下定决心积攒勇气，为了父母邀请人来我们家里做客。拉希姆的父母似乎是最佳人选。在我向父母说明这事之前，我要先等待客人的答复。他们一定会很高兴，会答应来做客，我对此满怀信心。

在拉希姆家里，我与他父母在一起从来没有过不自在的感觉。他们的生活里有成百上千本书籍，弥漫着求知的气息；他们的生活里有一顿顿时间安排得恰到好处的餐食。每个家庭成员都有自己的房间。拉希姆的父亲在地下室里还有一间书房和一间叙利亚厨房用具藏室，或者是武器藏室，谁知道呢。

每天临近结束时，这对夫妻还要详细地讲述一天的历程，彼此倾听对方的心声。一天结束时彼此倾听对方的心声，即使有我这个地地道道的外人在场，我觉得这让人感到惬意；我仿佛不在那里，因为这是一场只属于他们两人的对话。

他们对待我的态度令人感到格外舒适，无拘无束。他们提出的问题很少会超越我和他们的儿子谈话的内容，也就是学校和体育。这样做既真诚又适宜。我是他们儿子的朋友，

是客人。

有一次，我们谈论起应该怎样对待小孩子。这个话题的点在于他们养大了四个孩子，而我觉得我的两个小表妹很烦人。我记不起来说过什么话了。但我记忆犹新的是，他们坐在我对面，跷着腿，手里端着葡萄酒，好像在严肃地思考应该怎样来回应我。有人严肃地思考怎样来回应你，这就足以造就一次美好的对话了。

当他们知道我逃离了波斯尼亚战争以后，两人既不讲他们80年代在一个已经记不起名字的克罗地亚小岛上的度假之行，也没有论述“塞尔维亚人的心态”之类的话题。

这位父亲说：“我感到很遗憾，你不得不经历这样的不幸，萨沙。我很愿意了解你的坎坷经历。你下次过来时，我们也许可以聊聊这段令人心酸的经历，如果你愿意的话？”或者诸如此类的话。我当时不想聊。好久以后，当我掌握了更多的语言知识时，我们确实聊过。我们跷着腿，手里端着葡萄酒和冰茶。

一句波斯尼亚谚语说，一位友善的东道主亦是一位友善的客人。拉希姆的父母是友善的东道主，而我千万次寻思，要是请他们到我家里来做客，这事会不会一帆风顺呢？父母和外公外婆会有和我一样的感受吗？我期盼着我们能作为一家人办成一些事，哪怕只是一些简简单单的事，比如像和一些新朋友吃个晚饭那样。

我特别希望能为母亲这样做。她在南斯拉夫曾经那样喜欢当东道主，远胜于喜欢自己当客人。作为客人，她一到主人家里就立刻去厨房里忙前忙后，为其他客人端水送茶，实在令人感动。她对待自己的客人更是热情洋溢，让人觉得她恨不得立刻把自己的一切全都拿出来奉献给客人们。

拉希姆的父母会对我父母的热情好客做出怎样的反应呢？对我们的生存状况呢？对我们没有藏红花调味品和窗帘呢？我们觉得，由于时刻面临遣返的危险，这样的东西根本不值得去买。

我希望，他们能毫无偏见地来我家里做客，就像那天吃晚饭时对待他们来自普法尔茨的女同性恋朋友一样。我父母会为之激动和高兴。我们会——在饭菜摆上桌之前——相互寒暄，问东问西，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彼此友好，跷着腿。“你们在花园里栽种了什么？”对一个生活在德国的难民来说，这真是一个奇妙的问题！

然后我们会一起用餐，会聊一聊各种不同的调味品。我们的客人不会立刻就表明他们对巴尔干美食的看法。他们（或者他们的外星厨师）的烹饪水平国际化程度很高。对他们来说，巴尔干似乎既不寻常，也不成问题。确切无疑。我父母会说，红芸豆是我唯一不爱吃的东西。但它们却是我们的美食中不可或缺的基本食物。告别时，拉希姆的父母会为这美妙的晚餐表示感谢。这真是再好不过的事情：有人会为一些美妙的东西感谢我们。

接下来有一次，当我又在他们家吃饭时——有一道仅仅由三种配料做成的美食，我连一种都不知道，况且那是一道法兰克地区的菜肴，而不是阿拉伯的——我说出了邀请：你们愿意去我家里坐坐吗？

两人把刀叉放在盘子里，轻轻地擦了擦嘴唇。拉希姆的母亲说，这太好了。他父亲也表示感谢说，真的太好了，我们很乐意去。他们友好地这样说，而且有点诧异。一个星期后，我又坐在那里。布谷鸟钟⁽⁴⁾就挂在餐厅墙上。这只鸟7点整走出来，热心地和大家打招呼。

7: 01，豌豆煮摆在餐桌上。肉特别鲜嫩，是来自普法尔茨的牛肉。我学到了散养这个词。这里有布谷鸟钟；这里有一支管弦乐队。管弦乐也许是在磁带里演奏的，也许是

从墙壁里传来的——海顿或者莫扎特。我当时似乎费尽心思想弄清二者的区别，希望能跟着说说关于音乐的话题。

我没有告诉父母有关邀请的事。我也不敢当着拉希姆父母的面再次冒昧地说出来。他们当然也没有向我提起此事。

“散养的，”这个闪米特语言文学教授那天晚上在吃豌豆煮时这样说，“就在篱笆边上。”大家都会心地一笑。

我最好的朋友一家从来没来过我们家做客。我的家人也从没去过他家做客。我们的父母彼此不相识。那个布谷鸟钟来自黑森林一个知名的地方。我把名字忘记了。

(1) 德国最大的电器零售商。

(2) Bob Marley (1945—1981)，牙买加著名歌手和词曲作家，雷鬼音乐的先驱之一。

(3) 原文是Voodoo（伏都教），海地的民间宗教。它糅合了法国殖民统治时代遗留下来的天主教礼仪成分以及非洲约鲁巴族、丰族、刚果族和其他一些民族的奴隶带到海地的非洲宗教和巫术成分。这里泛指魔法。

(4) 产自德国黑森林地区，内部有精巧的齿轮装置，每到整点，钟上方的小木门会自动打开，出现报时的布谷鸟。

只是说说罢了（客人们，1987年）

客人们在我们家进进出出。今天晚上玩什么呢？饮料和骰子准备就绪，还有记录本和笔。科斯塔来了，贝雷茨也来了。前者和父亲有过一面之缘，后者是他的好朋友。科斯塔一根接一根地抽烟，贝雷茨也一根接一根地抽。贝雷茨留着髭须，须尖是黄色的，有一只假眼睛。当烟雾熏眼时，他就闭上另一只。父亲和母亲也抽烟。1987年11月这个星期六的晚上，烟雾缭绕。

我坐在母亲背后的沙发上。透过烟雾，她的脖子散发出一股芬芳的气味。骰子发出清亮的声音。父亲说：“这是要对塞尔维亚人进行种族灭绝吗？”贝雷茨说：“只是说说罢了。”科斯塔说：“就是有人在这么说。”父亲说：“你胡说八道。”母亲说“*Alea iacta est*”⁽¹⁾，随后望向一条小街。母亲脖子上散发的是什麼气味呢？

一年以后，脸上涂着“双头白鹰”⁽²⁾的科斯塔冲进我们在地下室藏身的大楼里。他当场就变成了文学虚构人物。面颊上涂着伪装色彩，镇定自若地说，他饿了。这时，孩子们围着他低声哭泣。“我饿了，有吃的吗？”

贝雷茨与科斯塔同为塞尔维亚人。因为那只假眼睛，他没有被征召入伍，但也没有自愿去那些也接收假眼睛的人的地方报名。他应聘去了瓦尔达公司。后来，瓦尔达公司绝大部分关闭了，贝雷茨先是失业，接着当了渔业监督员。

河边有一条条漫长的检查通道。下午待在一棵梧桐树的树荫下、一块岩石背风面、草地上、土地上、水泥地上：贝雷茨在工作时休息。贝雷茨用一只眼睛观望着，一边抽着烟。一旦他当场把你抓住，比如说你正在堤坝下方钓鲑鱼，只要他说“这里不是禁止钓鱼吗，善良的杜尚⁽³⁾？”，那你就当自己是杜尚说：“贝雷茨，怎么样，坐下来，陪我抽根烟好吧？”幸运的话，事情就不了了之，要么交一半罚金或者送一条鱼给他。这样，贝雷茨就闭上一只眼走开了。

我们离开维舍格勒前几天，我在那座桥上碰到了骑着自行车迎面而来的科斯塔。他摆出一副给人让路的架势，弄得我不能随随便便地走过去。他亲切地微笑着，打算摸摸我的头发，我迅速低下头去。他脸上的伪装色彩已经剥落了，絮絮拉拉的碎片挂在面颊上，有绿的，有黑的。他询问我怎么样，我父母怎么样。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于是我说，挺好的，大家都挺好的。科斯塔说，那就好，只要大家都好，那就好。

战争结束后，我只见过他一次，那是1998年，他又是骑着自行车。他沿着德里纳河慢慢悠悠地骑行，仿佛他不仅拥有阐释这个故事的权力，而且这条河也属于他。在他前面，贝雷茨拐向河岸边。科斯塔跟了上去。他们谈论着。看样子，好像他们只是冲着对方所说的一切点点头，或者示意拒绝。在他们之间不存在什么看上去模棱两可的事。他们都抽着烟，各走各的路。

科斯塔如今怎样，我不知道。凡是我问过的人，没人认识科斯塔。

贝雷茨依然在维舍格勒抽着他的烟，他的髭须尖依然呈黄色。他说话声音小，什么都不问。他每天晚上散步，这儿停停，那儿看看，和人聊聊天。他在这城里认识许多人，许多人也认识他。

父亲和我2018年4月碰到了他。我把话题引到从前那一个个快乐的夜晚，问他们是不是怀念那段岁月。

“是的，我们可以组织一些活动，”父亲立刻大声说，“只要我们还在这里。”

贝雷茨抽了一口烟，随之把烟灰弹到人行道上。“我就不参加了，”他严肃而低声地说，“我在这里已经输得一败涂地。”

父亲和我清了清嗓子。

贝雷茨微笑着，一边从我们身旁走过一边说：“只是说说罢了。”

-
- (1) 拉丁语，意为“骰子已经掷出去了”。这是恺撒的名言，比喻破釜沉舟，没有回头路可走。
 - (2) 双头白鹰是塞族的标志。
 - (3) Dusan（1308—1355），塞尔维亚地区中世纪时期的国王，是当时最强大的君主之一。

奶奶要离开这里

奶奶醒过来。她在哪儿？床单摸上去湿漉漉的。壁纸。无疑是个卧室。她两脚发热。脚上穿着拖鞋。她脱掉拖鞋。地毯，丑陋，丑陋的地毯，她在家里同样的地毯，不过要好看多了。书柜。棕色和白色，金色的镶边。书籍。铁托传记。还有梅萨·塞利莫维、阿卜杜拉·西德兰、⁽¹⁾萨沙·斯坦尼西奇和《茶疗》。呵呵，一堆书。

她梦见了一些令人眼花缭乱的东西，不知所措，稀里糊涂。梦里出现了一个士兵。一个姑娘。一个喜欢她的男子。一个掘墓人。一团乱麻。梦幻是些活生生的东西。这样的梦幻转瞬即逝，像记忆一样。这一切到底是从哪儿来的？

到处是钩织的小罩子。收音机上，床头柜上，茶几上。美妙，真是美妙。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当时她钩来织去。不知什么时候，眼睛就不听使唤了。

如果这屋子的主人回来了，怎么办呢？她系上衬衣最上端的扣子。她身上到底穿的是什么衣服呢？看上去和她自己的睡衣一模一样。

街上不会还没完没了的吧。

她小心翼翼地打开门。这时，她听到一些声音，像是有人在唱歌。厨房有三个门。第一个门后是楼梯间。第二个门后是浴室。她要去浴室。第三个门后有人在唱歌。她打开门。一个客厅。她似曾来过这里。电视在歌唱。一张沙发躺在一个玫瑰色罩子下，好像觉得冷。

电视里的女人唱得不好。总是少不了这样的人唱歌，而且穿着高跟鞋。这会伤害腰。怎样关这玩意儿呢？呵呵，拔掉电线，关掉了。

最好干脆回家吧。之前换换衣服就行了。衣柜里的衣服很合身。装几件换洗的。她知道有一只旅行箱。它就在这儿。

最好回家去，没错。钱在哪儿呢。她打开几个抽屉，分文都没找到。但有一只装饰精美的小盒子。她把小盒子收起来。

离开这里。说走就走。可差点儿忘记梳头了。

回家吧，没错。钥匙插在里面。外面门铃上的名字：克里斯蒂娜·斯坦尼西奇。

这就是我的名字啊，她一边心想着，一边走下楼梯。旅行箱沉甸甸的。如果你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一切都不好办。她要打开楼梯间的灯。可这里没有灯。今天是几号？无所谓了。关键是，不会又是昨天了。

她很快就来到院子里。清新的空气令人心旷神怡。去哪儿？一切都是对与错，一切皆有可能。她闭上眼，原地转动起来。一圈，两圈。她笑起来，你这个孩子！睁开眼吧，这是一座楼。她熟悉这房子的正面是灰黄色。她不就住在这座楼里吗！她要在楼梯间里打开灯。可这里没有灯。

四楼的门上写着她的名字。门大开着。进去吧。放下旅行箱。打开箱子，立刻。但是先来杯咖啡吧。

⁽¹⁾ Mesa Selimović (1910—1982)，南斯拉夫著名作家；Abdulah Sidran (1944—)，波斯尼亚诗人和剧作家。

烤全羊

1990年5月1日，我们在维舍格勒温泉疗养院附近的森林空地上烤了一只羊。这只羊惊恐得张开大嘴，它的嘶叫声久久回荡在空中。羊颌骨上长着歪歪扭扭的牙齿。羊皮闪闪发光，上面起了一些小泡。我感到害怕，于是我发出笑声。父亲建议，我应该用面包接住从羊皮上滴下来的油脂。我照做了。我吃着面包。面包卡在我的喉咙里。过来，用水冲下去。父亲把啤酒递给我。他当真是这样想的吗？

我把皮球踢进火堆里。有点故意为之。父亲把皮球从火堆里捡出来说，一个好大的土豆。没人为球或者我生气。

羊肉、面包、沙拉。

奶奶克里斯蒂娜坐在她的儿子们中间。她让人卷了头发，一头威震四方的卷发，在郁郁葱葱的森林里发出耀眼夺目的红色光芒。有人大声说：我们家的人简直太没天赋了！连个会玩乐器的都没有。我们哼唱国际歌。我打算学吉他。

我们玩捉迷藏，成年人也跟着一起玩。我跑进树林里，直到我什么都听不见了，只有林子和我自己。我坐在一根树干上。全世界没人确切知道我在哪儿。我用手指在苔藓上倒腾来倒腾去。因为谁也找不到我，很快就变得无聊了。

在返回途中，我发现母亲和婶婶藏在一块岩石后面。她们捧着一瓶葡萄酒咯咯地笑。我神不知鬼不觉地偷听了她们的谈话。我记不起来她们说了些什么。我希望她们说的是无关紧要且美妙的事情。两年后，在维舍格勒温泉疗养院，有十多个穆斯林女子被非法拖走、强奸和杀害。

对我来说，维舍格勒几乎再也不是一个让人感到无忧无虑的地方。几乎没有一段回忆是纯粹个人的。几乎没有一段回忆不需要补遗，不需要对案犯和蒙难者以及发生在那里的暴力行径做出注释。我曾经感受到的一切，全都和我对这个地方的了解搅和在一起。我知道人们对战争年代发生在这个地区的一系列事件做出的一项项法律判决。我看到了一个个用指甲刻在墙上的痛苦。这是那些从疗养院被抓走的女子用指甲刻上去的。

我的童年充满了无穷无尽的不和谐。一个火堆里的皮球不仅仅是一个火堆里的皮球。在树林里，大家在娱乐时玩的不仅仅是捉迷藏。我为自己寻找了一个个故事的母题。

我母亲更加深切地经历了这样的不和谐，更加痛苦地消化了这样的不和谐。在维舍格勒，她是另类人。她受到更多惊吓，情绪更加变化无常，但从来都不做傻事。她提心吊胆，夜不能寐。在维舍格勒，再也听不到母亲咯咯的笑声了。

我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我为什么不再待在那个生我养我的地方。但我觉得自己一直以来都在解释。几乎也是在请求原谅。面对我自己亦是如此。仿佛因为维舍格勒这座城市的历史，因为我童年的幸福，我感到自己身陷在一种必须用一个个故事来补偿的罪孽中。我感到我的一个个故事都在讲述这座城市，甚至当我不愿意书写它时，它们仍然在讲述着它。

1994年5月1日，父亲把他们公司的大众面包车停在我们住的埃默茨格伦德平层别墅前。车里有一只羊被叉在铁钎上。瞧那羊嘴，瞧那歪歪扭扭的牙齿。他们计划去烧烤小屋。我说：“我不去，我有事要出去。”

在阿拉尔加油站旁，我碰上了马特克。他坐在行人道上玩游戏机。

我说：“我们家要烤一只全羊。”

马特克从游戏机上抬起头来，摸摸自己的头发。他的头发用发胶固定得高高的，紧紧地绷成一个四方形。他的脑袋看上去宛若一座罗马城堡，而马特克依然不断地在那一道道防御栅栏上变换着花样。马特克说：“这可真让人垂涎三尺啊。”

“在烧烤小屋旁。”我说。

“实在令人馋涎欲滴，”马特克说，“我饿了。”他收起游戏机站起来。

这很奇怪。我告诉他一件我为之感到羞愧的事。美食爱好、空间狭小、生活艰苦、废弃沙发——我说的不是这些。我不愿意去烤一只插在铁钎上的羊！我尤其不愿意让别人知道我们家干这样的事。德国人对我们有这样的期待，我们烤全羊，在打篮球时恶意犯规，睡觉时把指节连环铜套放在枕头下。

“反正我不去。”我说。

“你不去我也去。”马特克说。

当我们到达烧烤小屋时，羊已经烤上了。马特克望着铁钎，望着我坐在小凳子上的舅舅。他旋转着铁钎，录音机夹在两腿间。赫伯特·格勒内迈尔大声说着什么。马特克摸摸自己的头发。

正在钩织的内娜·梅耶玛抬起头来打招呼。马特克看见了穆罕默德外公，他此刻会说声“喂”，后来会说声“谢谢”。马特克摸摸自己的头发。当父亲和他握手时，马特克看到父亲手臂上那古香古色的利剑和花环，看到从C&A店里买来的运动服和广告T恤。内娜穿着一件带有冲浪板和“加利福尼亚梦波钻石”字样的T恤，配着一条又长又花的裙子。

父亲做了自我介绍。母亲端来一盘饮料。外公喝芬达，舅舅喝金巴利橙汁，父亲喝啤酒。马特克和我面面相觑。我拿起芬达。马特克误解了我的目光，随手拿起啤酒来。

父亲说：“你不喝啤酒吗？”他是冲着我说的。我相信，父母不知道我喝酒精饮料。有那么多事情，我们从来闭口不谈。因为我几乎闭口不谈这样的事。

我第一次和父亲、我的好朋友马特克、这只羊以及赫伯特·格勒内迈尔一起喝啤酒。

有马特克在场，大家都说德语。喂和谢谢。外公微笑着。父亲和马特克聊汽车。这个话题简单，两人也感兴趣。父亲周末看了二手车广告，并且买了一辆。马特克正在准备考驾照。父亲说了一款“欧宝Astra”车型，马特克直言不讳地说出了不认可的评论，“一点儿不中用”。父亲最后加了一句：“但是欧宝Astra便宜啊。”“梅赛德斯！”父亲说着眼睛里直冒光，而马特克根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同样干脆说出：“梅赛德斯！”他们碰杯。

我为父亲感到自豪，我不知道为什么。

马特克摸摸自己的头发，吃起第二碗青葱酸奶。后来我提议说：“用面包轻轻地握一握肉上的油脂。这样才对。面包不能是干的。”马特克照样做了。接着又来了一次。

阿拉尔加油站文学

我认识一些抱着巴尔干的陈规俗套不放的南斯拉夫人，他们容易产生攻击性，容易不合群，容易受到刺激。他们混淆了好斗与自信，侮辱性言辞与言论自由。他们带着一个个与生俱来的旧时代的烙印。他们是克罗地亚人，他们就想让每个人都知道这件事。我们第一次相遇时，他们也要弄清我是什么人：只要不是塞尔维亚人。进一步的细节无关紧要。他们便不打扰我了。我躲开了他们。这样的人来阿拉尔加油站，只是为了加油而已。阿拉尔加油站周围的南斯拉夫人，没人会看重出身。大家只是这儿讲一个笑话，那儿讲一个笑话，谈笑风生，不绝于耳。要是佐基想在我们之中列出一个出身清单来，阿迪尔会让他连笔一起吞下去。

阿迪尔脸颊上横着一道伤疤，就像是第二张嘴。那里还有喜欢苦思冥想的杜莱和他敏捷的妹妹伊内斯。德多时而也来看看，好久都不说一句话，然后又无声无息地走开。人们认为阿拉尔加油站的南斯拉夫人机智而灵巧，但有点散漫。他们很早就创建了一套关于汽车的惯用话题。有一个传奇说，杜莱绝对能在瞬间修好任何一辆汽车。另一个传奇说，阿迪尔能在瞬间撬开任何一辆车。第三个传奇说，伊内斯在比尔赫尔德霍夫开任何一辆车都比你开自己的车要快。

一切都不是真的。然而，当一个传奇的主人公，这也不是什么坏事。也就是说，没人去纠正什么。我被排除在外了，因为大家心里都明白，我甚至弄不明白一辆车是怎样跑起来的。

我们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亲密无间。我们的父母彼此认识。我们共同庆祝一个个生日，如今都有对方最新的邮箱地址（阿迪尔的邮箱不灵，我刚试过了）。

我不愿意和某些南斯拉夫人打交道，他们来自让我不舒服的环境。在埃默茨格伦德不愿意，在学校里同样如此。我回避与他们见面，只要他们不找上门来，我也不会给他们提供任何帮助。要闲逛，我宁可去找阿拉尔的伙伴们；要学习，我宁可去找德国人。我意识到逃亡并不能抹去社会差别，认为自己要比那帮人强。为了谴责我们作为难民在德国毫无差别地遭受不公平对待，我以投机的方式分配我的信任，这样做的确不太光彩。

无论你自己来自巴尔干，来自西里西亚，是住在莱门的土耳其人，还是来自荷兰的米歇尔，所有这些从阿拉尔停车场观看太阳越过法国上方落山的人人都有一段我们喜欢讲述的传奇。一群没有手机的年轻人聚集在蓝色霓虹灯下，期待着下一个故事。谁会讲故事，谁就属于圈里人。在这个过程中，大家会难以置信地侃侃而谈。

阿拉尔文学是一种略有夸张的文学。除此以外都是现实主义的，绝对如此。英雄们的动机就是证明自己，或者向他人证明什么。为了引起特别的关注，什么样的恶作剧都有。有讲险些逃不掉的故事。有讲胜之不武的故事。有讲学校、培训和瞎折腾的故事。有讲打赌、违法乱纪和交通肇事的事故。尽管没有悲剧英雄，大家依然会来这里讲述。失败比比皆是，有些带有悲剧性。

第一人称视角，很少进入叙述者的内心世界。简洁扼要，没有不必要的修饰，高潮迭起。德语混杂母语，十分美妙。我多么希望也能这样讲述，但是从来都没能像当时的伊内斯或者在联邦国防军服役的沃伊泰克那样如愿以偿。

或者像“求你可别用脚踹我”的克日什托夫。他偷走了法提赫的自行车车轮。大家很快就知道是他干的。法提赫也知道，他的邻居克日什托夫偷走了他的车轮。可谁也不说什

么，法提赫也一样。克日什托夫完全受不了这样的压力，绝对受不了——人人都知道这事是他干的，人人也知道他本人心明如镜，这件事无人不晓，但大家都守口如瓶。

不知什么时候，这种无人不晓但都守口如瓶的压力折磨得克日什托夫实在无法忍受了。于是他把自行车车轮给法提赫送了回去。也就是说，不是偷偷地或者怎样，而是直接按了法提赫的门铃，并且随身就带着那玩意儿。跆拳道选手法提赫喜出望外地表示感谢，还问克日什托夫有没有时间待会儿。然后，他和克日什托夫一起走了几米远，问了问对方的家庭情况及诸如此类的话。他突然间停住步子说：“可我现在得让你尝一尝厉害。你瞎闹什么呢，当邻居的，谁会干得出这样的缺德事？”

克日什托夫当然无话可说，叉开两腿站在那儿，只是一再低声下气地说：“法提赫，求你可别用脚踹我。”

伊内斯在查票员面前溜下公交车。她一溜烟似的直接奔进火车站里。他们在后面追赶。她一下子跳上一列城际快车，车门随之关闭。她直接撞到列车员怀里，抱歉，老人家，来不及买票了。

“你要去哪儿？”

“是的，我们去哪儿呢？”

她笑了，他也笑了，去本斯海姆这段路程几乎变得浪漫了起来。尽管如此，她依然得付车票钱。

她在本斯海姆下了车，等了一个钟头回程，耽误了她的面试。

“伊内斯，你要去哪儿？”

“去莱茵-内卡运输协会。他们那里招聘查票员。”

听到了吗，沃伊泰克是怎样匍匐来到埃默茨格伦德的？

从罗尔巴赫南站到31路终点站？午夜时分走下去，手里攥着一根大约一杆枪长短的棍子，穿过一片片葡萄园。这一切的一切，就是要向我们证明，服完兵役一年后，这依旧是他的拿手本领。果真如此。要我说，这真是令人感动！

我们一路以蜗牛般的速度跟着走：克日什托夫和法提赫（又和好了）、杜莱和伊内斯、皮耶罗，两袋子大象牌啤酒，还有弯月陪伴。法提赫出发前说的话依然回响在耳际：“没错，可你只穿着内裤也能做到吗？”

上坡走了两个钟头。如此漫步穿过葡萄园，真是美不胜收啊！在暖融融的夜晚！在静谧的天空下！我们这般年龄，就有时间闲庭信步！

皮耶罗，这个最爱说话的家伙。这星期职业学校一个胸怀大志的德语老师要他阅读黑塞，并且断言说他会喜欢的。阅读《荒原狼》。“从头到尾，”皮耶罗大声说，“三天之内！”

我问，他为什么现在偏偏想起这件事呢。

没错，因为这本书如同沃伊泰克的匍匐一样：费劲，但也很来劲！

这是皮耶罗这个17岁的青年阅读的第一本成人书。他很激动。他被吸引住了。高兴自己活在世上。

他问：“别人也这样吗？”

“皮耶罗，兄弟，怎么这样问？你这样问是什么意思？”

是的，他不知道。“特别……锐利？这本书写了有关我的事，连我自己压根儿也弄不明白的事。比如说，我在家里同和你们在一起时完全不一样。你总不能只做一个无聊的家伙，有时候也要当回……狼。”

我回答了他什么呢？或许说了几本我读过的喜欢的东西。许多书还没读过德语的。卡夫卡、布莱希特和法拉达。我刚开始只是感觉很好，因为在这个圈子里，有人把我看成某些事情的专家，即使不过是读了些书而已。

皮耶罗大声说，没有对着任何人：“每个人都有他的命，没有一个人的命是轻松的，对不对？”

不管怎么说，沃伊泰克全力以赴地匍匐着。沃伊泰克精疲力竭地爬到了上面。他当然不会让人看到他疲惫不堪的样子，而是时而用真声，时而用假声朝着星空大声歌唱。这也不错，听上去很美，想想他大概从来没有这样练习过，你甚至应该不吝赞许。

“我们还是再看一会儿吧，”他边说边倒在草丛里，“一旦我睡着了，”他叹息着说，“你们可别忘了叫醒我。”

“正是这样！”皮耶罗大声说，“他正是这样！”

“谁呀，皮耶罗？”

“黑塞呀！他闲躺在家里，却不知怎的就是不想让我忘记他。我也根本不会忘记。就在这里面，就在这里面！”皮耶罗拍着额头。噼啪一声，然后万籁俱寂。一个作家似乎会

听到我们的心声。

现在，也就是25年后，我与皮耶罗、沃伊泰克以及其他所有人一起在这天晚上打开最后一瓶啤酒。我让大家为擦伤了膝盖的大个子西里西亚人和坚持读黑塞的小个子意大利人干杯。

“朋友们！”我让萨沙大声说，“为沃伊泰克！为这欢乐的时刻！为这样的经历，为这心醉神迷的时刻，为这振奋人心的时刻！”我们共同干杯。

这天夜里，谁也不会被忘记。

外交手段，1994年

埃默茨格伦德的烧烤小屋旁，偶然有两拨庆祝活动。一边是八个来自巴门塔尔的年轻小伙，在田野上举行告别单身仪式。他们踢足球，球门上没有网。烧烤架上烤着猪颈肉，烧烤围裙上印着乳房的轮廓。哥们儿之间命令式的说话方式，越来越喧闹。他们的T恤上印着你的名字：斯文。

斯文的哥们儿

再见了，自由！

另一边是我们。伊内斯把她的高尔夫车开到草地上，后备厢敞开着，从里面传来阿根廷探戈音乐，或者阿尔班博士⁽¹⁾激情洋溢的演唱。巨大的篝火堆。有一些女士在场，还有一些技术更好的足球运动员。我们对烧烤小屋本身不感兴趣。毫无疑问，如果没有酒精饮料，什么事也不会发生，也没人会大声喊道，我们得赶快走开，还有“这是德国的树林，你们这帮随便撒尿的家伙”这句话。我今天恐怕会认为这只是在引用艾兴多夫⁽²⁾的话。当一切还风平浪静时，要是我们踢足球的话，我们或许会更多地搅和在一起。

当有人说出这话时，沃伊泰克立刻说：“嗯？想干什么？”说着他提起裤子，朝对面那伙单身汉走去。其他人尾随着——我们这些在联邦国防军服役的西里西亚小伙子，其中包括法提赫，身上散发出紧张不安的气息，可就是爱出风头；还有拉希姆，他身上有一股争强好胜的劲儿，同样爱出风头。我则原地一动不动，碰到这样的人时，我总是敬而远之。

到了对面，外交手段立刻派上用场。聆听和争辩。手搭在肩上。瞅着眼睛。没有笑声，这是一个好兆头。当某些事情还成败未定时，你是笑不出来的。在这一点上，精神科医生可能持有另外的看法，但他们的看法是不对的。当你正在决定要不要发怒时，你是笑不出来的。

10分钟后，或者差不多时间，我们的代表团返回来。沃伊泰克把音乐关小。“哥们儿，听着。”他说。我们洗耳恭听，可是他却没有下文了。也不必有下文。我们喝光了杯中酒，熄灭火堆，收拾好东西，接着开车去了阿拉尔加油站。

我祝愿你们的婚姻天长地久，你们二人永远感到幸福，斯文。

⁽¹⁾ Dr. Alban (1957—)，瑞典籍尼日利亚歌手，其音乐风格为带有舞曲风格的雷鬼乐。

⁽²⁾ Joseph von Eichendorff (1788—1857)，德国最重要的浪漫主义作家之一。

皮耶罗来自阿普利亚大区的卢切拉城

后来，皮耶罗骑摩托车时被撞倒了。刚过18岁生日。一辆卡车撞的。卡车司机靠边行驶时没注意到他。或者皮耶罗高估了自己的驾驶水平，滑倒了。现在说什么都无济于事。皮耶罗打算去阿拉尔加油站，这是事实。我们知道他要来；当他迟迟没来时，我们也没多想什么，也没等他。

第二天，大家的电话自动应答都说：皮耶罗被车撞伤了。大家约好在阿拉尔加油站集合。每个人都带些什么，打火机和香烟、一台CD机和一些CD唱片、一本色情书。全是这种你在医院里会需要的东西。我带了一本书，戈特弗里德·贝恩⁽¹⁾的诗歌。

阿拉尔的伙伴们集体前往多人病房看望皮耶罗。他打着石膏躺在那里。“木乃伊，他妈的。”凡是可以看到皮肤的地方都青一块紫一块。眨一次眼表示“是”，眨两次表示“不”，眨三次表示“操他妈”。

皮耶罗心灵手巧，什么都会捣鼓，但不是个好学生。五金工人，学过精密机械。除了皮耶罗和我，阿拉尔小伙子们再没别人留长发。他在我之前很久就留上了长发，所以不管怎样，对我来说，留长发也就没那么惹人注目了。

有好一阵子，我们几乎每天放学后都在电脑上玩《不明飞行物：未知的敌人神话游戏》。外星人抵达地球，不愿意说话。我们边玩边吃奶酪，没面包。皮耶罗的父母成天加班，见不到人影。只要他们说话，自然都讲意大利语。和我说话时也一样。我觉得这样棒极了。我学了几句意大利语，久而久之又忘得一干二净。

我们在医院里待了一个钟头。我又把那本书带走了。皮耶罗伤得如此严重，他这样子怎么还能看书呢？有好几个星期他都必须插管排尿。后来伤情日见好转，皮耶罗又可以正常撒尿了。

我很少在夏天看到皮耶罗。每到夏天，皮耶罗就和家人一起去意大利。回家，他父亲说。去阿普利亚，皮耶罗说。车祸九个月后，他又驾驶摩托车穿行在这条路上。在南蒂罗尔的一个休息站，他要买一根巧克力条，第二年就娶了一个加油站女工的女儿。阿拉尔圈子里的人最擅长干这种事。

婚礼是在施韦青根举行的。南蒂罗尔加油站女工的女儿名叫安娜。安娜和皮耶罗一起来过阿拉尔加油站一次。可爱，漂亮，确实如此。当然，从我们这伙人嘴里也少不了说两三个有关加油站的笑话。

第二场更隆重的婚礼办在卢切拉，也就是过去三百年里皮耶罗整个家族的出生地。第三场婚礼是在米兰附近举办的，安娜来自那个地方。

皮耶罗的奶奶生活在马齐尼。她从家里步行去卢切拉城堡只需16分钟，但是她从来都没去过卢切拉城堡。一个城堡废墟，有什么好看的呢？

1220年，腓特烈二世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位期间，他提防着生活在西西里岛上反叛的穆斯林，也就是撒拉森人。在某个时候，他下令把他们迁移到阿普利亚的卢切拉地区，并在老城旁边建起了卢切拉新城。一个要塞，建造在当年生活在那里的诺曼人的城堡废墟上，有兵营和武器库，有清真寺和许多手工作坊。腓特烈二世允许撒拉森人在卢切拉享有广泛的自主权和宗教活动自由。

此举带来了商业的繁荣兴旺。城前的草原上遍地是阿拉伯骏马和骆驼。人们训练鹰隼和猎豹狩猎。撒拉森人用辛勤劳动和军事技术回报皇帝的大恩大德。他们的武士训练有素，英勇善战，骑马箭手远近闻名。腓特烈二世在某段时间的贴身卫士主要就由一些身手不凡和忠诚勇敢的撒拉森人组成。轻骑兵把毒箭头雨点似的射向敌人。基督徒和穆斯林短暂地和睦相处，亲密无间。但显而易见，这一切并不符合教皇的意愿。他不再信任这个斯陶芬人^[2]，这个不信上帝的异教徒，这头不祥的野兽。

1246年，腓特烈二世写信给他的女婿瓦塔泽斯说：“噢，幸运的亚洲！噢，你们东方人幸运的统治者，你们不用害怕臣仆们的武器，你们无须忧虑神职人员和主教的一个个发明。”这时，他已经被废黜了，这个撒旦的儿子和学生，这个魔鬼的使者。

1300年，在教皇胁迫下，卢切拉被那不勒斯安茹王朝的卡洛二世摧毁了。大多数生活在那里的撒拉森人都没能逃过这次劫难。

^[1] Gottfried Benn（1886—1956），德国诗人，作品带有强烈的表现主义色彩。

^[2] 斯陶芬家族为现德国南部施瓦本的统治家族，腓特烈二世为该家族成员。

危急的比赛局势

1994年，父亲第一次坐在观众席里观看了一场我参加的篮球赛。我获得了七个罚球，只罚中了三个，有三个篮板球，其中没有进攻篮板。比赛结束时，我只得了可怜巴巴的八分。我们赢得很险。

比赛结束后，父亲站在场馆前等着。当我出来时，还有三个男人在那里聊天。父亲孤零零地在一旁抽烟。我看到了那个场景。我当然看到了。

在回家路上，父亲和我聊了聊比赛中的几处危局。上半场结束前一次失败的穿越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前进的动作太冒险。他笑我随意出手，神奇地投了个三分球。我当然不会每次都这么走运。

我为什么以前没邀请他来观看比赛呢？他应该会喜欢来的。我承认，这或许是我做得不对。我说，要是他在现场观看，我会更紧张。实际上是不愿意听到他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呼喊为我加油，就像今天我错失了一次简单的上篮后那样。我也不想让他看到我错失一次简单的上篮。但比赛期间，这两种情形并没有给我造成什么困扰。我只是为自己的失误感到懊恼。我不再为我的母语感到羞愧。

父亲问我们下一场对阵哪个队。

客场对阵拉登堡，我说，星期六。

父亲没去看。我们输得很惨。

上十年级时，有一次，我上课走神被德语老师当场抓住。我在写诗歌，而他正好在讲诗歌。他告诫我：安心去写吧，可别在课堂上。接着又说：你就用德语写吧！这样我也能帮帮你。

我们约好午休时见面。我们坐在生物学系的一个人体骨架旁谈论起隐喻。他是我的第一位编辑，也是我在德国遇到的第一位认为我所做的事情值得鼓励的人。他也舍得为我花时间。

我先是从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翻译过来，然后在他的鼓励下，直接用德语写出了最初的诗句。他建议让全班来解读其中的一首诗。我要选用一个笔名，于是我整天寻思着这事。我们正在学习希尔德·多明和罗泽·奥斯伦德尔的诗。⁽¹⁾主题是逃亡和失去家乡。这就是说，我的诗很契合。为了提高我的口头表达能力，只要老师一提出问题，我就急不可待地举手回答。我的笔名是：斯坦·波斯尼。

这个故事到此结束。我把它讲过数百遍，听者总是会心一笑。我没说话。我全神贯注，比谈论别的话题时更为留心。我听到我们班的同学、我的朋友们谈论着一首诗，而这首诗就是我写的。

这天走在奥尔滕瑙大街回家的路上，我突然产生了写一篇小说的想法。我要立刻把它写下来，于是坐在行人道上，把书包夹在两腿之间，摊开纸写起来。几个星期后，我让德语老师看看这篇小说。我们谈论着里面的一场场对话和一个个比喻。我们对面有一个架子，上面摆放着肾脏、心脏、肺叶和大脑，按照我不明白的顺序分门别类排列着，或许也没什么顺序。

在这篇小说里，父亲第一次坐在观众席上，观看着一场我们球队的篮球比赛。

母亲和父亲参加我的中学毕业舞会。我在一支小乐队里演奏吉他。乐队是由我们年级专门为这次舞会组织的。我们演奏歌唱祖国的乐曲。母亲眼含泪水。母亲这天病得很厉害，尽管如此，她还是来到了现场，她当然不愿错失这个机会。

也许母亲之所以眼含泪水，是因为她第一次在公众场合看到我有所作为。不是在家里。不是在一堆南斯拉夫人之中。也许她之所以眼含泪水，是因为我相信自己有某些能力，会干出一些事情，并且能获得赞许的掌声。因为我第一次西装革履。抑或更简单，因为她十分悲伤，我们的生存中自然而然地缺少了这样的东西。这一切真的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带来希望。

我们四个人坐在一张圆桌前。父母、里克和我。有三道菜。奥利吃完饭后甜点也加入我们的队伍中。我向父母介绍了他。

我和里克一边跳舞，一边望着父母，希望他们也会随着舞曲翩翩起舞。可他们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我和德多聊了聊，大家怎样和德多聊我就怎样和他聊：我说话，他清清嗓子，一声不吭。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聊天，但当时我们都还不知道。

我和埃米尔聊了聊。埃米尔要去一家养老院服务，代替服兵役。

我说：你是在开玩笑吧？

他说：不是开玩笑。

我问他爷爷身体怎样。

他说：还行吧。

我和拉希姆聊了聊。他打算去读斯拉夫语文学。学俄语，去俄国旅行。学波兰语，去波兰旅行。我们短暂地梦想着我们也许可以合写一本书，有关所有我们可能会去实现的旅行。

不知什么时候，父母离开了，我没注意到。他们第二天一早说，他们不愿意打扰我。六个月后，对他们来说，德国这一章彻底画上了句号。

(1) Hilde Domin (1909—2006)，德国抒情诗人；Rose Ausländer (1901—1988)，犹太诗人，用德语和英语写作。

文学黏合剂

1998年，父母不得不离开这个国度。时至今日，海德堡仍是他们所钟爱的城市之一，因为在他们的想象中，要是他们有可能过上一种正常的生活，海德堡似乎就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地方。这个世界充满南斯拉夫的碎片，就像他们或者我一样。流亡者的孩子们早就有了自己的孩子，他们是瑞典人，或者新西兰人，或者土耳其人。我是一个自私的碎片。我更多关心的是自己，而不是家庭和团聚。

文学是一种力量微弱的黏合剂。我写这本书时也意识到这一点。我要唤起那完美无缺的东西；我要在那支离破碎的事物之间架起桥梁；我要描写那动荡岁月前后的生存状态。可实际上，我忘记了一个个生日，也没能应邀去参加一次次婚礼。我要沉思良久，才能说出表妹们的孩子叫什么名字。在外婆外公的坟墓上，我从来没点过一根蜡烛。

我疏远了我的家庭，但没有把责任推卸给那场战争和遥远的距离。我要让一个个故事行动起来，跨越我们之间的一切障碍。

其实，我能书写和愿意书写这些故事，并非由于一条条边界，而是得益于穿透它们的东西，得益于一些并非闭关自守，而愿意倾听的人。

1998年，我没有被遣返，因为那个移民局办事员对我并未完全公事公办。他倾听了我说的话。当我说到我多么喜欢在海德堡上大学时，他听得很专注。他核查了我的种种选项。“把你的入学许可拿来让我看看，”他说，“然后我们再考虑之后怎么办。”

我获准继续留在德国。起先，只要我上大学就能待在这里。之后我需要得到一个与我的学业紧密相关的工作。我想成为作家。这就是说，我必须出具证明，文学与作家息息相关。接下来还需要证明，作家真的是一个职业。最终要证明的是，这个职业可以养活一个成年人。

莱比锡移民局一位女办事员直言不讳地向我说明，自由职业艺术家，尤其是作家和小丑，几乎不可能持续地养家糊口。为了表达对这些信息的谢意，第二次见面时，我给她带了一篇短篇小说。它刊登在一本文学杂志上，为此我得到了45欧元稿酬。

她说，她不能接受任何礼物。

我问：“或许你愿意买它看看？”

她说：“我不怎么读书。”

我说：“没关系，我也一样。”

她满怀同情地注视着我。之所以这样，或许因为我把这篇小说印在了背面已经有字的纸上。然后她还是接受了，但分文未付。“合同，”她说，“你把合同拿给我看看。法律需要证据，要证明有人愿意为你所做的事向你支付报酬。报酬越多越好。”

一个月后，我为第一部小说签订了合同。我打电话给女办事员，向她通报了约定的稿酬数额。她笑了。

我说：“你现在这样笑会让人心里不好受。”

她说：“或许这是一个月的稿酬？”

“如果大家都买这本书的话，那我就会很有钱了！”我说。

“移民法，”她说，“可不认如果啊。”停了一会儿她接着说，“啊，你顺便把它带过来让我瞧瞧吧。”

就是这声“啊”！几个星期后，我可以去取签证了。

居留许可

在作家这个自由职业以及相关活动结束后自动失效。

除此之外，我不能够干任何别的工作。这也正中我意。我本来也不想干任何别的工作。

奥利亚，来自克拉伊纳⁽¹⁾的奥利亚，奥利亚，来自施瓦茨海德、一个爱讲笑话的人，在克罗地亚克宁县附近的一片树林里，一天内失去了两个兄弟。他自己幸运地活了下来。

我很少与生活在海德堡的南斯拉夫人谈论我们断裂的人生经历。我和德多见过多少次面啊！有一次，他只是提了提在埋着地雷的田野上开拖拉机的事，对逃过劫难的事一笑置之。有些人则压根儿什么都不说。这两种情形已然足矣。

德国是话题。当下是话题。如愿以偿的事。也有一些伤害。一些屈辱。讲述会让那些糟糕透顶的事情变得更荒诞，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变得可以忍受。或许吧，我对此知之甚少，我很少有切身的感受。我们积累着被歧视的经历，如同徒步旅行者收集徒步戳记一样。只是在我们的路途终点，没有可以遮风避雨的歇脚处，没有圣母像，也无法眺望一座可爱的德国山崖，只有种族主义者肆无忌惮地挥舞着托尔的锤子⁽²⁾，只有咽进肚子里的愤怒和对煎熬的未来的惶恐不安。

绝大多数人更随大流，但我不一样。在巴尔干半岛或库尔普法尔茨都是如此。我可以忍受昔日战争的暴力场景。在德国，没人打我嘴巴。奥尔滕瑙大街看上去一如既往。在31路车终点站如约迎接里克。有一次，我把她领到树林里，让她看看平日我独自看书的地方。我读书。学习。在吉他上弹奏巴赫，也练习甩头摇滚乐。有时候，我干脆久久地闭上眼睛，去想象另一个自己。

不知什么时候，来自波黑比耶利纳的伊内斯和来自波兰别拉瓦的沃伊泰克走到了一起，结了婚。他们想要孩子，打算给他们取国际化的名字，但起初未能如愿。医生说：沃伊泰克，你大麻抽得太多，酒喝得太多，你的精子太少，而且质量太差，所以总是要不上孩子。

于是，沃伊泰克去疗养。在奥登林山。我们说，他是那里唯一一个不到60岁的病人。我去看望他。乘火车，然后坐汽车，背包里装了一公斤杏子。在我走进他的疗养病房那天，沃伊泰克已经连续三个星期没喝过一滴酒，连续两个星期没吸过大麻了。

他看到我很是惊讶。我们的关系并不那么亲密，但还算好。他很兴奋。看到杏子也很高兴：“这杏子长得就跟个女同性恋似的，太棒了！”

我们去散步。两人吃掉了一公斤杏子。聊来聊去。聊到南方水果，聊到穿白外套的护理女工，聊到阿拉尔加油站。“伙伴们想念我吗？”

“谁会想念你呢？”我说，“你走了，大家都很高兴。”

沃伊泰克边笑边说：“你知道吗，浑蛋。你是个好西里西亚人。有点心软，但是我们

还能忍受你。”

“沃伊泰克，我压根儿就不想当西里西亚人。”

“浑蛋，我压根儿就没问你愿不愿意。”

沃伊泰克、皮耶罗、拉希姆、里克、奥利和埃米尔。在埃默茨格伦德和海德堡，正是和他们在一起，也正是因为有他们，我才没有迷失方向。在这段日子里，在这个地方，我们干成了一些事，尽管常常只是瞎折腾罢了。

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我的德国朋友中，有搞Mülltrennung（垃圾分类）的、有做Mohnkuchen（罂粟蛋糕）的，有在奥登林山树林里采Maronenröhrling（蘑菇）的——为了让这句话听起来更押韵，有一瞬间我寻思着，哪种蘑菇是以M开头的——有争夺监护权的，有负债的，也有星期天看《犯罪现场》连续剧的。在昔日的南斯拉夫人中，这一切或多或少大同小异，只是少些罂粟，多些李子。我当然也可以找到一个看过并喜欢《犯罪现场》连续剧的南斯拉夫人，但现在不也挺好的吗？

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写作中，我要总结我那段不协调的经历。有一次，我和阿拉尔伙伴们一起，带着一只皮筏子进入一个露天游泳池，为了夜里能在那里划皮筏子。第二天早上，奥利和他父亲带着我一起去逛一个中世纪市场。我们在那里观看了钉马掌。

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其中一句话是“我的反抗就是适应”。不是适应一种在德国作为移民必须要怎样的期待，但也不是自觉地与之对抗。我反抗的是对出身起源的神化和民族认同的幻象。我赞成其中的归属感。无论我在哪里，无论我愿意待在哪儿，那里都应该让人有归属感。找到最低限度的共同点，这就足够了。

太奶奶和太爷爷出生于奥斯科鲁沙，不是移民。与从西里西亚来的沃伊泰克的父母不同。皮耶罗的父母来自阿普利亚。里克和父母来自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卡德里耶和法提赫来自土耳其。埃米尔的爷爷来自但泽。德多来自一个地雷陷阱的噩梦中。

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这其中，不知怎的，我又不得不沿着这条曲折坎坷的道路走向奥斯科鲁沙。

我回想起九年前在那里告别的情景。奶奶和我已经穿好衣服站在加夫里洛家的客厅里。这时，加夫里洛老人突然又想起最后一件事。他跑出屋子，抓着一头猪崽回来了。他自豪地高举着这个小家伙，猪崽也为加夫里洛把它高高举起而感到自豪。加夫里洛要把它送给我。我拒绝了，于是他问我是不是更喜欢要一只鸡。“你把它带去让施瓦本人看看！”他说。我相信他是在开玩笑。尽管如此，我还是严肃而伤感地回应道：“我要过海关，既不许带猪崽，也不许带小鸡。”

加夫里洛并不觉得这是玩笑，他大声说：“可以的，没什么可以不可以。我们只需要好好想一想，我们应该怎么办。”

(1) 在克罗地亚寻求从南斯拉夫独立的过程中，“塞尔维亚克拉伊纳共和国”曾短暂存在，首府为克宁县。

(2) 托尔是早期日耳曼民族共有的神，他的锤子是雷霆的象征。

父亲和蛇

我在家人的聊天群里写道：

我想再去一次奥斯克鲁沙。

你们想不想一起去？

父亲写道：

想去。

妈妈呢？

也想去。

你是什么时候去那儿的？

2009年

在公墓里，有一条poskok一直缠绕在我们头顶的树上。

我相信它早就不在那儿了。

☺ ☺ ☺

我憎恶这些畜生。

你有一次在鸡舍里打死了一条poskok。

肯定没有。

在鸡舍里？ poskok？

这事我记得。我好像跑开了。

我记得清清楚楚。

我可以给你打电话吗？

我现在没时间。

尽管如此，父亲还是打来电话。“在奥斯克鲁沙有一座很高的山，”他没有跟我打招呼，开门见山地说，“你知道吗？”

“维亚拉茨山。奶奶总是一再提起它。”

“山顶下遍布火岩。我13岁或者14岁时第一次独自爬了上去。山坡陡峭，上面到处都是红色石块，一望无际。我抱起一块块石头往下扔，看着它们滚滚落下，又不断地撞飞其他石块。我成了一个制造石崩的上帝，萨沙。”

“你干吗说这些呢？”

“你就好好听我说吧！一个大石块引起了我的注意，深红色。它翘起来，松动了。要

是能把这家伙滚下去，那才叫棒呢！我找到一根粗树枝。我使劲撬，用力压。石头动了起来，慢慢地移动着，然后哗啦一声滚下去了。我随之一下子失去了平衡，只见石坑里有一堆蛇！一窝蝥蛇！你瞧，一个个仰起的脑袋！一双双盯着你的眼睛！无不充满恐惧和愤怒，躯体乱七八糟地缠成一团。我迎着它们扑下去，一条条舌头朝我舔来。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猛地抬起身子。我一下子飞起来了。仿佛有什么东西抓住我的脖子，背着我越过了石坑！着陆，下落。像什么东西一样从山坡上滚下来。我奔跑着，一路穿过树林，顺着山坡朝家奔去。奶奶正在切洋葱，她吃了一惊，我浑身上下脏得不成样子。

“‘蝥蛇！’我大声喊道，‘一大窝蝥蛇！’

“‘咬到你了吗？’

“‘不知道，没咬到吧。’

“‘有一条蛇跳到你的脖子上，把毒液喷射到你的眼睛里。’奶奶一边低声说，一边咬着洋葱。”

父亲有高血压。和爷爷一样。我将来也会这样。我在话筒里听到他气喘吁吁。

“如果那不是你，和那条蛇，那这事我是从哪儿知道的呢？”

父亲记不起来了。我担心他会说：也许这只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的。然而，那一幅幅画面依然历历在目：先是两个人跳舞，然后一个人与蛇共舞。

“恐惧直到今天还挥之不去，”父亲说，“我们什么时候上那儿去？”

奶奶吃桃子，不给那个掘墓人任何东西

奶奶厌烦了等待爷爷。她先是穿上连衣裙，后来又换上裤子，这可不是去跳舞。她装好干粮，给自己装了一个桃子，还有玉米粥，以防万一，因为大家都喜欢喝玉米粥。

黎明时分，她踏上去维亚拉茨山的路，要去找丈夫。几个钟头后，人们在教堂前找到她，看到她正在吃桃子。

那个掘墓人发现了她。像所有的掘墓人一样，那个掘墓人也有身体缺陷。他右耳什么都听不见。因为他没右耳。他小时候右耳就掉了。至于为什么，谁也记不清是怎么回事。

他坐到奶奶跟前。他认识她，在这座城市里有谁不认识克里斯蒂娜·斯坦尼西奇呢？而她也认识他。因为你知道，当你到了生命尽头时，谁会将死人放入墓穴。她问，真见鬼，一个掘墓人在维亚拉茨山上找什么呢？

掘墓人首先得问问她这样说是什么意思。一半是因为他没听清楚，一半是内容上弄不明白。

奶奶让他吃点玉米粥。没人会对玉米粥说不。

“一座山，”她说，“在奥斯克鲁沙那儿。”

掘墓人不知道那座山究竟在哪儿，但他确信的是：这儿是他的山，他的梅格丹山，他的公墓，他的教堂。

“你说我的是什么意思呢？”他清了清嗓子又问道。奶奶从他的眼神里看到了某些像是激动和自豪的东西。而这从掘墓人瞪大的眼睛里闪现出的两种情绪，毫无疑问让奶奶认识到，她还没到达她想要去的地方。谁满怀激情地说起他为之自豪的事情，既抑制激情，又不损自豪，那他就没在说谎。

奶奶肯定猜到了，她走了一条错误的路。就像是在晨曦里，从梅格丹山上望向德里纳河，你会以为它不是一条河，而是一个非常好的念头，无与伦比的念头。世界上没有一条河看上去与之相似。

掘墓人问要不要送她回家。

“行吧，这样挺好。”

“去哪儿呢？”

奶奶可能想了想，或者她不用着急，因为她坐在那里一动不动，要先吃完桃子。

看样子，仿佛你听到头顶上翩翩起舞的响动

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谁在讲述呢？有人在书写：一个生活在维舍格勒、苏黎世和斯普利特的39岁男子。一个不惑之年的男子在汉堡的阳台上书写。那是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今天是个哪个季节？

没有任何一句话是万能的。如果说有这样一句话，一句万能的话，那它恐怕只能存在三秒钟。每隔三秒钟，就会有一句新的话被创造出来，它会影响整体的话语，并使那一句万能的话失去作用。那句万能的话三秒钟后就过时了，被持续不断地追求重新定位的欲望夺走了意义。重新定位！这句万能的话就此失效，彻底失效。

奥斯克鲁沙公墓里有一条蛇？果树上的蝰蛇？维也纳自然历史博物馆说，蝰蛇是一种剧毒爬行动物。于是，它不得不寻求改变。蜕皮，仿佛它要卸掉一个面具。也不再是poskok。它需要一个名字：约塞普·卡尔洛·贝内迪克特·冯·阿兴多夫。可别把这名字和那个浪漫诗人混淆了。⁽¹⁾

那么现在就说说阿兴多夫吧。它——那条蛇——不再仅仅是那棵果树和这个故事的一个装饰。也不再是围绕父亲而产生的一个母题链条，因为父亲与蝰蛇的遭遇仅仅发生在几行字里。（父亲挥起石块：强大、果敢和严厉。但是后来发生了战争，更加强大，诸如此类。）我已经厌倦了回忆的欺骗性，也逐渐厌倦了虚构的欺骗性。

大腿上的伤疤，为什么？

父亲最后在德国的时候多么瘦弱啊。

不要让伤口分散自己的注意力。而要想象那条蛇。别把它想象成诗人：男式外套、高领、宽翻领、髭须。他已经在那里。静静地叹息着，带着古怪的气息，在树冠上，陶醉于自我。

快乐的同伴们，
云雀、泉水和树林，
它们又在鸣唱和邀约：
小伙子，还不快快来呀？⁽²⁾

比起树上那条蛇来，我更喜欢树上这位诗人。阿兴多夫和各种植物关系密切，相处融洽。这位诗人沉浸在与水果的诗意对话中，为什么不呢？一个中年西里西亚人目不转睛地观望着，呼唤着一行行纷纷落下的诗句：

突然间那里出现动静——
这会意味着什么？
看样子，仿佛你听到头顶上
翩翩起舞的响动。

一幅什么样的画面呈现在眼前？一只鸟儿的画面？阿兴多夫在等待猎物？蝰蛇们在树上等待猎物？维也纳自然历史博物馆说：不是。似乎有一只鸟儿在一个树洞里筑巢。蝰蛇其实只想沐浴阳光，偶然注意到它而已。是的，当它守在那里时……

这鸟儿也需要一个名字，最好是一个会说话的名字。地啄木怎么样？出类拔萃的鸟儿，2007年的年度之鸟。啄木鸟科。候鸟，因此有可能命运多舛，像所有的移民一样，不是英勇献身，就是命运悲惨。也就是说，约塞普·冯·阿兴多夫暗中守候的就是正在孵化的地啄木。等一等。地啄木真的在南欧筑巢吗？它们会在这个时候，也就是晚春筑巢吗？你当然可以这样说，一个来自布加勒斯特的鸟类学家答道。

地啄木不会来的。阿兴多夫，也就是那条蛇只会徒劳等待。艾兴多夫，也就是那位诗人对此会感到有点悲伤。这也没什么，浪漫诗人可以有点伤感，这样他们才能写出更美好的诗句来。

我要读更多艾兴多夫的诗。我打算一个星期什么都不做，只读艾兴多夫的诗和看《焦点》周刊的网页新闻。第一天早上，我在床上读了三首漫游者之歌。我做早餐，用破壁机打碎混合麦片颗粒。我一边打磨，一边朗诵：

在一道清凉的深谷里
水磨在那里转动，
我最亲爱的就住在那里
如今却不见了踪影。

早餐过后，我给孩子准备好他要折腾的玩具。我收拾好餐桌，把衣服塞进洗衣机里，给自己煮了一壶咖啡，在阳台上读起艾兴多夫的诗。两个钟头之久，低声，光着膀子，或者——只要有一首令我心醉神迷——大声朗读。退休的邻居们听到朗读的声音，他们从阳台上看到一个来自巴尔干半岛的人光着膀子在为他们朗读艾兴多夫的诗：

窃窃私语的椴树梢，
飞向远方的小鸟儿，
静谧群峰下的山泉，
告诉我吧，我的家乡在哪儿？

我大声地朗诵着，然后晾起洗好的衣服。

我又给自己煮了一壶咖啡，接着把这首诗翻译成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诗名为《回忆》。我打电话给奶奶，给她朗读这首诗。她说我是蠢驴，然后挂上了电话。

这段日子里，我只上了一次《焦点》周刊的网页，便立刻决定不在阅读艾兴多夫时再读它的新闻，因为你不会用香草冰激凌配淡而无味的冰鸡汤，这样会令人倒胃口。

星期二，我读了《一个无用人的生涯》。我有时记点儿笔记。托儿所出现了两起寄生虫事件。孩子的粪便检查过了——寄生虫不在那里。我和父母通电话。他们很快得离开克罗地亚三个月。重新办理一道又一道官方手续。又一次陷入忐忑不安的迷茫。没有医疗保险。又是这句话：“我们不再年轻了。”

星期三，我用整天的时间在易北河畔读了30到40首诗歌，订了几箱饮料。两箱气泡水，一箱不带气泡。艾兴多夫躺在沙地上沐浴着阳光。

孩子今天留在我身边，因为寄生虫事件，我不想把他送到托儿所去。我读艾兴多夫传记。孩子在沙地上修建公路。孩子建造的一条条公路通向医院、警察局、幼儿园以及许多工厂和建筑工地。

孩子说：“爸爸，我们托儿所里新来了一个女老师。”

我用玩具铲挖了一个坑，把艾兴多夫的诗歌埋到沙坑里。我一整天什么都没吃。我喝了两壶咖啡。

我无法入睡。一切画面都聚集在一起。那条蛇的舌头，那个诗人的语言。奶奶不再只是失去了一段又一段记忆，也失去了语言和意志。奶奶变成了一个个空白——不完整的句子和失去的记忆，而我则在这里以仿造的形式填补着这些空白。

我穿上衣服，漫步走过小区。我漫步走过静静的夜晚。这时，月亮如此无声无息、蹑手蹑脚地爬了出来。我就这样漫步下去。凌晨3点了，我开始渴望云雀欢唱。我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中间，远远近近，一个人影也看不到。

噢，神奇的夜晚歌声：
条条河流从大地远方流淌，
树林里回响着轻轻的战栗——
你让我思绪纷乱，
我在这里迷茫地歌唱
宛若梦境里一声呼唤。

我在这里迷茫地歌唱。去睡觉吧，蠢驴。

在那无与伦比的肖像上，艾兴多夫环顾四周，闪亮的衣领，深色的大衣，满头厚实的秀发，留着髭须，戴着小金链。他看上去像一个毒梟或者一位爵士乐演奏家。我在这里迷茫地歌唱。

我走回家，在这个夜晚开始描写艾兴多夫身上让我感兴趣的东西。我把这个写作计划称为奶奶离开之前的旅行散心演练。那么多的东西令他陶醉，我觉得很惬意。夜晚、森林、老鹰、狩猎，一个名叫路易斯的女子，另一个名叫韦努斯的女子。除此之外，还有云雀、萨尔河，又是云雀，全是云雀，秋天和春天，啊，所有的季节和黎明，清晨与夜晚，无不令人赏心悦目。他不是简单地说出“早晨好”，而是用这样的语言：

清晨啊，你是我的快乐！
在静静的时刻，我登上
远方的高山之巅，
从心灵深处祝福你啊，德国！

我喜欢艾兴多夫赞美这个世界的方式。他多么友善地迎着它而去。专心致志地表现它，包括其中蕴含的神秘的东西。他多么全心全意地投身大自然。他多么明快迷人地抒发出这一切。

我喜欢他的怪癖，感动于他的生平。让我深受感动的是，他是个在办公室里驱赶桌上爬来爬去的昆虫的小公务员，内心却承载着对远方深切的渴望。

在文件、昏暗的墙壁之间
生存辛劳的责任
缚住这个渴望自由的人，
那些遭受伤害的缪斯

从柜子和文件堆里
嘲笑小公务员的面孔。

我不用忍受这么多的劳累。

星期五，我还要读更多的诗。

“你在干什么呢？”我儿子问。

“我在工作。”

“别人可不是这样工作的啊。”

“他们怎样工作呢？”

“比如说，在塔吊上。”

地啄木是一种在树洞里孵化后代的鸟。只有地啄木才能唱出地啄木的歌声。地啄木在繁衍后代时最喜欢大声歌唱。它的歌声是由8到15个听起来不太圆润的wied或者wöd音素组成的。它发出警告时会唱出teck或者töpp音素。

奶奶管我叫蠢驴和太阳。

奶奶穿着拖鞋睡觉。

出身，来历，没有什么英雄故事。

星期六早上全家去文德兰郊游前，我坐在汉堡的这个地方，一边押头韵写诗，一边引用艾兴多夫的诗句：噢，你这个安静热情的幸运儿！

以自信对抗外力控制（在语言中也一样）。家庭、啄木鸟、艾兴多夫、我儿子、推特、维舍格勒人、格林兄弟、电脑游戏、格林字典。讲述一个故事的可能性是无穷无尽的。你在这里遇到最美妙的故事。还有：你不是忘记了什么吗？你总是会遗忘一些东西。

(1) 指浪漫主义诗人约瑟夫·冯·艾兴多夫（Joseph von Eichendorff），原文中蛇的名字是Ajhendorf，是对艾兴多夫的戏仿。

(2) 本章中引用的艾兴多夫诗歌均出自《艾兴多夫诗歌全集》，哈特维希·舒尔茨编，德国经典作家出版社，法兰克福，1987年。——作者原注

奶奶和生日

奶奶昨天过生日，我忘记了她的生日。我打电话去，至少事后表示祝贺。她和我打招呼，叫的是我父亲的名字。要我帮她找到眼镜。

我说：“眼镜就架在你的脑袋上。”一句玩笑，但奶奶笑得很尴尬，因为眼镜真的就架在她脑袋上。她说了句谢谢，让我别挂电话。她呼唤着她姐姐：“扎戈尔卡！”我听到她在屋子里忙来忙去。接着一扇门打开又关上。过了一阵子，因为她一直没过来，我就挂了电话。

过后我突然想起来我打电话的目的。我又拨号码。奶奶整整一天都不接电话。

奶奶看到姐姐在后院里。扎戈尔卡跳来跳去，说说笑笑，仿佛她在追赶一个个美好的梦幻。奶奶从窗口呼喊着她，叫她上来。“扎戈尔卡！”她呼喊着她，“亲爱的姐姐！”

扎戈尔卡没听她的呼喊，或者没兴趣听她的呼喊。她原地转着圈子，一圈又一圈。奶奶下楼了。后来，当她在超市里找不到出口时，有一个人过来跟她搭话。

奶奶寻找出口。

奶奶寻找她的梳子。

奶奶寻找电费单。

奶奶寻找姐姐和丈夫。

奶奶拿到了邻居的房门钥匙——在邻居度假期间，她帮人家浇花。一个大胆的选择，可所有的花草都活下来了。当然，奶奶也吃掉了在邻居家里可以找到的所有能吃的东西。邻居说，没关系。我奶奶今天78岁零一天。

青年接力棒

举办大型活动绝对是这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强项：所有隆重的节日、阅兵式和欢迎会，所有爱人民、爱党和爱总统的盛大演出活动——全都是些好事，让你实在无可挑剔，场面五彩缤纷，气势磅礴，还有巨大的军帽和勋章。当然，所有活动都十分冗长，但是你要向谁去抱怨呢？

5月25日青年节是南斯拉夫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在这天，人们身着庄重的传统服装进行接力赛跑。一群经过挑选的青年女子和男子先后拿着一根木棒穿越全国各地，在最后时刻将木棒交到铁托手里。大多时候交给他的还有一些象征性的东西，比如火炬、红星或者什么农产品。自从1945年解放以来，接力赛跑年年举行。初衷是向铁托表达敬意，直到铁托豁达地说：“不，你们最好向青年人表示敬意。”铁托死后，人们把接力棒最终交到另一位总统手里。他的名字今天已经没人记得了。

每个参加接力赛跑的人心里都明白他应该怎样做。出发和抵达时间，赛跑路线，休息场地，一切都按规定进行。最重要的规定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让这玩意儿掉在地上！一旦掉在地上，那会发生什么事，谁也说不清楚，因为这种情况从来没发生过。99年干旱？恐龙回到南斯拉夫？或者资本主义？某些无比重大的事情似乎是绝对可以想象的。

在接力赛选手抵达某个地方前，有音乐和讲话；当接力棒就地等待着接下来的旅程时，又有音乐和讲话；当它被捧着继续踏上旅程后，还有音乐和讲话。

接力棒晚上抵达一个城市时，就在那座城市里一个安全的地方过夜。有一次，接力棒被安排在维舍格勒过夜。父亲是筹划委员会成员，负责接力棒安全过夜。接力棒住在“文化之家”。年轻的同志们在“文化之家”门前守了一夜。没发生什么事情。

有一年，我自己成了接力赛选手。那是1986年或1987年的事。当时我以为自己能入选是因为在学校里表现好，写过一些关于英勇献身的游击队员的诗歌。如今我才知道，那是父亲有意安排的。

我明白这项活动的意义。它就像我对做错什么的恐惧那样庞大。在接力棒抵达前夜，我梦见了一根肥皂似的木棒，从我指头间滑落出去，在我脚边变成了一条长着髭须的鱼。

吃早饭时，父亲提醒我要担当的角色：从上一位同志手里接过接力棒，像举着一个奖杯那样举过头顶，再高高兴兴地继续传递接力棒。他问我是否一切都明白了，我举手敬了个少先队队礼。

他没提到最重要的事，因为他不提我们也都心知肚明：无论如何都不能让接力棒掉在地上！

接力棒应该在下午1点抵达体育中心。三个钟头前，我就到了那里。11点，伴随着少先队员正式列队入场，配套活动开始了。我领着一队人穿过热烈的掌声。我们被领到一个足球门前，在那里要站着等待两个钟头。

这件事到底发生在哪一年呢？我在谷歌上查了一下，最后一次传递接力棒是在1987年。能够成为最后的接力棒手之一具有象征性的意义，这似乎让我很开心。但我也在网上发现，1987年的接力棒是用玻璃和塑料做的，与我对木头棒的记忆迥然不同。它有一个壳体，里面插着八根白色柱子，顶端有八个红点，据说象征着南斯拉夫八个民族的血液。人

们以今天的眼光不难看出，它预示着这些民族之间不久将斗争至血流成河的惨景。

在我的记忆中，接力棒是一个上面有五角星的木棒。所以，或许不是1987年？1986年的接力棒同样不是木头的。不管是1986年还是1987年，我戴着少先队队帽，等待着那个统一友爱的象征。不知什么时候，我开始忍不住想撒尿。我实在难以自制，怎么也憋不住，迫不及待地要撒尿——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这样的事只是发生在孩子身上吗？难道在我的回忆里始终只有一个人禁不住想撒尿吗？我禁不住要撒尿，那样毫无理由，那样迫不及待，就在一群刚刚沐浴过的少先队员、喷了香水的官员以及为这个几乎自由的一天而兴高采烈的老师之中。我是铁托的少先队员！要有自我牺牲和献身精神。我是抵抗战士！我没放弃这个赋予我的位置。

突然间，全场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响起进行曲，一时人头攒动，场面一片混乱。接力棒终于到了，而我只是想着：现在千万别有人讲话。过后再讲话吧，同志们，我再也忍受不了了！真的没人讲话。这时，我看到她，也看到他，一个穿着运动衫、身强力壮的年轻男子。他穿过手持鲜花夹道欢迎的孩子们朝我跑来。他神采奕奕，满头大汗，看上去健康活泼。他看上去棒极了；如果说他是从卢布尔雅那出发、手里拿着接力棒径直朝我跑过来的，我也不会感到惊讶。

他盯着我的眼睛。我们是相差半代的人，可他手里那玩意儿又把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作为物体，作为意义的承载，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是伴随着接力棒成长起来的。我们熟悉它的历史。此时此刻，我们成了它的主人公。这是一项荣耀，我们感到自豪，我们也感到恐惧。这个国家的传记就建立在这三种情感之上。它们奖赏你，它们鼓励你，它们也使你变得麻木，一切是同时发生的。

在交接接力棒时，自豪感胜过一切。我也从对面的人的眼神里看出了这种感情。啊哈，什么呀，我现在只是这样说说而已。我什么也没看到，我一心一意盯着接力棒，只是为了把它安然无恙地接过来。

接力棒木面很光滑，热乎乎的。我把接力棒举过头顶，宛若一个胜利者举着奖杯。我不能让接力棒掉在地上。我没有拿着它跑开，只是迅速地把它递给身后那个姑娘，然后冲出队列，要去静静的、缓缓流动的德里纳河边撒尿。

我们从来没回过家

我在家人的聊天群里写道：

嗨

有没有一张我捧着接力棒的照片？

母亲写道：

有是有

可我不知道我们还能不能找到它

或许在斯普利特

我们从来没回过家

接力棒是木头做的吗？

我记不起来了，或许吧

1987年的接力棒是玻璃做的，或者别的什么

但在我的记忆中是木制的

你大概上三年级

我问问爸爸

他当时在组织委员会里。他应该知道怎么回事

好的

他说，你当接力棒手是1986年的事

那个接力棒是木制的

他非常肯定，因为这接力棒来自瓦尔达公司

这是在他们公司做的？

是的，所以他知道是这么回事

通常都有一些地方举行的接力赛

是地方上的公司、协会或者别的什么组织举办的

它们也沿着主接力棒的路线进行

只不过是地方上增加的

等一等

瓦尔达做了一个

阿尔霍斯也做了一个

所以我举过的，不是那个传递到贝尔格莱德的青年接力棒，不是那个真的对吗？

绝对不是

母亲给我寄来了那张有我和那个假接力棒的照片。我是一个瘦长而笨拙的家伙，手里高高地举着一根带有五角星的木棒。在我的少先队队帽上同样有个红色多边形。我的神色：一副饱受煎熬的样子。

我让儿子看看这张照片：“这是谁？”我问。

儿子宁愿玩他的手工坊玩具。

我置身于过去之中。它甚至不必是事实。我没让青年接力棒掉在地上，那个用木头精心制作的接力棒，变成了玻璃制成的意识形态。那个真的。在青年节这天，手捧着接力棒，我感到无比幸福。

穆罕默德和梅耶玛

在德国，内娜·梅耶玛只用红芸豆给我们看过一次未来。那是1998年冬天，一个冰天雪地的日子。几个星期后，父母就不得不离开德国。家里的气氛格外紧张。父母面临着去美国重新开始，外婆外公时时刻刻忐忑不安地等待着自己被遣返的通知，大表弟上学遇到麻烦。我正好从家里搬出去了，回家来看看（很少回家）。

我们一家人聚集在客厅里。内娜在地毯上摊开一块布，坐在前面抽着烟。一个干瘦的女人盘腿端坐。上身晃来晃去。我把烟缸递给她。

大表弟排在第一个。内娜根本就没看芸豆，而是直截了当地说：如果你不好好学习，看也是白看，有什么用呢？

她为自己的丈夫撒出芸豆，然后一声不响地拥抱住他。她没说芸豆图像预示着什么。

她同样也没对我母亲说什么。这些芸豆坏了，她大声说着把它们从窗户扔出去。然后，她又让我去雪地里把芸豆捡回来。当我回到客厅时，只见母亲脸色苍白，父亲低声劝慰着她。

内娜为我撒出芸豆说：“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一个比你大的女人会爱上你吗？”

我记得。

内娜说：“你就把这事忘掉吧。”

我说：“里克比我年龄大。”

内娜说：“我说过了。”

告别时，内娜告诫我，今天别坐公交车。我没听，我坐的公交车果然陷在雪地里动弹不得。

内娜·梅耶玛和外公后来也被遣送了回去。据说他们的祖国需要重新建设的劳动力。他们不能回维舍格勒。他们随女儿，也就是我姨妈卢拉去了扎维多维契⁽¹⁾，在她家附近租了一个很小的房子。他们在那里谁也不认识，但这种情况很快就会改变，至少对外公来说是如此。他刷墙，购物，照看小孩，胡子刮得干干净净。他一点儿都没变，一如既往地和蔼友善。波斯纳河里有鳟鱼。他去钓鱼，晚上早早就睡觉了。

内娜坐在窗前，神情越来越凝重。有什么东西扼住她的喉咙。她等着丈夫回家。不知什么时候，她央求他别这样经常出去了。他答应了，而且说到做到。

我去看望过他们一次，在那里待了一个星期。内娜病了，丈夫和女儿照顾她。我多么想和外公一起去钓鱼，但在这种情况下难以启齿。我自己什么都没钓到。我和内娜看了一部电影。我们在电视机前睡着了。

内娜呼吸困难。呼吸道出了问题。肺出了问题。医生试试这个，又试试那个，千方百计想挽救她。内娜的呼吸越来越困难。内娜走了。呼吸系统出了问题。

外婆去世后，外公一蹶不振，身子骨一天不如一天。他几乎不吃饭，也很少下床。他让大家别打扰他。他的孩子们却不想这样。卢拉姨妈定时拽他出门呼吸新鲜空气，推着他上街。一天又一天，从不间断。母亲去看望他，跟他说话，帮他刮胡子。她们不想让他感到孤独，也不想让他独自与悲伤为伴。

舅舅想到了那条河。他把外公接到萨尔茨堡，去萨尔察赫河边⁽²⁾。舅舅钓鱼，老父亲先是坐在一旁观看，后来自己也想试试。他没法靠自己的力量把上钩的鱼拉上来。第二天早上，他几个星期以来第一次自己动手刮了胡子，而且又要去河边。几个星期后，当他回到家里时，他已经恢复过来了。

老天又赐给了外公穆罕默德五年岁月。直到离世，他一如既往去钓鱼，去帮助他人，乐此不疲。即使死亡临近也没能让他停下来。如果哪一天两腿不能承载起他的身体，他就等待着第二天到来。

2011年12月一个严寒彻骨的早上，外公刮完胡子，披上那件铁路工人大衣走进院子里。他想要为一位女邻居劈些柴火。他试了试，但身子太虚弱。邻居感谢了他，后来送来了鲜花。这时，他发着高烧躺在床上。卢拉姨妈守在他身边。2011年12月一个严寒刺骨的日子，外公助人为乐地走了，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地走了。

⁽¹⁾ 现为波黑城市，在波黑的两个政治实体中属于波黑联邦。

⁽²⁾ 流经奥地利与德国的河流。

奶奶和牙刷

奶奶不再经常刷牙了。在她为数不多的开怀大笑的瞬间，牙齿上露出一片片黄斑和残余饭渣。她肯定忘记了刷牙。她记不起来什么时候该刷牙，记不起来刷牙会让人感到清爽。如果有人提醒她刷牙，她也会去做。

奶奶的牙刷曾是蓝色的，如今用的是一支浅蓝色的。牙刷毛已经向外弯曲得不成样子。我们带来了一把新牙刷，把旧的扔进垃圾筐里。她又把它捡出来，而把新的扔进垃圾筐里。谁也不能随意决定她的生活，她说。

我们承认她说得没错。但是，你也不能把我们给你买的东西随便这样扔进垃圾筐里呀，我们说。

她承认我们说得也没错，然后把新牙刷从窗子里扔出去。

另一次，我们试图说明为什么这样做。她一边急切地倾听着，一边说：“要么用我的牙刷，要么就不刷牙。”

我们不放弃。有人想出一个主意，用一把几乎完全一样的新牙刷换掉旧的。浅蓝色换浅蓝色。颜色区别让人几乎看不出来，只是牙刷把稍长些。我们给牙刷上抹一些牙膏，让它不容易显出是新的。唯独直立的牙刷毛比旧牙刷要显眼。我们觉得奶奶眼睛不好使，不会看出来。我们把旧牙刷藏起来。如果调换没引起奶奶的注意，我们就扔掉旧的。

调换立刻就被奶奶发现了。她愤怒地要把新牙刷折断，塑料把都掰弯了，但牙刷完好无损。她执意要讨回自己的牙刷。好吧。我们说，至少她还是会去刷牙。我们在浴室里和灶台上给她贴上写着“刷牙！”字样的标志。

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想要控制她。我们清理了奶奶的柜子和抽屉，扔掉了一些毫无用处的东西。这同样让她火冒三丈，因为对她来说，那些恰恰不是什么毫无用处的东西。我们绝大多数时候都不在这里，当我们来到这里时，我们就想要感觉自己有用处。我们总是几天后又离开，而奶奶又独自一人。我们想向自己证明，她可以依赖我们。

拉达是住在三楼的女邻居，也是奶奶多年的好朋友。她尽心尽力帮助奶奶。煮饭洗衣，给她注射胰岛素，陪她聊天。奶奶依然自己打扫卫生，谁都不能背着她清洁浴室。

拉达会不时地过来看看。她也无能为力，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奶奶一次又一次陷入对过去的回忆。一旦她又出现这样的情况，邻居为了随时听到对面的动静，会让自家的房门一直敞开。

2018年春天，奶奶因为肺炎休养期间，那把牙刷不见了，再也找不到了。父母买来一把新的。奶奶也不在乎了。她有时开怀大笑，牙齿便露出一片片黄斑。她不再打扫房间卫生，因为她的身子变得太虚弱，或者她忘记打扫了，或者她对打扫卫生再也不感兴趣了。她不再能自己洗澡。当奶奶久久不说话时，她耷拉着脑袋，下巴几乎贴到胸膛上。

她需要专人护理，最好是全天的。在维舍格勒找不到人，因为奶奶面对陌生人会变得很难相处。有一位女医生要给她量血压，她险些咬住人家的鼻子。

肺炎发展到十分严重的地步，奶奶住院期间，谁也说不出来大家心里在想什么。母亲和父亲从克罗地亚赶过来，伺候了她整整两个月。母亲硬撑着承担了大部分工作。

奶奶再也找不到她的手表了。

奶奶再也找不到家门了。

奶奶再也找不到丈夫了。

奶奶需要尿不湿。

母亲给她注射胰岛素、购物、打扫卫生、煮饭，自己却忘记吃饭。奶奶有时心里明白这个帮她洗澡和牵着她手的女人是谁。她爱抚地摸摸她的脸庞。而有时她觉得受到了一个陌生女人的打扰。奶奶要自己梳头，可她找不到梳子了。

当她不愿意做梦时，父亲夜里就守在她身旁。母亲白天领着她去散步。母亲满怀疑虑地面对这座城市，母亲满怀疑虑地在这座城里忙来忙去。小心翼翼。因为她不再认识许多人。也因为她认识一些人。

奶奶恢复了健康。她要洗地毯。她一再重复这个愿望，直到父亲和母亲把地毯洗了。第二天，她要去山里看丈夫。第三天，她大发雷霆，因为有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站在她的厨房里，她不认识他们。母亲和父亲出去购物时，她吃了一板巧克力。当他们回到家里，她又要洗地毯。

也许有一列火车开过来

今天是2018年3月29日。清晨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尿骚味和樱花味。母亲为她的婆婆换了尿不湿，做好早餐看着她吃。她问：“你还需要什么吗？”

奶奶大声喊道：“我需要什么，我自个儿会去拿！”

母亲收拾好餐桌，洗完碗盘，换了身衣服。她要出门。这时，她发现婆婆跪在一个旅行箱前。

“你要去哪儿？”

“去我亲爱的姐姐那里。”

“德拉甘在哪儿？”

“谁是德拉甘？”

“你儿子啊。”

“我没儿子。”她寻思着，“我亲爱的姐姐在哪儿？扎戈尔卡在哪儿？”

母亲犹豫了一下。“我来帮你吧。”

母亲和奶奶收拾行李。她们装上外衣、衬衣和内衣。母亲添了一件冬大衣。“谁知道，你还会在这一生中奔波多久呢？”她说。然后两人几天来第一次笑出声来。她们装上一双双鞋、靴子和拖鞋。洗浴液和牙刷。奶奶还要带上笤帚和一升牛奶。这也不成问题。她们装满了三个棕色旅行箱。

旅行箱实在太重了。她们把其中两个留在了院子里。奶奶看上去为自己将要离开或到达十分高兴，无论去哪儿她都全然不在乎。她挽起儿媳的手臂。

母亲出生的房子坐落在那座桥附近，黄色的桥面已经年久失修，千疮百孔，凡是墙皮脱落的地方，砖头都裸露在外面。

“我们为什么停止不前呢？”奶奶问。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母亲说。

奶奶要穿过桥去，母亲不肯走。

母亲想去那所中学看看。她透过一扇扇窗户望去。在那儿的黑板前，她为学生们讲述了一些看起来毫无希望的理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那个体育馆看上去是新的。奇怪：一些新东西。完好无损的东西。

奶奶已经穿过街道，好像要去德里纳河边。母亲赶上她，把她领到市场去。她们到达那里后，奶奶说：“可是我们来得太晚了，买不到好奶酪了。”市场是个可怜巴巴的大杂烩，有来自中国的廉价商品和熏肉之类。市场旁的鞋匠依然是同一个人，弓着身子在小凳上坐了三百年。

“我们乘火车去？”奶奶问。母亲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几个月来，鲁扎夫河上的桥有坍塌危险，一直禁行，所以，她们必须绕行好一段路去火车站。旅行箱在柏油路上蹭来蹭去，有一个小轮子卡住了。人们观望着。在这里，人们总是会观望。

火车站是一片废墟。自从1978年以来，再也没火车在那里停过。汽车运输近几年来也停了。一个姑娘蜷缩在候车区角落里。那是一个小乞丐，名叫罗姆尼，睁着一双蓝色的眼睛。她一边撒尿，一边高兴地向两个女人挥手致意。

母亲用纸巾擦了擦长凳。奶奶坐下去。鸽子落在地上，翩翩起舞，随后又飞走了。

“天哪，怎么看上去是这般光景啊？”荨麻从窗洞里长出来。一只猫揉着迷糊的眼睛。

“就是这样的光景，”母亲说，“看上去就是这样的啊。”母亲不想坐下。她数着趴在墙上的蚂蚁，数到第107只，然后就停止不数了。

50多年以后，一幕幕图像浮现在母亲眼前：她站在铁道旁边，听到将要抵达的火车的鸣笛，等待自己的父亲归来。他已经出现在那儿，那件沉重的大衣，那张熏黑的脸庞。

她的童年就留在斜对面。一栋呈沙土色的楼房，毫无装饰，四棱四角，如同一座兵营。一群狗懒洋洋地躺在那里沐浴着晨曦。狗群的出现意味着衰落。一条晾衣绳上看不到衣服。到了楼梯间，她想要避免发出声响。为什么？照明不灵了。通往父母房子的门依然如故，只是更加破旧了。

敲门？

这不再是我们的家了。

一片破败不堪的惨景

一堆衰落悲哀的杂物

出去吧。奶奶还坐在长凳上。母亲打算带她走。奶奶不肯，要继续等火车。母亲更加坚决了，再也不会有火车开过来了。

当年的松香油厂的窗户几乎全都坏掉了。那里还有一个完好无损，位于顶层上，左边第三个。母亲捡起一块石头。奶奶也学着她的样子。鸟巢，老鼠。这里竟然成了动物的家园。

“现在来杯咖啡吧。”奶奶心满意足地说。

当年铁托大街的书店里灯光太昏暗。向来就是如此，总是如此。母亲终于决定要彻底改变这种状况。她要对这种昏暗表达不满，要说出来这书店多么不招人喜欢。书需要光明！她走进来，为孙子买了一本涂恐龙的色彩练习本。

当她的生命在那里陷入危险境地时，母亲毅然离开了维舍格勒。她现在回到这座城，找到的只是过夜之地，而不是安宁。她之所以还到这儿来，是因为婆婆需要她。在这里，她看到一片毫无生机的东西，一片破败不堪的东西，一片半途而废的东西；裙带关系四处泛滥，一切变得衰落颓废，到处笼罩着永恒的昏暗，这个世界永远停留在昨天。她心里只有憎恨。一天清晨，阿尔霍斯公司最后一任老板提着一只装满现金的塑料袋离开办公室，又两次折返，还要提走其余的袋子。他若无其事地从工人们身边走过，大家只能站在一台台缝纫机旁一声不吭。什么都没变，他们后来说。这座城市再也不会焕发出昔日的荣光。

奶奶又挽起母亲的手臂。她们走过体育中心。体育中心已经不复存在。电影人埃米尔·库斯图里卡早就把它夷为平地了。在河流交汇的沙嘴上，他让人建了一座名为安德里奇格勒^[1]的艺术小城，一个毫无想象力的拙劣之作，一个俗不可耐的幻想之地。这个破项目居然花去了1700万欧元。

奶奶说：“这不挺美吗。”

母亲说：“愚蠢透顶。”

母亲在间奏曲咖啡馆为婆婆要了一杯浓咖啡，自己要了一杯茶。她把一片柠檬放在一个小榨汁机里然后加入茶中。服务员和母亲说上了话。她应该是他多年前的政治老师？他看到老师时喜出望外。他们说说笑笑。真是没想到。母亲微笑着。当他又来到桌旁时，母亲对柠檬榨汁机赞不绝口。多实用啊。当服务员再次来到桌旁时，他给她带来了用厨房纸包裹起来的柠檬榨汁机。他要把柠檬榨汁机偷偷送给母亲。母亲不能接受。您就拿上吧，别推辞了。您一定要拿上，教授同志。母亲付了钱，拥抱了她的学生。母亲把小小的柠檬榨汁机收起来。

奶奶已经恢复了体力。母亲让她走在前面。奶奶回到家里。旅行箱还在院子里。她自己打开房门。忙乎了相当长时间，但她终于如愿以偿了。这是最重要的。

母亲在浴缸里放上水。奶奶喜欢水热。或许因为这样她会感觉到自己身体的存在，也因为相对于她那一段段躲闪的回忆，这是一种令她愉悦的变化，身体才是实实在在的存在。

母亲一边用海绵给她擦背，一边唱着歌。这首歌名叫《小蚂蚁》。一只蚂蚁消失在一个年轻女子的袖口里，一个男子观察着这样的情景，噢，我要是她该多好啊。可怕的歌。奶奶和母亲闭上眼睛。

[\(1\)](#) 安德里奇格勒是为纪念南斯拉夫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伊沃·安德里奇而建造的。

不管怎样，日子毕竟还要继续下去

和奶奶的电话交流最终变得越来越短，越来越让人难以忍受。不知什么时候，她再也不接电话，之后电话便彻底打不通了。我们给邻居拉达打电话。她说，奶奶把自己关在屋里，声嘶力竭地大喊大叫，很吓人。另一些日子里，你又不得不把她关起来，因为她要出门找她的佩罗。不然的话，你怎么都拦不住她。拉达无可奈何地说，她也无能为力了。一来她已经力不从心，无法照顾奶奶；二来奶奶也不能这样下去了。

离维舍格勒最近的养老院也有50公里之遥，位于罗加蒂察。叔叔和父亲开车去看了。他们对那里满院的玫瑰篱笆和明亮的房间很满意，而且护理人员可以按时领到工资。但当他们和奶奶提起养老院时，她说，不许他们再提如此愚蠢的话题。

“我们打算和你一起去一家酒店，”他们第二天说，“去度假。”

“你们以为我傻，想把我卖了？”

我们都有点儿自欺欺人。儿子们依然怀着侥幸心理，认为她的状况恐怕不会越来越糟。我依然相信奶奶还能回答我的一个个问题。奶奶，她就算不打胰岛素也能撑过一天又一天。可她因为糖尿病陷入了昏迷状态。邻居发现她几乎失去知觉，赶紧叫来了急救医生。

今天是2018年4月24日。我在汉堡坐城铁去机场，但这趟城铁根本不是开往机场的。我发现坐错了车，可为时已晚。我冲出车站，拦了一辆出租车。司机说：“别担心，我知道走捷径。”阿纳托尔带着俄语的大舌音、斩钉截铁说出“捷径”这个词，斩钉截铁地开着车。我说——为了更加激励他——我要去看望奶奶，因为她患有糖尿病，已经失去了记忆。我说（这时，我自己觉得这真的有可能），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去看望她。

阿纳托尔耐心地听我说完话，然后把手伸进手套箱里，递给我一板巧克力。“以防万一。”他含糊地说。我从上面掰了一块，把其余的还给他。我没赶上飞机。当航空公司帮我查看可能选择的航班时，我心想：要是奶奶正好此时此刻向着自己的目标走去，永远迷失在回家的路上，她的脑海里会浮现出什么情形呢？

“我已经有30年之久没见过我亲爱的奶奶了，”阿纳托尔说，“她一无所有。德国人不会让你把所有人都带进来。乌克兰人也不让我回去。亲爱的奶奶是一个说一不二的女人，信仰上帝。她爱憎分明，刚直不阿。”阿纳托尔说，“尽管如此，我还是替她担心啊。”

我改签到下午一个航班，抵达萨拉热窝时比原计划晚了五个钟头。然而，我真的觉得或许晚了几个月，或许晚了几年。我本来想和奶奶说的话，对她来说早就来不及了。

父母来机场接我。在回维舍格勒的路上，我们谈论着一条条年久失修的隧道，谈论着苹果公司暴涨的股票。父亲在限速以下平稳地行驶着；如果看不到限速标记，他就开得特别慢。这里的交通警察可是尽职尽责，一丝不苟。只要他们守候在那里，父亲车牌上的克罗地亚国徽准会让我们在塞尔维亚领土上被拦停。他们总会在你的车上找茬。

行驶到罗曼尼亚山区时，天色暗了下来。我们在那里被拦住了。父亲明不明白为什么呢？

父亲摇下车窗，一股清凉的空气立刻涌进车里。父亲说：“因为车牌吗？”

“因为限速60，你超过了80。请出示驾驶证和行驶证。”

他至少谎报了20公里时速。再说“请出示”也是骗人的把戏。

父亲递给他行驶证。“这么说肯定是我的测速表坏了。但你百分百肯定超速了吗？”

警察说：“如今还有什么是一百分的呢？”

父亲说：“不管怎样，你这样说也得有记录凭证吧？”

警察说：“我觉得很冷。”

父亲说：“你什么时候下班？”

警察看了看表：“快吃晚饭了。”

母亲从后座大声说：“我们有一个奶酪三明治。”

警察把脑袋深深地探进车窗里，仿佛要看看三明治是不是真的。他胡子刮得干干净净，有点肥头大耳。他满身酒气，但不会让人觉得难受。母亲递给他三明治。警察犹豫不决，也许在寻思着，他喜不喜欢吃奶酪，或者在寻思着别的什么。他的家人正在干什么（一枚婚戒紧紧地捆在他的手指上）。或许像我一样，在这黑暗的喀斯特山区里，“三明治”这个词让他感到诧异，他要把它弄个明白。它不合胃口吗？或者——就一个分享美味的提议来说——它不够美吗？

“你们是从哪儿来的？我听得出来，你们不是克罗地亚人。”他冲着三明治说。

此时此刻，任何回答都可能是错的。

“从维舍格勒来。”父亲冒险地抢先说。

“从维舍格勒来？你们要耍我吗？为什么刚才不立刻说出来？”警察的眉毛滑稽地动起来。“我也是维舍格勒人！我叫米特罗维奇！”警察大声说，仿佛这样一来一切都不言而喻，“天哪，我差点儿给你们开了罚单。”他说着咬住三明治，轻松地靠在车门上，打算聊聊天，“你们是哪个家族的？”他大声地朝着这充满传奇的罗马尼亚喀斯特山区的黑夜喊道。

在附近，有一家十多年来还未建成的工厂在喘息；它感到很不舒服，因为它是个面子工程，欧盟投给它的钱都被侵吞挥霍了。

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我叔叔1984年冬季奥运会期间把他的车开进沟里了。

1944年，爷爷佩罗不知在上面什么地方负了伤。

1942年2月，在东部山区里，游击队从乌斯塔沙法西斯⁽¹⁾手里夺取了库拉村。

以前这里的树林里有熊出没。

在罗马尼亚喀斯特山区，到处都可以看到中世纪的墓碑，人们可以在遥远的西部的一座墓碑上看到这样的文字：

兄弟们，我曾经像你们一样

而你们也将会像我一样⁽²⁾

谁毁坏墓碑，谁就会遭到雷劈。

警察打开包着三明治的锡纸，在上面闻来闻去。“这是什么奶酪？”

“特拉皮茨克奶酪。”母亲说。

“这是克罗地亚人做的奶酪？”警察问。

“不是的，”母亲友好地说，“这是一种用牛奶做的奶酪。”

大家禁不住笑出声来。警察咬了一口三明治嚼起来，咽下去。“米特罗维奇，”他边吃边说，“你们肯定认识我们家族的人。”

(1) 乌斯塔沙是克罗地亚独立组织，1940年代加入轴心国阵营，1945年被铁托率领的人民军击溃。

(2) 原文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

总是没人帮忙

尽管夜色已深，但房门还没锁。奶奶躺在客厅沙发上，就是那个盖着玫瑰色罩子的沙发。她面色苍白。还有呼吸吗？

父母会在她身边过夜。我在德里纳河边租了一间小套房。酒店旁边正在举行一场婚礼。流行民谣混合着叫喊声，一切都一如既往。睡觉就别想了。一个钟头后，我又去大街上溜达。一群闹哄哄的年轻人东张西望，随地吐痰。我从来没沾染过这样的习气。这种流里流气自以为是的恶习根深蒂固，四处泛滥。

德里纳河无声无息，黑蒙蒙一片。太爷爷太奶奶的房子曾经坐落在那儿的什么地方，对面是一棵垂柳。外公喜欢坐在垂柳下面钓鱼。一个男子正对着河里撒尿，他骂某人是婊子，说着把他的衬衫扔进河里。

在返回途中，我从老桥旁上岸。在第一座桥拱下面，一群人围着一堆篝火坐在那里。我走上前去，有两个人随之站起来。我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我举起双手用英语大声说：“一个朋友，只是一个朋友。”并说出我的名字。这两人又坐下了，目不转睛地盯着我。

我问他们从哪儿来。

阿富汗。你呢？

当地人。

你能帮帮我们吗？

他们想去北方，让我看他们一家人在废墟和灰烬前留下的照片。我寻思着，斯特沃不能开车送他们去呢。我傻乎乎地要给他们一些钱，他们不肯接受。他们头顶上方的桥已经有340年历史了。

我问他们一路上最糟糕的经历是什么。一个人放声大笑。另一个说：“总是没人帮忙。”

第二天一早，奶奶认出了我们大家。我们回来了，她很高兴。到了中午，她便只能认出她儿媳。下午时分，她不知所措地问我父母：“你们身旁这个年轻小伙子是谁？”

晚饭前，我又前往那座桥。可那些阿富汗人不见踪影了。

母亲做了酿柿子椒，我走进楼梯间时就闻到了香喷喷的味道。楼梯间里也聚集着一些昔日的气味。那个小塑料球的气味，我们小时候把它从走廊这边踢到那边。它绝对不太坚硬，因为我们只穿着长袜子，况且门上还镶着玻璃。

有时候，这里也弥漫着那个士兵的气味，一种汽油、金属和叫喊声混合起来的气味。到了秋天，那就是煮玉米的气味。令人迷惑：如果说楼梯间里弥漫着玉米的气味，那么我弄不明白——与回想起那个小球和那个士兵时不同——这是我的回忆，还是有人真的在煮玉米？如果是真的，是谁呢？我多么想吃一个啊！

母亲在厨房里，酿柿子椒马上就做好了。奶奶在客厅里盯着电视，没有画面，没有声音。电视坏了，她把插线弄断了，却说这是别人干的，不是她。我坐到她跟前。她拉着我的手端详着我。

“我们要去奥斯科鲁沙，”我说，“你要一起去吗？”

“去奥斯科鲁沙？”

“是的。”

“佩罗要上维亚拉茨山，可是天气那样糟糕。他——”奶奶中断了她的话。餐盘叮叮当当响个不停。父亲摆好餐桌。他从头到尾都在问来问去，东西搁在哪儿，盐在哪儿，餐巾纸在哪儿。

“要是我的佩罗知道你们要去该多好啊！那他就会等着你们，不会独自上山了。”她说着突然很生气，“就怪你们没和我们说好。佩罗几天前就走了。”

“他要去哪儿呢？”

“进山里！登上维亚拉茨山！”

“去那儿干什么？”

“我说过，起码要等到天气好转后再说。”

伴随着每一句话，她的声音变得越来越细小。

“奶奶，我是谁？”

“你是小毛驴，如果你这样问的话，你就是小毛驴。”

“我们要不要一起等爷爷呢？”

“一只小毛驴，一个淘气包。”奶奶的身子靠了回去。看上去仿佛她突然担心起那个在山里失踪的人。这一下子攫取了她的全部力量。

“你今天喝够水了吗，奶奶？”我给她倒上水，可她连水杯动都不动一下。母亲把做好的一罐菜摆到桌上，给我们大家分别盛在盘子里。我把奶奶扶到桌前。奶奶吃得很香。她津津有味地喝着汤汁。母亲问她好不好吃。奶奶说：“不好吃。”

奶奶必须忌口，但她偷偷地什么都吃。

“你口渴吗，奶奶？”我把水杯推到她跟前，仿佛她是个孩子，你必须把她的注意力从那儿引到这儿来。“奶奶，你喝够水了吗？”

奶奶放下汤匙。她用餐巾纸在脸上擦来擦去。嘴唇上的茸毛闪闪发亮。她把盘子贴到嘴边，大口大口地喝光了盘子里的汤汁。

“我想起来了，”奶奶说，“在奥斯科鲁沙的各种事情。”

今天是2018年4月25日。一个塞尔维亚摩托车俱乐部光临这座城市。我和奶奶坐在一家咖啡馆里。一伙穿着皮坎肩的人趾高气扬地穿过一条条大街。一帮身上贴着“切特尼克”⁽¹⁾标志的人。

相信上帝。

骷髅。

自由或死亡。

塞尔维亚十字符。

他们在桥头上自拍。（有些人曾经在桥上惨遭杀害，有些人曾经被扔进河里，有些人曾经在桥上遭到枪击。）

奶奶说：“你知道吗，在这个地方，越是无所顾忌，就越不受欢迎，历来如此。”

我回想起奶奶那一个个爱憎分明的念头，回想起她面对自己认为不公正的事情时那坚定不移的态度，回想起她面对我的宽容和迁就。我相信，当我们——先是爷爷，然后是父母和我，再就是邻居们，一个接一个——分别以各自的方式离去以后，她会感到很孤独。

我牵住她的手。她的手冰凉，干巴巴的。

“你回来太晚了。”她说着耷拉起脑袋。

“为什么说太晚呢？奶奶，奶奶？”

1996年，我在战争结束后第一次回来探亲时，这座城满目疮痍，让人感到绝望，人们好像都发疯了，到处都是失业者。我没有回家的感觉，我觉得来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我和拉希姆一起一路奔波。我们要把我叔叔的车偷偷地开到波斯尼亚去。我觉得这是违法行为。我相信，是一种巨大而天真的幸运使得我们抵达了目的地，至于叔叔作为酬金支付给我们的钱，我们全都拿来打点买路了。

在维舍格勒，我持续感到良心上受到指责。我碰到了当年的同学，他们都坚守在这里，而我夜间却在海德堡一家露天游泳池里划着皮筏子；我兑换我的德国马克。拉希姆想了解一些关于这座城市的情况，我却无法回答。几乎每个人都在说日子过得多么糟糕，而我心想着：我的日子过得还挺如意。

在这里，唯一真正熟悉的人就是奶奶。健康，不可动摇。她和拉希姆说起话来多么斩钉截铁，仿佛他一定能听懂她说的语言似的。事实上，他也听明白了，如果他吃不完她做的皮塔饼，她就恨不得要掐死他。

奶奶独自把地毯弄到楼下去，刷洗干净后叫拉希姆和我把它抬到楼上来。奶奶帮邻居打理菜地，负责让这楼里又有电可用。她陪着我去议会大楼，因为我要在那里领取我的出生证。她从一群排队的人身旁挤过去来到窗口前，和办事的官员低声说了些什么，于是人家示意我们过去，十分钟后我们离开议会大楼，因为事情办妥了。

我今天把奶奶领到她的理发师那里。女理发师问：“还是老样子吗，克里斯蒂娜夫人？”我奶奶禁不住笑出声来，禁不住非常大声地笑起来。

“如果你觉得好看，”她说，“那就请便，没错，还是老样子。”

^[1] 即南斯拉夫祖国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南斯拉夫抵抗德国的游击部队。

奥斯克鲁沙，2018年

2018年4月27日清晨，天空晴朗，万里无云。我们收拾好干粮。邻居拉达会照看奶奶。我们8点钟就上路了。这条道要穿过波斯尼亚东部，那里被视为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的堡垒。克罗地亚车牌又成了话题。“我们穿过这地方时真的不能不带武器。”父亲开玩笑说。

母亲没心情开玩笑。

大约在半道上，我们要穿过一片树林。这时，有几个背包客从树林里走出来。他们距离马路六七十米远，背着背包，也提着购物袋。有一个女人背着孩子。我让父亲停下车。当我们打开车门时，他们就像听从指挥似的跑开了，弯着身子躲进树林里。一个跑在最后的女人四下望了望，一个神情严肃的年轻女人，吓得面色苍白。

母亲点上一支烟，离开车。

天色已晚，一个女人和她的儿子在马路上走着。她背上压着一只沉重的背包，身后拉着一只带轮子的棕色旅行箱。男孩几乎同她一般高。他肩上披着一条红白相间的围巾来隔开闷热的空气。

画面：灰尘和农田。

这女人每当听到有车开过来，便回头张望。招手，呼叫，伸出大拇指。一辆辆车一闪而过。有些按响喇叭，听上去就像是咒骂。

过了几个钟头。喝水，吃面包。

一座城市。人行道，交通灯，家家户户坐在桌旁吃晚饭。一个老年男子出现在窗后面。男孩停住脚步凝视着。老人把汤匙送到嘴边。咀嚼着。一次又一次。他点燃一根蜡烛，为自己创造了惬意的光亮。这一切还有什么可说呢？男孩犹豫不决。男孩又追上那女人。

去火车站。五个停车区。没有警察。候车室：散发着腐臭味的地面上满是烟灰。又出来。在小卖部前：“你们收德国马克吗？”饼干、炸薯片、矿水、纸巾。行李始终不离身。长凳子：床。天气还不那么凉。

一辆公交车开进来。下车的只有司机一个人。一个胖墩墩的男子。在路灯的反光里，他的侧影冒着烟雾。女人用低微的声音说：“我们想越过边境去。”

司机的脸庞影影绰绰。“你就行个好吧，你不用做任何别的事情。”

“我们来自波斯尼亚，”女人说，“我们可以付些酬金。或许你知道一个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穿越过去的地方？”

公交司机踩灭烟头，走上近前。“你们为什么不试一试步行穿越呢？”

“被遣送回来了。”

“我下班了。”

女人不吭声了。

“你倒瞧瞧这玩意儿，”他指着公交车，“坐着它，怎么还能神不知鬼不觉地穿越过去

呢？”

“孩子困了。”

“我不困。”男孩说。

女人严厉地瞪着男孩，但这严厉的神色没持续几秒钟。她随之脱口而出：“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

司机揉了揉眼睛。“你们是从哪儿来的？”

“从维舍格勒来的。”

“伊沃·安德里奇？”

“伊沃，伊沃·安德里奇。”女人垂下目光。

男孩大声说：“他们用一把巨大的锤子把安德里奇的脑袋从塑像上砸掉了。”

一阵沉默。司机开始气喘吁吁，或者咳嗽起来，或者二者皆有。母亲抓住男孩的手腕。他立刻挣脱了。男孩不再只是男孩。

“我会开车。只有这些了。我不能向你们许诺更多的。绝大多数人都被遣返回来，流落到这地方。我会开车。我可以干这事。”

此时此刻，他站在长凳前，把一包烟递给女人。她站起来点上一支烟。女人和司机抽着烟。天空星光灿烂。

这事发生在1992年8月17日。母亲上了公交车。我跟随着她。

现在是2018年4月27日。母亲掐灭烟头，又上了车。我们继续前进。

在农村地区，谷歌地图是绝对不可信的。我们把车停在一个公交车站上。那里有一个年轻女子正在涂抹指甲，周围都是购物袋。她评论着谷歌选择的路线：“如果你们选择这条路线，你们就会被群山吞没。”我们必须先到乌瓦茨河，从那里才可以上奥斯克鲁沙去。她也要去这个方向，可今天公交车也许来，也许就不来。“我搭你们的顺风车行吗？”

这时，你当然难以说个不字。她问可不可以等她很快地涂完指甲。对此，你当然可以说你急着赶路。可是我们什么话都没说。刚一上路，她就想知道我们的车牌是哪儿的：“ST——这是斯普利特的车牌吗？”

这一次，我抢在父亲之先。“我们是当地人。”我说。停了一会儿又说：“ST代表斯坦尼西奇。”在我看来，这样说听起来仿佛不存在任何可疑：斯坦尼西奇。

我想起那些躲进树林里和待在维舍格勒桥下的流亡者。他们要穿越过巴尔干地区。这条路线引领他们跋山涉水穿越过一个个地方。我们就是从那里逃亡出来的。我打开车窗。我自愿回到这里。

“我认识几个姓斯坦尼西奇的人。”这个女子说。她分别说出全名，多次提到父亲的名字，还有那个村子。听上去就像一首没有旋律的歌曲重唱。其中只有一个不是农民，他在乌尔茨经销汽车轮胎。

母亲也打开她那边的车窗。塞尔维亚腹地从她眼前闪过，还有涂在墙上的斯拉夫文字：

为了国王和祖国。

别让那神圣的东西落入狗杂种手里。

我们的鲜血，我们的国家。

用一种她懂得的语言书写。那些说“我们的”人也会说“不是你们的”。这不是针对母亲，但同时也针对她。

到了乌尔茨，我们的客人下车了。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的边界在这里交汇。一个奇特的地方。一家家微小的店铺紧紧挤在一起：波纹顶的铁皮小屋，一家小超市，有辣椒和塑料制品。一个卖西红柿的小摊，一个卖运动衣和拖鞋的小摊，一个卖烤面包机和吹风机的小摊。男孩们留着板正的发型，穿着印有里贝里和梅西图案的紧身运动衫。他们光着脚相互追逐，手里拿着塑料枪和新鲜水果。

一群奇怪的轮胎商人在这里安家立业。到处是热乎乎的轮胎金字塔。有许多猫咪卧在上面晒太阳。

父亲不顾母亲的反对，执意要直接去询问价格。他把车停在一家商铺前。

母亲非常严肃地说：“你发疯啦。”

店主身材粗壮，留着短发，穿着汗衫和牛仔裤，问是不是停在门外的雷诺车的轮胎。父亲说是的。

店主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手背上长满汗毛。他问：“你们为什么挂了一个克罗地亚牌照？”

父亲采用反问方式岔开了话题：“我们打算去奥斯克鲁沙。我们可以从这儿什么地方开上去，对不对？”

“你们到底要去看望谁？”店主左下臂有文身，图案是矛和盾，他说话的时候身子俯在柜台上。我父亲身上有一个相似的文身：利剑和花环。

“去看望加夫里洛·斯坦尼西奇。”我说。

“斯坦尼西奇？”右下臂上文有一条三头龙。

向阳一面很甜蜜，背阴一面很苦涩

“加夫里洛是一脉。我也是属于斯坦尼西奇家族的。”店主这样说，并报出了四条轮胎的价格，“非常便宜。”他微笑着，露出金色犬齿。父亲难以说出不字，便买了四条轮胎。店主坚持要立刻更换轮胎。他说，他自己会亲自处理，然后不知给哪儿打了个电话，有人会过来更换轮胎。

轮胎工是一个身穿工装裤、头戴耳机的年轻女子。10分钟后，我们就可以启程了。然而，店主要求我们跟着他去到前往奥斯克鲁沙的十字路口。他要确保我们不会走错道。他开着一辆黑色宝马，坐在车里望着我们的背影，直到我们拐进山里。

前往奥斯克鲁沙，一路上尽是穿越森林的盘山道。一条条没有铺砌的小路通往一户户农家和一座座庄园，只有姓名，没有街名。在空旷的地方，你可以眺望利姆河河谷，一切尽收眼底。一条绿莹莹的水带，一片片棕色的田野，一道道未加粉饰的红砖墙。十分肥沃，又十分空虚。越向山上，盘山道就越狭窄，越陡峭，一道险过一道，然后柏油路到了尽头。我们靠着崭新而异常便宜的轮胎一路上行。

现在去哪儿？我什么也认不出来了。父亲最后一次回归故里是50年前的事了。小丛林，蕨类植物，无谓的吵吵嚷嚷。天空不会告诉你什么，树林也静默无声。周围一片片洼地里弥漫着腐烂的气味。

我们决定：继续盘山而上。沙沙沙，嗡嗡嗡，树叶，啄木鸟，被虫子叮咬的疼痛。一道坍塌的篱笆，仿佛有某种东西将它横着从地里揪出来似的。在这儿的某个地方，加夫里洛曾经等待着奶奶和我的到来。

我试着想象爷爷年轻时怎样走在这些道上。身着休闲上装。骑着毛驴。我没能像他一样。这里什么都没有。这里只有凭借照片想象的我。

第一个十字路口：一条狭窄的森林小道通向山下，灌木之间出现闪亮的空地。不对，要继续盘山而上。“只有盘山而上，才能到达我们要去的地方，在山顶上。”父亲这个具有哲学思辨的地理行家说。我们跟随着他。如果没人知道该怎么继续走，那你就要听从第一个表达意愿的人。

最高点上有一座小房子。一个老头从门里走出来，望着我们，慢慢悠悠地迎面而来，在房子与不速之客之间的半道上停住脚步。他头戴便帽，身穿马甲，裤子提得高高的，手里拿着一块巨大的火腿面包。

他大声喊道：“是谁迷了路，在我的树林里转来转去呢？”

母亲低声说：“大家管我叫玛丽亚。”她疑虑重重，宁可信口编造一个塞尔维亚名字，也不愿说出自己的真名。

我们自我介绍。当说出“玛丽亚”时，母亲微笑着，并且让人看到了她的牙齿。

树林主人又开始挪动步子。他的眼睛是深褐色。和我的一样，我立刻想到，因为我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情景。

“你们到底是斯坦尼西奇家族哪一脉的？”说到博戈萨夫，他点点头；提起克里斯蒂娜，他说“好的，没错”。“这么说你们要去扫墓吧？”

“是的。”我说。

“那你们来这里干什么？”

“我们也打算去看看加夫里洛。”

“你们怎么会认识他？”

“我以前来过这里一次。”

“这么说，你熟悉这地方。加夫里洛在山谷里。我们在这里有一座小房子。你们只管循着雷霆般的鼾声找去，就肯定会找到他。他让我在这里照看羊群。”老人摇摇头，咧嘴一笑，“我叫斯雷托耶，”他说着把火腿面包拿到左手上，为了握手欢迎我们，“加夫里洛是我哥哥。然而有时候——我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会心地微微一笑，于是我们也会心地微微一笑。就在大家会心微笑的时候，斯雷托耶·斯坦尼西奇琢磨着他们之间的亲缘关系，并且一一道来：

“克里斯蒂娜是你母亲。”他大声地冲着父亲说。此时此刻，他才真的对我们的出现感到好奇。“来看望加夫里洛。”他本来要去照看羊群，现在却邀请我们去他家里坐坐。“我们可要好好拉一拉家常。你们可以过后去墓地。他们还会待在那里。”

他很好奇。他又一次说起话来，并且开始讲故事。他首先为这块面包说了声对不起，他还没吃早餐呢。这座房子是学校，有个冰箱。他的冰箱已经坏了几个星期了。

“我那会儿上学时，”他说，并未咬一口面包，“我们这里有70个孩子。现在只有三个了。我们当时有一位女老师，也不是人人都喜欢她，可以这样说。她名叫达妮察。年轻聪明。我是说，不是所有的家长都喜欢她。问题在哪儿呢？她不是当地人。不是当地人，但她从她出身的地方带来了很特别的思想 and 所有诸如此类的东西。

“拉特科抱怨得最厉害。他有三个儿子，一个比一个捣蛋。达妮察把这三个孩子管教得老老实实。尽管如此，拉特科还是不满意。他一周接一周地找上门去跟她理论。他对这个不满意，对那个不满意。什么家务管理！孩子们为什么要学这玩意儿？成绩差？这玩意儿他在家里也会教！这样说个没完没了。是的，后来，拉特科从马上掉下来，情况相当糟糕。但更惨的是，他坠落时咬伤了自己的舌头。他往后可能只能靠吸管吃饭了，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而达妮察，那个女老师，她是继拉特科的家人之后第一个去医院看望他的人。带着香蕉！这是一件人们议论了好久的事情，说她送去了香蕉。还有她对医生说的有关拉特科的话：‘请你让他恢复健康，让他的舌头像以前那样坏就行了。’

“是的，听到这话后，他禁不住笑出声来，拉特科。他后来连七个字母都说不全，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达妮察能去看望他，拉特科对此深为感谢，十分敬重。从此以后，人们再也没听到他说过达妮察一句坏话。可惜达妮察后来又回到城里去了。是的，你想想，我们这里来了一位拿着棍棒教纪律的老师。”

我们依然站在学校下方。斯雷托耶说：“我们闲站在这里干什么。去我家吧，我们可以坐下来舒舒服服地聊个痛快。”他领着我们径直穿过树林，“你们一家人也常常盛情接待我。”他注视着母亲，“你们是哪里人，玛丽亚？”

“维舍格勒人，世代都是维舍格勒人。”母亲说，接着又不得不引开话题，免得人家追问她的家谱。从树林边上可以看到一栋房子，母亲询问起什么人生活在那里。

“一只猫咪。建造这房子的人是一个志愿兵。他两次从战争中返回来，从第二次战争

中回来时身负重伤，但他无论如何要死在这个地方。他的孩子们死在了这里。他的孙子们将会死在别的什么地方。”

到了房前，他停住脚步。我心想：此时此刻，他准会咬一口面包，但他没这样做，而是抬高嗓门，仿佛要我们意识到他的话很重要：“你们在这里建些什么吧，就在你们家曾经坐落的地方！你们建一座新房子吧！这是你们家的！一切都是你们家的。”然后又冲着我说，“别这样东张西望。这家伙当然不会回来死在这里！他还要写五年他的战争故事，或者不知道还要折磨大家多久。”

房前的院子里，一棵山梨树正在开花，一头猪在粪堆里拱来拱去，一张桌子摇摇欲坠。夏日里，他时而在桌子上过夜，他说道。因为背痛，因为要看星斗。

他让我们看他的烤肉棚，看看他的黑狗，看看他的黑马。“这马是我养来骑的，但也是养来说话的。”他说。他很想念妻子。“她也几乎只待在山谷里。”然后他边笑边说，“有时候——我有时候很想念妻子。”

他让我们进屋去。我们脱掉鞋以后，他说：“玛丽亚，麻烦你给我们煮咖啡吧。”

母亲愣了一下。

斯雷托耶把咖啡容器递给我母亲后便坐下来，让父亲和我一同坐下来，把火腿面包放到桌子上。母亲往四周看了看。想问什么。没有问，一句话都不说，打开橱柜。父亲和我也一声不吭。

外面是一座座郁郁葱葱的山包。这个世界弯向四面八方：向下进入山谷里，穿过草地、田野和村落；向上通往维亚拉茨山那壮美的顶峰。奥斯克鲁沙。

“你们可别责怪我，我在这里如此……家里如此凌乱。我独自一人，不知道你们要来看我。”斯雷托耶说。母亲找到了咖啡壶，轻轻咳了一声。

“你们可别误解我。我不想吹牛。但我们可是村里第一个用上冰柜的人家。”斯雷托耶说。这时，母亲在灶台上忙来忙去。

“我们家曾经有13个孩子，6个成人。门前摆满了鞋。当你进门时，会被绊得踉踉跄跄。没有好鞋跟，那你就无法在这里过上好日子，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母亲一天到晚缝缝补补。尽管如此，你还是需要新鞋。你寄去一封信，过不了几天，公社就给你送来新鞋，或者面粉，或者药品。这还是在铁托领导下的时候。公社事事都关心你。然而，当公社决心要索取，而不是给予时，你就会感到苦不堪言。那时就不是冰雪老人一样的人背着满满一包鞋站在你门前，而是同时出现三四个人，他们亮出证件，要和你们分享面包。”斯雷托耶说。这时，母亲按下按钮，用手心试了试炉盘是不是很快就会热起来。

“我现在坐的地方，就是我父亲当年坐的老位子。吃早饭和晚饭时。白天要在田里干活。他只坐在这里，长年累月只坐在这里。”斯雷托耶说。这时，母亲把水倒进咖啡壶里，又把壶放到炉盘上。她背对着我们，短暂地用手捂住脸。

“不说啦。现在来点烧酒吧，”斯雷托耶说，“玛丽亚，请你在那里看看，架子上有瓶酒。给你也拿个小酒杯来。酒杯就在玻璃柜里。”在母亲向酒杯里倒烧酒的时候，斯雷托耶终于咬了一口面包。他咀嚼着，而母亲正在他背后倒烧酒。

“我们每个孩子都有一个上帝、一位父亲和一块地毯，”斯雷托耶说，“瞧这块地毯，这是我母亲亲手织染的。愿她在天之灵永远开心！”他举起酒杯。

母亲犹豫不决。她的杯子是空的。她用手指遮住捧在手里的酒杯，再次贴到嘴唇上。

我们喝着酒。斯雷托耶却没喝。他给自己手心里滴了一滴酒，抹了抹，接着鼻子凑上去闻了闻。

“免得让你们误会，”他边说边从马甲兜里掏出一只透明的塑料袋，“你们瞧瞧，这就是背痛的检查结果。六个月以来，我不能举任何重东西。我也举不起来啊。我不中用了！我不能和你们一起喝酒，这真的让我感到很遗憾。你们可千万别责怪我。”斯雷托耶说。母亲又站到灶台前。炉盘上烧的水连气都不冒。

“我参加过374场婚礼。”斯雷托耶说。母亲在等待着煮好咖啡。

“这里有好年景，也有坏年景。但真正的坏年景从来没有过，这是最重要的。你们说对吗？我至多冬天在山谷里待上几个星期，除此之外始终住在这里。从前，我们耕种自家的地需要十天之久。十天啊！而现在，我们只剩下一块种土豆的田地和一点儿苜蓿地。”斯雷托耶说。母亲在等着水烧开。

“在所有这些日子里，在所有这些岁月里，在数十年里，我绝对无法想到，有朝一日我会如此长久地独自一人待在这里。”斯雷托耶说。母亲在等待着。

“我本来可以离开这里。可以舍弃一切。然而不管怎么说，命运把我们安排在这里，让我们过这样的日子。我继承了我父亲的命运，他也继承了他父亲的。这不是什么咒语。你从父辈那里继承了什么——你得到它，就是为了拥有它！人们如是说。我可不这样说。我对我的孩子们说，”斯雷托耶说着，而母亲在等着水烧开，“这要看有用还是没用。如果你们觉得在别的什么地方日子会过得更好，那你们就不必厮守在这里——好吧。可话说回来，你们要在四周围上一道篱笆。邻居的畜生不能踏进你家的领地。一切都要合乎规矩！”斯雷托耶说。炉盘上烧的水依然没开。

“为了不造成误会，”斯雷托耶说，“我守在这里，并非因为我非得要干什么。我之所以守在这里，是因为如果没有我，属于我们家的一切都会走向衰亡。正因为如此，我宁可与之相依为命，在这里待下去，老老实实在这里待下去。”他又给手心里滴上酒闻了闻。

水还没烧开。母亲攥紧拳头。母亲怒火中烧，因为她不得不在这个世界里等待着水烧开。她已经在这个老掉牙的灶台前站了足足十分钟。她怒火中烧，肯定也担心咖啡煮不好。况且她生我们的气，因为我们把这种愤怒和担忧留给了她。理所当然。

斯雷托耶咬了一口面包。他身后的墙上挂着一个巨大的、老掉牙的电话机。

“电话机还能用吗？”我问。

斯雷托耶拿起听筒，倾听着，又挂上，然后说：“不能用了。”

母亲打开炉门盖，又把它关上。滗去一些水。炉灶上方挂着一个香炉，摇来晃去的。冰箱的盖板松动了，斜挂着，上面放着一包盐，几乎要滑下来。门上有一块磁吸头像，上面是佩奇牧首伊里内伊⁽¹⁾的头像，留着大胡子，戴着滑稽的礼帽之类。斯雷托耶又给我们斟上酒。此时此刻我才发现，酒瓶里插着一个木头十字架。

“有一个神父，”斯雷托耶说，“每年都来为我的饭锅祈祷赐福。后来有一年，他没来，人们也吃不出什么区别，于是我不再请他来了。”

母亲在灶台前踱来踱去。

“我在查伊尼切学过绘画，”斯雷托耶说。“70年代，查伊尼切是个气候宜人的疗养地。东方大酒店。不打领带你是进不去的。如今的查伊尼切满目疮痍，伤痕累累。战争把它彻底毁掉了。从前生活在这里的穆斯林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九；要是没有科尔尼亚

察^②和他的军队的话，今天恐怕会达到百分之百，我给你们说的是真心话。但要是这里压根儿没有发生过战争就好了。我当过兵，我并不想隐瞒这一点，但我从来没有按宗教信仰区分过人，绝对没有！我是什么就是什么。”斯雷托耶说。母亲用脚踢着炉门。父亲和我抬头望去。斯雷托耶咬了一口面包，继续讲下去。

“可恶的战争爆发后，你所积蓄的一切都化为乌有了，”他说，“老实说，一帮罪犯。在我们这个国家，有一个好人，就有三个罪犯。我当年绝对不会忍饥挨饿，也绝对不会缺衣少穿。但是如今情况大不一样了，没吃的没穿的，到处都是这样的光景。”他边说边给手心里滴上酒，“我可以向你们断言，一个时代将会到来。”他说。这时，母亲走了出去。

也许过了30秒，她又回来了。她手里拿着一根棒子，手臂长短，相当粗壮。她拿着棒子站到咖啡壶前，两手挥动，犹如舞弄一个美式棒球杆。

在通往楼上的门旁挂着一幅圣人像：镶着金框的圣格奥尔格像。画面上有一条龙欲咬住一匹马的肋腹。马儿受惊跃起。圣人的眼睛睁得老大，长矛指向一旁。母亲用衣袖掠过嘴边。

“我最相信你，”斯雷托耶对我说，“你现在给我说说二手车的事。如果你现在生活的地方买二手车运送到这儿，加上关税以及其他开支，比如说，开了三年的旧车，价钱怎样？”

我对二手车可是一窍不通。相比之下，我更熟悉海狸的生存状态。我望着父亲，他却盯着母亲，没在听我说什么。于是我含混不清地说了几个任意的数字。斯雷托耶对此频频点头，此刻又讲起他的拖拉机。我实在听不下去了。就在这时，只听到啪的一声响——

母亲扔掉手里的棒子。她四下看了看。她满脸通红。她拧开咖啡罐，把咖啡倒进沸腾的水里。

“我太爷爷米洛拉德，”斯雷托耶说，“活到了183岁。直到他百岁生日时，大家都必须听他的，全家人，也就是说半个村子。后半辈子83年里，他唯一的嗜好就是苦苦思索，思索再思索。当他最小的儿子，也就是我爷爷在火岩旁杀死了一个宪兵逃跑后，他便踏上了寻找儿子的旅程，最终也找到了他。他们谈了一会儿。后来，我爷爷就投案自首了。”

“他为什么杀了宪兵？”母亲问。

“天知道，反正是杀人了，”斯雷托耶说，“他几年后被释放了。就我所知，他之后再也没杀过人。”斯雷托耶说着站起来。

“克里斯蒂娜·斯坦尼西奇是个好人。她很关心我们户族的墓地。她尽心尽力。该她做的她做了，不该她做的她也做了。你们说说她的身体怎样？她经常独自一人吗？是的，这事关键在你们，别让她经常一个人孤孤单单的。这事就看你们怎么做。说起克里斯蒂娜时，我必须站起来。要说起这样一个女人，你可不能坐着不动。”

母亲端来咖啡。她给我们一一斟上咖啡。我们喝着黑咖啡。

父亲向斯雷托耶打听火岩的情况。

“你们要去那儿干什么？”他咳嗽了一声。

父亲说起那个蛇窝。他或者我们要去那儿干什么，父亲并没有和盘说出来。还没等我能想出什么说法，斯雷托耶便劝我们别上那儿去。去那里的路可不好走，让人心惊胆战，因为没人关心路的好坏。要说天气吧，到了下午，天气变化无常，这会儿阳光照耀，可这不过是表面现象。“我现在得去看看羊群了，可别让它们进入苜蓿地里。”斯雷托耶没喝完

咖啡就出了门。

母亲坐下来。喝了一口咖啡。

“你看见老电话机了吗？”我对她说，为了避免沉默。这时，外面传来狗吠声。它汪汪地叫来叫去。这是唯一的响声。斯雷托耶没回来。狗依然叫个不停。我们走出去，母亲走在前面。

狗龇牙咧嘴，隔着篱笆汪汪叫。但是，那里什么也看不到。空气如同迷迭香。桌子上长满苔藓。斯雷托耶竭力劝着狗。母亲跪在身旁的草地上。狗就像发疯似的，口水不停地从口角滴下来。母亲把手伸过篱笆。狗气喘吁吁，嘶嚎了一声，身子抖了抖便不声不响了。它嗅了嗅母亲的手心。看母亲的样子，仿佛她悄悄地给它说了些什么。狗打起哈欠。

“你们过后肯定要去吧。”斯雷托耶说。他目不转睛地看着母亲。“如果你们真的要去火岩看看的话，”他说，“那可别太晚了！”

当我们走出他的视线时，母亲停住脚步。我们前面是树林。上坡的小路消失在丛林里。维亚拉茨山就在我们上方。

母亲说：“我不想上那儿去。”

“肯定不远了。”我说。

“什么？什么叫不远了？”

我无以应答。

“你们要去那儿干什么？我们到底要在这地方寻找什么呢？”

“没有什么确切的东西。”我说。不是一条条会变成话语的蛇，或者相反，我心想着。我心想着：我真的也知道怎样煮咖啡。我心想着：什么东西缺失了。一个人。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现在还是去墓地吧，”母亲说，“然后就回家。瞧后面那儿，风起云涌，马上要下大雨了。我不想站在这里被淋成个落汤鸡。”

我立刻顺从母亲。母亲看起来不再担惊受怕，只是理所当然地有点儿心绪烦躁。这样做似乎会简单地变成一次全家的大自然郊游。好久以来，我们再也没有三个人一起享受过什么美好的东西了。父亲朝着树林方向走了几步，又折返回来。

好吧，去墓地，起码会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墓地上的杂草刚被剪过了，一个斯坦尼西奇墓前摆放着鲜花。我们拔去杂草，点上蜡烛。那棵山梨树上，初生的白色花朵在枝头含苞欲放。自从上次研究山梨树以来，有一句话铭刻在我的心里（那句被提醒的话），我必须大声地把它说出来：“嫩枝顶端的花序呈伞形。”父亲问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只能大概传递它的意思。

我饿了，而树上的花朵弥漫出令人惬意的馨香。

我望着太爷爷太奶奶那坍塌的房子，我有那么多东西弄不明白。弄不明白膝盖是怎样运转的。笃信宗教的人与把金钱和希望寄托于魔法、赌场、药丸或者千里眼（内娜·梅耶玛除外）的人有何不同。我不理解坚持民族原则，不理解喜欢吃甜爆米花的人。我不理解素质会与出身绑定，也不理解有些人随时准备着以出身的名义奔赴战场。我不理解那些认为他们能同时生存在两个地方的人（可话说回来，要是真的有人能这样生存，我很愿意拜他为师）。我多么愿意同时生存在两个时代啊。我喜欢问儿子最喜欢什么东西。“紫色是我最喜欢的颜色，”他最近说，“也是你最喜欢的。”我明白他的意思。

我站在那棵智慧树下，而这棵树扎根于太爷爷太奶奶的坟墓里，树枝上再也没有蛇发出嘶嘶声，再也看不到什么象征。它仅仅开着花。

我们在雨夜里返回维舍格勒。我们买来啤酒和一块热乎乎的白面包。我们进屋时，奶奶坐在沙发上。我想说些快乐的事，可我什么快乐的事都想不起来。我拥抱她，问她喝没喝够水。

“你们没找到我的佩罗。”奶奶沙哑地说。

“没找到。”我说。

“你们就没好好找。”

母亲帮她刷牙。我们安顿她上床睡觉，坐在她旁边喝着啤酒。

父亲问我，是不是高兴又去了一次奥斯科鲁沙。

“你高兴吗？”

他耸耸肩。

母亲说：“我很高兴。风景美不胜收。”

“一个奇怪的家伙，斯雷托耶。”我说。

“一点儿都不奇怪。”她说。

奶奶闭上了眼睛。我把手贴到她脸颊上。我们没好好找。

(1) Irinej (1930—2020)，塞尔维亚的东正教精神领袖。佩奇牧首修道院是塞尔维亚牧首的驻地。

(2) Dušan Kornača，塞族军队地区首领，波斯尼亚战争期间曾强行驱逐穆斯林。

天天如此

奶奶从来都不问，我的情况怎样。我一直觉得这样挺好。她如是说：“你饿了。”她说：“你累了。”

我今天又要离去。奶奶说：“你不高兴了。”

这话说得出乎意料，因为事实并非如此。当她看到我饿了的样子时，我是饿了；当她给我送来毛衣时，我是感到冷了。我今天并没有不高兴，也许有点忐忑不安，心里酸酸的。我坐在她面前，又是一次告别。她伸手去拿汤匙，要搅一搅她的咖啡，但汤匙却不在那里。她的动作显得古怪和缓慢，如同一个正在学步的孩子。

我并没有不高兴。

她坐在盖着玫瑰色罩子的沙发上喝着咖啡。罩子不好看，有好些年头了。她搁在膝间的双手老了。我并没有不高兴。

我不高兴她喝那么少的水。我一直想让她喝水。有时候，我忘记了她已经有一杯水，又给她端去一杯。你渴了，奶奶，你累了。

邻居外出时，就把奶奶锁在家里，这让我感到五味杂陈。然而，只要没有别的解决办法，我认为这样做也没什么错。我们一家人还没找到一个解决办法，这也让我心神不安。瞧她下巴贴到胸口上的样子。

奶奶抬起头来。“可别不高兴啊！一切都会顺其自然的，无论是这里还是那里。”说到“这里”时，她把手平放在她的胸口上。说到“那里”时，她用食指敲了敲我的额头。

她没这样说，这让我心里不是滋味。我为她想象出这样的举动，这让我心绪起伏。事实上，她依然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仿佛一口咖啡耗尽了她的气力。

我并没有不高兴。对我来说，没有什么非得顺其自然不可。我不可能使奶奶变得年轻，也不可能使奶奶变得健康。她的下巴贴在胸口上，难道我还能在叙述中把它反过来吗？

她喝了一点儿水。“我们去散步好吗？”

“我必须走了。”我说。

“胡说八道，今天谁也不许去任何地方。”

“今天是什么日子呢？”

奶奶说：“天天如此。”

必须谨防要你去回忆的人

叔叔在聊天群里发了一张照片：奶奶蜷缩在一张床上，下巴贴着胸口。她身后的墙壁是青绿色。床上用品呈现出黄绿杂糅的酱色。骨折的手臂就像是成熟的李子色。奶奶蜷缩在一张陌生的床上。

叔叔写道：“她的情况不太好。”

她的情况不太好。

那不是她的床上用品。

“她知道她在哪儿吗？”我写道。

叔叔没回复。

今天是2018年6月23日。叔叔把奶奶送到了罗加蒂察养老院。几天前，她在家里爬到火炉上。她要把窗帘卸下来洗，结果摔下来了。邻居拉达发现她躺在地上呻吟，便把她送到医院里。骨折的手臂打上了石膏。回到家里后，奶奶用厨刀捣碎了石膏。

罗加蒂察是一座小城，群山环抱，风景秀美。什么东西秀美，谁说了算呢？奶奶从她的窗户可以看到医院。罗加蒂察比维舍格勒更凄惨。什么东西凄惨，谁说了算呢？战争年代里，城边有一个农家院，后来变成关押非塞尔维亚人的集中营。1992年8月15日，德拉戈耶·保诺维奇·斯皮罗的队伍把其中27个囚犯当作人盾送上前线。他们从那场战役中幸存下来，却被斯皮罗的人枪杀了。阿明·巴日达尔当时15岁，手臂上挨了两颗子弹却幸免于难。

2018年7月12日，我第一次去养老院看望奶奶。她躺在房间里，侧身躺着，曲着两腿，脚上还穿着拖鞋。她的手伸到床外，眼镜松松垮垮地挂在手指间。我把她搂在身边，怕她滚到地上。奶奶一动不动。

在另一张床上，一个非常瘦小和年迈、一身黑装的老妇正在吃梨。她两腿间夹着一个破破烂烂的旅行箱。天气很热。房间里弥漫着塑料和梨子味。我想打开窗户，但是窗上没有把手。我问一个女护理员为什么。我心里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我想让她亲口说出来。之所以没有把手，是因为怕老人们打开窗户跳下去。她没说跳下去，她说的是掉出去。她给我拿来把手。我打开窗户，站在窗前。

奶奶依然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

她的室友拖着箱子，拿着半个梨走出去。一个女护理员又把她送回来，手里的梨不见了。老妇迟缓地骂着护理员。奶奶一动不动。女护理员给两个塑料杯里倒上橙汁。老妇一口气就喝光了，然后坐到床边，箱子夹在两腿间。我接过给奶奶的橙汁。女护理员说，她叫安娜。我无法装作对她的名字感兴趣的样子。她又不见人影了。

一只苍蝇围着奶奶的脑袋飞来飞去，仿佛它要跟她悄悄地说些什么。奶奶的耳垂上挂着一个耳饰，一个朴素的圆东西。耳朵里的茸毛，上嘴唇的茸毛。一块块胎记，一块块老人斑，我不忍心再看下去。我抓住她的肩膀，呼唤着她。“奶奶？”她睁开眼睛，眼睛十分浑浊。

在德国，有许多老人会在这样的地方度过他们的晚年——人们是这样说的吗，晚年？

他们很早就和家人商量好，当他们生活上再也不能完全自理时，就和约好的朋友们被安排在一起过日子。谁给提供伙食呢？人家怎样看你呢？有《卡坦的定居者》[U](#)玩吗？这样一些问题接踵而来。

在波斯尼亚，养老机构寥寥无几。奶奶恐怕宁可天天从火炉上掉下来，也不愿意住进养老院。家庭只要完好无损，必然会在家里赡养老人。

“奶奶？”我把眼镜递给她。奶奶戴上眼镜，她的目光试探着我的脸：严肃，几乎生气的样子。

我查阅过，你不能向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提太多问题。于是我不问她知不知道我是谁。她不微笑。这样就够让你感到欣慰了。

她想站起来，我便抓住她的胳膊肘，她疼得脸都变形了。正好是那条骨折的胳膊，我连忙说对不起。她站起来。迈着小步子。停在衣柜前靠过去。一个个小步子。我还从来没见过奶奶如此虚弱。

“我们来得太晚了。”

没提什么问题。

“我等了整整一天。”

“我感到很遗憾。”

“葬礼早就开始了。我本来想再看她一眼，此刻她肯定已经躺在地下了。”

“谁去世了？”我现在倒问起话了。

“是的，这个……女人！我的梳子在哪儿？你瞧我现在这样子。”她扯着自己的头发。头发稀稀拉拉的，苍白的头皮显得透亮。她打开衣柜，梳子就放在里面。

我不知道是什么人的葬礼。我甚至不知道奶奶此时此刻活在哪儿。我不知道她相信什么。一面面围着她的墙壁是哪里。青绿色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叔叔告诉她，由于胳膊骨折，她需要康复治疗一阵子。去一家酒店。有可能，她早就看穿了这谎言。

她草草地梳了梳头发。“现在几点了？或许我们还能赶上丧葬筵席。”

老人们坐在阳台上晒太阳。一个坐着轮椅的男子失去了双腿。一个男子在秋千椅上荡来荡去，可他压根儿就不喜欢摇来晃去，喋喋不休地乱发牢骚。一个秃头和没牙的女士说，她喝的茶就像橙汁。

我把奶奶扶到一个靠背椅上。

“这要干什么？我们为什么不继续走了？”

“奶奶，我忘了葬礼在哪儿举行。”

“嗯，在那儿。”

“哪儿？”

“我可不能就这样去啊。我需要我的表。我需要我的鞋。”她说着甩掉了拖鞋。

“奶奶，你说说到底埋葬的是谁呢？”

“这个女人，埋的就是她。”

或许她说的是自己。

她推开我，要继续走。我又给她穿上拖鞋。她寻找出口。出口在一道茂密的玫瑰篱笆后面，你从这儿是看不见的。我领着她来到花园深处。养老院是一座设施周全的大楼。正面是青绿色，还有椅子和花木。那个管事的人看来很喜欢青绿色。

花园里，有一个穿着工装裤、光着膀子的人在剪草。公共活动室的窗户敞开着，电视声音开得很大，透过剪草机的响声，你也听得到那不堪入耳的民间音乐。一个老年男子超过我们，放了一个响彻云霄的屁。

地狱，我心想着。这是地狱。

奶奶步履蹒跚，踉踉跄跄，不得不坐下来。剪草机突然不吱声了，有人关掉了电视机。只听得到蟋蟀的叫声。这时，奶奶说：“我多么想和家人说说话，大家彼此见面太少了。”她说话时听上去无比悲伤。

太阳火辣辣的。

奶奶没有可以去参加的葬礼。或许根本也没有一个她现在可以去的地方，她能在那里持久地感到幸福，目光不会这样疲惫。

我两手抱着她的脑袋：“奶奶，你不会相信发生了什么事！”我瞅着她的眼睛，“人们今天早晨要从教堂里抬走一个装着女人的棺材。这时，有一个抬棺人说：‘你们听到了吗？有人在敲棺材！’大家揭开棺盖一看，她活生生地躺在里面！而且非常生气。‘说说吧，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呢？’”

奶奶重复着这句话：“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呢？”

“她复活了，那个女人！这就是说：她复活了！根本没有死！他们险些把她活埋了！”

我确信无疑，自己刚才的所作所为是不对的，但奶奶微笑着。

“彻底发疯了！”我大声说。

“根本没死。”奶奶低声说。

“居然没人发现。”

“或者本想发现……”奶奶告诫似的挥起食指。

“医生什么都没说。”

“我一点儿都不感到奇怪。”

“是的。”我说。

“真奇怪，”奶奶说，“你说说，没有咖啡，我们却在这里说来说去说什么呢？是的，快去给我们弄咖啡来！”

养老院旁边就有一家小咖啡馆，你可以从花园里隔着篱笆要咖啡。我端着咖啡回去时，奶奶一边打招呼，一边说出一个名字，那可是我的名字啊。她很高兴我在这里。我也很高兴我在这里。奶奶和我在阳光下喝着咖啡。

“真奇怪。”她轻声说。接着：“我不想这样死去。”

“怎么样呢，奶奶？”

“只有一点点。”

[\(1\)](#) 一种多人玩的德式棋盘游戏。

后记

晚上回到维舍格勒。没有奶奶，我就不认识这座房子。我坐在她的沙发上。上面盖着那个罩子，玫瑰色、干净、陈旧。我用那个有裂纹的玻璃杯喝着水。到处都是照片：爷爷佩罗的面孔、父亲的面孔、母亲的面孔、我的面孔，还有我儿子的面孔。我再也不知道我在这里该做什么。我8点钟躺到床上，等待着进入梦乡。

第二天一早，我又赶往罗加蒂察。奶奶吃得不错，喝着茶，诉说着她的家事，首先是扎戈尔卡。她有点担心可爱的姐姐，因为她黎明时分牵着那只羊出发了，直到吃晚饭时还没回来。担心变成了痛苦，奶奶开始大声呼唤着。这时，我便让自己回想一些有关扎戈尔卡的事。

我带来了一本相册。我们翻阅着奶奶的人生经历。在最早的一张照片上，有一个年轻女子和朋友们一起坐在草地上分享野餐。在最近一张上，一个年迈的老人低着头坐在沙发上。我不知道，奶奶一生中有什么事情让她感到不合心意。她愿意让什么事情变成另外的样子。现在，一切天天都变得不一样了。

有一张照片，她久久地、恋恋不舍地凝望着。上面有她本人，有她丈夫，我在他们中间。我们在奶奶家里。我们上方的刺绣画如同一幅幅圣像。爷爷穿着质地上乘的休闲上衣。我穿的应该是奶奶亲手织的马甲。她用大拇指情意绵绵地抚摸着丈夫的脸庞。

“你还记得照片上这小孩吗？”我指着自已问。

“一个小男孩。”奶奶说。

当我第一次站在奥斯克鲁沙的墓地上时，我猜测奶奶和加夫里洛带我来那个地方，是为了促使我对它的一个个故事、对我的祖先、对我的出身产生兴趣。我应该喝太爷爷水井里的水，应该感到他们在逼迫我做一番表白。

我弄错了。他们没有期待我做什么。两人就是想彼此拉拉家常。出于自愿，出于他们对亲缘和归属承担责任的兴趣。这其中还有对一切所创造和所继承的东西的自豪，丝毫不在乎这一切是不是他们眼前的过眼烟云。在这里，没有任何东西是我的，将来也不会变成我的。我只不过是一个他们共同盘点家底的偶然见证者。偶然有一次，为时不晚地出现在他们的一些家族事务中。

他们一如既往地坚持诉说下去。他们不孤独，但心里却明白，他们很快就会变得孤独。除了死亡，似乎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社会事件随时在等待着。

田野上一条条犁沟。一道道篱笆。烧酒瓶子里的十字架。为公公婆婆做的玉米粥。维亚拉茨山。加夫里洛和奶奶——现在还有斯雷托耶——诉说着这一切，也是为了追忆往事。他们为故去的亲人安插了一个美好的故事。那井水的味道是由语言造成的。这语言将会继续流淌。有一个人活下来，就是为了讲述。为了说：我的生命是不可理解的。

加夫里洛的膝盖坏了。斯雷托耶的腰背不灵了。这是数十年的摸爬滚打造成的，是坚持不懈地掏空和搬走一座座山造成的。如此长年累月的辛劳，即使你能一辈子规规矩矩地坚持下来，能弯腰俯身地劬劳到底，但在某个时候，你还是要服用止痛片。

在罗加蒂察的第三天，又一次面临和奶奶告别。几个钟头后，我将飞往德国。我们看看相册。码起多米诺骨牌。又看看相册。吃米饭和别的东西。当奶奶第三次翻开相册时，

我拥抱住她，站起来。其他老人在我们周围又喊又叫。她翻着她的历史。指着一张照片问：“这是我吗？”

我把这个问题留给了她。我们很快会继续讲述下去，奶奶。

在机场候机厅里，一个女孩爬到旁边一个老年男子身上，他为她朗读着。起先我跟不上故事的来龙去脉，后来跟上了，结局是皆大欢喜。可我多么希望是另一种结局啊。旅行，灯火辉煌，预告。没有季节之分的机场候机厅。

我没有登机，但我的箱子已经被运走了。我感到极度恼火。我要租一辆车，等待了几个钟头才终于等到一辆。可我晚上才可以开走。我开车又回到罗加蒂察。

午夜前一个钟头，我到了那里。在一盏防风灯下，一个男子正在修剪养老院门前的玫瑰篱笆。我把车停在大门对面。从这里看去，一根根玫瑰枝条仿佛是从园艺工的背上长出来的。仿佛他是篱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剪刀很大，园艺工操作起来十分吃力。

我穿过大门进入花园。玫瑰枝四处蔓延，挡住了道路。园艺工用一只眼打量着我，眼罩遮盖着另一只。他身材高大，有点驼背。他用手电筒给我照亮路。我穿过玫瑰蔓，玫瑰刺一次又一次扎进我的上衣。有什么东西从灯光下溜过去，一只小动物。驼背人骂咧了一声。然后，我来到另一边。

我说：“谢谢你的灯光。”

他肯定认识我，因为他问我是不是忘记了什么东西。园艺工光秃秃的脑袋上戴着一个用玫瑰枝编成的花冠。他声音粗粝。我寻找着一个图像。这时，他摘掉挂在我右耳旁的一根带刺的玫瑰枝。我猛地低头弄掉玫瑰刺，急急忙忙朝大楼走去。

“是的，”我大声说，“我忘记了跟奶奶说晚安。”

龙——守护神

警告

你不用按照顺序阅读下面的章节！你可以决定这个故事应该怎样继续发展，你可以去创造你自己的冒险故事。

你是一个企业经济学家和一个重点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家的儿子。一个黑社会女头目和一个过早离开人世的——是的，到底是干什么的？——人的孙子。农民的重孙，也是一个女歌唱家和一个艄公的重孙。你就是我。

你又返回养老院，为了向奶奶说声晚安。或许你已经回来过了，奶奶压根儿就没睡去。

斯拉夫人喜欢冒险。许许多多的人在暗中守候着！你的一个个决定会引领你获得成功，无论是怎样的成功。或者使你一败涂地。

祝你好运。

你走进养老院，霓虹灯光耀眼使你眯起眼睛。走廊墙壁上画着各种各样的画。它们都是住在养老院的老人画上去的。有铅笔画，有水彩画。

一座带花园的房子。

一片背靠大山的苜蓿地。

一辆奔驰车。

一张布满皱纹的脸。

你小心翼翼地打开奶奶的房门。她坐在床上，走廊里的灯光映出了她的轮廓。

“是你吗，佩罗？”她头也不回地问道。

你说谎？你说：“是的，就是我。”接着看[此处](#)

你说实话——“是我，奶奶，萨沙。”——接着看[此处](#)

你无视于你知道的关于塞壬歌唱[Ω](#)的一切。你不顾及玩角色扮演游戏时遭遇的一次次经历，森林女妖会诱惑漫游者掉入陷阱。是的，你毫不动摇，只要你朝着那泉水方向走几步，便会有十多个身披叶片的美人儿围着你翩翩起舞。如果有一个偶然与你有肌肤接触，你就会感到舌头上有蜂蜜、草莓或者牛排的味道；你最喜欢吃什么，就会是什么味道。你会越来越渴，越来越想喝水。于是你奔向泉水，而森林女妖们则唱起歌戏弄你：

要是有一个男人知道
这样趴着喝水意味着什么，
那他就绝对不会趴着喝水

你的咽喉：灰尘。你不得不喝水。有一个女妖汲来一些水，把它倒进你的手心窝里。

你接受了她的好意，喝起水。接着看[此处](#)

你直接去喝泉水，趴在草地上。接着看[此处](#)

奶奶说她倦了。她高兴你来了。你坐到她跟前。奶奶牵住你的手。

“你来得太晚了。”

“我现在就在你身边。”

“要是我的佩罗知道你来的话，他会领着你一起去。那他就不会独自一人上山了。”

“爷爷在维亚拉茨山上，我知道。”

“独自一人！离去已经太久了。”奶奶转向我，“你说说，他去哪儿了？我的佩罗去哪儿了？”

你说，爷爷已经死去好久了。接着看[此处](#)

你说，你不是特别清楚，但是在你认识的人中，没有一个自愿久久地守在龙群那里。接着看[此处](#)

加夫里洛黎明前夕前来看望。一个你不认识的男子陪着他。他们的衣服上满是黑点，像是煤灰。你坐在陷入梦乡的奶奶身边。玛丽亚没来。

看到你们时，加夫里洛点了点头。斯雷托耶温存而生硬地拍了你一巴掌。你们相互拥抱，你们相互亲吻。有个陌生人把左手臂紧紧地贴在他身上，手背上伤痕累累，血迹斑斑。

加夫里洛坐到奶奶跟前，问怎么回事。他两眼闪亮，目光落在她的脸上。“我们可以帮忙。”他说，仿佛他在回答我的一个问题。

你说你们在寻找爷爷。在她看来，他还活着。奶奶误以为还生活在他出门去郊游的岁月里，就在这个地方。

“去看火岩了。”加夫里洛补充说。

“你知道这事？”

“我猜想的。”

“最晚到她醒来时，她就不记得这一切了。然后我再把她送回来。呵呵，为了说明爷爷不在家，为了把这次旅程描述得更扣人心弦，我就说他的消失似乎跟龙群有联系。”

一提到“龙”，三个男人都回头看着我。他们希望你接着说下去？还有什么可说呢？你当然不相信龙的存在。你说有就有，你说没有就没有，如同现在说爷爷一样。

三个男人站起来。当他们不约而同地发出响亮的声音时，他们的靴子嚓嚓作响，他们的热血在沸腾，他们的低音和中音在颤抖：“谁说龙不存在的？”

加夫里洛补充说：“你的计划相当愚蠢，如果你要问我的话。”

就在这时，奶奶闭着眼睛大声说：“顺便说说计划吧：什么时候接着说下去呢？”

[此处](#)接着说下去

龙五千年以来一直生活在地球上。这里的龙是从哪里来的，可以在高加索和美索不达米亚那些充满神奇传说的地区找到蛛丝马迹。没有过去数千年那一次次移民潮，奥斯克鲁沙周围地区也就不会有龙。正因为这样，你们才听到——你停放好租车，和奶奶一起下了车——头顶上方的乌云里响起了剧烈抖动翅膀的声音。

“这是怎么回事？”奶奶问。

“只是山里传来了树林的呼啸声。”你说。

奶奶打起哈欠。可你打心底里感到不寒而栗。

你把你的上衣搭在奶奶肩上。车里的灯灭了。这个世界也随之陷入一片黑暗。

手电APP在树林中时亮时灭，到[此处](#)

奶奶离开房间，开始吐露自己的心声：“佩罗和我最近也住过像这儿一样的酒店。不过要美丽多了。在海边。在科托尔。和阿西姆与哈尼法一起。游泳，闲逛，漫步。就这样。”她选择走楼梯，你扶着她，“要是你看见哈尼法和阿西姆，就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能来看看我，我会很高兴。”

奶奶开始讲述发生在酒店里的一桩盗窃案。这时停电了。电立刻又恢复了。在这短暂的黑暗瞬间，奶奶中断了她的讲述。

你去问问，什么东西被偷走了，谁被偷了。奶奶一脸茫然地注视着你，然后继续走下去。

战争时期，哈尼法和阿西姆逃出了维舍格勒，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回来。他们几年前就过世了。没有必要提说这事。

“每年夏天旅行一次，”奶奶在绘着各种各样图画的走廊里说，“不是一定要去一些美丽的地方，不是这样。的确常常会让人感到无聊。但是只要我们形影不离。这就足够了。”她停在苜蓿地画前。她说，她知道这是哪儿。“我想离开，”她说，“你听到了吗？和佩罗一起。我不能骗自己。不是马上就走。而要等到我身体好了。”

从外面传来十分刺耳的响声，有人正在用剪刀修剪玫瑰篱笆。驼背人真的会让你和奶奶一起出门吗？

你要冒这个险，领着奶奶穿过大门，离开养老院大楼。接着看[此处](#)

你在寻找另一个出口？接着看[此处](#)

加夫里洛家里亮着灯。你们透过窗户窥望。奶奶低声地说出一个女人的名字，因为她正在客厅里给餐桌摆上餐具：“玛丽亚。”奶奶认出了加夫里洛的妻子。这更促使你下定决心去敲门。

女主人连问都不问一声就打开门。她微笑着，先是吻吻奶奶，然后又吻吻你。“你们快进来吧，欢迎你们。”仿佛她什么都不在乎。不在乎时间已经这么晚了，不在乎你们最后一次见面已经过去十几个年头了。

你们渴不渴，你们饿不饿。因为你们说又饿又渴，她便拿来水、啤酒和面包，请你们上桌。“我心想是男人们从火岩那里回来了。”她边说边把面包切成厚片。

你们吃着。

战争罪犯的照片不见了。

奶奶把面包泡进水里。

你想知道男人们在火岩上干什么呢。

“和一群女妖吵架呗。”玛丽亚打量着你。你难为情地微笑着。“他们在焚烧垃圾，”她接着说，“在山上焚烧更安全。那里只有岩石，远离树林。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免得我们闻到臭气。”她说着转身望着圣格奥尔格与龙搏斗的画面。或者望着龙与圣格奥尔格搏斗的画面。画面上的形象无动于衷地回望着。

奶奶放下刀叉，打起哈欠。

玛丽亚询问她的健康状况。她没问我们来奥斯科鲁沙干什么。奶奶直言不讳地说她累了。多么想休息一会儿。

那还用说。

她躺在沙发上，用手捂着眼睛。玛丽亚给她盖上毯子。

你祝奶奶晚安。

接着看[此处](#)

你领着她来到对着大楼入口的公共活动室。有几张桌子乱放在那里，还有几把椅子和两个皮面皱皱巴巴的靠背椅。每个角落都摆着一棵闷闷不乐的橡皮树。有人玩着《人啊，别生气》[②](#)的游戏。红的赢了，别的颜色没参与。

奶奶手指间转动着骰子。“我们的玩具都是我们自己制作的。父亲喜欢干那种雕刻和捣鼓玩具的事情。我可爱的姐姐经常和我一起玩。”

你在寻找后门出口。但所有的门都通向卧室，还有一扇通向食堂。橡皮树注视着你。电视注视着你。菜牌和日历注视着你。

一个空鸟舍挂在一根柱子上。你不明白，这是艺术呢，还是鸟儿会回来？

“从这儿真的能出去吗，奶奶？”

她把骰子递给我。还剩下两扇门。

你在掷骰子。

骰子显示奇数：你便打开活动室北侧的门。接着看[此处](#)

骰子显示偶数：你便打开活动室东侧的门。接着看[此处](#)

你在等待。

园艺工冷笑着。

奶奶说：“我小时候经常夜里哭。如果一个小孩夜里经常哭的话，人们就认为女巫会吃掉他的五脏六腑。我的扎戈尔卡帮我赶走黑暗，安慰我。我称她为可爱的姐姐。再说她比我年龄大。她死在我的床上。她开始照顾我，而我最终又照顾她。人生就应该是这样。”

“可爱的姐姐教会了我这样一些东西。”奶奶说着举起手臂，你们周围霎时变得一片光明。

接着看[此处](#)

事情进行得挺顺利，比预期的要容易。你们信步走上大街。你扶着奶奶上车。

她想知道我会不会播放车上的音乐。

你会。

“那就别放了。”奶奶说着闭上眼睛。过了一会儿，她睡着了。

你松了一口气。

你在欺骗奶奶。你在欺骗她，因为你让她相信她丈夫还活着。你维持着一个幻想，就是为了让她的这个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免遭丈夫死亡这个不可挽回的事实折磨。从另一方面说，如果你天天重新告诉她这个事实的话，他会因此每天遭受一次死亡。

当她又醒来时，估计她不再记得你们去过哪儿了。有什么办法呢？

你等着奶奶醒来，把她送回养老院。接着看[此处](#)

交通信号灯显示绿灯。去奥斯克鲁沙。你开车出发。接着看[此处](#)

听了你的话，幽灵把手电筒举到脸跟前。他的指甲就是玫瑰刺，瞳孔就是玫瑰花。在他的眼罩下有什么东西在爬行。他咧嘴一笑，深深地鞠躬致意，宛若一个流浪艺人。起风了，玫瑰篱笆也垂下来。二者保持着这样的姿态。你们蜷缩着身子从他身旁溜过去，穿过玫瑰篱笆。这个可怜的家伙身上散发出特别甜蜜的气味，仿佛老天过分偏爱地给他涂上了香水。

从这里出去，到[此处](#)

耀眼的光线刺得你眼睛针扎似的痛。眼前闪烁着一片红色星点。渐渐地，这个世界才又显现出它的轮廓。奶奶站在租车前，直挺着背，活像一个立正的士兵。你们来到街上。

你身后传来一声怒吼。

“快走吧！”或许是你自己在大喊。余光里闪现一个动作。你跳上车，为奶奶打开车门。她上车，慢慢腾腾地。金属撞击金属的响声，剪刀划在车漆上，这些都顾不上了，整个车身都在晃动。快快离开吧。

接着看[此处](#)

门后还有一间卧室。一盏夜灯投射出一点光线。三个躯体躺在三张床上。窗户敞开着。距离地面大约一米半。如果从那里溜到大街上，你们就不用从园艺工身旁走过去，也不用穿越带刺的篱笆。

你在窗口下放了一把椅子，好让奶奶更容易爬上去。一想到她会从里面跳出去，你就禁不住有点心惊胆战。

奶奶俯身望着一个熟睡的人：“这是我吗？”

“奶奶？”

“你们去了世界各地。没错，这我理解。我理解其中的原因。你们打电话来，问我身体怎样。你们路过来看看，和我喝杯咖啡，给我吃的喝的。你们说，我的牙刷不能用了。你们说，我有一座房子。瞧这地方，这可不是我的房子。这不是我的墙壁。在陌生的房子里，我怎能过得舒心呢？你说说。这也不是酒店，也不是疗养院。因为他们不让我离开。他们只是安慰我。这就是他们对我所做的一切：给我喂吃喂喝，欺骗我，安慰我。”

奶奶把手放在熟睡人的额头上。抚摸着她的头发。

女护理人员们说，她有时候像个小孩似的跑来跑去，给养老院其他人挠痒痒。有些人觉得挺好的，有些人则不然。

你不知道该怎样来回答。你想要直言不讳地说，你现在就是因为她才来到这里。然而，这样说也未必是真的。这就是说：将就一天算一天吧。一如既往地将就下去，或许也只好守着一个事实将就下去——这里不是酒店。

你试图劝说奶奶从窗户逃出去：“我们就从这里逃出去吧！”接着看[此处](#)

这样做太冒险。你不是还想试试从公共活动室的另一扇门出去吗？接着看[此处](#)

你帮奶奶穿衣服。她身上起了鸡皮疙瘩。你把长筒袜套在她脚上，直提到她的膝间。她的皮肤粗糙松弛。一件衬衣。毛衣。毛裤。你竭力要把她的脚塞进靴子里，但靴子太小。

“这不是我的鞋。”

柜子里还有一双平板鞋和一双亮闪闪的青绿色运动鞋。你决定给奶奶穿上运动鞋。

当你跪在她面前时，她问，干吗要这样呢。对付龙群。

“武器。最好是有魔力的。”

运动鞋很适合。

“但愿我们压根儿就不用去战斗。我们找到佩罗后把他领回来就是了。”

柜子里放着奶奶的家当。几件衣服。她的刷子。一把梳子。一个指甲刀。一个空塑料瓶。她的手表。尿不湿。一板剩下一半的巧克力。藏得不是地方，藏在夹着家庭照片的相册下面。这就是她的生活。有朝一日，你应该给那些照片标上名字和日期。

你们走出去，到[此处](#)

林中小道十分泥泞，坑坑洼洼，行走艰难。你们只是慢慢腾腾地前行。尽管如此，奶奶求你再放慢脚步。你们停在一根倾倒的树干上休息。你的手机剩下33%的电量。信号时有时无。

一个钟头后，你们来到第一座房屋前。奶奶停住脚步，注视着房子。一扇通往一片废墟的蓝色房门。电线架子矗立在千疮百孔的屋顶上，房子宛若木偶似的挂在一条条电线上。

“你瞧瞧，如果灯灭了，便是一片黑暗，”奶奶说，“房子里面，在石头垒起的墙壁之间，又黑暗又湿冷。然而，你有妻儿绕膝。你听到他们在呼吸。父亲，年轻时就失明的母亲。可爱的姐姐，我的扎戈尔卡。我毕竟可以躺到他们身边去。辛酸和甜蜜地闻着他们的呼吸，就这样。”

奶奶好像以为她到了童年的村庄斯塔尼舍瓦茨。“我们要不要唤醒可爱的姐姐？”她问。

“这是你们家吗？”

“是的。”奶奶寻思着，“等一等。不是。我们家的房子……我们家的房子是两层。而且屋顶完好无损。我们在底层吃饭和玩耍。我们在楼上睡觉。九个小孩，六个大人，还有两个哥哥的家。”

“奇怪。我不知道我明天要干什么。毕竟每个人到了晚上都知道他第二天要干什么。你就是要去那儿，你一门心思要去那儿。一个人照看奶牛。一个人照看羊。我们家有107只羊。两个人负责烤面包和做饭。有一个人留在家里照看鸡，打扫卫生。各种各样的事。现在是夏天，田地里有活要干。这里不存在你喜欢不喜欢做的问题。你必须什么都会干。最近我补了一整天长筒袜。”奶奶转身望着蓝色房门，“这不是斯塔尼舍瓦茨，对吗？”

你躲开她的目光。“不是的。”

“我明白了我们在哪儿。”奶奶捏住你的脸，“要是我们有马的话，那日子就更好过了。”奶奶走起来。

“怎么，现在走？”

“马看着比你好，你这个小毛驴。再说我也知道路怎么走。”她指着你身后的一座座山。维亚拉茨山顶峰高耸入云，那儿不知什么地方火光冲天。许许多多的火焰。闪烁和熄灭。又活跃起来。火焰蹿来蹿去，绕着一个个弯儿。熄灭。在许多地方又同时闪现。看起来仿佛有人用火焰在夜幕上作画。人或者什么东西。

“龙。”你低声说。

奶奶笑出声来，挽起你的手臂。“那不是蝴蝶，你这个小毛驴。”

今天是2018年10月29日。我写道：“那不是蝴蝶，你这个小毛驴。”我的手机铃响了。我奶奶在罗加蒂察去世，享年78岁。

斯雷托耶的庄园位于东部山坡上，到[此处](#)

最好去加夫里洛那里，他家里好像还亮着灯。接着看[此处](#)

女护理员吓得猛地从办公椅上跳起来。她问发生什么事了，扯了扯自己的白大褂，脸颊睡得红彤彤的。还没等你回答，奶奶便大声说：“我们要去奥斯克鲁沙驱赶龙，可爱的安娜。”

你摇摇头，装作奶奶脑袋不正常的样子，咕哝着说起一次小郊游的事。

女护理已经听够了。你住在养老院里，如果没有报告批准，就不允许离开，更何况还是半夜三更里。她说话的时候挽起奶奶的手臂，把她领到楼梯前和她开玩笑，奶奶便咯咯地笑。

到了房间里，她帮奶奶脱衣服。你希望奶奶会拒绝。她打起哈欠。女护理员让你们单独待在那里，不忘最后向你投去责备的目光。她甚至熄灭了房间里的灯。

“奶奶？一切都好吧？”

你朝着半明半暗里说，到[此处](#)

在罗加蒂察，天才蒙蒙亮，你就醒来了。奶奶离开了。她之前在副驾座上睡着了。你不想唤醒她，你自己肯定也在停放的车里打起了盹。你没在养老院门前发现她。玫瑰篱笆看上去就像玫瑰篱笆看上去的样子。美丽，你认为这样的东西美丽那它就美丽。

老人们捧着热气腾腾的塑料杯坐在阳台上。走廊里，一个女护理朝你迎面走来。是的，克里斯蒂娜，她在这里，正在看电视。

奶奶坐在一张污迹斑斑的皮沙发上，用手指梳理着自己的头发。她头顶上的电视吼叫着早间时事新闻。女主持人向一条小狗提了一个问题。小狗不予理睬。女主持人转向一个小个子先生。他管理着一所为神经过敏的狗开设的学校。

你坐在奶奶对面。她微笑着。

你有没有看到她的梳子。

你看到了。

你会不会给她梳梳头。你从奶奶房间的柜子里拿来梳子，给她梳着头。

她说：“早晨好，萨沙。”

“早晨好，奶奶。”

“我们今天打算干什么？”奶奶关掉电视，端详着你。

“你想干什么呢，奶奶？”

“或许我们去看看扎戈尔卡吧？上一次，你自己一直走到山上面。我压根儿就不用背着你走。从山谷直到家里。”

“我很乐意去。”你说。扎戈尔卡的家已经成了一片废墟，你心想着。

“收获李子的季节快到了。”奶奶说。

你把奶奶扶起来。你们在养老院里转了一圈。然后是游戏时刻。多米诺骨牌分发完毕。在其他老人眼里，奶奶的手指太敏捷了。她每次都赢，奶奶深谙此道。午饭吃的是火鸡肉加土豆和蔬菜。

结束

“你是谁呢？”

你说你是孙儿。

“是这样吗？”驼背人身子支撑在剪刀上，目光扫视过你望着奶奶，“克里斯蒂娜，你可压根儿没对我说过你有孙儿呀。”奶奶闻着一朵玫瑰花。“这是你孙子吗，克里斯蒂娜？”

她摇摇头。

你向她走去，说，你就是她孙子，并说出你的名字。

奶奶一边打着拒绝的手势，一边笑起来。“我家萨沙正上小学呢。他是个好学生，成绩永远是最好的。”

你提到爷爷，你对园艺工说，你可以去车里拿来你的证件，同样的姓，等等。

奶奶问，她可不可以摘一朵玫瑰花。园艺工为她摘下一朵。与此同时，他做了个鬼脸，仿佛他揪掉了自己的头发。他把玫瑰花送给奶奶，陪着她进入大楼里的护理办公室。

你尾随着他们，到[此处](#)

这房子又暗又静。这不是斯雷托耶家的狗西戈吗。当你们走近院子时，它就汪汪地狂吠起来，意味着不欢迎你们。这狗比夜晚还黑。它顶着篱笆，叫声响彻山谷。你好心地哄它。可是它把自己的恐惧看得比你更重要。

要是斯雷托耶在家的话，估计他早就醒来了。尽管如此，你还是用拳头在门上敲了几下。一点动静都没有。你按动门把手。门锁得紧紧的。

今天是2018年10月30日。在我们汉堡的家里，窗台上燃烧着纪念蜡烛。我仔细端详着奶奶的一张张照片。有一张上，我坐在奶奶的怀抱里。我是6岁，也是40岁。我难以回想起她还是一个健康女人时的音容笑貌。我难以在这里保留奶奶活着时的形象。

马儿在嘶叫。奶奶进入马厩里。你跟着她。她拖着马鞍走去。

你现在帮帮她呀，到[此处](#)，你干吗无所事事地站在这里呢？

园艺工在等待着你们。他扛着大剪刀，守在玫瑰篱笆前。叉开双腿。弯着背。剪刀看上去比你来的时候更大。剪刀刃就像是利剑。玫瑰篱笆四处蔓延。枝蔓像触角一样在风中晃来晃去。

“要去哪儿呢，你们两个小宝贝？”他的声音听上去让人局促不安。他用小手指在眼罩下抠来抠去，仿佛要抓住眼球似的。

你站到奶奶前面，一声不吭地等待着什么事发生，到[此处](#)

你说：“我们打算进行一次小郊游，最晚明天晚上回来。”接着看[此处](#)

你读过很多有关南部斯拉夫人民间信仰的故事，你知道这是一个魔鬼，它的生存永远与植物的生存息息相关。它随着植物而活，也将随着植物死去。于是你大声喊道：“让开，地狱里的魔鬼，不然我就割断你的喉咙！”接着勇敢地看[此处](#)

“龙？在维亚拉茨山上？”奶奶摀住你的手。

“树龙。洞穴龙。变身龙。三头六臂的庞然大物。会吟诗的蛇。圣格奥尔格不是特别细心。”

“你乱七八糟说些什么呀？”

“什么乱七八糟？好吧。那么我们干脆就在这里等着佩罗回来。”

她突然跳起来。寻思着，身子挺得直直的，声音很大，你担心她会吵醒同屋的人。

“龙。”她过了一会儿说。接着，她不由自主地笑起来。在这污浊的房间空气里，在这用薰衣草来对付蛀虫的世界里，她放声大笑起来。

当奶奶问起是不是“树龙”时，她的神情又变得严肃了。

“树龙收藏闪闪发光的東西。”

“如果你不由自主地害怕碰上一条树龙，那我们就不能穿金戴银了，”奶奶边说边打开衣柜，“你现在就帮我换身衣服吧。”

“我们要离开这儿？”

“是的，去驱赶龙，你这个小毛驴，快快把龙赶走吧。”

驱赶开始，到[此处](#)

天亮了。奶奶不见了，那些狗也无影无踪了。你下了车，呼喊着想从前一样：“你把球扔下来，奶奶。我饿了，奶奶。”她的脑袋便出现在窗前，你需要什么，她就给你什么，或者不给。

奶奶的脑袋出现在窗前。满是疑虑地晃来晃去。

你呼喊道：“我好害怕呀。”

奶奶大声说：“害怕又能怎样？”

你上楼去。门上贴着讣告。你走进去时，母亲已经煮好了咖啡，正在搅动着。她吻吻你。父亲、叔叔和饼干在客厅里等待着前来吊唁的客人。一位当年的女邻居和她儿子正好刚进来。他说他认识你，你们小时候在楼梯间里踢过足球。你记不起来了，又说，你回想起来了。

奶奶坐在沙发上洗耳恭听。赞扬死者。玫瑰色罩子被揭去了。今天是2018年11月1日。奶奶已经去世三天了。在那张有玻璃板和钩织台布的小桌上放着四个手机。母亲给大家斟上咖啡。

二楼的女邻居佐丽察拥抱你，她拿了一块饼干说，她在市场上碰到了神父，他将会主持在墓地举行的葬礼。

你感到惊讶。

“这是她生前的愿望。”叔叔说。

“而且，家里最年轻的男性后辈要扛着十字架去墓地，”父亲补充说，“当然就是你了。”

这一定是在开玩笑吧，你回应道。如果你拿上十字架，要么是十字架、要么是你的双手会燃起火焰，估计二者都免不了如此的厄运。

奶奶说：“你可别一心只考虑自己。”

“要是爷爷听到有一个东正教神父在他的坟墓上张牙舞爪的话，”你说，“他会从坟里爬出来，非得亲手把这家伙揍一顿不可。”

“会这样的，”佐丽察说，“要是神父在他的坟墓上说三道四，他肯定会这样做的。”

“神父会有什么反应呢？”

“耿耿于怀吧。克里斯蒂娜几年前就把这事说好了。”

“这不是真的。”

“是我把他带到她那里去的，我对着母亲发誓。克里斯蒂娜躺在医院里。他忍不住说明了墓碑上的星象。要我转告克里斯蒂娜，把那块墓碑弄走。她听到这话后非常恼火。”

两位年长的女人和一个浑身弥漫着香水味的女子走进来。奶奶翻了个白眼消失在卧室里。你跟着走进去。

“我觉得请神父的事很可笑，”你说，“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宗教信仰了？”

“这不过是以防万一，防止这个时候真的出现什么问题。要是一切顺利的话，那你就不过是花点儿钱，忍受一下那无聊的哼唱罢了。况且，是你们去，我可不去。”奶奶咧嘴

一笑。

旁屋里，父亲讲述着他有一次想帮姨妈扎戈尔卡劈柴的事。他拿起斧子试了一次又一次，怎么都劈不开，直到扎戈尔卡走出来，从他手里夺走斧子，咔嚓咔嚓地劈开了半个林子。奶奶挥手示意，那一个个故事便静默无声了。她打开抽屉。在衣柜里，她把鼻子贴在她的衬衣里。她的全部钩织品都摆放在玻璃柜里。桌布、垫子、装饰悬挂品、枕套等。为了做这些东西坐了多少个日日夜夜？她用手指抚摸着一个个图案，拿出几个来让你看。那肯定是一些做得特别满意的珍藏品。可你却不识货。

“我感到很遗憾，我们没找到爷爷。”

“不用了。”她坐在睡椅上。那个绿色的、可拉长的睡椅，比你的年龄还大。她抚摸着它的表面。你知道这种布料在波斯尼亚语里叫什么，但不知道德语名称。你非常熟悉它摸上去的感觉。十分柔软，但也有点粗糙。

“我本来应该为了你在这里多待一段时间。”你说，“我们大家本来都应该如此。”

“一切都挺好的，我的太阳。我们有过共同的岁月。我们还可以讲述一些事情。”

“讲述什么呢，奶奶？”你坐到她跟前。

奶奶抱着你的下巴，亲吻你的额头。“啊呵，你知道吗，也许我们应该保持沉默。然后我离开。他们又在外边呼喊了。他们应该再等一会儿。”

他们又在外边呼喊。爷爷在呼喊，你希望如此。那个姑娘，还有那个士兵。阿西姆和哈尼法。兄弟姐妹。声音最大的是可爱的姐姐扎戈尔卡。

奶奶闭上眼睛。奶奶倾听着。

奶奶问：“这是我吗？”

结束

不，还不到结束的时候。一个亲爱的人行将辞世。已经走了。“这是我吗？”是奶奶说的最后一句话。这话不是说给任何人听的，是说给自己听的，是说给我听的。这话是在罗加蒂察养老院说的。两年来，在这个故事里，我一直问自己：这是我吗？父母的儿子，爷爷奶奶的孙子，太爷爷太奶奶的重孙，南斯拉夫的孩子，战前逃亡，偶然来到德国。父亲，作家，人物。这一切是我吗？

我竭力回忆童年的一幕幕情景。可此刻浮现在脑海里的东西少之又少——我的绰号回响在耳际，奶奶总是说：“对你来说，一切都是游戏，小宝贝。”那是一段受到无微不至呵护的童年，一段无拘无束天真烂漫的童年。

我还是这样吗？

战争结束后，每次去看望奶奶，她总是匆匆忙忙。去一次，我们彼此就疏远一些，那亲密的东西成为历史了。我总是匆匆去，匆匆回。而她始终待在那里。

我带着女朋友和孩子去看她。那是孩子出生后九个月的事。奶奶推着坐在童车里的重孙去逛街。由于不懂操作，车子越走越快。她跟在后面奔跑，一边奔跑，一边慈爱地冲着重孙说话。

我把手贴在她脸上。我祝愿奶奶晚安。我一直等到她进入梦乡。我坐到公共活动室里。鸟舍里有一只金丝雀。我打开《我从哪里来》文件夹。我写道：

我把手贴在她脸上。我祝愿奶奶晚安。我一直等到她进入梦乡。我坐到公共活动室里，鸟舍里有一只金丝雀。我打开《我从哪里来》文件夹。

结束

然后又删掉它。

我写道：奶奶看到大街上站着一个小姑娘。她从阳台上向小姑娘大声呼喊，让她别害怕，她就去接她。你站着别动！

奶奶只穿着袜子奔下楼去，要下三层楼，她走啊走啊，踉踉跄跄，膝盖不听使唤，上气不接下气，腰也酸，背也痛。当她来到小姑娘刚才站着的地方，小姑娘却不见了踪影。

结束

你还从来没给马上过鞍。奶奶上过，但已经忘记了怎么上。她一边帮忙，一边说着以“我觉得，你必须……”打头的话。但是这样也不行。或者：这样能行，只是你们没做到位罢了。马儿很快就失去了耐心，变得烦躁起来。

你掏出手机。没有网络。到了马厩门口：网络连接上了。你在YouTube上搜索“怎样给马上鞍”。上面有无数视频。你站在奥斯克鲁沙一棵山梨树下，等待着一个视频向你展示来自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³⁾的米娅怎样给她的马上鞍。

奶奶伸手抓住你的手机。你允许她把手机拿走，因为这样是对的。她久久地抚摸着屏幕，直到它变黑了。

“当父亲晚上说，‘克里斯蒂娜，你去把马儿照管好’，我就很高兴，”奶奶边说边抚摸着马的肋腹，“我们家有两匹马。一匹用来骑乘，另一匹用来驮运货物。泽坎。骑乘的马叫这个名字。另一匹——我记不起来叫什么了。我可以骑得很快，但我总是慢慢骑，也不用赶时间。骑乘的马叫泽坎，德国人管它——”奶奶停顿了一下，“士兵们有叫泽坎的马吗？”她没期待任何回答。奶奶轻轻地拍了一下马，转身走进院子里。

“我们继续走吗？”

“不。去睡觉，明天再继续吧。”奶奶说。

“好吧。我们可以去看看，玛丽亚和加夫里洛在不在家，去他们家里过夜。或者我们开车直接回维舍格勒。”

“我觉得好冷。”奶奶说着就跑起来。你追上她，让她跟着你。

——走向加夫里洛家：接着看[此处](#)

——走向车，回维舍格勒：接着看[此处](#)

山毛榉树叶在风里闪现出红色和橙色。矮树林和灌木丛一直在阻挡马儿前行。你们必须下马，牵住缰绳。唯有奶奶留在马鞍上。加夫里洛牵着奶奶的和自己的马穿行在树木之间。

“你觉得怎样，奶奶？”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喜欢骑马，但很少骑，”奶奶说，“我不了解这片树林。这不是回家的路，对吗？”

“你家在哪儿？”

“我的太阳，”奶奶说，“我的快乐。我的小毛驴。你什么时候才能明白这事呢？什么在哪儿，或者你从哪儿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去哪儿。其实最终连这也无足轻重。你看看我：我既不知道我从哪儿来，也不知道我去哪儿。但我可以告诉你：有时候，这种状态也不是很糟。”

我能说什么呢，我什么都想不起来。几个钟头以来，我待在奶奶位于维舍格勒的房子里。一整天人来人往，向我们表达深切的哀悼，不是喝杯咖啡，就是喝杯烧酒，或者别的什么东西。我不了解这些风俗习惯。在离世与葬礼期间，家人必须守在这里接待客人。

“我死了？”

“我不了解这些风俗习惯。房门一整天都敞开着。”

“我是怎么死的？”

“你的儿子们和儿媳们都在这里，还有你的孙子们。”

“我是怎么死的？”

“在梦乡里。”

“人们是这样说的。”

“一个女邻居带来了皮塔饼。”

“土豆皮塔饼？那是拉达。”

“她泪流满面。”

“她说了什么吗？”

“她深表感谢。感谢你。皮塔饼是给孩子们吃的。他们的母亲和奶奶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因为你帮过她——”

“在她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是的。那个警察也来了。”

“安德烈吗？”

“是的。”

“他悲伤吗？”

“大家都很悲伤，奶奶。”

“安德烈悲伤时，看上去那样英俊。你在哪儿呢？”

“在你的卧室里。”

“你在写你的一个个故事吗？”

“是的。”

“现在接下来怎样写呢？”

你知道怎样写吗？接着看[此处](#)

你不知道怎样写？接着看[此处](#)

大雨让你们只能在滑溜溜的岩石上缓慢前进。每一步都是冒险。你们脚下的碎石哗啦啦地滚入深谷。你们蹚过一条小溪，它像瀑布一样雾气腾腾地冲向山谷。溪水暖融融的。

奶奶下了马，洗把脸。她要步行前进。你们轮番守在她身边，时而是加夫里洛挽着她的手臂，时而是斯雷托耶向她伸过手去，时而又是你。奶奶脸色苍白，但不知疲倦。

山坡上出现越来越多的碎石。闪闪发红的石块像鳞甲一样遍布山脊。火岩。数十年前，你父亲在这里唤醒了一窝蛇，成为他心灵上永远挥之不去的恐惧。你一生也背上了这样的恐惧，它永远铭刻在一个词语里。

顶峰就守候在我们上方，一道呈石灰白的陡峭岩壁。加夫里洛走上一条和山脊平行的羊肠小道。从岩石里喷射出一条条烟雾柱。从无底深渊里散发出硫黄味。一只老鹰站在突出的岩石上嘶叫着。斯雷托耶说：“它们已经在守候了。”

要不是加夫里洛提醒，你恐怕不会注意那个山洞入口。山岩上有一道裂缝，宽度正好能让一个身材不太高大的人穿过去。加夫里洛打着灯笼走在前面。玛丽亚递给你一支火把，跟在奶奶和你身后走进洞里。斯雷托耶在入口前停住脚步。

山洞穿过岩石缓缓向下延伸。从山的深处传来一阵阵响亮的敲击声，伴随着——一颗缓慢跳动的钢铁之心——你们的步伐。到了第一个岔口，你们停下来休息，而敲击声也随之沉默。你们喝了口水。当奶奶走动起来，敲击声又回响在山洞里。

你们穿过第二个岔口，又穿过第三个。加夫里洛在岩壁上留下粉笔标记。接着每遇到一个岔口，他都寻思半天，思考得越来越久，和玛丽亚商量着。玛丽亚接手当向导，但很快同样停在一个有许多分岔的路口前。两人回头转向你们。

“山洞是活的，千变万化。”加夫里洛说。

“你们要当心。”玛丽亚说。

“对每个人来说，穿越山岩的道路走向各不相同。”

“不是人人都有可能到达目的地。换句话说吧。”加夫里洛说。而玛丽亚补充道：“我们是在绕着圈走。”她指着那一个个粉笔标记，“无论加夫里洛或者我选择哪条道，我们都一再返回原地。对我们来说，没有别的路可走。”

“你们不应该踏上这段旅程，维亚拉茨山说。它恐怕会让我们一直在这里原地打转。”

“只有返回去，”玛丽亚说，“走出山洞。这是有可能的。”

山洞里暖融融的。水珠滴滴答答地掉落在石头上。

“不可能返回去。”奶奶说，“你们不应该踏上这段旅程。”她拥抱着这两人。“一个美好的故事”，她说，“就像我们的德里纳河从前一样：绝对不是静静的涓涓细流，而是湍急、宽阔。一条条支流使它变得越来越汹涌澎湃，让它奔腾咆哮，漫过堤岸。无论是德里纳河还是那一个个故事，二者都没有回头路可走。”奶奶端详着你，“我希望我们最终能到达目的地。”

“——并从你手里，玛丽亚，”她伸开手臂，“接过这把剑。”

一片寂静。在山洞里。在罗加蒂察养老院里。在2018年11月2日清晨维舍格勒的奶奶墓前。

“如果我们继续走下去，等待我们的会是什么？”你问。

“只有你知道是什么，”奶奶说，“我在罗加蒂察。我在维舍格勒。我就是你要描写的对象。”

到了离开山洞的时刻。你把奶奶送回养老院吧，到[此处](#)

今天是2018年10月31日。对我来说，这是离开虚构的时刻。奶奶不在了。今天，前来吊唁的客人们向她做最后的道别。奶奶还活着。你送她回家吧，下一页

永远不要停止讲述一个个故事。你们越来越深入山洞里，到[此处](#)

快到维舍格勒时，奶奶在副驾座上睡着了。你盘旋行进在一条条空空荡荡的街道上。路灯光给一座座房子的表面涂上了暖融融的灰暗光彩。马哈拉区的信号灯毫无意义。当信号灯变成绿色时，一群狗站起来，跟在车后慢慢腾腾地走过来。

雷扎夫河上的桥和永远产卵的大头鲑鱼。永久禁止钓鱼。鳞次栉比的房屋之间有一个缺口，药店曾经坐落在那里。一家家中国商铺。有一个女邻居十分惊讶地讲述了一个中国婴儿的故事，仿佛她在谈论一个马戏团节目。总结：“是中国小孩，难以置信地可爱。”第二座清真寺没有重建。这房子对面是游戏厅吧，自动游戏机和弹球游戏机丁零当啷的响声诱惑着来来往往的人。这里如今是一家彩票店，一个35岁上下的女人值班，从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3点到6点之间，她的两个黑发孩子待在她身边，一个3岁，另一个6岁。

这样没完没了的家长里短总归得有个头吧。

你把车停在院子里。一群狗寻思着。你没下车，一直等到它们走开。它们分守在车身周围，躺在柏油路上。奶奶轻轻地打着鼾。

你也打了一会儿盹儿。你醒来了，到[此处](#)

奶奶绝对知道她在哪儿，她也明白她为什么在那里。

她固执地说：“我们该出发了。”

加夫里洛也不准备拦她：“如果我们要上山去，”他说，“那我们就必须有充沛的精力。你能吃得消吗，克里斯蒂娜？”他打算把她扶起来，而她则要向他展示自己的力量。她自己还能行。

男人们在盥洗盆里洗了洗脸。那个受伤的人和加夫里洛商量了一会儿后离开了房子。好像要发生什么事。餐桌上摆好了六套餐具，你们六个人。

玛丽亚走进客厅里。瞧她的模样：头发编成了辫子，额头上装饰着一个金色的冠状头饰。加夫里洛站起来拥抱住她。一件武器的球形手把从她的肩头露出来。没人问什么，于是你也保持沉默。就是这样一个夜晚。武器：一把利剑。

大家都坐在桌旁。客厅里十分暖和。你的眼皮沉甸甸的。加夫里洛和奶奶在桌子顶头窃窃私语。你听不清他们说些什么。

那个受伤的人又返回来。他手上的血迹不见了。他向加夫里洛点点头。而你也明白过来：出发。

“你会骑马吗？”

几匹马儿在院子里等着。一方面，我已经许多年没骑过马了，另一方面，我还分到了一匹桀骜不驯的家伙。过了没多久，道路开始上坡，相当陡峭，你只能跟在其他人的后面走。

天色渐暗，但太阳还藏在云层背后。在维亚拉茨山顶峰，雷声开始轰鸣。你们来到一片山毛榉林边，停下来休息。山毛榉叶子无视季节变化，呈现出秋天的红色。四面八方传来树叶哗啦哗啦的响声，弥漫着最后决战的暴风骤雨的气息。

你们骑行进入树林深处，到[此处](#)

你们离开树林。狂风骤雨无情地拍打着你们。这里的山上没有遮风避雨的地方。维亚拉茨山的另一种面目几乎是赤裸裸的石头。遍地苔藓，到处是奇形怪状的灌木丛。

你望着手机，想看看几点了。在这即将登顶的关键时刻，要是电池还有电量，你会为此惊讶不已。

“佩——罗——！”奶奶突然大声喊道。喊声回荡在山上。过了一阵子，雨水顺着奶奶的名字倾泻下来。那一座座山拖着一个男人的声音呼唤着克里斯蒂娜，一个让奶奶微笑的声音。

登上山顶，到[此处](#)

在一片旷地边上，一片草地，四周云雾缭绕，到处回荡着女人的歌声。这个词似乎十分熟悉，但又十分陌生——一种古老的方言？——如此悦耳动听，加夫里洛告诫大家要小心，示意你们绕开这地方走。

云雾缭绕。

右边是陡峭的山坡，左边的旷地是越来越迫近的诗情画意。

马儿都变得惊恐不安。

你跟着加夫里洛和奶奶，走在你身后的是玛丽亚和斯雷托耶，那个陌生人收尾。你还不知道他的名字，不久后他必然死去，就像《星际旅行》[\(4\)](#)里履行宇宙使命的无名乘务员一样。

你滑倒了，因为你失足踩在露水上。你顺着山坡向下滚去。你紧紧地抠住草地，才避免了身体继续下滑。

草热乎乎的。草茎缠绕，仿佛它们试图从你的手掌中挣脱出来。一个合唱团在你的肩头歌唱，越唱越响亮，一团团云雾向你飘来。

你渴了。突然间，难以忍受的干渴。

正好，旷地中间有一眼清澈的泉水。

更巧的是，你一下子明白过来唱的是什么，唱得如此迷人：

要是有一个男人知道，
与我们同饮意味着什么，
那他就
绝对不会与别人同饮

显然这是一个陷阱。你又躲进树林里，到[此处](#)

选择水和一些要与你一起喝水的女妖，到[此处](#)！

“这就是说：当一个村子衰亡时，它的水源也会随之枯竭。”奶奶嬉戏着从岩缝里渗出来的小泉水。喝着小泉水。让它从剑刃上流去。“我们斯塔尼舍瓦茨的水非常令人讨厌。我们村坐落在山坡上，但水源在山脚下，而且还在第一座房子下方。考虑得很不周全，人们肯定会这样说。你一辈子都要把水往山上背。因为像我们这样的人宁可移山，也不愿意挪动房子，世代都是这样。”

奶奶动身了，然后又停下来，把手捂在胸口上，大口地喘着气。是纯粹的意志力支撑她继续走下去。她听命于心灵深处跳动的节奏。

你标记了你们穿过的每个十字路口，依然没有形成一个回环。到了下一个十字路口时，你选择两个山洞中比较宽大的。那里有一道吼叫声，会让整座山颤抖起来。声音如此之大，仿佛它是从下一个转弯的地方传过来的。一股热浪迎着你们扑面而来。

奶奶跪倒在地上。敲击声变得越来越缓慢，最终彻底无声无息了。

你急忙赶上前去，她挥手拒绝，揉了揉眼睛。此时此刻弥漫着一股仿佛有草在燃烧的气味。你的眼睛也发痒。奶奶吐了一口唾沫。继续走，奶奶要继续走下去。

走到山洞尽头，眼前是一块狭窄而突出的山岩。放眼望去，别有洞天：在你们上方是一个圆形火山口，乌云密布的天空形成一个顶盖。在你们下方，到处是烧焦的景象，遍地裸露出被火熏黑的岩石，上面散落着一个绿色的小岛——一片片草地和一个村落。一根根闪亮的石柱将它们与其余烧焦的或正在燃烧的世界隔离开来。一条环状的火流包裹着整个画面。总而言之，到处都是熊熊大火，到处都冒着火星和烟雾。到处都是龙的身影。

一个不可捉摸、闪耀着鳞状光芒的密集图像。大龙和小龙，大多是长着翅膀的龙。它们安歇，它们进食，它们喷吐火焰，它们依靠锋利的前爪沿着村庄爬行。千足龙，洞穴龙，还有脑袋上长角的长颈蛇妖，它们从火流里冒出来。

火流上架着一座木板小桥，亮闪闪的，尽管与火焰近在咫尺，但看上去安然无恙。在小桥抵达对岸的地方，岩石张开大口。一个强大的裂隙喷发出势不可挡的黑暗：阴暗从那里把爪子伸向世界深处。

一个三头巨妖守卫着桥。瞧它那粗暴的举止，每个皱巴巴的脑袋都像在训斥另外两个。谁也弄不清楚，这条龙守卫着桥，是为了不让任何不属于对岸的东西穿越过去，还是为了阻止不许在我们这个世界存在的东西逃离出来。

巨大的厅堂墙壁上布满蜂窝状的孔洞。奶奶和我也站在这样一个厅堂里。一条又一条龙离开或飞进来，如同那条淡红色的龙的样子，长长的尾巴形成它的尾翼，翅膀宽大而透明，依靠它们，它可以毫不费力地盘旋而上。现在它正朝着你们飞过来。

奶奶举起剑，到[此处](#)

你感到喉咙里有冰冷的水，脖子上有一只冰冷的爪子抓住你。有什么东西将你拽入深渊。有什么东西与你翩翩起舞。它看上去是什么样？这取决于你。魔鬼对每个人来说都不一样。不管怎么说，照此看来，仿佛你的旅行

结束

“真是胡言乱语！”奶奶大声说，“现在我们已经走了这么远，而你居然会中魔鬼的圈套？”

“我和魔鬼谈好了一笔交易。”

“你说说。”

“明天吧。时间晚了。”奶奶嘟囔着躺下了。我给她脱掉拖鞋。奶奶是我幼年时的善良女妖。

“小宝贝？”她低声说，我的绰号回响在过去的岁月里，“对你来说，一切都是游戏，小宝贝。”

我给她盖上被子，又在她身边坐了一会儿。

结束

你攀登着，只要泥泞光滑的土层允许，你便尽可能快地攀登着，你要回到山坡上去。有人向你伸出手，把你拽上去。歌声依然回响着。但树林在叽里咕噜地抱怨。玛丽亚惊恐地抽出剑。加夫里洛一边安慰她，一边劝说她。大家都必须保持镇静。

后卫无声无息。陌生人再也不见了踪影。你们呼喊着，又往回走了一程，一路寻找。可什么都没找到。女妖的歌唱此刻越发欢快了，一片兴高采烈的情景。看来情况多有不妙。

“一群女妖。”奶奶吐了三次唾沫。

加夫里洛、斯雷托耶和玛丽亚商量着该怎么办。他们一再仰望天空。天开始下起雨。

“继续前进，”加夫里洛大声说，“我们走着瞧吧。也许她们这一次只是想跳跳舞而已。继续前进。”

他加快速度，到[此处](#)

你说话的声音太大。奶奶的室友在床上动来动去，一边还咂着嘴。

奶奶躺下去。“你给我盖上被子好吗？我简直累坏了。”

你给她盖上被子。你小时候，她不知给你盖过多少次被子。你祝愿奶奶晚安。

“挺好的，我们住在这里。”她一边低声说，一边寻找你的手。

你不明白，她所说的我们指的是谁。你也不明白，她的这里是哪儿。无论是谁，无论是哪儿：毕竟有什么东西是好的。

结束

第一口水如此甜蜜，立刻缓解了你的渴。你情不自禁地喝光了女妖递给你的水——

——接下来你看到的是上面的旷地：你飘飘欲仙，女妖们与你翩翩起舞。如此轻松自在，令人惬意，况且你也熟悉所有的舞步。不知什么时候，你总会疲倦的。你想继续——

——现在是秋天。你之前没想到，女妖们都有洁癖。你每天必须清扫她们的树屋，在山涧里清洗她们的餐具，当然不用洗洁精——

——冬天来了。你没别的衣服，只有你来这旷地时穿在身上的衣服。女妖们嘲笑你，她们有时候帮你取暖——

——春天来了。你再也没有清静的时刻了；游戏、跳舞、打扫卫生，这就是一切的一切。女妖们没法订阅网飞⁽⁵⁾，但她们至少可以把一些新歌收录进她们的剧目里。你跟着一一起唱，吃的是地地道道的环保食品，穿着用树叶做成的衬衫。你不是她们中的一员。按照她们的想法，你只是融入其中，你和她们的地位并不平等，也不能拥有自由。

你开始苦苦思索一个逃亡计划。

结束

“什么，结束了？”奶奶大声说。我坐在床边，感受到她的恐惧。她的室友不知什么时候醒来了，听到了她说的话。她也大声说：“不，不，还没有结束！”

“你为什么不问我一下？你和那帮家伙一起喝水，那你就成为她们的人了！”

“此时此刻，这话说得有点晚。”

“那里什么都没有，晚了。你别接受女妖的水，明白吗？你压根儿什么都不用做，只有从那里逃走。就这样，继续前进，走出树林。我要去山顶上。”

那好吧。接着看[此处](#)

“别说啦。”

“奶奶？”

“人们出于截然不同的原因彼此联结。我用不着给你一一赘述。”

“奶奶。”

“讲述也不能维持我的生命，萨沙！你把星星之火变成熊熊大火。你言过其实，夸大事实。出身是某种与龙共舞的隐秘图像？一条龙守卫着架在火流上的、通往彼岸世界的木板小桥？”

“那是你的小桥。”

“什么？”

“我一定要陪伴着你去那里。”

“这话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

“这只是我的自言自语。”

“那就更加糟糕。”奶奶躺下去。

我们在维舍格勒。我是你孙子，4岁或者14岁或者24岁或者34岁。奶奶说，我不能披着湿乎乎的头发出门。

我们在美国。在一个暖融融的夜晚，奶奶问我在海德堡的日子过得怎样。我讲述了沃伊泰克匍匐向上爬行穿过整个埃默茨格伦德。我讲述了我们在树林里烤全羊，有一个牵着猎狗散步的女子询问我们烤的是不是一条狗。

我们在贝尔格莱德一个汽车站里。天色已晚。我们等待着开往维舍格勒的班车。我们很疲倦。那里的墙上写着字。我问上面写的是什麼。我也许4岁，至多不过5岁。奶奶不耐烦地说，我应该自己去看。我说：“出口。”奶奶微笑着，捏住我的下巴，亲吻我的头发。

我们在罗加蒂察，把多米诺骨牌垒成一座塔，直到一块都不剩下。我们一起喊着推倒的倒计时：“3，2，1——”奶奶放声大笑。

我们被发现了。那条龙抖动了三四下翅膀就直接浮现在我们面前的空中。它的翅膀是透明的。它嗅来嗅去。它的瞳孔里闪现出数百年之久的黄色火焰，是虚构的故事。

“大龙，你好。”奶奶说。龙眨眼示意。奶奶放下剑。龙又一次眨眼示意，这时它看上去仿佛在鞠躬致意。此时此刻，它的脑袋直接伸到那块突出的山岩跟前。我们就站在那里。

奶奶迈出第一步，接着又一步。她骑到龙脖子上。我跟着她。我当然跟着她。你不可能让自己的奶奶一个人跟一条龙离去。龙掉转头，冲进熙熙攘攘的人群里。

我们飞过一个小岛村庄，其中有一座石头房子位于湛蓝的湖边。房前还有果树和菜地，十多个人在那里载歌载舞。

“一群少女，”奶奶大声说，“她们看样子好像特别开心。”

我们猛地一下降落在小桥旁的三头守护神跟前。三个脑袋随之停止争吵，左边的抱歉地说：“我来自一个俄罗斯的龙的传奇，我压根儿就不应该待在这里。”它闭上眼睛。

“我猜，我丈夫就在对面？”奶奶转向另外两个脑袋说。

“请问您丈夫尊名大姓？”中间的脑袋说。

“佩塔·斯坦尼西奇。”

它专心致志地查看着一个巨大的记事本，一页又一页地翻着花名册。左边的脑袋问，我们等待期间，要不要喝点什么。这里有血、水、山梨汁以及所有的外语。我选择西班牙语。奶奶选择水。我用来喝的玻璃杯上有一个小裂纹。

中间的脑袋彬彬有礼地向一旁吐出一团火说：“我找到他了。”

“他能出来一下吗？”奶奶问。

“这可是个新鲜问题。”龙说。

“那可以吗？”我说。

就在这时，爷爷慢慢悠悠地从黑暗里走出来，走上小桥。他留着髭须，穿着衬衫和上装。他看上去神采奕奕。奶奶一直觉得爷爷是这番模样，也一直这样说。奶奶的客气让爷爷受宠若惊。

“克里斯蒂娜，你在这儿干什么呢？”他问，眼睛瞪得大大的。他几步就走到她跟前，紧紧地抱住她。她也紧紧地搂住他。不知什么时候，他们转向我。

“你瞧瞧，是谁把我带到这里来了。”

“这是——”

我握住爷爷的手。我寻思着合适的握手劲儿。可就在这时，握手已经结束了。

“你跟我们一起走好吗？”奶奶问爷爷。

“我可以吗？”

中间的脑袋说，没问题，你可以。“数千年来，从来没有一个人想到回头路也是可行的，难道这不奇怪吗？除了希腊人有过一次，即便是那一次，后来也是以失败告终了。”

龙甜蜜地嗫嚅着，但我把这事保留在心上，谁也不愿意和龙吵架的。

“请您在这里签字，”龙对爷爷说，“请您在这里签。”又转向奶奶说。我们告别时，龙又补充说：“请把这个同志送回来，最晚不能超过48小时。”

加夫里洛、玛丽亚和斯雷托耶装作没看到这条把我们一直送到山洞出口的龙。一看见我们，他们好像很高兴，如释重负。他们拥抱爷爷，仿佛他从亡灵那里回来了，我几乎会这样写道。

关于走下维亚拉茨山，仅仅还有一个细节要讲述：半路上，我们碰到一条蝰蛇，我不想断言，这不过是阿兴多夫而已。

我忠实地阅读过
这些话，质朴而真实，
穿过我的心灵深处
变得无与伦比地明晰。

我们打算马不停蹄地赶回维舍格勒，48小时不算太久。我们为失去那把剑而道歉，与那些奥斯克鲁沙人道别。

我坐在驾驶座上。奶奶和爷爷坐在后座上，他们彼此有说不完的话。各种各样的事。你后来干什么了？再后来呢？说说吧！奶奶的回忆天衣无缝，无可挑剔。一一地娓娓道来。也说到那场战争——这时，我们正好驶过一片关于塞尔维亚的暴力涂鸦。我期待着爷爷会谈论起政治。然而，他只是一个劲儿地靠近奶奶。

回到家里，我们喝咖啡。“这是我们三个第一次一起喝咖啡。”爷爷说。

“这家伙已经尝过了，”奶奶说，“当时他还不满4岁。”

我们再也没什么问题了，这样太好了。我闭上眼睛。

我闭上眼睛，2018年11月2日。在这里，在我的眼帘后面，浮现出一系列我曾经历过的事情：

奶奶克里斯蒂娜和爷爷佩罗。

我的内娜·梅耶玛，她抛撒红芸豆为我预测未来。有一次，她对我预言说，我将会有许多条命。像猫一样？我问。

猫的生命只是迷信。她干脆地说。

外公穆罕默德，他是管火车刹车的。有一次，他随着一列运木材的货车陷入极端恶劣的暴风雪里。他系紧大衣，一路跑回维舍格勒，穿过雪地和刺骨的寒冷，跋涉了30多公里路程。这个故事有一个出人意料的高潮，那就是他活下来了。母亲回想起她父亲那冻成一团的眉毛。他那天没刮胡子，第二天也一样。

一只瓷鸟，那是我和父母最后一次度假时带回来的。只要你给这只鸟灌上水，冲着它的屁股吹口气，它的前部就会传出叽叽喳喳的叫声。我很喜欢这样做，因为我喜欢度假。

布拉戈公司⁽⁶⁾生产的汽车模型，比例为1：43。我拥有40多个。炮声轰轰隆隆。不得不丢弃它们。我儿子收藏汽车模型，但他还不明白收藏是一种理念：他只是有许多汽车模型。在eBay上，当年那些模型价值8到25欧元不等。我订购了一辆白色保时捷924（原装）。

我睁开眼睛。奶奶和爷爷坐在那里，互相凝视对方。

此时此刻，我不知道事情接下来会怎样。

我说：“回头见。”于是跑出去玩了。

结束

或者你想有一个看上去很真实的结局？葬礼？11月2日，一家人聚集在墓地里。一个侄子打着十字架。神父念着祷文。他念了很久，持续的时间磨去了哀悼的棱角。当棺材下葬时，大家才哭成一片。

然而，棺材太长。掘墓人之前就担心放不下，已经预留了弧度。尽管如此：棺材卡在墓穴里，几乎贴近地面，而且还有点倾斜。

男人们拉着棺材绳，有一个人踩到棺材上，也许这样可以将它放平，但无济于事。人们决定这样就行了。棺材已经下得够深，再说也不是那么倾斜。

结束

- (1) 塞壬是希腊神话中半人半鸟的女海妖，常用美妙的歌声引诱航海者触礁沉船。
- (2) 一种十字跳棋游戏，在德国很受欢迎。
- (3) 德国最北部的州。
- (4) 1966年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首播的科幻电视剧，此后又衍生出其他电视剧和电影。
- (5) 网飞（Netflix）是世界最大的收费视频网站，向用户提供电影和电视节目订阅服务。
- (6) Bburago，意大利玩具车品牌。

致谢

感谢我的父母，是他们带给了我欢乐。感谢我的祖父母、外祖父母，他们都心地善良，为我讲述了许多故事。

感谢埃默茨格伦德的阿拉尔加油站，感谢拉希姆、弗雷迪、维尔纳·格布哈特、约瑟夫·冯·艾兴多夫、海德堡国际小学、海德堡和莱比锡移民局的办事员，他们解决了我名字里“S”的问题，并询问我今后打算做什么。

感谢玛丽亚·莫特，她帮助我核实了许多事实和不确定之处。

感谢卡塔琳娜·阿德勒、克里斯托夫·布尔特曼、达维德·胡根迪克、马丁·米特尔迈尔和卡特娅·萨姆曼，他们为本书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和改进意见。